



## 中国与世界秘史 ——从“天下”型第三极到古今“一带一路”

王德奎

Wang Dekui, y-tx@163.com

**Abstract: 摘要:** 上海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文扬教授写的“70年对话5000年”，阐述中华文明诞生历史是一个“天下”型国家——“天下国家”，或称“内含天下结构的国家”——是“天下”型定居文明独有的也是必然的产物，是对“天下”型定居文明的守护，确保它不解体，不灭亡。文扬教授的这一思想与赵汀阳教授的书《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和杜钢建教授的书《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以及李后强教授的“天府学”等中的思想是连贯性和一致性的，是对新时代党中央致力于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的响应，作的新《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的梳理和探索，其中的缺环可以相互补充和校正。

[王德奎. 中国与世界秘史 ——从“天下”型第三极到古今“一带一路”. *Academ Arena* 2020;12(2):14-150]. ISSN 1553-992X (print); ISSN 2158-771X (online). <http://www.sciencepub.net/academia>. 3. doi:10.7537/marsaaj120220.03.

**Keywords:** 关键词：中华；文明；诞生；历史；人类社会；理想；美好；追求

## 目 录

## 《中国与世界秘史》前言

## 第一部分 中国秘史

## 第二部分 世界秘史

## 《中国与世界秘史》前言

## ——看不懂“盘古王表”，就看不懂中国和世界

上海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文扬教授写的“70年对话5000年”，阐述中华文明诞生历史是一个“天下”型国家——“天下国家”，或称“内含天下结构的国家”——是“天下”型定居文明独有的也是必然的产物，是对“天下”型定居文明的守护，确保它不解体，不灭亡。文扬教授的这一思想与赵汀阳教授的书《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和杜钢建教授的书《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以及李后强教授的“天府学”等中的思想是连贯性和一致性的，是对新时代党中央致力于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的响应，作的新《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的梳理和探索，其中的缺环可以相互补充和校正——

“一带一路”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不是从零开始，它远不止继承古丝绸之路的开放传统——李后强教授的“天府学”，立足于十大主要原理——第一个就是珠峰映射原理——青藏高原是人类共同的舞台，世界淡水塔，是人类最早活动之地；喜马拉雅山的珠峰海拔8844米，世界最高，誉为地球第三极，对周边环境有重大影响，如四川

盆地受到珠峰映射很大，在中国四大盆地中，只有四川盆地海拔最低（300米至700米），四川处于中国地形第二阶梯，但有横断山、邛崃山、岷山，有垂直分布的各种尺度的海拔高度（最高是贡嘎山7556米），使得生物种群呈立体分布，盘古、嫫祖、大禹诞生在此。为啥？黄河和长江主要源头在四川阿坝，岷江、沱江、嘉陵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等在四川；四川盆地古代是大海、内海、盆塞海，三峡出口打通后才形成外流型盆地，但三峡口子很小，外界低空气流难于倒入，加上四周环山，四川盆地具有海洋性气候，昼夜或一年四季温差不大，适合动植物繁衍，生活舒适，处于北纬30°黄金线上（在北纬26°至34°之间），有最佳温度和湿度（纬度45°内、经度120°内），于是有了4万年前“资阳人”和200万年前“巫山人”，多种生物发源和生存于此。四川位于印度洋板块与欧亚板块交界处、环太平洋地震带上，地质运动复杂，产生过攀西大裂谷，发生过多次强烈地震，形成了许多地貌特征。

杜钢建教授等推动的“人类文明起源于湖南热”，与巴蜀远古文明及中华各民族人，“本是来自世界第三极的青藏高原，那里的河流和堰塞湖因大地震溃坝形成远古巴蜀盆塞海，及其远古山寨城

邦海洋文明和远古联合国”不矛盾——杜钢建教授说：“从历史文物看，关于有巢氏记载的历史文物有四川绵阳地区盐亭天垣盘垭村的盘古王表龟碑。该碑相传是禹王时期所立的盘古王表石碑”——杜钢建教授的《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一书，揭示华夏文明是世界文明的源头，也推翻了 20 世纪考古发现所带来的判断，即北非与亚洲，包括西亚两河流域、东亚大陆的中国，同属于世界农业起源中心。“天府学”的《非洲多贡人与四川贡嘎山初探》赞成谢维扬教授的《21 世纪中国古史研究面对的主要问题》中说：中国古代史迄今未能在一系列主要和重要问题上建立起公认的解释的基础，这需要新世纪的古史研究有突破性的进展。2007 年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考察队邓涛等专家，在喜马拉雅山西部海拔 4200 多米的扎达盆地中，发现的一具远古完整的披毛犀头骨和下颌骨后，推证全世界的人类起源的“动物”类，来自青藏高原雪岭地带的“雪人”类。因为这表明西藏披毛犀，有带着对寒冷的适应能力基因，走出西藏，扩展到包括北极圈在内的欧亚大陆北部的干冷草原地带，最后演化为最成功的冰期动物之一。由此的贡嘎山视角是：人类进化到类人猿，与人类文明起源于非洲是有区别的。因为世界亚、欧、非、美等各洲都有类人猿，以及中国有类人猿，这只与生命起源来源于共同的动物祖先有关，而与后来人类文明起源的孵抱地的单一没有关系。即人类社会的起源，不是从一盘散沙开始，而与有早先优胜动物社会群体的传承性有关。

“贡嘎山雪人”约 200 万年前到非洲，其杂交后代约 20 万年前从非洲，沿陆路和海路走出，是已经进化到“智人”的一部分现代人种。何拔儒先生出生在四川盐亭县。何拔儒先生说“山海”就是“盆塞海”，《山海经》就是以“盆塞海”文明为中心的古联合国史地志书。何拔儒曾把《山海经》看成是《涸海古卷》，并以盐亭县桦溪河两岸，距今 8000 年左右犹存的规模宏伟、气势壮观的山寨聚落遗址，以及围绕山寨的处于半山腰的大围坪，延伸数百里的地貌作为具体考古平台，提出西部远古地震——堰塞湖——盆塞海——大围坪——海啸有关联的假说。理解让这种文明失落证据的四川盆地几经盆塞海、几经干涸，由此人类早期起源地的青藏高原，四周河流，江水入川，围绕古四川盆塞海形成过山寨城邦海洋文明，是先于农耕文明的。此期的迁徙实为围绕青藏高原与盆塞海的起落，周期流转，与后来盆塞海彻底干涸后的迁徙也有区别。这个“远古联合国时期”存在的事实，解决了“多地区起源”和“非洲起源”的中现代人种与中国类人猿不分的错误。

第二个孵抱期“远古联合国”的巴蜀盆塞海文明，有没有形成原始的先进的科学文化？斯克兰顿《物理学家多贡人》中的解读方法，提供了新的视

角。例如，斯克兰顿说：“过去也没有一个人类学家会去把一个简单的部落涂鸦和神秘的科学图表进行比较。但是当这样的比较一旦发生，我们就会发现二者令人惊奇的相似”。斯克兰顿对多贡文化研究提供的模板，正好供我们去理解非洲多贡人与四川贡嘎山“雪人”的现在品种繁多的现代人类学、考古学、科学之间的联系。因为在远古，嫫祖发明“丝绸”和开辟“丝绸之路”类似“高科技”——多贡人物理的贡嘎山解读比较——如果我们不怀疑原始的非洲多贡人有“高科技”的需要——因为最基础物理、数学原理，是不分时间、空间、物质、能量，逻辑也都能成立，是一种抽象思维“智力”，更是自然运动的组合，不然宇宙也不会诞生出“人”这种复杂的东西。在《被禁止的科学》书中，斯克兰顿的《物理学家多贡人》解读多贡人的许多物理学的例子和方法，都可以联系华夏上古文明和新中国解放后 70 年来的事情，作比较学解读。例如，斯克兰顿的《物理学家多贡人》后半部分，抬出国际主流前沿科学的“弦理论”来作评判标准，这使我们之间获得有了一个共同的比较基础——丝绸也类型“弦”。

斯克兰顿在《物理学家多贡人》中说得很清楚：“弦理论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时走在了科学研究的最前沿。弦理论认为物质的最小组成部分是一些微小的一维闭合圈，即闭弦，这些闭弦像橡皮筋一样按不同速度在振动。这些振动反过来就形成了不同类型的量子力和基本粒子……根据弦理论，能量弦的一个功能就是产生粒子的四种基本作用力——重力、电磁力、强作用力和弱作用力……在每年一次的宗教仪式上，多贡人会在地上画一个图形用来代表阿玛神的 266 个种子或者符号。这个图形由一个大圈和大圈里面的一个小圈所构成。在这两个圈之间的空间里画满了一系列的曲线……这个完成的图形和现代科学所画的量子弦的一种典型的振动模式图非常相似”。由于我们不是国家主体或国际主体的科学家，而是在没有科研经费和弦论专业培训下的社会基层，坚持业余自学走上独立研究弦论的道路的。所以我们类似是一个“多贡人”或“贡嘎山”多贡人，研究丝绸“弦论”——非洲多贡人生活在马里中部高原尼日尔河的一条近 200 公里长的有河湾的大峡谷；列维·斯特劳斯在《原始思维》书中认为：原始人类的思维是一种与现代人类思维一样具有逻辑性、抽象性和富于理智的思维方式，有其存在价值和理由。即原始人类也具有很强的抽象思维的能力，例如多贡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就很强，多贡人弦学的思想体系要比绝大多数的其他非洲民族来得更为抽象，而连接古今一带一路。

这里我们把文扬教授的观点抄录如下，以便读者对比研究。

数年前由四位顶尖学者倾十年之功完成的六卷本《哈佛中国史》——无论这部被认为代表了“新史学”中国史研究世界水平的著作取得了多高的学术成就，获得了多少赞誉，被多少名牌大学当作教科书，它的先天缺陷却是如此的显而易见——秦汉不是中华文明的“古典”时代，夏商周才是；秦汉之于中国，完全不同于古希腊和古罗马之于西方，两者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秦汉不是中国最早的一统时期，从“天下一统”的角度看，周朝是第一次，秦汉是第二次；没有春秋战国时期，就没有秦汉大一统国家的建立，不提前者，后者就好像天上掉下来的，这不是历史——周初建立的是“天下国家”，秦汉建立的也是“天下国家”，都不是普通王国或帝国，都是“天下”型定居文明独特的也是必然的产物。而整套“天下”体系和政治结构，则是周初的创造，并经过周朝八百年，特别是春秋战国五百年三大历史进程的反复糅合塑造，最终才孕育出现代化的“天下国家”秦和汉。

这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重大事实，周朝初期形成的“德治天下”和“协和万邦”伟大理想，直到今天的现代世界还远远没能实现。三千年来谁著史？三千年前谁领先？为什么故意无视呢？将中华文明中的秦汉对应西方文明中的古希腊古罗马，同称“古典时代”，表面上看似乎也算一种学说，但在人们头脑中产生的实际效果是什么呢？在中华这边，秦汉距今只有 2000 多年，原本的 5000 年文明史被一下子截掉了 3000 年，少了一大半；在西方那边，古希腊古罗马本是包括西亚和北非在内的古代地中海社会一部分，一旦被并入了所谓“西方文明”，原本只有 1500 年文明史的西北欧社会又接上了另一个社会的 1500 年历史，最后结果，好像西方文明史比中华文明史还要悠久，还要连续！对于西方学者明显属于“西方中心论”和“现代中心论”双重错乱的问题，实际上没必要再平等讨论，只能彻底扬弃。环顾中国历史研究领域里西方学术霸权留下的一个个“精神殖民地”废墟，中国学者还有大量的拨乱反正工作要做。

欧美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就是运用基于近现代欧洲历史经验的国际关系理论模型，研究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并使用比较历史学的方法进行相互对照，试图找出为什么中国的秦朝实现了统一，而欧洲始终四分五裂的根本原因。关于这项研究，出了不少学术成果，有人强调地理因素，有人强调文化因素，有人强调支配和制衡或进攻和防御的平衡因素，但都没有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美国圣母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许田波 2008 年完成的《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一书，代表了欧美学术界在这个领域的学术前沿。该书基于如下基本假设：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和近

现代欧洲在很多方面有相似性——起源于一个由许多国家组成的封建社会，有着频繁战争，经历了封建体制的垮台和官僚体制的形成，有一个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等，因此可以运用比较历史学、以国际关系理论和行为主体性为核心的理论方法进行对比研究。

研究的结果是：之所以近代欧洲的历史演进形成了一个多国平衡的局面，而中国却走向了统一，是因为春秋战国中的列国采取了“自强型改革”和“聪明的”军事外交策略，而欧洲国家却都采取了“自弱型权宜措施”的对应和相对“笨拙的”外交策略，所以前者的国家力量越来越强大，最终迎来了秦国的统一，而后者则由于“实施‘自强型改革’之晚和推行‘自弱型权宜措施’之早，继续使欧洲偏离强制型轨道”，而失去了武力统一的机会——不能说该书中使用的“竞争性逻辑的动力学”理论模型不学术，长达 42 页的中西文参考文献目录令人肃然，书中也不乏精彩论述和深刻洞见，但总体上，这项研究却又是双重错乱的典型。由于“西方中心论”立场，作者将不具备对称性的中国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西方两者硬塞进比较历史学的对称性案例研究框架当中，于是不得不忽略大量的差异性，勉强求得一个简化对比中的简化结论。又由于“现代中心论”立场，作者实际上是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框架下来分析春秋战国的历史发展，完全丧失了历史感。以上两个例子都说明，如果不改变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基本的出发点，无论是哪一种“新史学”，都是死胡同，出来的研究成果也都是误人误己。

自周朝之后，中国就是一个“天下国家”，与普通国家有着根本上的区别，所以，在涉及中国历史上各种重大的国家问题时，不能简化到与普通国家相提并论。由于“天下国家”数千年历史有一个“平天下”的“总事业”贯穿始终，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总成绩”——“天下”型定居文明的存续和发展、“广土巨族”的形成——这就决定了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独特性。例如，被西方学者认为是一个历史之谜的中华政商关系，就需要在“平天下”的事业中破解，而且会发现其独特性的根源深藏在三千年前的商周之变当中。《吕氏春秋》曰：“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又曰：“天下大乱，无有安国，一国尽乱，无有安家，一家皆乱，无有安身。此之谓也。”[3] 即是说，“平天下”的事业，在于通过“天下为公”实现全天下范围内的安国、安家、安身。

周朝初期，以政治单位的层级结构和政治伦理的礼乐制度为核心，周王室（宗主国）为顶级，封国和服国（诸侯国）为第二级，士大夫采邑（贵族领地）为第三级，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内含天下结

构的“天下国家”。然而，尽管是一个极具创新性的制度设计，细密而严谨，繁复而有序，“郁郁文哉”，却还是太超前于当时的时代了。管仲曰：“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老子曰：“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意思是，“天下国家”是一个整体秩序，这个秩序对全天下每个政治单位包括每个人都是有要求的，必须各安其位，各得其所，不可以自行其是。很显然，这太理想化，只在非常完整的、成熟的“天下”型定居文明中才可能实现。

事实上，周朝初期的天下，还远远不是一个完整的、成熟的“天下”型定居文明，甚至大部分地区都还属于化外之地。化外之地渐次开化，先后融入定居文明区，最终合并成为“天下国家”的组成部分，这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所完成的。70 年对话 5000 年，今天回看春秋战国时期这段对于中华文明存续和发展至关重要的时期，会发现这五百多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渡期，也不是诸侯称王称霸故事、诸子百家争鸣故事等流传至今的历史典故所能概括的。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实际上并行地贯穿着三大历史进程，而正是这三大历史进程的先后完成，才共同促成了秦朝的统一和秦汉帝国的建立。

第一个进程是国家的兼并和集中，数百个林立的小邦国，合并成为了七个大国，最终又统一成为了一个超大国家。周初封建，“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但这七十一个分封国，其实只是当时全天下邦国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按《逸周书》的说法，在封国之外，“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关于这些臣服于周朝的前殷商小邦国，或者就是小部落，没有留下多少文字记录，人们只知道周朝历史到了《春秋》记事的时代（隐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只剩下十几个方圆数百里乃至数千里的国家存世，绝大多数小邦国或部落都在过去的几百年里被兼并融合了。再到战国时代，又完成了一轮大淘汰，只剩下了七个更大的国家。从七百多到七个，集中度 99%，这是在干什么呢？如此剧烈的兼并融合，其历史意义是什么呢？

小国被大国吞并、国家数量越来越少的兼并集中进程，世界历史上不乏其例，也最容易纳入现代的国际关系理论框架加以解释。例如查尔斯·蒂利的“国家制造战争，战争创造国家”的民族国家理论等。但是，如果只看到国家，甚至将春秋战国时期的各诸侯国简单理解为相当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行为主体，就不能真正理解其历史本质和意义。很多学者都忽视了这一点：春秋战国诸侯国的特殊性在于，它们虽然都已是典型的领土国家，但是在观念意识中，“天下”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就是

群雄割据的所有领土国家的总和。因此，每个诸侯国都天生自带复兴天下的使命，各国君主都被告诫其言行要取信于天下，通过施行仁义“天下可运诸掌”。所以，就其本质而言，每个诸侯国都是在周初“天下国家”解体之后进入了“据乱世”阶段但仍然怀抱“太平世”理想的一个小型“天下国家”。

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历史演进是带有方向性的，国家的兼并和集中也隐含了某种目的性，并不是只服从于丛林规则。到了战国晚期，七国无一不建政府、定法制、备官守、设郡县，本质上已属于同一种制度甚至同一种风俗文化的“现代国家”，相比周初时参差多态、类别不知凡几的七、八百个邦国部落，已经高度发达，既不属于同一类别，也非处在同一水平。所以，春秋战国时期的确有一个“战争创造国家”的进程贯穿始终，但这八百年却是“天下国家”从早熟到成熟、从理想到现实的一个具有自身演化逻辑的阶段性的历史运动。而无论是欧洲近代早期，还是当代世界体系，并没有“天下国家”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与春秋战国不可同日而语。第二个进程，是散布于东亚大陆的众多蛮夷戎狄族群大规模同化融入华夏族群。

周初封建，在山东北封齐太公，南封鲁周公，开始有了齐国和鲁国。但齐国和鲁国所在地区的原住民分别是莱夷和东夷，再往南的淮河流域还有淮夷，在建国早期，新移民与原住民相互争地，杀伐不断。所以，齐鲁两国的发展壮大过程，同时就是夷人被同化的过程。及至齐桓公九合诸侯、尊王攘夷、救燕国灭山戎那个时期，齐国内部的族群同化融合早已完成。

晋国始祖是成王幼弟叔虞，始封于河汾以东的太原，该地的原住民是“群狄”，即商周时的豳、鬼方、鲜虞及后世的丁零、敕勒、铁勒、突厥等。《诗经·六月》所记周宣王遣尹吉甫“薄伐豳，至于太原”，《左传·昭公十五年》所记晋大夫籍谈有言“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等，即反映了晋初周人农民与游牧戎狄错居杂处、互有攻伐的情况。及至鲁庄公十六年曲沃武公为晋侯时，“谓晋人曰：‘与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晋师伐夷，杀夷诡诸”。晋献公时号称“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11]，大量的狄人部落如皋落氏、骊戎、耿、蒲、屈等，都在这一时期先后被灭国。再说秦国。与周人东进的方向正好相反，原属东夷居于曲阜的秦人，在商朝末年从山东穿越中原来到西北，取了周人故地。

根据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秦人嬴姓，始祖是东夷白帝。西迁时，嬴姓的一支去了山西，成了后来的赵国；另一支去了甘肃和陕西，就是后来为周孝王养马，并“分土为附庸”的秦嬴。秦仲被封为西陲大夫，为周王室“保西陲”，岁岁攻伐，

到秦文公五世中有三君死于戎难，历时四百余年与西戎混居杂处，相互融合。经过春秋战国时期，西戎整体即已全部被秦、晋、赵等国同化。《后汉书》中所记的西戎，只剩青海诸羌。楚国更不必说，连是否正宗的黄帝世系都大可怀疑，所谓帝颛顼之后、唐祝融之后、夏昆吾之后、殷彭祖之后、周始祖曰熊绎等各种认祖归宗都是自称的，无法考证，总之与中原族姓世系有别。建国之后，在南方不断融合百濮百越“群蛮”，在中原则将汉阳一带周初姬姓诸封国吞并殆尽。经过数百年同化融合，无论从种族上还是文化上讲，楚国整体上还是更接近于荆蛮。也是到了齐桓公称霸的时期，楚国崛起成为大国之一。

所以，若以齐桓公的霸业高峰时期为阶段标志，如公元前 664 年率大军灭山戎孤竹之年，此时距周初分封诸侯过了大约三个半世纪。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齐和晋，是中原对外扩张消灭戎狄，而秦和楚，则是蛮夷向内同化融入中原。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都是华夏族的扩张和对蛮夷戎狄的同化。第三个进程，与种族融合进程相一致且更为本质的一个进程，就是定居文明区域的同步扩大。一些学者认为，华夏族与蛮夷戎狄的区别，并非是种族上的，而是由生产生活方式所决定的。如拉铁摩尔，他的“移置理论”认为，在北方草原地带过着游牧生活的戎狄部落，实际上是被很早就居住在农牧交界线附近的边缘人口“推动”出来的，是定居的农耕社会人口和土地不断扩张的结果。也就是说，这些戎狄部落不过就是当初边缘人口中那一部分更能适应大草原自然环境的人群而已，种族上并没有根本的差别。《史记》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也是一个佐证。

周朝以迁居到岐下周原的周人氏族为文明主干，周人继承后稷、公刘的稼穡传统，推进农耕，发展农业，所以，当开始实施“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武装殖民政策后，基于农业经济的定居文明就在一个很短时期同步扩大到了各地边疆。这应该是在那个历史时期最大的一次定居文明圈的扩展。七十一个诸侯国，就是七十一个定居文明核心区，这应该没有问题。然而，农民集团在全天下范围内进行武装垦殖，这一战略性扩张行动的另一面，必然是对于全天下先前的采集者、狩猎者、放牧者部落领地的战略性抢占和掠夺。对于采集者、狩猎者、放牧者们来说，原本自由自在、居无定所、四处游走的生活，变成了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居住下来，每日在一片固定的田地里耕种，或在一座固定的房子里缁丝织布的生活，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巨大转化。

蛮夷戎狄融入华夏的过程，实质上也就是这个转变过程，并无其他。因为一旦定居下来，从事重复的农耕和养殖生产活动，就是一整套的新道德和

新风俗，文明发展的速度也随之加快，城市开始出现，成为定居文明的主要标志。反映在汉字上，“國”与“野”相对，《说文》段注：“距國百里曰郊”，“郊外謂之野”；而“文”也与“野”相对，《论语》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其中的含义是，只有武装边界之内的國才有定居文明，而边界之外的野，既可以是农耕也可以是游牧或狩猎，处于荒蛮世界。分封初期，最靠近“天下之中”的鲁、卫、宋、郑、陈、蔡各国，或是先王故都，或是文物重地，历经数百上千年文化浸润涵养，已成华夏族的人文渊薮所在，声教衣冠名区。相对于晋楚齐秦燕吴越等边疆国家，在这些中原小国里见不到“九夷、八狄、七戎、六蛮”各部落，也没有“被发左衽”、“断发文身”等风俗，文化上都是“君子国”，血统上都属“正宗”，也就是农耕定居文明的核心区。

但是，春秋战国五百年的历史大势，却是文化高人一等的定居文明核心区注定被半开化的边疆大国先后灭国。晋楚中原争霸、齐秦东西二帝，核心区的老贵族国家都先后成了大国霸政的牺牲品。如果抛开国家的表象，仅从蛮夷戎狄被同化并转入农耕定居生活方式的先后顺序上看，其规律即表现为：率先转入定居的地区一定会出现文化和经济上的昌盛，但尚武精神也迅速消失，国力随之衰落，随着晚近转入定居的地区在四周崛起，国力增强，前者终将被后者征服吞并。这一可以被简要归纳为“早定居者衰，晚定居者胜”的规律，不仅只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实际上贯穿于全部人类文明史。从古埃及古苏美尔覆灭到雅利安征服古印度，从古罗马帝国亡于北方蛮族到蒙古大军横扫欧亚大陆，从东胡女真入主中原到欧美列强统治全球，各文明历史概莫能外。综合以上，春秋战国时期的无与伦比之处在于，这五百年里包含了国家的兼并集中、种族的同化融合以及定居文明区域的层层扩大这三大历史进程。而秦朝大一统的实现，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国家的建立，则是这三大历史进程共同的结果。

最终，通过这三种历史进程为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创造了最佳条件，并在“早定居者衰，晚定居者胜”历史规律的作用下经过上千次战争决出了秦国这个“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的终极胜利者，天降大任于斯人，由它一举完成了大一统历史使命，重建了周初开创的“天下国家”。70 年对话 5000 年，今天的中国人应该认识到，春秋战国时期这些惊心动魄、波澜壮阔的历史运动，在整个世界的文明史上，不仅在当时是空前的，直到今天也还是绝后的。翻遍世界历史，找不到任何可以与之相比的时期。

西方学者看中国，一直都有很多难解之谜，甚至研究越多，谜团反而越多。导致这种情况出现，

本不是因为中国问题有多神秘、多难懂，归根结底还是西方学者自身的问题。概言之就是两大先天缺陷：一个是老毛病，就是先入为主的“西方中心论”立场，用西方文明做标准评判其他文明；另一个可以叫做不由自主的“现代中心论”立场，用现代社会做标准评判古代社会。进一步讲，这两个先天缺陷是一病二症，因为西方文明本身就是一个没有历史的现代文明，其巅峰只出现在近代之后，所以偏于“西方中心论”也必然同时偏于“现代中心论”。结果就是，大多数的西方学者，既不能很好地理解其他文明，也不能很好地理解古代历史，两个偏向叠加之后表现为：在面对最具历史特性的中华文明时完全混乱，就像是带着一副近视眼镜遥望高山大川，怎么看也是模糊一片。

何为基本的出发点？既然世人公认，只有中华文明是唯一从最初的原生文明延续发展至今没有中断的文明，那么理所当然，也只有中华文明最适合当作一种标准，用来对比其他文明，进行各种衡量，并描述出人类文明史的一般发展规律。在这个标准中，春秋战国这一历史时期的本质就是：它是“天下”型定居文明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在这一独特文明自身的发展逻辑中，夏商两代是“天下”型定居文明的成型阶段，周朝八百年是封建制“天下国家”发展阶段，从秦朝开始是郡县制“天下国家”发展阶段。按唐代柳宗元的看法，在制度演进上，郡县制取代封建制为势所必然，也是“公之大”之后的自然结果。从“势不可”到“势之来”，从“私天下”到“公天下”，从周事“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到秦事“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归根结底，这是“天下”型定居文明自有的制度演进逻辑，只有中国人自己看得清楚。如果不是受到“西方中心论”历史观的干扰，今天的中国学人断不该连唐代古人那点见识都没有。

从柳宗元到现在，中华的“天下”型定居文明又按照自身的逻辑发展演化了1200年，并成功汇入了全球化时代。立足于当下世界回看从“势不可”到“势之来”、从“私天下”到“公天下”的历史发展大势，难道不是来到了“世界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的新时代了吗？而包括了整个国际社会的“公之大”，不正是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吗？从周初的“天下国家”，到今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属于“天下”型定居文明的三千年演进脉络，不是从《圣经》叙事到“现代性”这个西方文明演进脉络，两者在“公天下”大势还是“私天下”大势的区别中泾渭分明。其实，反观西方文明，无论是真实的1500年，还是虚假的3000年，都没有经历过“天下”型定居文明的自发演进历史，当然也就不可能在全球的“天下”时代为全人类指出共同发展方向。

## 第一部分

### 中国秘史：从盐亭学到重庆学，从历史智能到人工智能

#### （一）类比暴露组学和基因组学联系的研究

##### 一、暴露组学与口传智慧论

读加拿大滑铁卢大学于淼博士2018年11月12日在科学网的博文《暴露组学的黎明》，其中类似的“主流物质数据库的覆盖情况”图，有60个从1到708206的自然数中选的大小不同的数字，填写在被六种颜色组成类似多角形花瓣曲线交叉分割的区域内。

此图联系邱嘉文研究员2018年2月14日在科学网的博文《数学，微积分，概念关系》中，类似的“数学，微积分，概念关系境界”图——这不是五颜六色类似花瓣曲线图，而类似多线条交叉串联起的被五种颜色区分的椭圆形的28个气球。对这两者内涵的相似，类比口传智慧和文本智慧很有感触。于淼是2011年以来哈工大化工与化学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他2007年在英国Warwick大学获理学博士学位，又先后在丹麦奥胡斯大学、美国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而邱嘉文研究员是珠海诚开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副经理。他们两人从事的工作不同，但他们的科研分析的“心灵的境界”，却有相似的地方——《数学，微积分，概念关系》的文字很少，不妨全摘录如下：

“去年9月女儿考上了心仪的大学和心仪的专业，想到当她考上高中的时候，我曾送了她‘心灵的境界’说。这回，她感到高数学起来有些困难，于是我送了她这幅图。她表示：‘可以。’现在分享给其他家长的孩子”。把邱嘉文研究员归类分列画的“数学，微积分，概念关系境界”图，联系于淼教授表达的“主流物质数据库的覆盖情况”图，是为能更好地阐明“暴露组学”比“基因组学”科研的多头性，以及其中复杂关系的联系，由此来理解口传智慧比文本智慧的深邃。在《暴露组学的黎明》一文中，于淼教授说的“暴露组学”很新鲜，由于很多人是第一次才听说，不妨摘录一些如下：

“暴露组学从名词提出，到现在大概10年有余。从2017年开始，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今天的暴露组学，大致处于20年前基因组学的发展阶段。美国最早开始提暴露组学的是NIH——加州伯克利、埃默里大学都是暴露组学起步比较早的地方。西奈山医学院2017年成立的美国第一家暴露组学研究所，是借助美国医学院间的网络，来推动暴露组学研究。2018年11月在美国西奈山医学院召开的第二届暴露组学会议，就相当于20年前基因组学的发展阶段。也许接下来的10年内，它的研究经费与成果可能出现“井喷”。

暴露组学研究什么呢？它的基本问题跟基因

组学差不多——一个人健康与否，基因组学认为更多依赖基因。伴随测序技术的进步，针对个人的测序，已经是可负担的了。但暴露组学认为，人的健康状态除了基因外，还要考虑表观遗传、蛋白组、代谢组与日常暴露，甚至还要考虑诸如地理位置、社会经济地位、肠道微生物组等的作用。

健康是目标，这里预测变量却非常多，很明显不是一个单因素模型。所有暴露组学属于面向问题的高度综合性学科，基础包括不限于统计学、生命科学、数据科学、社会科学、环境科学、分析化学、毒理学、公共卫生、医学、遥感、传感、自动化、信息科学等诸多学科；目前并不知道哪个学科更重要。但很明显，任何一个学科都可能成为回答终极问题的短板，而且几乎每一个学科，都有短板且学科间交流壁垒不是一般的高。例如，从环境分析化学与数据科学这两个学科来说，当前如果要评价暴露水平，首先得知道有什么？

也就是目的性分析——但就暴露组学而言，并无法事先知道样品里有什么？所以更多研究是借鉴代谢组学的方法，利用高分辨质谱，来对未知物进行信息采集。这里信息采集的终点是色谱质谱峰，然而高分辨质谱全扫描的结果，往往混杂大量源内反应形成的加合物、碎片或物质本身的同位素峰；这导致虽然可以同时收集上万峰，但形成这些峰的化合物可能只有峰数的十分之一，且这些峰会共相关。

如果想讨论物质间的相关性，而使用了峰数据，那么估计会有偏。同时，峰识别的算法，也通常对全扫数据很不友好，会看到大量不应该被当作峰的数据被选成了峰，积分效果也是一塌糊涂。这一点，从分析化学角度是不可接受的。另一个问题是对未知峰的标注，现在流行的方法，是先跑全扫筛出差异峰，然后把那些峰去打二级质谱，有的则直接对差异峰去标注。这里使用一级质谱定性是风险很高的，下游的通路分析会因此不靠谱。而且就算找到一级质谱的匹配，也无法确认是否是同分异构体。而同分异构体的生物活性千差万别，更不用说当前主流数据库各搞各的，覆盖范围有局限性，唯一的标注也并不意味定性。二级质谱定性当前有很多软件可以做，但基本都是欠拟合状态，训练用的数据基本依赖可获取标准或社区用户共享，想做未知物十分困难——当前主流物质数据库的覆盖情况，如“主流物质数据库的覆盖情况”图中最大的三个物质库还没列，因为数据搞不到，或搞得到但处理起来太费劲。

目前能汇总整理这些信息的地方并不多，而且处理有些库的数据时，发现数据整理问题很大，格式不标准。如果不是专业人士，光是数据提取就得懵圈。另外，分析通量也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即使分析上的问题都解决了，下面的问题就是统计

分析——用什么模型？为什么用这种模型？眼下都没法检验，也谈不上哪个好哪个坏，其实都不怎么样。统计模型的复杂性可高可低，一般说高了，过拟合，而低了，欠拟合。不是说不能一次性尝试几百种统计模型或机器学习模型，关键如何解释？线性模型与层级模型是两种最有解释力的模型，但预测性谁能用谁知道？直接上神经网络不是不行，就是不好解释。精巧的统计模型面对错综复杂的数据，难怪临床上喜欢多元线性回归。另一个相关问题是代谢物或暴露物有差异，环境研究可能没有分组，或者说分组后并无法进行效应预测。虽可以用效应诱导分析来做，但效应终点还是相对固定的。

此时预测多个毒性终点，不过如何把荷质比转成结构，也可说是一团乱麻。多个毒性终点也意味着不同的健康模型，有没有基于多个健康模型的宏模型呢？回答这个问题，只能依赖合作研究。跟健康相关研究还有个问题，就是无穷混杂因素。例如，有的知道年龄、性别、种族等；有的在建模时是忽略的，甚至根本意识不到可能是混杂因素。

暴露组学研究是点对多点做相关——健康研究的真相，是多对多互相影响，控制实验当然是必要的，但如果数据是来自观测研究，那这问题就几乎无解。受研究共同体的视野限制，如果只关心那些强信号，可能忽略了那些弱信号。但这里的强弱，是仪器决定的，不是生物学意义决定的。或许很多人的研究，可以讲一个故事，但很难回答一个真实的问题。这只是现存问题的很小一部分，每一点的进展都可能对上下游研究产生颠覆式影响。

对研究方法论的标准化、可重复化及与对基础研究进展的快速整合，是必要的。或许十年后回看今天的暴露组学，很多人可能惊叹：为什么大量的资源被浪费在了毫无意义的研究上？不过这就是科研的现状——无法预知今天的愚蠢，但更重要的则是要意识到当前的问题——暴露组学处在新研究的黎明期，即幸运也不幸。幸运的是大家起跑点都差不多；不幸的是只要跑，摔跟头几乎是必然的。

以上摘录《暴露组学的黎明》的文字很多，关键是把“暴露组学”对应“口传地方史”考证，把“基因组学”对应“书报公开史”考证，想说明“口传地方史”考证，比“书报公开史”考证，复杂和困难的问题很多。为啥要作“口传地方史”考证？正如暴露组学研究的基本问题跟基因组学差不多——是关系一个人健康与否？基因组学认为更多依赖基因，但暴露组学认为，人的健康状态除了基因外，还要考虑表观遗传、蛋白组、代谢组与日常暴露，甚至还要考虑诸如地理位置、社会经济地位、肠道微生物组等的作用。

延伸这种类比——“口传地方史”考证研究的基本问题，跟“书报公开史”考证差不多——都是关系

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否? 2018年11月5日在上海举行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的主旨演讲中说: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 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有风平浪静之时, 也有风狂雨骤之时。没有风狂雨骤, 那就不是大海了。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 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 大海依旧在那儿! 经历了5000多年的艰难困苦, 中国依旧在这儿! 面向未来, 中国将永远在这儿!”。

中华民族的复兴也如“大海”----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 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5000多年的艰难困苦, 中国依旧在这儿! 面向未来, 中国将永远在这儿”。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艰难困苦的历史, 主流一般更多依赖古代保存下来的书籍文献文物, 伴随田野考古技术的进步, 针对书籍文献文物的古史鉴别测序, 认为已经是可负担的了----这被称为“书报公开史”考证研究法。无需讳言, 这影响我国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理论研究的进步。因为在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艰难困苦的历史中, 还有一些值得关注的“口传地方史”考证研究。虽然“口传”有误或虚假的时候很多, 但有些家传的往事, 涉及社会处理不当, 当事人或知情人把它忍耐下来, 暗中或不经意间口传给后代成为家庭、家族或地方人群, 作为教训或注意回避的处世“记忆”, 相对公开的书本知识、智慧, 或许也可叫一种“口传智慧”。

笔者对“口传地方史”与“书报公开史”的比较和研究, 起源于青少年时代家乡四川省盐亭县龙潭榨溪河畔一些类似盘古、岐伯、嫫祖等远古地理人文的传说, 与公开的书报说法不同; 以及近现代革命斗争事件及人物的传说, 与地方管理部门的操作不同, 不知缘故。

例如, 2017年6月间四川省嫫祖文化促进会在绵阳市新世界宾馆召开学术研讨会, 中午饭后一些参会代表在宾馆大厅休息交谈。坐在笔者旁边一位来自成都的姓王的老学长, 他告诉退休前是在四川省社科院作党史研究的, 职称是研究员, 这使笔者大感高兴。

就问: “王老师, 我出生的四川盐亭县龙潭榨溪河畔地区, 1936年以前是一个革命老区。1934年10月龙潭地区发生的‘西山坪’共产党游击队被国民党军队包围事件, 延伸到1935年3月申秋成和何登甲等300多共产党员的游击队战士被砍头的英勇就义, 刑场是公开示众的, 所以在当地的传闻很多。直到1980年代中期盐亭县文化馆出版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四川盐亭县卷》一书中, 其中的民间故事还收集到王映维等写的龙潭地下党游击队领导人申秋成(申家成)和何登甲领导当地群众进行斗争的故事。但书出版后又用笔注明这类故事“作

废”, 问文化馆赵方铭馆长, 他说是县上领导通知申秋成和何登甲等300多英勇牺牲的盐亭县地下党游击队员是‘叛徒’。像这种相差很大的口传, 王老师, 你搞党史研究不?”

王老师说: “我们不研究。我只研究公开发表的书籍和刊物上发表的资料, 以及允许公开看的档案材料。对我们来说, 这已经够了”。笔者明白王老师说的“够了”, 类似“基因组学”的测序负担。而笔者说的“口传地方史”考证有类似“暴露组学”----“除基因外, 还要考虑表观遗传、蛋白组、代谢组与日常暴露, 甚至还要考虑诸如地理位置、社会经济地位、肠道微生物组等的作用”。

例如笔者单就龙潭地下党游击队领导人“申秋成”这个人物的名字考察, 遇到过很多的困难。1991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102万多字的《盐亭县志》, 407页的“第13篇党派群团-第一章中国共产党-第一节中共盐亭地下组织”下, 开头“1、特支、支部:”就有1929年“五一”劳动节“中共盐亭特支成立, 范宏先任书记, 余国政任组织, 侯伯英任宣传; 10月, 成立天垣申家沟这部, 书记申家成”。

笔者就出生在这里“天垣申家沟”附近的王家坪, 母亲就出生在与“天垣申家沟”接壤玉龙镇申家沟, 名字就叫“申家蓉”。这里山区农村, 申姓人家很多, 密集分布在多处沟、坪、坝、湾, 且申姓同名, 甚至一个人的几个名字, 在几个人身上同时出现相同的现象都有。申秋成、申家成、申信然等三个名字, 同时期在天垣乡对应的, 笔者知道的至少有四个人, 就出现全同名或交叉同名的情况。为什么呢?

原来解放前天垣和玉龙镇地区农村的风俗习惯, 一般成年男性的名字分“本名”和“号名”两个。这是问父亲才知道的。例如, 笔者父亲的名字, 社会上都叫他“王治平”, 但他说这只是他的“号名”, 他还有父母按族群字辈取的“本名”叫“王修齐”。父亲还说, 与我们天垣王家坪同族同村不远的赵家沟的冯家坪, 也有一个比他大20多岁人, 也叫“王修齐”。可见同族同村同名的现象, 也不奇怪。也许正因为这种同名, 父亲才有自己改名“王治平”的。但社会上, 别人到底是叫你“本名”还是“号名”, 是按别人的习惯。例如, 父亲说他的弟弟, 就是笔者的么爹, 社会上都叫他“王修治”。父亲说“王修治”还有“号名”, 叫“王平儒”; 但知道的人不多。

这种类似“暴露组学”属于诸多学科的现象, 如果编写党史的老师对此情况不是完整了解, 写“申秋成、申家成、申信然”的事情就有混淆。因为笔者小时候, 就见过天垣王家坪圆山下申家湾的一个叫“申家成”的人, 他人长得高大, 一脸麻子。刚解放划为地主, 但夫妻二人没有孩子, 财产也不



多，类似“雷明远”式的“穷人中的豪强”，爱帮各阶层的人家评事。据说天垣场的修建，他都出面拉拢他帮打工过的大户人家，1955年他才死的。笔者还听说住在天垣新作坊的一个地主也叫申秋成，解放初才死；解放前在当地很有名气。

由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2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盐亭县历史》一书，56页说：1935年3月26日在三河乡的大观子赶庙会，何登甲和申秋成“与团丁发生冲突，高灯团防以何、申二人不同心协力反共清共、组织暴动以土匪犯上为借口，将二人当场抓捕，在高灯乡梅子坡将何申二人刀劈处死”。据口传这里申秋成（1904-1935）是一位共产党员，又名申家成、申信然，盐亭天垣乡申家沟的人。同一时期在天垣申家河坝还有一个叫申信然（1913-1942），又名申家成、申秋成的人。《中国共产党盐亭县历史》一书24页说他1929年参加共产党，“又名申家成，1933年参加国民党别动队，抗日战争时期阵亡于江西”。盐亭口传申秋成和何登甲（又名何增甲）作为龙潭地下党游击队本土实际的领导人，是人还是鬼？

《盐亭县志》、《中共盐亭县志》等书刊中，记载天垣乡申秋成、申家成、申信然等三个名字相同的这两个人历史，与当地口传的实际情况有没分清和弄混的呢？笔者1970年大学毕业分配重庆顺路回老家天垣，听到的一些事情是，“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从县城传出的解放前的敌伪档案中，在天垣解放前由于同乡同村同姓多名交叉的现象普遍，而一些乡和村里的领导干部以及部分群众，并不是一定认真对证查实，想当然地图痛快，张冠李戴，弄错弄混淆的也有。“文革”后这类乡和村里的领导干部，有的仍在继续任职。即使群众有反映，他们也并不想去理清。被弄错的人，也觉得国家整个大方向都好了，那些“不痛快的事”也影响不了啥，加之那些乡和村里的领导干也是熟人或沾亲带故，也就不追究了。这对今天的书刊不免有影响。

私塾是私家学塾的简称，私塾成为一个社会常用词汇是近代以后的事情，以示与官立或公立新式学堂的区别。古人称私塾为学塾、教馆、书房、书屋、乡塾、家塾，等等。私塾有多种：有塾师自己办的教馆、学馆、村校，有地主、商人设立的家塾，还有属于用祠堂、庙宇的地租收入或私人捐款兴办的义塾。所以说是“私塾”，有时也不一定是私，如一族人用某项公款办的义学，也都有“公”的成份在内。私塾在我国解放后已经不存在，这里重提私塾，是想类比“口传地方史”现象在个别地方、个别时候的存在。因为类似今天盐亭县和四川省内在改革开放以来，兴起的对远古盘古、岐伯、嫫祖传说的考证和出现的文化促进会等现象，主要也就是缘于“口传地方史”现象的影响，但真实性是否

准确，考证起来缺环不少，难度也很大。

但像2017年11月12日由中共绵阳市委组织部、宣传部、党史研究室、中共江油市委，在江油共同主办的纪念王右木诞辰130周年学术研讨会，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原副主任、研究员李蓉蓉同志出席。2017年11月13日《绵阳日报》发表她的《不忘初心高举旗帜不懈奋斗》发言摘要文章中：“《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显示，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于1920年3月12日在重庆成立，这是目前国内发现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这份重要文献的发现，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提供了新的证据，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也是中国社会发展历史必然”。这里中国共产党1920年3月12日在重庆成立，在盐亭也有类似“口传”，因为时间近，可以作些探索。

把“1920年3月12日”前的历史之谜看成类似“暴露组学”，真相已经远去。今天的盐亭，像打开的一本书。但看到的“书报公开史”的文章、资料，与被“赶走”的考证“口传地方史”的一些真实不同，例如，众所周知的因“正能量”、“主旋律”、“底线”等要求，也是可以理解和允许正常存在的。那么盐亭为啥会成为“1920年3月12日”之谜解开的一把钥匙，这要从盐亭陕西会馆到盐亭存古学堂，与马克思学说最早“口传”入中国说起。因为近现代中国问题的解决，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与近现代生产革命的工业发展有关；而盐亭与马克思主义的天然联系，一是它的古文明，二就是它特殊的地理环境与生产经济的历史。

据《中国共产党盐亭县历史》一书介绍：盐亭自古以来就有祭祀先蚕嫫祖发明栽桑养蚕煮茧抽丝制衣、衣被天下的历史。盐亭县位于四川盆地中部偏北，居嘉陵江、涪江两江分水岭。盐亭历史悠久，初为《禹贡》梁州孱亭之域，公元535年的西魏废帝时，因治所近盐井改名盐亭县。到公元584年的隋文帝时，县令董叔封抓住县民善于栽桑养蚕这一传统优势，革新技术大力发展，致使当时盐亭的蚕丝产量跃居三台郡之冠。在唐代，县北安家场所产“鹅溪绢”，细密光滑，色泽柔嫩。到宋代鹅溪绢织造遍及全县。明《一统志》有“天下皆称鹅溪绢”的记载。1869年清同治时，盐亭被列为全川蚕桑重点区之一。1920年盐亭麻秧乡被誉为“蚕丝大王”的吴家义，买回缫丝机具，雇用缫丝工人，日产丝33公斤，初在成都出售，后又运到上海市场出售。而盐亭的盐业长期居私营工业之首，是盐亭重要的经济支柱。到民国有盐井2000多口，盐工3000多人，井盐年销售量312万公斤，66%销往外地10余县。1847年起，盐亭各地农民、盐工揭竿而起，在反封建、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前仆后继，勇

往直前。

2018年中央民族大学姜秀荣教授在《光明网-学术频道》，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翻译之梳》文章认为：“马克思主义在1899年最早传入中国的观点，无疑更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在1899年最早传入中国的观点”，只属于党史研究中归类“书报公开史”的考证结论，不属于“口传地方史”的考证结论。所以针对“马克思主义在1899年最早传入中国的观点，无疑更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笔者不从属于党史研究中归类“书报公开史”作考证，而从属于“口传地方史”考证作回答，认为时间可分两段。

例如，在盐亭从陕西会馆到存古学堂就有“口传”第一段，针对1689年9月7日康熙政府与俄罗斯帝国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之后，外国侵略者占领中国疆域演变到1856-1860年，英、法在俄、美支持下，联合发动的侵华战争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仍肆无忌惮。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22篇关于中国事件的评论，包括马克思1858年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433和5438号写的《鸦片贸易史》，时间就在1858年被“口传”注意到。

再“口传”传入盐亭的时间，是1873年因美国经济开始的萧条，随着凝聚为美国1882年的《排华法案》，使得大批因种族歧视搞垮了经营，把从1868年中美签订《蒲安臣条约》后移民美国的华人、华工及家人，被迫暂时赶返回中国，由此1868年开始有马克思的一些观点口传人盐亭---其中也与口传1649年出生的盐亭历史名人张鹏翻有关。张鹏翻中康熙时的探花，1689年他出使帝俄参与签订《尼布楚条约》。口传他外斗帝俄，内斗“内鬼”，争得大清丧失主权辱国，是与他在家乡当难民、灾民、饥民、移民时的感受，以及了解中华文明的起源有关。这个“口传”变为公开出书的，例如，四川盐亭原五龙龙潭中学教师任周浩先生，是十七届中共中央委员、全国政协第一副秘书长及担任过四川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常务副省长，云南省政协主席的杨崇汇同志的初中老师，2016年他出版的《黄昏练》一书中说：“官至宰相的张鹏翻，盐亭县折弓乡人，家境贫寒。父母双亡后迁居遂宁黑白沟，依靠叔父生活。叔父死后又迁居西充县槐树镇禅洞湾接受名师教育，攻读成才，中康熙时探花。因代表大清出使帝俄，签订有名的《尼布楚条约》，为国家争得了乌苏里江的大片土地，升任为大理寺少卿。后又奉旨治理黄淮两河有方，深为康熙帝赏识，功成封为史部尚书。雍正三年被诬冤死，查明后雍正追封张鹏翻为清国文华殿大学士，领宰相衔”。

由此的影响，马克思1858年谈论鸦片战争对

中国充满的正义感和同情心的传闻，开始在盐亭传播。第二段马克思主义1899年前在盐亭“口传”最大影响，是震撼世界的1871年3月18日的巴黎公社运动。巴黎公社起义仅存72天，被处决公社社员超过3万，监禁4万多，流放又近万人。但巴黎公社一宣布成立，马克思就开始细心搜集和研究所有关于公社活动的消息。在1871年4月18日总委员会会议上，总委员会把就法国“斗争的总趋向”起草告国际全体会员的宣言的工作，交给了马克思。1871年5月30日，即巴黎最后一个街垒陷落的两天以后，总委员会一致批准了马克思宣读的《法兰西内战》的定稿文本。《法兰西内战》最初于1871年6月13日左右在伦敦用英文印成35页的小册子发表，很快销售一空。不久又出了英文第二版，在工人中间减价销售。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通过总结巴黎公社经验，阐述了人民至上、民主反腐、敬畏责任和勤俭节约等思想，指出巴黎公社是“生产者的自治政府”，“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时政要闻的巴黎公社起义在中国的传播，虽在巴黎公社被镇压40多天后，才有一家清朝的报纸报导法国“官军戡乱”，将“乱匪”发往充军，“以肃典章，而除凶孽”。

但在盐亭较正面的“口传”，也类似与一位张家人物关联---1871年清政府驻法国使团英文翻译、23岁的张德彝，目击巴黎公社社员的英勇气概后，在日记和寄往中国的书信中，评说那些“叛勇”---公社社员“有仰而笑者，虽衣履残破，面带灰尘，其雄伟之气，溢于眉宇”。类似张德彝的这种评说与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中的一些评说，结合在一起的敏感时政要闻，在中国的“口传”回荡久远，在盐亭也有回响；直至50年后中国人自己组织建立共产党。这种“回荡”，在盐亭从陕西会馆到存古学曾经传出最多，为啥？

## 二、从陕西会馆到存古学堂

早在1646年11月张献忠的陕西农民起义，张献忠兵败盐亭和西充边境的凤凰山而亡。为啥张献忠在盐亭会兵败而亡？与盐亭的古文明遗存以及这种古文明，存在内乱频发，分裂、战争、灾荒、瘟疫不断等，造成类似“湖广填四川”的数千年的兴衰历史的轮回教训，引起当地的警觉和抗争文化等因素，也有关。从盐亭榨溪河畔到梓江、涪江流域有数百座密集寨子山的古生态景观与寨子山下半坡的大围坪台地。如从盐亭境内盘古圣地的天垣盘垭村袖头山、五面山以及螺祖故里的云毓山、烟鼎山、螺村山出发，如目角寨、新寨山、大牛山、寨子山、仁和寨、保和寨、大碑寨、母猪寨、子母寨、四面山、罐子寨、猫儿寨、麒麟寨、凤凰寨、锣锅寨、毛达寨、金铧寨、点灯山、古龙山、炎台山、大佛寨、长生寨、摩天岭、烽龙寨、四方山、佛贡寨、

金垵寨、蚕丝山、水丝山、马鞍山、太皇山、石马山、阳鹤山、白象山、丝源山、王崗咀、打鼓山、铜钟山、笼子寨、玉龙山、高粱观、仁广寨、江家寨、大寨山、伏龙山、刘家寨、白虎寨、青龙寨、登高寨、南瓜寨、水秦寨、二龙寨、太阳寨、七庙寨、空相寨、天生寨、狮子寨、金凤寨、金龙寨、观台山等 60 多处古山寨，它们一般相距 3 至 4 里，海拔约 600 米，上下相差约 80 米。它们的主要特征是，山寨半坡的大围坪一般在海拔约 450 米处，弯月形包围山寨，或背靠山寨。现在 95% 以上的农户已从不当道的大围坪搬家到沟坝或靠近沟底的不规则的台地居住；并且古山寨城邦原有建筑已经荡然无存，但早在明清时代及以前修建、留存的一些小寺庙，被兼容变为当地人家子弟的书院也不少。而这里远古文明的心灵，没有被撼动过。

例如，盐亭石牛庙乡农民范炳南，清末科举秀才，一生不涉仕，在家只对西汉史学家刘向传承的“抗争文化”作推演研究。如刘向的《说苑·指武篇》中“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这类“抗争”，既有政治，也有民生的特征。“抗争”影响经济，助长社会对立。但道理一说就懂，一学就会，一会就用；一用就有自组织、他组织；本地性、普世性；而选择中有对抗，就需要法治。但法治是分法律和效法的，这两者的交叉，盐亭远古盘古-嫫祖传说有“法天法地”的效法，即法是天，是地。天，不怕变天。天变了，还是天的规律；地变了，还要地的勤劳。所以西汉学者刘向理解的“抗争”是：大凡动荡暴力兴起的时候，其实都是百姓不服以现状；如果文化与现状不改的话，那么暴力活动就会更加猖獗。范炳南认为，“抗争”会出现社会动荡，或暴力，是百姓不服现状。范炳南在调研近代暴力的“抗争”与“文化”的对立，相互关联类似“湖广填四川”的动乱暴力对土著的冲击，以及类似张德彝对巴黎公社起义的评说与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中的一些评说，结合在一起的时政要闻口传感生自持几代殷实，满门书香，应为培育子孙后代去对付和解决这种现象。

于是范炳南独自拿出资金，长期聘请有关教师在家开办一所私塾，既教本家几个子弟，又供同族及村内儿童免费读书。在盐亭，这样的私塾和存古学堂很多。范炳南的大儿子范仲纯，受他的影响和指派，早在 1906 年就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求学，专攻马克思学说。1910 年学成归国后范仲纯开始在自己家私塾和盐亭县里新潮人士家庭朋友聚会中，讲解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好东西。石牛庙乡后继的还有蒙思明，1927 年到日本东京留学，1944 年到美国哈佛大学进修。

盐亭的存古学堂，早于 1896 年冬天湖南湘乡人蒋德均（1851-1939）提出创办类似“中学为本，

西学为用”的“时务学堂”。而且蒋德均曾任四川龙安（今天绵阳市安州区）知府时，到过盐亭，了解盐亭的存古学堂的经验。后因他父丧返湘后参与矿业经营，并向湖南士绅新秀谭嗣同、梁启超、张之洞等口传过。而盐亭存古学堂与盐亭陕西会馆的渊源的联系，是 1646 年张献忠兵败盐亭而亡，大西政权宣告结束，大批陕西籍的老兵及其家眷，有的改姓埋名，有的削发为尼，留在盐亭当地隐居生存下来。盐亭很多山寨传说的“牛儿大炮”和发现金银财宝，就有转战湖广、江西的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大军有关。从 1665 年（康熙四年）四川巡抚李国英、张德地奏准垦请清廷招民垦荒，大批湖广、江西、福建、陕西、山西等移民移居四川及绵阳、盐亭，各地移民和商旅不忘根本，集资修建本省会馆。

例如，绵阳 1742 年建湖广馆，1746 年建山陕馆，1755 年建福建馆，1758 年建江西馆，1770 年建广东馆等，这些留居经营在盐亭的张献忠陕西籍老兵及后代，他们中出现的发家致富者和盐亭土著中艰难活下来的有识之士，与人民共同体验“湖广填四川”的苦难和反思上古文明兴衰轮换的总结，才使盐亭陕西会馆和存古学堂走出了不同的路---与追根溯源私塾从西周时期，塾只是乡学中的一种形式；当时学在官府，官师合一，塾的主持人是年老告归的官员，负责在地方推行教化。存古学堂虽然是清末为“保存国粹”而设立的学校，蒋德均、谭嗣同、梁启超等 1897 年 11 月 29 日在长沙正式开学办“时务学堂”；1902 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向清廷最早提建立存古学堂的理念，和 1905 年他首先改武昌经心书院为存古学堂；四川国学院之前期存古学堂设立于 1910 年等，主张“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救亡图存，为妥为处理“中学”（国学）与“西学”的关系，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西教育文化交流的原则与方法等相比。

盐亭不同是从 1665 年体验“湖广填四川”苦难和反思，盐亭的会馆和本土大批学人对“存古”保存的认知，与后来洋务派张之洞等人的不尽相同，是把西汉刘向《说苑·指武篇》中“抗争文化”解决国家的“内乱”与“外敌”，与“难民、灾民、饥民、移民”问题相关联。再结合到两百年后的 1871 年巴黎公社起义的时政要闻，和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评说要人民至上、民主反腐、敬畏责任和“生产者的自治政府”等思想“口传”入盐亭，使他们把解决“难民、灾民、饥民、移民”的办法，与马克思学说的解决方法求索结合在一起。

因为对于什么是“存古”，他们认为存古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要“拔高”儒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把中华文明定位在人学、仁学的单一的和谐早、好自居，看作是自杀陷阱---拔高儒学一是要强调中华文明是“海洋文明在先，农耕文明

在后”；二是要强调中华文明是人与自然及天下的和谐持久双赢。例如，日本从隋朝年代起至明涌维新之前，一直是中国的学生。其后开始侵略中国，这是学生打老师。其次像历史上中国南方比北方遭到“外敌”的侵犯多，是北极的严寒，使沙俄白人南下不断侵犯，也逼迫中国东北梟雄、后金的努尔哈赤等向关内侵犯。但早在 1871 年之前的 1649 年出生的张鹏翮，就已从盐亭陕西会馆到存古书院的求索成功培养出民族气节。

1689 年张鹏翮内斗“内鬼”，外斗帝俄，出使帝俄参与签订《尼布楚条约》，争得大清少丧权辱国相关盐亭陕西会馆——在“湖广填四川”后，它在盐亭建立的多省会馆中最为出名，而且也是唯一还有遗存，留在今盐亭云溪镇西负戴山东下半坡上。盐亭陕西会馆解放前也称县云庵，地势偏僻，系唐代石木结构古建筑，曾为李白、杜甫流寓盐亭住居处，也为唐朝宰相严震家墓地看护房。1956 年县政府划给县林业局作为看守负戴山森林的住房，但在 1970 年代初并无人居，而且可见残存的大幅上古盆塞海洋文明的彩色壁画；直到 1970 年代末才改建为县林业局的办公处。“盐亭学”到“重庆学”，历史智能到人工智能，都可以从这里展开。这里“口传”张献忠农民起义的陕西籍的老兵及其家眷，难忘为啥要在 1633 年时才起义的是：

起义涉及“口传”1632 年 9 月 7 日，明朝著名科学家、内阁次辅徐光启，他的学生、大明火器部队总司令、西洋火炮专家、登莱巡抚孙元化，在北京西市被斩首，年仅 51 岁，只因“一只老母鸡带来血案”——登州巡抚孙元化造炮练兵，本想雄心勃勃重用熟悉辽东情况的汉人辽籍军人孔有德率部打先锋，出征收复辽东。但山东人却处处排挤这些外来户。孔有德率部出征时，沿途遭遇闭门罢市，辽兵一路挨冻受饿。到吴桥时，一名饿极的士兵抢了山东望族王象春家仆的一只鸡，家仆仗势，闹上门来。孔有德军纪很严，将抢鸡士兵“穿箭游营”，但辽兵压抑已久的愤怒被点燃，将王家飞扬跋扈的家仆打死。群情激昂，士兵哗变在即，但王象春的儿子更加飞扬跋扈，不依不饶。孔有德走投无路，受人唆使煽动，率乱兵把王家给灭了门，倒戈杀回登州。孔有德并非想叛乱，而孙元化也坚持试图招抚。

但孙元化的同僚王道纯却想趁机灭掉这股辽兵，出城打杀。正等招抚的孔有德吃了亏，与城内辽兵里应外合，攻下登州城。孙元化战败自刎未遂，为叛军所俘。但他在叛军中有极高威望，对孔有德等也有大恩，他明以大义，孔有德又回心转意。朝廷也同意孙元化戴罪招抚，但巡按王道纯却藏匿诏书，结果叛军长时间求招安不得，又开始作乱。孙元化继续说服叛军，让他回朝陈明真相，让辽兵们

等待招安。

但孙元化还在前往北京路上，王道纯袭击叛军。孔有德的叛军因为掌握有大量火器，等着招安却最终等来了孙元化的死讯。而且在登州失陷时，朝中温体仁等说孙元化已反。他的恩师徐光启上疏代其申辩，甚至愿以全家百口性命为担保。但朝内温体仁等对孙元化的攻击与诬陷并未停止，因为他们攻击的目标是当初力荐孙元化的首辅周延儒。

周延儒试图保下孙元化，但他一手提拔上来的副手温体仁，觊觎着首辅宝座，他等来的借孙元化攻击周延儒的机会，怎能放过？温体仁摸准崇祯帝的痛点：痛恨大臣结党营私。他一改以往对周延儒的恭敬，将他和孙元化扯在一起，说周延儒曾收过孙元化的好处。1633 年 6 月周延儒下台，温体仁当上了首辅。此后不到半年徐光启溘然长逝，1633 年 4 月孔有德等在山东无法立足，带去 13000 多人，数百艘船，还有大量西洋火炮与娴熟的火器手，渡海投奔后金努尔哈赤的继任者皇太极。这支明朝最精锐的火器部队的叛逃，使明、金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后金有了入主中原的本钱。

孙元化之死却被张献忠看作是农民起义的最好时机，张献忠在 1633 年宣布起义。以后转战湖广等江南各地 11 年，1644 年张献忠主力进入四川，1646 年张献忠在盐亭边境山寨大围坪被射杀而亡。有人把张献忠进川的超量“肃反”，类比近 300 年后的张国焘——1932 年 12 月 24 日邛继勋率部队进攻通江县城，12 月 29 日红四方面军解放通江县，成立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邛继勋被选为主席。1933 年 6 月邛继勋在张国焘搞“肃反扩大化”中被诬陷，惨遭张国焘杀害于四川通江县洪口场，年仅 36 岁。邛继勋的战友曾中生 1933 年 9 月被张国焘以“右派首领”等罪名逮捕，长期监禁，1935 年 8 月张国焘派人将他秘密杀害于四川西北部的卓克基。就连盐亭龙潭榉溪河畔地区革命老区，1934 年 10 月发生的“西山坪”共产党游击队被国民党军队包围事件，延伸到 1935 年 3 月申秋成和何登甲等 300 多共产党员的游击队战士被砍头的英勇就义，也有“口传”与张国焘“肃反”利用敌人消灭内部不同意见派有关。

金一南教授的《苦难辉煌》书 416-417 页中讲：1932 年鄂豫皖苏区保卫局审讯部长戴季英，不顾红 25 军 74 师当师长的徐海东的反对，借口“肃反”下令将 74 师 220 团的政委、参谋长等 49 名干部抓起来全部杀掉等，这是否也与张国焘影响有关不说。把张国焘与张献忠农民革命的“肃反”相提并论，其实从“历史智能”的发展上说是不能类比的——以 1871 年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革命起义经验的《法兰西内战》一书，阐述人民至上、民主反腐、敬畏责任、勤廉节约等“生产者的自治政府”，“巴黎

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思想“口传”入我国划线，之前张献忠 1633 年宣布农民起义以来，都属于等待马克思主义的诞生阶段。

1871 年总结巴黎公社的《法兰西内战》等马克思学说“口传”入我国后以来，都是属于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实践阶段。1646 年张献忠大西政权垮台后留存在盐亭的老兵及后代不结怨，是他们张献忠农民起义军在江南各地转战中，看到改为大清国号的后金努尔哈赤的继任者皇太极，利用孔有德等反叛缴获与仿制孙元化的火炮，入关后即使与陕西李自成的农民军交锋，火炮也仍然是大显神威，攻城掠地，势如破竹，使他们才明白徐光启老师带出学生孙元化的意义：

孙元化不抗拒西洋火炮，走上“西学为用”之路，潜心研究西洋火炮，青出于蓝，写出了专业著作《西洋神机》，成为明末独一无二的火炮制造和弹道学的专家，这是对的。用今天的话说，是“暴露组学”---革命不仅是暴力“造反”，夺取政权---类似健康的目标不仅是基因、表观遗传、蛋白组、代谢组，还要考虑日常暴露、地理位置、社会经济、微生物组等综合学科的作用。因为仅“中学为体”一个顺序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老办法，仅类似“基因组学”。胸怀世界，反过来“平天下、治国、齐家、修身”才是新时代。

把明朝文臣武将类比“基因组学”---先是抗拒西洋火炮，等到努尔哈赤崛起，所向披靡时，才发现孙元化的“神器”的厉害。例如，孙元化在“宁远大捷”中协同袁崇焕驻守宁远，面对骁勇无比的后金铁骑，宁远城头 11 门西洋大炮成了超级大杀器，后金勇士再凶悍，也顶不过最先进的热兵器，连努尔哈赤也受炮伤---身经百战，战无不胜，唯宁远忿恨而回的努尔哈赤，八个月后在郁闷中死去。

孙元化的“西学为用”，是因明军当时有火器，但射程短，甚至比不过后金的弓箭，所以他主张用射程远的西洋大炮来解决问题。其次，后金骑兵天下无敌，他主张大炮架在城上，而不是放在旷野中，坚城与火炮互相依存，发挥火器威力。这也联系到另一方面---如盐亭土著人民中的乡贤，从读西汉刘向《说苑·指武篇》，近两千年来盐亭各区、乡、村从私塾、书院到后来的存古学堂，能总结巴蜀盆塞海古文明以来兴衰轮回的“抗争文化”得出：“敌人”不仅类似在球面画个圈，只分内外；还有像环面，画的圈也能绕过---“防线”内因、外因，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悠久的盐亭书院（书馆）为提高质量，素有外请全国名家来讲学，内送学子出外去求学或教学的习惯。

如安徽“桐城派”奠基人方苞(1668-1749)，1699 年（康熙 38）举江南乡试第一闻名，1706 年中进士，1712 年因《南山集》案牵连入狱两年后免

死。方苞 1734 年（雍正 11）奉果亲王命编选《古文约选》作为八旗子弟的教本，使古文与时文空前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也为方苞等桐城派古文大家成为文坛领袖提供了文化土壤。盐亭书院（书馆）研习刘向“抗争文化”闻名远播，相传盐亭龙潭书馆有几辈方苞的后人，为躲避乱世中大开杀戒的“文字狱”的清剿，也远涉千里、隐姓埋名来到盐亭龙潭学馆授课。

从 1646 年张献忠大西政权垮台后留存盐亭的陕西籍老兵，到“湖广填四川”中建立起的盐亭陕西会馆等外来户，无不对盐亭土著人民中的乡贤、书院的“抗争文化”感到震动和清新。两面结合推动“历史智能”迎来 1871 年总结巴黎公社的《法兰西内战》等马克思学说“口传”盐亭的转型“蜕变”，这可以用盐亭县城中 31 米高的百年笔塔作证。2008 年“5·12”大地震，盐亭县城中 31 米高的笔塔垮塌，当晚电话传到绵阳，笔者不久两次前往盐亭笔塔地点察看。见周围虽有地震发生的危房，但直接垮塌的没有，而笔塔垮塌也奇：这类似粉粹性垮塌，砖头散落在四周，连成块的不多，所以靠近它的房子受损的也不严重。笔塔残存仅余约 9 米：西面大致两层，实际只有一层半多。因为有缺口。只是东面，至第三层还完好，而且在第二层露出了一副完好的对联，约长两米，字约小碗口大。右联是：门第科举擢东关；左联是：火候文章光北斗；横批是：云蒸霞蔚。

盐亭笔塔是省级保护文物。位于盐亭县委机关内，即原来的盐亭旧城西门外宝台观。笔塔建于 1888 年，到 2008 年整整 120 年，其间经历了 1933 年和 1976 年两次大地震。该塔为重檐歇山式楼阁塔，七层六面，高 31 米。盐亭笔塔与盐亭陕西会馆遥遥相望，像一管巨笔着墨伸向蓝天。使笔者震惊的是，垮塌的笔塔在解放前就把对联字样，被涂盖了泥层。只因这次地震剥落，“火候文章光北斗”对联才显露出---“口传”涂盖与针对 1871 年“口传”马克思学说入盐亭有关。但永恒的是，建筑笔塔的时代背景有多种解读，却有传说“门第科举擢东关”，意指“你当你的官”；“火候文章光北斗”，意指“我干我的革命”---这说到与马克思 1871 年总结巴黎公社的《法兰西内战》等思想的联系虽难，却不难理解：因为 120 年前的盐亭人何能占到这样的高度？那么我们就看看 1888 年濒临死亡的满清王朝，与《法兰西内战》说战乱不断，国家体系崩溃，经济跌至谷底的相似。

当时外敌不远千里驾驶着军舰到中国肆意蹂躏，民生不聊，一个接着一个的耻辱写在我们的历史书上。1888 年广东才子康有为，上书光绪帝，吁请“变成法”；整个清朝朝廷是洋务派当道，中国现代货币形式出现---两广总督张之洞设立银元局，铸

造银币；李鸿章支持上海道龚照瑗及严信厚等，在上海筹办的华新纺织新局，颇有现代工商体制的雏形。在天津，建有第一家中学的天津汇文中学。在南京，建有教会制的大学金陵大学。在军事上，批准《北洋海军章程》北洋海军正式成军。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的《法兰西内战》等“火候”思想，等于给盐亭乡贤的思维壮胆。1889年盐亭就出生了一位叫任望南的人，与何拔儒同乡。他家境清贫，父亲早亡。他在何拔儒的启蒙教育下，选择四川藏文专科学校深造，16岁毕业就投奔藏族地区任教，并从那里崛起。北洋军阀时期他官至山东省代理省长；北洋军阀失败他漫游欧美，并投向孙中山。到成都解放时，他官至四川省财政厅厅长。在解放军的感召下，他拒绝随同省主席逃跑，保护案卷财物迎接我军接管。1952年盐亭县法院以支持土匪暴动罪处决他，1984年经绵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查证不实，宣告无罪；四川省委统战部决定对任望南以爱国民主人士对待。任望南在旧时做官期间，曾在龙潭创办私立中学，并为盐亭中学等多所中学的发展筹款赠物，有一定影响。

实际早在笔塔修建的25年前，盐亭已拉开近代化的序幕。这个标志是1863年，在盐亭县城东门外的凤凰山顶，以感答随代县令董叔封教民栽桑养蚕之德，重建了一座高6.3米，呈六角形的纪念亭。盐亭人知道感恩，也许同时已明白栽桑养蚕缫丝织绸在近代化经济中的地位，才选择了董叔封。到1888年盐亭建笔塔前后，全国类似1873年海南办的继昌隆缫丝厂，1881年上海办的公和永丝厂和上海办的同文书局，1890年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 and 湖北设立的纺织四局等，近代气息一波又一波袭来盐亭，使祖国西南这块有过远古文明洗礼的沉眠的小县、穷县，开始抬起头来。解放后至改革开放，盐亭县城地面文物，能完整保存的只有县委机关内的笔塔和凤凰山顶的董叔亭，没有被暴风骤雨的政治运动所摧毁，也可见其近代化意识的清醒。

21世纪开始，从北京到广州，从上海到成都，大江南北东西出现为清朝大臣盛宣怀叫屈，歪曲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的思潮。其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的马勇教授，1956年生于安徽濉溪县，他的书《1911年：中国大革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独树一帜提出一系列新问题，他认为：“以往的很多研究，都把晚清完全妖魔化了；在一百年后的今天，值得我们用温情和敬意看待一个王朝的潇洒隐退”。马勇教授在《文史参考》杂志2011年第14期，发表的《辛亥百年温情回望：一个王朝的隐退》一文，可谓是分外引人注目。因为歪曲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之风，他是带头人之一。

例如，还有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改

革都有红利吗？》一书，作者[澳]雪琪先生主要以清朝政权历史五个阶段，切片改革红利，分析兴衰成败虽很有创意，但美中不足的是，雪琪先生在前面《自序》中说：1911年“引爆辛亥革命的四川保路运动，本质上就是既得利益集团上下其手，所挑动的政府与民众的对立”。这可以说与马勇教授歪曲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的思潮，从国内影响到国外有关。

因为马勇教授在《辛亥百年温情回望：一个王朝的隐退》一文中说：“从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几年的时间，就出现了大规模的铁路建设和矿产资源的开采。修铁路，朝廷没有钱，但有政策，允许外国资本、民间资本等介入到铁路修筑里来。因为技术标准不一样，全国的路网联不起来，1910年已发展到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于是马勇教授把对在甲午中日战争失败中，负有科技责任的清朝大臣盛宣怀树立起来，说“清廷派盛宣怀跟四国银行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由他们出钱把全国的路权买回来，然后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准。当时跟广东、湖北、浙江、湖南谈得都很好。最后剩下的是四川”。

马勇教授说这件事上，四川情况非常特殊”。他拿出一个四川保路运动领导人“腐败闹革命”的证据，“他们”之说——他们先成立了一个“川汉铁路总公司”。马勇教授讲的故事是：他们“并没有本钱，完全向四川7000万人民去集资，集资共计800万。但这800万修路远远不够，因为要修的这段路很危险（直到去年这段宜万铁路才通车），成本太高，于是川汉铁路总公司的人，把钱挪到上海炒股票。1911年盛宣怀要收回股权时，川汉铁路总公司生意上已亏了一半，他们就说那股票不要了，你们赔我们800万就可以了。盛肯定也不愿意。事情就这样彻底抖搂出来了。当时有人挑动人民的情绪，希望事情闹大，可以就此掩饰挪用这笔钱的责任……结果在四川总督府门前，卫兵开枪打死了集结的群众30多人。朝廷命铁路督办端方调集部队往成都去。他就带了湖北的新军去，然后形成了武汉地区的空虚。紧接着武汉地区的新军在1911年10月10号发动了起义。辛亥革命就是这样发生的，两个失误直接导致了政治变革。”

但这是对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保家卫国、反帝反封建历史意义的歪曲。原因是在当时四川盐亭等地，就有范仲纯这样一批早期学人对马克思主义自觉的宣传鼓动，四川保路运动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次的马克思主义群众革命运动，它为后来的辛亥革命和“重庆组织”及“上海组织”，都创造了部分条件。说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当然马勇教授并不是孤军作战，歪曲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之风带头人，最早还有陆建德先生。2010年4月11日上海的《东

方早报》，发表陆建德先生写的《烈士之死——关于四川保路运动的札记》后，就有上海和北京的著名学者、平台带头冲锋，陆建德和马勇教授的观点，被“武威”等人改标题为《保路运动：被建构的“烈士之死”》、《四川保路运动真相：贪污犯闹革命》，观点大致不变，在新浪、搜狐等知名网站大肆刊发。

这类文章对 1911 年四川保路运动的歪曲，比雪琪先生更甚——文中还不忘记丑化郭沫若先生；还说清朝政府和清朝大臣盛宣怀等的正确方针，是触犯了蒲殿俊、罗纶等极少数把持四川咨议局与铁路公司地方绅商的利益。又说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完全明白川路公司造路无望，但是停收“租股”意味着财源断绝。他们不想放弃特权，更不允许中央政府，查账并接管七百多万两银子的未用路款。于是就用“卖路卖国”等极端情绪化的语言，淆惑人心发起保路运动。清廷早就识破保路领导人的所虑所求，甚至在谕旨上挑明了问题的实质。

但是随着运动的蔓延、深化，中央的声音，已被有效阻隔，无法抵达民间。民国后，铁路国有政策不变。袁世凯政府是典型的弱政府，为了讨好地方，交通部于 1912 年 11 月与蒲殿俊、邓孝可等四川代表签约，像战败国一样答应承担公司以往的一切费用，分期支付，本息总额高达两千九百余万元。后来内乱不已，这笔巨款中的绝大部分不了了之。至于那笔余下来的“浮财”，有的虚耗于争权夺利的内战，有的被偷、被抢，下落不明。有的被用来开办铁路银行和轮船公司，供经营者坐享红利。分赃不均，内讧又起。

看来 2010 年以来，从国内的陆建德和马勇教授，到澳大利亚的雪琪先生等人，是要想把已经蒸发的清廷政体“黑洞”请回来。说张澜、吴玉章、蒲殿俊、罗纶、郭沫若、邓孝可等人，是清廷改革红利的新既得利益者也行。但其中张澜、吴玉章、蒲殿俊、郭沫若、邓孝可等在日本留学，归国时间不长，他们有的当了省议员，也只是用钱买的一个虚位；如王右木就不愿哥哥拿钱为他买省议员当。张澜、吴玉章、蒲殿俊、罗纶、郭沫若、邓孝可，贪污了清廷中央政府大员实际掌管的铁路公司的钱了吗？说民国后 1912 年蒲殿俊、邓孝可作为签约四川代表，贪污了袁世凯政府承担铁路公司的“浮财”，这与有文章说：“1912 年张澜任四川军政府川北宣慰使，和 1917 年 11 月张澜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省省长时等的关系、名望、人脉，和掌握的省政府余下的一些资金，一是与组织青年留法、留俄、勤工俭学的储备人才的运动；二是与支助北京李大钊、陈独秀，和湖南毛泽东等的革命活动”，有关吗？

### 三、盐亭解“重庆学”初探

《中国共产党盐亭县历史》一书 6-7 页中说：1911 年 6 月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推举蒲殿俊为会

长，罗纶为副会长；“盐亭籍的彭健修先生任保路工作团部书记（秘书）。彭健修与乡人蒙裁成（蒙公甫）、王明金（王济钦）等组建成盐亭保路协会（分会）……盐亭人民在‘保路同志会’的旗帜下，有数百人投入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从这里可以看出从 1871 年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革命等思想“口传”盐亭，到 1911 年四川保路运动在盐亭的表现，这 40 年间盐亭已有一大批“历史智能”转型的新人出生和成长起来，并影响到临县地区。

因为这同 1871 年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革命等思想“口传”盐亭有联系，特别是发生的 1911 年“四川保路运动”，类似一次巴黎公社失败的起义。陈奎先生是绵阳市交通运输公司原工会的主席，2015 年他出版的长篇小说《古水井》，一开始就以四川绵阳地区早有类似在国外参加当地的共产党和革命战争的先行者的真实故事为基础，写石德贵参加 1911 年四川保路运动后被追逃，就偶遇到从南方来的这类“先行者”香客的救援和指教。“香客”也许与 1914 年在印尼组织共产党（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的荷兰共产党员马林，有相似之处。

这类“先行者”也包括后来 1920 年 3 月 12 日在重庆组织成立中国共产党（简称“重庆组织”，研究称“重庆学”）的张澜、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四位负责人。《重庆报告》说的“重庆组织”有近 40 个成员和 60 多个候补成员中，在盐亭的，就有“口传”袁诗尧、何拔儒、杜润之、彭健修、岳鹏程、蒙公甫、蒙伯颀、胥竹成、蒙文通、杜佩绅、任望南、袁焕仙、刘仰高、王济钦、张维川、范蜀林、范仲纯等 17 位盐亭人参加。而“口传”张澜与罗纶年青时，都曾到盐亭求学过。这一因从盐亭陕西会馆到盐亭存古学堂传播马克思学说名声远扬播；二因出生他们的家乡西充县境，与盐亭接壤近有关。

2011 年 7 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开端——中国共产党成立述实》一书，下册 588-592 页有《四川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探疑》一文的论述。《开端》作者张军锋先生原是河北电视台纪录片编导，现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在 2017 年 11 月 12 日江油市召开“纪念王右木诞辰 130 周年学术研讨会”前，笔者在写《王右木江油长歌的动地诗》一文后，查到并读了《开端——中国共产党成立述实》一书。由于王右木（1887-1924）烈士与袁诗尧（1897-1928）烈士交往密切，且袁诗尧是盐亭麒麟乡人，所以笔者写王右木时得到的“口传地方史”材料，也多于“书报公开史”材料，特别是张国焘入川影响的历史。

例如，2016 年 11 月 5 日《绵阳日报》刊登记者彭雪的《追寻盐亭山乡 de 红色记忆》一文，开篇不久就说：“1929 年，中共盐亭特支建立后，袁诗

尧领导盐亭人民进行了一系列反封建、反剥削、反苛捐杂税的斗争，党组织和农民协会普遍建立，在全县 24 个乡镇建立了 33 个党组织、30 个团支部、100 多个农民协会，以川西北“抗捐大联盟”为代表的党的外围组织，群众达 4100 多人，并建立了以“工农前卫团”为主的农民武装队伍 1200 余人”。但在正式公开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盐亭县历史》、《中共绵阳市志》等书中，记载袁诗尧烈士是在 1928 年 2 月 16 日，已被国民党军阀秘密杀害于成都下莲池。那么《绵阳日报》记者彭雪，是笔误还是说错了？都不是。

自从上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对“中共盐亭县历史”普及以来，县委和政府有关领导，也就是这样公开宣传的——其实，在汪克明 1934 年 4 月或 5 月第一次在盐亭，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的时间上，如《中国共产党盐亭县历史》书 32 页说：1934 年 4 月汪克明和赵济舟在盐亭县城被捕，“赵当即叛变，出卖了汪克明”；但该书 136 页又说汪克明，“1934 年 5 月，因叛徒出卖，在盐亭县城被捕”。《中共绵阳市志》书 53 页说：1934 年 4 月，“赵济舟在盐亭县城被捕叛变，致使三台中心县委书记文俊（汪克明）被捕”；但该书 533 页又说汪克明，“1934 年 5 月被叛徒出卖遭国民党逮捕”。即盐亭县和绵阳市党史两书说法，同一书说是 4 月或 5 月都有。原因也许不想说汪克明“叛变”——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好写，但汪克明与党内个别中层难写——1932 年-1936 年张国焘进四川，高层的情况好写：张国焘分裂党中央有结论。但中层省、县领导听令张国焘错误指挥，有出卖下层地方本土组织的，认识会有出入。即使对 1920 年 3 月 12 日由张澜、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在重庆成立的共产党（简称“重庆组织”），虽在马林的调解下，妥善处理与时代潮流苏俄指导 1921 年 8 月初成立的共产党的交叉，自行解散，但仍然有对其成员和受过影响的“上海组织”基层进行打击，由此上下的认识会有出入。

正如“暴露组学”的复杂——当时张国焘在红军以认“江西老表”拉拢的人，跟他搞“肃反扩大化”，有的后来因能反戈一击无事。但 1949 年带兵南下进川，又进行封口追杀，这段历史如文革中下层批刘、邓一样不好写。又如 1934 年 10 月 23 日（农历的 9 月 15 日）盐亭龙潭革命老区石狗场晚上发生的“西山坪事件”——1000 多人的党团员、“工农前卫团”被国民党田颂尧 29 军及反动派包围。汪克明在包围外被抓，带到国民党 29 军军部，《中国共产党盐亭县志》137 页说他“坚贞不屈”，没有被杀。但延伸到 1935 年 3 月 26 日盐亭本土何登甲与申秋成带领的 300 多曾参加龙潭地下党游击队革命的人，被国民党大屠杀砍头。这种就义到改革开放后 1980 年代盐亭县文化馆，出“盐亭民间文学三套集成”

书后，赵方铭馆长传出上面指示说他们是“叛徒”。《中共绵阳市志》书 535 页“人物简介”何登甲中也说：1933 年 7 月任中共盐亭县委组织（委员）、游击大队队长，11 月任龙潭区委书记，“1934 年冬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

笔者在盐亭县科协工作，1980 年代两届被选为盐亭县人大代表和一届盐亭县人大常务委员，一届绵阳市人大代表。因要反映群众不同意见对“西山坪事件”的看法，曾找过原盐亭县党史办刘泰焰主任，了解申秋成和何登甲等“叛徒”之谜。刘泰焰主任说：何登甲、申秋成“叛徒案”，指 1934 年 10 月汪克明被捕，被国民党县保安队和田颂尧 29 军包围的何增甲、申秋成带领的龙潭革命根据地 300 多人的游击队与敌人谈判，条件解围放群众，愿接受本县保安队收编。结果被派到安县去参与“剿共”。由于不卖力，被令回盐亭整顿。何增甲、申秋成带领的这支龙潭根据地的游击队回盐亭后，很快“反水”，借机逃进龙潭附近石狗场（今日的五龙乡）的大山区，和追捕他们的田颂尧的 29 军周旋打游击。后被田颂尧的 29 军在 1935 年的围剿中，捉住何登甲、申秋成等 300 多的游击队战士，集体屠杀高灯镇等地。

群众反映的是：1934 年 4 月三台中心县委书记汪克明，同中共富驿区委书记赵济舟一路，在盐亭城内喻殿臣的“恒丰泰”绸缎铺联络站一同被捕。汪克明被敌人押送到三台“军学研究会”监禁，因赵济舟告密他的身份，“口传”1934 年 6 月敌人策划，假借押送汪克明到绵阳的路上，让他择机潜逃回盐亭龙潭地区，共灭龙潭革命根据地 1000 多人的游击队。1934 年 10 月汪克明通知何登甲、申秋成带领的龙潭根据地 1000 多人的游击队，到龙潭西山坪一个山沟里秘密集合开会。当队伍集合到西山坪时，汪克明却迟迟没有到场。在何增甲、申秋成等游击队骨干研究撤退时，才传来汪克明又再次被捕。

国民党 29 军和盐亭县保安队在石狗场龙潭西山坪，用重机枪等强大火力包围何增甲、申秋成带领的龙潭根据地 1000 多人的游击队。在这十分特定十分危难的背景下，为了避免无辜的人员大规模伤亡，游击队地下党迅速决定成立临时特支，经过短时间的开会争论，最后由临时特支成员集体表决通过，决定利用刘仰高、袁思尧在国民党县保安大队和 29 军的原“老关系”，假以愿集体被县保安队收编为条件，来解决突围，让一些不愿继续跟走的游击队战士和大多数群众，自谋生路——这与刘泰焰主任说法不同，也是何登甲、申秋成等人 1934 年冬被敌人包围后“叛变”，又“反水”的来历。这里的真假，会否何登甲和申秋成等人的“叛变”，敌人制造有“档案”？汪克明后来给组织是否有很多能说“清楚”的材料？何登甲和申秋成等人已经就义，



是否没人能为他们说清楚？而汪克明活着，是否有关系网保护？

何登甲、申秋成等带领的“工农前卫团”的“反水”命运，他们是知道的：借机逃回龙潭革命老区山林打“游击”，遭国民党追捕演变成1935年的屠杀，迟早只是时间问题。但他们不知解放后被认为的“反水”，到如今2018年10月，笔者了解盐亭本土的一些干部、群众中，仍有不赞同上层认为是“叛徒”的看法——申崇碧主任是申秋成家乡天垣申家沟的人，1960年代起当盐亭县黄溪乡妇女主任30多年。退休前在盐亭县政协工作，她不认可申秋成是“叛徒”。笔者问：听说申秋成被杀后，他的家人已有被杀的。申崇碧主任说：他还有后人。申崇碧主任的儿媳的父亲——李壁奎主任，当时也在场，1990年代起他先后曾是中共盐亭县委组织部长和盐亭县人大主任。笔者问到1929-1933年曾作过中共盐亭地下党县委书记的余国政，到盐亭县委组织部要求“落实政策”的情况。李壁奎主任说他不清楚，他知道的说法也与余国政说的不同。笔者再问道：成都有人发文说袁诗尧烈士1920-1921年与参加过无政府主义组织“适社”无异，是无政府主义者吗？李壁奎主任说：这是盐亭人“闻所未闻”的事。

《中国共产党盐亭县历史》书中159-163页录选有汪克明写的《盐亭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和武装斗争的经过》的回忆文章。一开始他就说：“1933年6、7月间，我第一次到石狗场地区，那时盐亭特别是整个龙潭一带，群众革命情绪很高……在我第一次被捕出逃后，所以仍回盐亭的龙潭地区继续搞，就是想实现组织上给我们的这个任务。我第二次到盐亭龙潭地区……情况与我第一次大不相同，知识分子都较为消极”。这里汪克明说的“知识分子”和“群众革命情绪很高”，实际就与“重庆组织”未解之谜有关——1921年8月自行解散后，盐亭龙潭地区没有申请再加入“上海组织”的成员有关。为啥？

一是从1871年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革命等思想“口传”盐亭，到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类似“巴黎公社起义”，在盐亭从陕西会馆到存古学堂，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都在探索如果成立“共产党”，如何走中国特色的路线。这些影响不局限于盐亭，而且传到陕西。如后来的刘志丹和习仲勋等陕西地区老革命家，早期的行动就在实践——“重庆组织”立足于“军运”，是因在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中吴玉章等组建的“保路同志军”，在旧军队在有联系。但“重庆组织”的根本路线是立足于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迎接全国解放”；立足于“保家卫国，创建经开区、工业园”；立足于“无产阶级专政，但不一切无产阶级革命化，而是合理合法”等等。

这就需要有一个大智慧的隐蔽求生存求发展的初级发展阶段，而与后来的“上海组织”苏俄特色，有相似也有不同；第三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理解这一点——苏俄特色作为世界潮流，只有通过的曲折实践才能唤醒人民认识中国特色的必然胜利；这是一个与左、右斗争很残酷很艰苦艰巨的过程。

马林挑明“重庆组织”被排除出“上海组织”，是陪同他的张国焘作梗。其实张澜、吴玉章、王右木、杨闇公等四位直接负责1920年3月12日在重庆成立共产党，是早曾相约到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张圣旻、张太雷等京津马克思研究会、毛泽东的湖南马克思研究会等川外成员、组织的支持和参与。张国焘对此耿耿于怀——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在北京逝世，共有123个国家的政府和首脑向中国发来信电或唁函，世界各大媒体都发表或转载介绍毛泽东革命事迹的评论和文章，世界上唯一一对毛泽东逝世“不闻不问”的国家却是历来亲近的苏联。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到加拿大后，旅居多伦多的张国焘被问及如何评判昔日的对手之死时，张国焘只说是“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其实，张国焘1933-1935年在四川“借刀杀人”，留下的“尾巴”并没有过去。1921年张国焘对马林同意湖南派毛泽东和何叔衡两位代表同去参加“上海组织”会议，也自此开始不满。

有口传毛泽东参加“上海组织”会议，也还含有曾接受“重庆组织”张澜、何拔儒等的委托作代表。原因是1911年保路运动后，1912年张澜任四川军政府川北宣慰使，1917年11月张澜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省省长，由此张澜利用他的关系、名望、人脉，和掌握的省政府余下的一些资金，一是支持吴玉章组织青年留法、留俄勤工俭学等储备人才的运动；二是支助支持北京地区李大钊、陈独秀，和湖南毛泽东等川外同志的革命活动。1918--1919年青年毛泽东带领湖南勤工俭学留法学生到北京，曾持杨怀中先生手书求章士钊予以资助。

在章士钊筹集到两万银元巨款中，就有章士钊的好友张澜用四川带来的资金，资助的500银元。张澜还运用蒲殿俊是四川保路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以及1916年袁世凯下台议会重组，蒲殿俊当选众议院议员；1917年7月段祺瑞二次组阁，蒲殿俊又任内务部次长，但因受排挤，12月被迫辞职，逐渐脱离政治等资质；当1919年蒲殿俊谢绝北洋政府委任他教育部长之职时，张澜和他商量：要以他们的资金和广泛的名望、人脉，去支持李大钊、陈独秀等北大学者宣传新文化。

张澜的用意，就在推荐蒲殿俊先出头，到北京《晨报》作总编辑。也正是在李大钊、陈独秀等北大学者的协助下，蒲殿俊在北京《晨报》副刊增设了《译丛》和充满民主气息的《自由论坛》。蒲殿

俊还约请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郁达夫、徐志摩、闻一多、冰心等一大批文化界名人写稿，大力从事新文化、新思想与新知识的倡导与宣传。当时鲁迅的《阿Q正传》，就是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连载的。所以张澜、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四人1920年3月12日在重庆成立的共产党，相约京津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张圣奘、张太雷，湖南毛泽东等，能获支持和参与。因此有“口传”毛泽东是“打入”的“上海组织”，代表的是“重庆组织”。毛主席用55年（1921-1976）的实践，带领人民证明苏联特色的社会主义有缺陷，“乌奸文化”要不得，所以逝世时遭俄国民族主义者表示不满。

刘慈欣先生在获2015年雨果奖的《三体》第一部书开头，第8章《寂静的春天》中借用写程丽华的话，解释“乌奸文化”说：“应该并入苏联，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的一个新共和国，这样国际共产主义的力量就更强大了……”。其实乌奸文化的基础是东正说，东正说的历史观，类似不影响俄罗斯人要求捍卫乌克兰地区俄罗斯同胞利益的意志。东正说的国家利益是什么？是俄罗斯在沙俄时期强行对外扩张，打出了越来越大的地盘，东欧、中亚、东亚等地的弱小国，当年都是俄罗斯国家利益包罗的对象。中国大量的地方，主要就是在那个时期被俄罗斯国家利益包罗去的。等到列宁掌管俄罗斯时，面对超级庞大的国土，俄罗斯已经有些消化不良，才倍感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东西，是主张依法治国，合作共赢，管控各国分歧。由此各国就可以按公平、公正、公开的国际公约，进行正常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交流办事的思维，所以才最后完成登上真正的列宁主义的高峰。

自然科学，是法天法地道法自然的根本。东西方不存在绝对的“意识形态”分歧——如今的乌克兰和俄国并不是共产党掌权，“乌奸文化”的特点是宣传东西方对立，乌克兰也只能应对。其实，把俄国类比美国，把乌克兰类比俄国，俄国与美国的争斗，类似乌克兰与俄国的争斗，俄国只能应对。但这是因共产党掌权“意识形态”分歧的继续吗？我国解放初修成渝铁路发现“资阳人”，从毛主席和小平同志抓人类上古史大统一的期望，到习近平总书记大力支持青藏高原地球第三极、亚洲水塔的科学考察，揭示青藏高原成为远古巴蜀盆塞海洋文明的密码之一如湖南大学，杜钢建教授的新书《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说：西方各民族是来自先夏和夏朝以后华夏民族的迁徙，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由西迁的华夏人创造——原因是青藏高原拥有在北极和南极之外地球上最大面积的冻土和冰川，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不但享有“世界屋脊”的美誉，而且揭示华夏文明是世界文明的源头。

其实，在盐亭革命老区的龙潭，何拔儒先生提出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早期因多次大地震，产生远古巴蜀堰塞湖扩大形成巴蜀盆塞海，古书《山海经》类似远古联合国志书。杜钢建教授的书把中国湘西道县定为人类文明发源地，从远古巴蜀盆塞海看，道县属于远古巴蜀盆塞海的东南面海边地区，从统一人类上古史来说，也没有错。1989年风波处理小平同志也有错——学西方民主，难道全归来自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吗？科学有第一也有第二，中国的科学创新，如数学柯召-魏时珍猜想的近现代自然科学创新，即为中美俄欧科学结合的发展。

《绵阳晚报》2005年3月20日发表《百年海喇叭话螺祖》一文介绍：盐亭螺祖研究能够薪火相继，并在我国改革开放后再度兴起，还得力于盐亭县梓溪河畔盘古故里的“天下第一楼”的兴建。何故？“口传”笔者最早是1950-1951年解放初，笔者家下半沟何家湾有户口贫农叫唐开元，他是天垣乡三村贫农协会（贫协）的主席。笔者那时才5-6岁，亲自听到他说过：“何拔儒先生教过毛主席”。但大人不让小孩再乱传，因那时土改运动“清匪反霸”搞得很热烈，怕把此话看作政治“谣言”惹祸。贫协主席唐开元说是他被乡政府选上，到邻近的九龙乡抬滑竿，送快90岁的何拔儒先生到盐亭县政府开会。由此听说毛主席要接何拔儒到北京去；也许唐开元抬送何拔儒与其交谈，引出过额外的话题。其次唐开元住的何家湾，还有一户贫农叫何礼成（何吉光）。笔者小时看到何礼成穷得房子没用泥抹涂墙壁，用竹片一枷了事，连风都挡不住。但笔者读高小、初中假期，在合作社、生产队跟大人一起干活休息时，听何礼成讲何拔儒先生在天垣场戏楼上讲学的故事却是一串串，如他说盐亭可被称为革命“帝师之乡”。

也许正因为盐亭革命老区人民对毛泽东、朱德和邓小平等三位革命领导人有深厚的感情，对毛主席和朱德领导的井冈山中央红军信仰特别强烈，才使张国焘把“重庆组织”势力的“残余”，与盐亭龙潭“群众革命情绪很高”联系在一起。那是从1911年至1935年期间，四川各地的存古学校成为省内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策源地。以盐亭梓溪龙潭地区为例，中共盐亭、三台地下组织在这里最早最快建立，数十个村庄成立了农民协会，参加的农民群众达数千人，还组织了龙潭游击队进行武装斗争，迎接中央红军北上抗日。革命的大风暴遭来反革命的疯狂镇压，1935年在盐亭高灯镇梅子坡、玉龙镇宗峰寺就有300多共产党人倒在血泊中。

其中，有很多是何拔儒教过的学生。在经历各种风暴中，何拔儒深知，存古学校办在古庙，不管是讲传统的四书五经，还是新式的国民教育课本，

都很难传播中华上古盆塞海文明的研究成果。因此他鼓动乡贤在发掘出“盘古王表”石龟碑的榉溪盘垭山口，修建纪念盘古的天坛场。1925年天坛场初具雏形，他利用抵押“盘古王表”石龟碑筹集到的部分资金，建议在天坛场修建一座奇特的戏楼——这楼只有逢年过节时才演戏，平时是用来上课的。这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也是一间没有墙壁的教室。戏楼临沟，地势较低。戏楼面对是盘古庙。楼面建得比很多乡间戏楼高，因此楼下及戏楼前面和左右的平地，都可作市场。例如楼下有柱子，好拴猪、拴牛，可被人作牲畜交易的场所。如此的开放课堂，坐在楼上的男女学生和教师，一举一动都受到赶场群众的监视。学校收的学杂费虽不高，但上楼的还是富家子弟多。实在不能保证上学的穷人家孩子，也能在楼下找个地方旁听。由于何拔儒曾把许多学术观点与他相似的学者或教师，推荐到此楼上公开讲学或教书，使得《盘古王表》一类观点在民间得以流传。

原因就是楼下旁听的一些穷人家的孩子，解放后成为党依靠的贫下中农，使他们在以后的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集体生产劳动中，敢讲一些“天下第一楼”的故事。贫农“何吉光”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常常涉及一些敏感的话题：在1949年后的土改中，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赵鸿儒、任望南等一批支持“存古”的教师和人士被镇压，何拔儒的孙子也在其中之列，所以一些家庭成分高的人就不敢说。更巧的是，四川省商会办公室秘书长黄靖先生是盐亭县龙泉乡人，2017年10月1日从成都来绵阳到他母亲赵家大舅那里作客。因邀约笔者作陪，听黄靖说：他祖母的父亲，就是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任保路工作团部书记（秘书）的彭健修先生，曾教过邓小平同志。

原来早在1911年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先生，在成都四川法政学堂读书时，就和同时在成都优级师范读书的彭健修认识。原因是与邓绍昌是同班同学的袁焕仙，又是彭健修的盐亭同乡、同学。因此他们常来常往视若兄弟，后来他们又一起参加1911年张澜、蒲殿俊、罗纶等发动的保路运动，彭健修任罗纶的团部书记。1914年经张澜推荐，1914年至1919年彭健修到广安中学当校长兼教史地，这期间邓小平考入该校就读。邓绍昌在1919年到1920年间多次寻找张澜、王右木、吴玉章指出路。1919年夏王右木告诉邓绍昌，重庆总商会的会长汪云松等要办重庆留法预备学校的消息，邓绍昌毅然把15岁的邓小平送去读书。在张澜、吴玉章、王右木、彭健修等帮助下，1919年夏邓小平离开广安去重庆，就读旅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

在2017年10月1日那天的相会中，黄靖的大舅赵老师曾是盐中的老教师，笔者听他补充告诉：

“何拔儒先生还教过朱德”。原来何拔儒1903-1906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在1907-1909年曾教过在成都高等师范读书的朱德。何拔儒1913-1917年又应陈润霖、杨怀中之邀，到长沙教过在第四师范和第一师范读书的毛泽东。陈润霖先生的孙子陈继先先生，2016年曾从长沙打电话告诉笔者，他祖父与毛主席的交往。何拔儒先生嫁到盐亭三元江家的三女儿，有个在成都新华社工作的孙子，也曾打电话告诉笔者，何拔儒家在解放后的境况。

彭健修（1884-1953），盐亭高灯镇人。1909年毕业于成都高等师范学堂，与朱德是同学。1911年因与张澜、蒲殿俊、罗纶友善，在争川汉路潮中任团部书记。保路运动中因蒙公甫同蒲殿俊、罗纶、张澜等人遭诱捕，彭健修想尽办法营救，并亲自出马带人到赵尔丰督署抗辩，请愿释放。因年轻气盛，陈辞最为慷慨激昂，赵尔丰下令喝阻，彭健修与兵丁发生抓扯，混乱中伤及左眼。后来被摘除按上假眼珠，从此彭健修落下残疾的瞎左眼；这也是他与张澜、罗纶等后来相互信赖和支持的根源。1914年经张澜推荐，彭健修到广安中学当校长兼教史地，邓小平曾是他的学生。1920年经张澜、吴玉章介绍他参加“重庆组织”。他虽没申请加入“上海组织”，但彭健修1941年解救过中共地下工作者、盐亭中学童子军教官田多文。

1952年彭健修作为政府各界的人民特邀代表，参加参观三台、蓬溪、射洪的土地改革时，不幸判处死缓；1953年释放归家逝世。改革开放后，盐亭县卫生局局长、盐亭县医院院长杨作清先生对彭健修的评价是：“彭先生一生执教，虽有参政议政的历史，但绝非蒋家鹰犬。他以其高尚人品、进步思想、渊博知识，影响和教育了他的学生，在川北享有盛名”。杨作清先生解放前就读盐亭县文同中学时，是彭健修的学生；解放初是彭健修引荐他参加的土改工作队工作。

2018年12月8日早晨，原绵阳市人民法院政策研究室杨洁华主任给笔者打电话，说她哥哥——即杨作清局长的侄儿杨崇汇书记，从北京回到绵阳来看望她家，顺便也想会见在绵阳的他高中班时的同学。这让笔者喜出望外——笔者和杨崇汇的家，当时都属于盐亭县三河乡；杨崇汇是从龙潭初中考入盐中的。1962年笔者上盐亭中学高中65级班，杨崇汇是盐中学生会的宣传部长，盐中高65级班的班长。1963年电影《怒潮》在盐亭公开上映，其主题歌特别动情。他当班长，带领全班同学在每晚下自习后都要组织教唱《怒潮》这首主题歌，一下激发起大家对革命传统教育的热情，他建议和鼓励班上同学，也去收集考察盐亭本土解放前共产党地下斗争的革命史料。

由于1950年盐亭刚解放，笔者听到很多盐亭

粹溪河畔龙潭地下党的故事和评论。例如，大人们说邻居的马么婆，娘家的一个弟弟在盐亭读书参加共产党，1935年被敌人逮捕，用“背火背篋”的酷刑整得死去活来。后来家里虽然把他保释出来，但回家后不到一个月，还是死了。总之，小时候听到赞扬革命老区苦难中辉煌的故事很多。但1963年笔者没有多想：为啥大人们后来不再提早期参加共产党的事？1963年笔者只想利用假期收集梓溪河畔龙潭革命老区地下党、游击队的革命斗争故事，也许今后能写出《龙潭激浪》的盐亭革命史该多好。于是笔者向杨崇汇班长汇报了这类想法，他热情支持。

杨崇汇从小热爱党、热爱祖国，以后能当上十七届中共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及中纪委委员、四川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云南省政协主席等高级职务，也许与他的家庭环境、家乡革命传统的熏陶有关。2018年12月8日笔者当天也顺便带上2017年写的《王右木江油长歌的动地诗》一文的打印稿，并附上写了一页纸的便信：“崇汇书记：请为盐亭本土1935年被国民党反动派砍头的300多位何登甲和申秋成带领的共产党游击队员正名。盐中高65级班同学王德奎”，就前去了。见到杨崇汇，他身体很健康，但比以前瘦多了。笔者把打印稿送给他后，简单说明是类似完成55年前他交给的任务，只是遇到了一些困难，还希望他这位老班长帮助和指点。

要说明的是，《王右木江油长歌的动地诗》一文的打印稿，是2017年想参加“纪念王右木诞辰130周年学术研讨会”时，《绵阳论坛》杂志特约编辑刘文传先生帮助原先打印的，因没能参加才留下的。刘文传先生曾与绵阳市党史研究室的办公室段雯主任一起在市社科联开会时，向段雯主任汇报过盐亭本土1934-1935年300多位共产党游击队员因“西山坪事件”，后被国民党砍头，又被解放后定为“叛徒”问题。如《中共绵阳市志》书535页说：何登甲“1934年冬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笔者1980年代还在盐亭县科协时，因工作与盐亭县农学会联系，一次偶尔与盐亭县农业局办公任朝洪主任谈起1943年盐亭“西山坪事件”，任朝洪称何登甲是他的姑父说：何登甲被国民党砍头后，全家灭口很凄惨——妻子跳堰塘自杀，8岁的儿子出走流浪，生死未知。他希望组织为盐亭本土1934-1935年被国民党砍头就义的共产党人，又被今天定为“叛徒”解开疑难。

但据刘文传先生转达段雯主任的话说：“翻案证据缺乏”。2018年12月20日早上笔者在三江半岛绿化带散步，偶遇退休的曾是盐亭县档案局的赵天民局长，谈起这件事，他说在档案局时，翻看解放前的敌伪档案，就有国民党杀何登甲、申秋成的

布告，说是“共匪的匪首”；今天有说何登甲、申秋成是“叛徒”，不知怎么回事？

其实，《中国共产党盐亭县历史》（简称《盐亭党史》）和《中共绵阳市志》（简称《绵阳党史》）两书自身就是研究的“证据”——从两书的《大事年表》、《人物简介》和记叙中，把有关1921-1936年间盐亭籍在革命中牺牲定为的“烈士”，和在盐亭本土的中共地下党县、区负责人被定为“叛徒”的人各列一张表，以此对照此期间张国焘分裂中央、控制指挥川陕革命根据地及中共四川省委、县委的出轨行为，和被张国焘等定为中共三台中心县委书记和军委书记的汪克明（1909-1984，四川达州宣汉人）两次被捕的诡异，是揭题“盐亭学”、“重庆学”和“上海学”最为诡谲的证据材料。

#### 四、“口传”求证公开诡谲

1983年《四川党史研究资料》第9期，公开发表的《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探索意见》一文，是我国最早否定1920年3月12日张澜、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四位负责人，在重庆组织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文章，影响很大，直接带动了如杨松奎、杨世元等出生重庆的学者“知难而上”，进行过分析破解。《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探索意见》的作者何盛明（1929-），四川省党史办的“岷啸”先生在写的《1949年中共川康特委机关被破获案真相初探》一文中说：何盛明老师曾“任四川省委党史工委专职委员（属党史工委专职领导之一，分工负责“专题”业务工作）”。

“360搜索成都党史研究员何盛明”介绍：她1950年川大法律系司法组毕业；曾在四川省总工会、省委统战部、省政协、省委党史研究室工作；先后主编《四川文史资料》、《四川党史月刊》、《保路风云录》等书刊。何盛明主任在她写的《沉痛悼念秀熟老师》一文中说：“1978年，我调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张老是省政协副主席，主管文史资料工作，我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近五年”。即《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探索意见》一文，是1983年何盛明主任作张秀熟（1895-1994）主席的助手，才完成的。

2013年1月13日新浪网《何盛明的博客》上，何盛明主任发表的“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再考证”文章中，她更明确地说：“《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在1982年末内部出版前，中央档案馆曾函讯四川革命前辈张秀熟同志，那时笔者正在张老身边工作，张老嘱我回信说明1920年四川没有共产主义组织，此件（指《报告》）待查，暂不宜发表。张秀熟是五四时期四川爱国学生运动的领军人物，是四川学生联合会的理事长，《四川学生潮》主编，通过学联与刊物和各地先进

青年都有联系，张老是当时历史的见证人，他的话应属实可信”。

但四川省党史办的“岷啸”先生说：他办“专题材料案”落实“叛徒”问题的经历中发现：“此案被捕的人的经过情况，当然只有抓人的人与被抓的人才能说清楚。我当场还对那个期间有些人对有关自己个人的政治历史，在向组织交待时是一种说法，而在党史会的‘回忆’及撰写回忆文章中又是另一种说法的现象，提出‘这本身就不是负责任的态度’的意见。因为，上世纪80年代党史征集过程中，的确有不少人借机吹嘘自己，甚至肆意歪曲历史；借搞党史抬高自己贬低他人的情况也是十分常见的”。张秀熟主席1928-1936年遭国民党逮捕坐过牢。中共绵阳市党史研究室网上有介绍张秀熟主席《舌战王灵官》的文章，不可能是“写小说”笔法。如果认可党史研究室官网是照抄“敌伪档案”的记录，也可证实何盛明主任在《百年潮》杂志2011年第7期发表的文章《刑庭激辩震山城---共产党人张秀熟的革命传奇》，来自“敌伪档案”的记录。

《舌战王灵官》文中说：1928年10月1日，由于原共青团四川省委书记彭兴道与团干部廖时勉先后叛变，是日深夜张秀熟在四川省委机关所在地重庆七星岗吴师爷巷被捕。国民党四川军阀刘湘部下的第三师师长兼重庆卫戍司令官王陵基（绰号王灵官）于打枪坝公馆，连夜提审：“张秀熟，你们共产党天天叫阶级斗争，要打倒阶级敌人。我就是你们最大的敌人。今天你又哪格说？”“王先生此言差矣。”张秀熟回答道：“我们共产党是讲阶级斗争，是要打倒阶级敌人。那最大的阶级敌人，从国际上讲是帝国主义；从国内讲是蒋介石。你王陵基么，也算是一个阶级敌人。但要说‘最大的’，那你就卑卑不足道了”。王陵基气极败坏，暴跳如雷，他骂，张秀熟也骂。最后，王陵基只得连连挥手，叫道“带走，带走，押到司令部去！”……

14日下午，王陵基在卫戍司令部礼堂公开审讯“重庆共案”。重庆军、政、绅界头目以及报界、学界旁听者达数百人。“你是四川共产党头子张秀熟吗？”这是问案的必要程序。“哪里人？”“四川平武。”“是受共产党委派的吗？”“是受代表大会选举的。”王陵基认为头开很顺利，三问都如实招认了，于是平和地向张秀熟说：“我在你们机关查出的文件中，发现你父亲给你的家信，他要你‘希圣希贤，不求名利’，你简直违背了你父亲对你的教训，你怎样解释？”张秀熟看穿了王陵基的心机，决心把敌人的审讯台变成宣传党的革命主张的演说台，对问：“你们四川有多少党员？组织情况怎样？”回答“共产党员多得很！只要是认识了现在的社会制度，明白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都会加入到共产党队伍里来。至于组织一层么，那是我们

自己的事，不能告诉你。”“你们的经费从哪里来？你们每个月领多少津贴？”“共产党员不领什么津贴。党的经费靠党员自愿捐助。”“你们那点钱，够吗？”“是的，党的经费很困难。不过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和一切反动派都有大量财产，有时被我们没收，也可作些补充。”王陵基有些坐不住，提高了嗓门：“军部政训主任戴至诚先生是何人杀死？从实招！”“谁叫戴至诚，我们不知道。你既然指认是我们杀的，请拿出证据来”。王陵基拿不出，就说：“那么，你们为什么要造反？要搞暴动？”“让我来问你，你们的田赋征到哪一年了？”张秀熟反问一句。王陵基尽量克制自己：“你认为你们共产党的主张真是对的罗？你相信你们一定会成功喽？”张秀熟回答：“我们共产党人为民众谋幸福，求中国之解放，为了共产主义的实现，是随时准备一死的。”王陵基叫道：“那么，本司令就要枪毙你们！”“‘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张秀熟也提高了声音。

王陵基再也按捺不住，破口大骂：“王八蛋！你敢硬！老子偏要把你们的脑壳割掉。你们不依教，给老子到鬼门关等我算帐！”张秀熟不再回答，翘首微笑，让王陵基独自去跳。审讯再也搞不下去了。这天公审后，重庆《新蜀报》很快就在该报第一版登了专题报道，题目是《张秀熟舌战王灵官》。成都《国民公报》也以《重庆共案观审录》为题，发了快讯。一时间，“张秀熟舌战王灵官”的新闻，不胫而走，传遍了巴山蜀水。如今党史研究室官网的宣传，太“诡谲”，好像1928年的重庆《新蜀报》、成都《国民公报》是今天办的一样。

“诡谲”还多。党史研究室官网说：1935年春，中共中央上海局特科派张曙时到四川。张秀熟是张曙时点名要放的人，遂于1936年10月首批释放出来。他入院时未办任何手续，出院时也未发“自新”书。出狱后，张秀熟返回平武老家，创办了简易师范学校校长，招生上课。“7·7”芦沟桥抗战爆发后不久，张秀熟在成都见到张曙时，张曙时代表成都特支宣布：“你在监狱10年的情况我已了解清楚，从现在起恢复你的组织关系”。张秀熟对张曙时说：“组织上需要我干什么，请安排，我一定服从。”这时张秀熟的全部工作就是推动川军出川抗战，张秀熟代笔写了一篇《为民族救亡抗战告四川各界人士书》，作为刘湘出川抗战的宣言。刘湘看后一字未改，以《告川康军民书》为题，发表在8月26日的《四川日报》上。9月四川成立战时后方统制委员会，刘湘任委员长，张秀熟任委员。11月南京军事委员会委任刘湘为四川学生军训总队长，保安处长王陵基等任副总队长，张秀熟经组织同意任政训处副处长，负责政训处实际工作。

1938年1月20日刘湘因胃病复发死于汉口，

张秀熟的川康绥署顾问也随之终止。此时四川省的党组织恢复,1938年6月张秀熟当选为中共川西工委委员(当时中共川西工委对外称作中共川康特委)。这一时期,张秀熟以教员的合法身份协助张曙时做上层统战工作,与刘文辉、田颂尧以及成都市市长陈炳光等来往。1949年10月当时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对抗解放大军。中共绵阳临时工委书记王朴庵找到张秀熟,说已通知蹇幼樵暗中联系,要张秀熟到成都做王陵基的工作,帮助蹇幼樵取得山防总队长的委任,同时暗中把平武地方势力纳入山防总队。张秀熟领到任务,恰好此时平武县新县长要找一位认识王陵基的人去成都,领取一批枪支回县,于是张秀熟便趁此机会来到王陵基的公馆。王陵基很是客气,对于张秀熟所提蹇幼樵任职之事,王陵基当即同意,并答应给平武60支枪,充实山防总队。

1949年12月22日江油解放,张秀熟即参与地下党一起研究如何组织民众迎接解放军。解放后张秀熟经贾子群介绍,找到了原中共川康特委书记、时任成都军官委员会兼组织部副部长的马识途。马识途把张秀熟的党组织关系转到川西区统战部,不久经李劫人、熊子俊等人介绍,成都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张秀熟为成都市树德中学校长。1950年7月川西人民行政公署成立,张秀熟担任川西文教厅长。

通过如今党史研究室官网的宣传,看来在绵阳市内的平武、江油、盐亭等三个县市级中,早期“上海组织”人物张秀熟主席比王右木烈士、袁诗尧烈士更有政治智慧。与张秀熟主席1936年同时走出监狱的三台中心县委书记和军委书记的汪克明,也不能相比。张秀熟主席的经历比王右木烈士、袁诗尧烈士强吗?党史研究室官网文中有不少介绍:1912年17岁的张秀熟,到江油县城武都镇报考原龙安府的最高学府——龙郡中学(1906年,匡山书院改为龙郡中学堂,迁址到武都镇)。四川马克思主义运动先驱者王右木当时在龙郡中学担任教务长,负责招录新生,张秀熟有幸受教于王右木先生。王右木打开了张秀熟的思维和眼界,二人也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1913年王右木回到成都四川通省师范学堂(1913年,四川通省师范学堂改名四川高等师范学校)复课,张秀熟也跟随王右木的足迹来到成都读书,插班到成都五世同堂街口的共和大学校中学部。王右木从四川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回到龙郡中学任教时,张秀熟也回到龙郡中学复学。

王右木到龙郡中学不久,便决心东渡日本,学习明治维新的国富民强之路。1914年张秀熟和一些同学专门为王右木送行,从学校一直送到武都镇西门外的水巷子。不久以后,王右木就给张秀熟来信,得知王右木老师考得了明治大学中国官费生卧名额,就读于该校的政治经济学系,并于1918年夏天获得明治大学政学士学位后就离开。

张秀熟于1915年从龙郡中学毕业,次年考入四川高等师范学校。年轻的秀熟一进入高师就发奋读书,他特别喜欢著名经学大师廖季平的课。1919年5月成都成立四川省学生联合会,张秀熟和他低一年级的盐亭籍学生袁诗尧,被推举为学生联合会理事部正、副理事长。两人因有共同的人生观,工作上配合得恰到好处。1920年5月23日四川省学联创办了自己的周刊《四川学生潮》,张秀熟因临近毕业,就由袁诗尧担负了大量的工作。1920年暑假张秀熟毕业,以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国文部本科生的资格,回到家乡平武县,担任县立高等小学校长。一年之后张秀熟收到张澜,请他去南充县立中学任教务主任兼国文教员的邀请信。不久又接到王右木老师的信,知道袁诗尧也应聘要去南充。张秀熟与袁诗尧再次联手,担任王右木所创办的《人声》报在南充的特约通讯员和代办员,不仅写文稿,还在南充发行代售。

但1920年袁诗尧被王右木介绍参加“重庆组织”,为啥王右木烈士不介绍张秀熟主席参加“重庆组织”呢?是否因张秀熟不如袁诗尧有参加过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的锻炼?但党史研究室官网介绍:1922年10月张秀熟收到王右木老师的来信,信中王右木委托张秀熟在南充组织建立川北社会主义青年团。为此张秀熟找来了老乡袁诗尧,他们二人在学生中物色过如南充县立中学农业部的罗瑞卿和师范部附属小学的任白戈等一批积极分子,进行重点培养和考察。可见王右木在发展“上海组织”上也看重张秀熟没有“重庆组织”的经历。

张秀熟在南充任教一年之后,应聘到江油龙绵联合县立师范学校当教务主任兼国文教员。1924年暑假,张秀熟接到成都高师附中(今成都市第十二中学)的聘书,遂带上妻子罗文淑到了成都。此时的成都由1923年打败了熊克武的杨森掌权,教育界的负责人全是拥护杨森的“新人”,王右木已经离开成都。张秀熟也辞职来到重庆。在重庆,《新蜀报》的主编周钦岳介绍张秀熟认识了萧楚女(中共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1924年夏王右木不幸牺牲。1925年9月张秀熟回到成都,在高师附中任教,同时在全省第一师范兼课。王右木牺牲前,为啥介绍袁诗尧参加“上海组织”,而没有介绍张秀熟是一个谜。因为张秀熟入团最先,已多年;他的入党,却迟到1926年。

1926年2月下旬,中共重庆地委成立后不久,地委委员兼成都特支书记刘愿庵找上门来,与李劫人共同将张秀熟介绍给《西陲日报》主持人徐幼根,聘为主笔。3月底的一天晚上,刘愿庵又来到张秀熟家,这次是与童庸生一起来的。童庸生当时任重庆团地委书记,负责领导全川的团组织。刘愿庵告诉张秀熟:党组织决定,由他们二人作介绍人,发

展张秀熟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成都特支又派黄理州来，代表党组织正式向张秀熟个别谈话，从此张秀熟就在他们的领导下开展工作。1927年成都发生了二·一六事件，3月31日军阀刘湘在重庆制造了三·三一事件，打死群众137人；到4月4日逮捕了杨闇公同志，并于6日将其残杀。四川各地党、团组织由半公开转入秘密活动；中共中央要求，这一时期，各地党、团组织的建立，必须有良好的上层关系作掩护。顶着险恶，是1927年7月袁诗尧调任中共川西特委宣传部长，公开职务是成都高师附中教导主任（校长）。

张秀熟这时虽未担任党内职务，但面临险恶形势正值暑假，张秀熟派人把妻子罗文淑和才11个月的长子张益龙送回平武老家后，成都特支负责人黄理州就安排他离开成都，到川北一带去查看各地党组织的情况，避一下风头。张秀熟先到广汉，随后到了绵阳。中共成都特支对江油经过较长时间的考察，认为在江油的省立二中建党的条件比较成熟，准备派出适当的人选去创建党的组织。中共成都特支党员章璞的堂兄章雨初，系驻江油县国民革命军29军屯殖司令部参谋长，故中共成都特支决定章璞到江油建立党的组织。章璞通过同学的介绍和中共成都特支的活动，被四川教育厅委任为省立二中的校长。

此时张秀熟还在绵阳县，中共成都特支交给章璞一封信，指示他转交张秀熟。1927年7月章璞赴任途径绵阳时，转交了中共成都特支给张秀熟的书信，张秀熟阅后即按指示，与章璞同往省立二中任教，张秀熟任教务主任。同月张秀熟按照中共成都特支的指示，组建了中共中坝省二中支部，张秀熟任书记。在江油过了半个月，张秀熟接到通知，立即赶到成都，方知中央已在武汉召开了八·七会议，由瞿秋白代替陈独秀主持中央工作，四川也由临时省委代替了重庆地委。临时省委下设川东、川西两个特委。川西特委于11月中旬在成都建立，因刘愿庵已到重庆临时省委，组织上就确定张秀熟任特委书记。

1927年开始“上海组织”内的斗争激烈，不亚于外部的激烈。发展到1928年2月10日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在巴县召开扩大会议建立正式省委，刚调重庆工作的张秀熟，就被选入省委五人常委班子，张秀熟担任教育宣传委员会书记。诡谲的是，1928年2月16日清晨，成都大批军警就将成大、高师、高师附中等几所学校包围，当场逮捕袁诗尧等师生100余人，到下午4时就将中共川西特委宣传部长袁诗尧等14人杀害于成都莲花池，不给袁诗尧像张秀熟有《舌战王灵官》的宣传机会。到1928年3月9日四川省委在重庆兴隆巷8号巴县县委举行会议时，又被军警包围，傅烈、周贡植等9人被捕，4

月3日即被杀害于朝天门下。至此“重庆组织”解散后加入“上海组织”在四川工作的高层成员，全部牺牲。

此后省委才正式决定由刘愿庵代理省委书记，但刘愿庵于1928年4月底即离开重庆前往上海，转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由此遂决定由张秀熟代理中共四川省委书记，顺理成章。据1929年4月29日《四川临时省委致中央报告》反映：“省委本身仅张秀熟同志一人及临时吴秀鸣等共三人支持，人少事繁，极难应付，经济缺乏更形[困]窘”。党中央见四川省委遭到破坏，就派木青（于1930年牺牲于重庆）到四川协助工作；又派在江西搞过农暴的李鸣珂到四川担任军委书记。李鸣珂性情急躁，决心要以赤色恐怖镇压白色恐怖，其中心任务是处决主谋枪杀9名中共党员的戴弁（第21军政治部主任）。张秀熟本来不同意李鸣珂这样做，在几次会议上都表示这仅是一种中共四川军委书记李鸣珂报复行为，对全川的革命行动不会有多大的好处，而可能后果更坏。但李鸣珂坚持必须以赤色恐怖镇压白色恐怖，与他从江西带来的枪手李觉民，用手枪将戴弁打死在大街上。

刘湘当即下令“大索十日”，进一步血腥镇压。事情既已发生，张秀熟只好布置同志们隐蔽，保存力量以待时机。也许张秀熟主席此时从江西搞过农暴来的李鸣珂书记，和与李鸣珂从江西带来的枪手李觉民等人身上，进一步掌握了“趋利避害”的政治智慧的。学会后来如何与在江西搞过农暴工作的老领导，以及一些四川军阀打交道的政治智慧。据介绍与张秀熟主席打过交道的重庆卫戍司令、四川省主席王陵基(1883-1967)，四川省乐山人。川军五行中资格最老，刘湘、杨森都要喊他一声老师。因死保北洋被打成光杆，才投奔刘湘。

王陵基帮助刘湘重掌兵权，但因倚老卖老又一度被刘湘撤去一切职务。抗战初期王陵基争夺四川省主席失败，编组16个保安团组成第30集团军出川抗战。1946年7月31日晋升为陆军上将军衔，晋升同时退为预备役，出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兼江西省保安司令，江西省军管区司令。1948年4月王陵基调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四川省保安司令，四川省军管区司令。1950年2月6日王陵基化装潜逃时，在四川江安县被人民解放军孙重远同志等人逮捕，先后在重庆战犯管理所、北京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1964年12月28日获得特赦。

田颂尧(1888-1975)，四川简阳县人，国民党陆军上将。1910年加入同盟会，曾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后参加苏浙学生军，任军事部部长兼营长。之后田颂尧加入川军，曾先后担任川军第4师参谋、川军第2师清乡独立支队长、第1军2师骑兵团长兼成都城防司令等职。1918年田颂尧任北京政府第

21 师 41 旅旅长，第 21 师师长。1925 年田颂尧任四川军务帮办。1926 年 5 月任川西北屯垦使，12 月任国民革命军第 29 军军长。1927 年 2 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并响应国民革命军北伐。1928 年 11 月任四川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1933 年 1 月任川陕边区剿匪督办，10 月任四川剿匪总部第 2 路总指挥。1935 年因围剿红军失利，田颂尧被撤职查办。1936 年 9 月田颂尧任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从此寓居成都。1948 年 3 月当选为国民大会代表。1949 年 12 月 9 日在四川彭县参加起义，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民革中央和四川省委委员。

根据何盛明主任自己介绍：“《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在 1982 年未内部出版前，中央档案馆曾函讯四川革命前辈张秀熟同志”。张秀熟主席嘱咐何盛明主任回信：“说明 1920 年四川没有共产主义组织”。张秀熟主席的话“属实可信”吗？据党史研究室网说：“1920 年暑假张秀熟毕业，以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国文部本科生的资格，回到家乡平武县，担任县立高等小学校长”；这期间张秀熟主席到重庆参加过“适社”无政府主义组织了吗？何盛明主任是如何完成张秀熟主席交给她写“1920 年四川没有共产主义组织”的任务的呢？

何盛明主任发表的文章含有把矛头指向王右木烈士和袁诗尧烈士。例如，在何盛明主任的“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再考证”文章，诡谲中一点是说：“无政府共产主义在四川流传中，从兴起、发展到衰落的整个过程，始终未与马克思主义者形成对立局面……四川早期的党团员中，不少是受过无政府主义影响的青年，有的如童庸生、袁诗尧还成为早期中共党团组织的骨干”。何盛明主任在文章中说：“重庆‘适社’与全国各地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多有联系。江凝九原是‘适社’成员，1921 年春分出成立《人声》社，即出版《人声》杂志（‘适社’当时尚未办刊物）。一创刊，即与全国各地无政府主义组织取得联系，它的代派处就有上海、汉口、北京、武昌、广州和成都等地，可见他们和全国各地联系之广”。

何盛明主任不说明 1921 年春“适社”出版的《人声》刊物，与王右木烈士 1922 年 2 月 7 日开始一再用刊名《人声》，创办出版的《人声》刊物的区别；更不说明王右木烈士为啥对《人声》这个已被无政府主义组织污染的刊名感“兴趣”？实际是王右木加入“上海组织”后，是为其纠偏挽回名誉。因为重庆“适社”按何盛明主任的介绍分析，其实是被筹备“上海组织”幕后的苏俄远东共和国情报机关物色，用来对付 1920 年 3 月 12 日成立的“重庆组织”玩的“把戏”。

为啥张秀熟主席同意何盛明主任的文章，写早

期中共党团组织的骨干袁诗尧烈士也混迹“无政府主义”？“上海组织”成立后，张秀熟主席与袁诗尧烈士背后有个人矛盾吗？因为《中国共产党盐亭县历史》一书 20 页中说：1919 年“5 月 25 日‘四川学界外交后援会’在成都成立，后改名‘四川省学生联合会’，推选张秀熟为理事长，袁诗尧为副理事长。袁诗尧担任省学联领导职务后，于 1920 年 5 月 23 日创办了学联机关刊物《四川学生潮》，这是当时四川许多刊物中影响最大的。刊出的许多重要文章，都为袁诗尧所写”。这说明 1920 年如果袁诗尧能参加“重庆组织”，张秀熟主席有可能听说。也许他本人也曾被动员介绍，但最终没有参加，为他赢得后来生机。

张秀熟主席和汪克明书记在 1921-1936 年间，分别当过中共四川省委代理书记和中共三台中心县委书记等党内主要负责人；被捕坐牢后都同时在 1936 年释放。但不同的是，《盐亭党史》书 137 页说汪克明写了“登报脱党”；而《绵阳党史》书 534 页说张秀熟是“获释回平武”。张秀熟主席和汪克明书记作为中共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被国民党逮捕坐牢，能出狱活下来到解放，继续干工作，是一件幸事。如今盐亭人民也是通情达理的，问题是：大家不理解类似汪克明书记 1933-1934 年在盐亭龙潭地区领导革命，盐亭本土 1934 年因“西山坪事件”被国民党反动派砍头，就义牺牲的共产党员和游击队员就有 300 多位，解放后被说成“叛徒”，为啥与他两次被捕释放没关系？

《盐亭党史》书 137 页说汪克明第二次“在狱中坚贞不屈”。盐亭城关小学孙昌金校长在新浪网博客上写诗，也赞扬汪克明“狱中坚贞不屈”。笔者有次与孙昌金校长在绵阳体育馆相遇，问他是怎样知道汪克明“狱中坚贞不屈”的？他说是照着盐亭党史办的文章说的。

《重庆日报》也有记者写文章说：“刘湘妄想通过反省院收买、感化共产党人为他所用。因此被关押者中刑期最长的为十年，如原四川省委书记张秀熟”。张秀熟主席 1928 年 10 月被捕后，与重庆卫戍司令王陵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是因“坚贞不屈”，国民党军阀才不杀他的吗？而且张秀熟也没有坐够 10 年牢。《盐亭党史》和《绵阳党史》两书，树立的盐亭本土共产党的地下负责人，闹革命响当当牺牲的烈士是袁诗尧（1897-1928）和侯伯英（1907-1935）两人。但他们在盐亭本土实际从事革命活动的时间很短，而且离开盐亭后，都打入国民党军阀国民党田颂尧 29 军，为以后地下工作留有“内线”。

《盐亭党史》书 120 页就说：“1934 年 1 月，保安大队长刘仰高的共产党员身份暴露，29 军内党组织决定并通知他迅速转移”。盐亭本土 1935 年被



国民党反动派砍头的 300 多位何登甲和申秋成带领的共产党游击队，在国民党盐亭县保安队有“内线”，也是因有共产党员刘仰高打入国民党盐亭县保安队作保安大队长留下的。盐亭县党史办刘泰焰主任对笔者说：上面认定 1934 年 10 月在盐亭龙潭五龙石狗场西山坪，被国民党田颂尧 29 军包围的 300 多位何登甲和申秋成带领的共产党游击队，愿意“投诚”被国民党盐亭县保安队收编，是“被捕叛变”；后又在 1935 年 5 月被国民党 29 军砍头，是国民党认为他们“反水”，解放后上面也认定他们不是“牺牲的烈士”。

那么汪克明书记 1934 年一年两次被国民党田颂尧 29 军逮捕，都和他追随张国焘：第一次被捕叛变就与国民党策划消灭盐亭龙潭共产党游击队有关吗？这是到 1934 年 10 月在龙潭五龙石狗场西山坪，300 多位共产党游击队被国民党田颂尧 29 军包围，何登甲和申秋成才最终相信袁诗尧和侯伯英在 29 军留下的“内线”，和刘仰高在国民党盐亭县保安队留下的“内线”，曾揭秘汪克明“被捕叛变”的暗示的。但为啥这些“内线”不向更上级的党组织负责人反映呢？

这又回到张国焘分裂党中央，以及盐亭龙潭 300 多位何登甲和申秋成带领的共产党游击队，不赞同张国焘“极左、极右”的创建根据地的意见有关。而曾参加“重庆组织”的王右木（1887-1924），1924 年夏赴广州参加中共中央重要会议，返川途中在旷继勋的家乡贵州土城，说是被当地反动势力杀害牺牲。那时也有“口传”是早期追随张国焘“内部人”，策划告密当地反动势力，对外却称是“土匪”所为。

2016 年 5 月笔者曾听绵阳市社科联刘仲平主席讲他在广安考察中听有人说：1936 年 1 月 24 日春节后，小平的父亲离家出外办事，一些受张国焘蒙蔽者在其蛊惑下，对小平的父亲下了毒手，对外也谎称“土匪”所为。这也许与 1934-1936 年红军在长征中，1935 年 10 月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挥师南下入川；小平同志因拥护毛主席出名，是反对张国焘的；广安属南充地区，离张国焘领导的通南巴苏区近。其次也有“口传”，小平同志的父亲邓绍昌先生（1886-1936）参加过“重庆组织”。1933 年 6 月张国焘在肃反中杀害的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邝继勋主席（1895-1933），也曾参加“重庆组织”。

类似复杂，打入“内线”的袁诗尧和刘仰高的人不得不考虑；而何登甲和申秋成带领的共产党游击队在被包围中研究突围，假降接受盐亭县保安队的整体收编，以等待时机，也许也来自和同意 29 军内党组织决定的“权宜之计”。但《盐亭党史》书中 120 页只说是：1934 年 10 月一个晚上，秘密通知龙潭地区党团员、“工农前卫团”等数百人，

在西山坪集会，“因叛徒密报，当地团防得知，在会场四周设下埋伏，将汪克明以盗匪罪名逮捕送县警所”。

诡谲是，如果仅是“当地团防”，是难对付 300 多人的共产党游击队的。而国民党军阀国民党田颂尧 29 军，在龙潭地区的活动严密，在《盐亭党史》书中多处提及。例如，《盐亭党史》书 119 页中说：1933 年 9 月下旬游击队“在石狗场打了 29 军的提款委员吴慎修，游击队员陈朝发被捕”。同页中还说：“1933 年 11 月，29 军谍查队长董咸仁率队在盐亭石狗场，逮捕中共盐亭县委书记何什民……何什民叛变”，相继逮捕了十余人。《盐亭党史》书 54 页中说：1933 年 10 月，“曾在绵安中心县委任过常委的陈燮和……转移回盐亭，被 29 军逮捕后叛变”。可见盐亭革命老区是国民党 29 军重点监视区，西山坪集会用“当地团防”去包围，是否“诡谲”笔法？《盐亭党史》书 119 页中说，何什民是汪克明来盐亭后的 1933 年 7 月才提拔的中共盐亭县委书记。何什民叛变后，“三台、盐亭共逮捕 100 余人”。

而汪克明来盐亭之前的 1933 年 5 月，当时的中共盐亭县委书记余国政，《盐亭党史》书 118 页中说：就“因党内身份暴露，去重庆”。汪克明是在何什民逮捕叛变后的“白色恐怖”条件下，仍然继续在龙潭石狗场从事地下工作，能“有惊无险”，是何什民没有告发他吗？那么《盐亭党史》书 120 页中说：1934 年 4 月，汪克明调盐亭富驿区委书记赵济舟任三台中心县委秘书，赵济舟随汪克明路过盐亭县城时一同国民党逮捕，赵济舟“叛变出卖了汪克明”。但“6 月 27 日汪克明在被军警押赴绵阳途中逃脱，经三台转回盐亭石狗场继续领导中心县委工作”。直到 1934 年 10 月石狗场“西山坪事件”集会，“当地团防得知，在会场四周设下埋伏，将汪克明以盗匪罪名逮捕送县警所”。29 军内党组织“口传”汪克明也“叛变”不是没有根据——《盐亭党史》和《绵阳党史》两书揭秘的诡谲“跃然纸上”：是国民党军阀党田颂尧 29 军“愚蠢至极”，身为三台中心县委书记和军委书记的汪克明，1934 年 4 月被捕逃脱，他们也不理不问。1934 年 10 月也只以“汪克明以盗匪罪名逮捕”——难道不知道身份？

国民党 29 军为啥不像砍杀何登甲和申秋成的布告称是“共匪匪首”，而仅称汪克明是“盗匪”？也许《盐亭党史》书 119 页中说有一条原因：1933 年“8 月下旬一个夜晚，游击队员到三元乡保安场袭击了财主杨寿堂家，毁掉佃当文书、破仓分粮、缴获银币 150 元”。这类事，解放初笔者小时也听邻近的何家湾村贫农协会（贫协）主席唐开元和贫农叫何礼成讲过。但他们不赞成游击队夜晚蒙面去袭击财主，当时内部也有“工农前卫团员”说，造成革命老区不必要的恐慌，

要干就公开干，不然弄巧反拙，财主们会认为是自家的佃户贫农“点水”，而让财主、反动派们更厉害残酷对待佃户、贫农。

这事也许反映了本土部分共产党游击队员，与汪克明和张国焘路线的分歧。那么汪克明与张国焘到底有没有联系呢？《盐亭党史》书119页中说：1933年“8月四川省委为了输送党员、干部支援和巩固川陕根据地，从成都到巴中（川陕省委驻地）建立了一条交通线”。《盐亭党史》书135页中说：刘仰高（1893-1968）“1930年7月，受命赴洪湖任洪六军军长。1932年，中共四川省委派刘仰高回盐亭从事地下活动……后又担任省委与川陕苏区交通员”。这里说的成都的“四川省委”和巴中的“川陕省委”，在张国焘1933年6月肃反中杀害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卞继勋主席后，实际成都的“四川省委”由巴中的“川陕省委”直接指挥的。

《盐亭党史》书120页中说的1934年1月“刘仰高的共产党员身份暴露……离开了盐亭”，与张国焘没有联系吗？刘仰高是盐亭1920年参加“重庆组织”的17个人中，唯一与袁诗尧两人是在1921年“上海组织”成立后，又单独申请参加的。张国焘配合马林组建“上海组织”，他一开始就知道“重庆组织”的原始《报告》和成员名单，在刘仰高任洪湖红六军军长时，张国焘也就认识刘仰高。其实在1932-1935年的盐亭，可作三台中心县委立足的“群众革命情绪高”的根据地，南北各有一个——除盐亭龙潭五龙石狗场西山坪外，就是中国最早留学日本攻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范仲纯的家乡，盐亭石牛庙店垭地区——这个北部大山区，还是著名历史学家蒙文通的伯父蒙公甫，1911年在家乡组织四川保路运动的地方。《盐亭党史》书61-63页中说：1935年3月一部分红军来到店垭，发动群众，“组建了游击队，1935年4月5日，建立了乡苏维埃政权……红军在石牛庙场镇建立了村苏维埃”。可见这里比南部更能配合川陕苏区。

但在1933年汪克明当然要听“川陕省委”张国焘的指挥。为啥说是张国焘？《盐亭党史》书159-163页是汪克明对在盐亭经历的回忆录，161-162页中汪克明说：“当时四川省委告诉过我：‘红四方军突破嘉陵江后，可能经梓潼地区，走盐亭与南部之间进军……造成进战合川、攻打重庆之势（其余军事计划全部我不知道）。’”这里汪克明说的“四川省委”，只能是“川陕省委”。因为当时的党中央是要北上抗日的。“进战合川、攻打重庆之势”的军事计划，不可能是毛主席的部署，而是张国焘想南下另立中央的打算。这样重要的军事计划能亲自告诉汪克明的，张国焘的可能性最大。而且读《盐亭党史》书159-163页的汪克明的回忆录，他在盐亭一些“左”的搞法，与张国焘的思想

一致，如“唯成份论”。李井泉书记进川也如此。

汪克明和张秀熟在1936年前的大革命时期，都被如今的一些党史书报描述为“传奇”：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只要坚强不屈，表明共产党的身份，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就不会被反动派屠杀的共产党地方主要负责人。但与他们同样共事的共产党地方主要负责人王右木和袁诗尧，就没有这样“幸运”。特别是如四川的高级党史专家何盛明主任等，或明或暗把王右木和袁诗尧说成与无政府主义组织“适社”有关联的人。这是否与“岷啸”说“1981年10月当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重新建立的时候，86岁高龄的张秀熟突然来了精神，再度担任副主任，主持这一中断了15年的工作。这时的编委会不仅要继续编修《四川省志》，还要负责指导各市、州、县的修志工作”有关？

事情的演变，还把“重庆学”与“上海学”联系起来，是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审、学术顾问何盛明主任公开发表的《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探索意见》、《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再考证》等文章，把袁诗尧和王右木、汪克明与张国焘、张秀熟与李井泉等历史人物推到前台。但张秀熟主席与李井泉书记也主要是在解放后才共事；其次1936年前李井泉书记也不可能深交汪克明，最多他也只能听闻汪克明在盐亭的活动故事。至于袁诗尧和王右木，张秀熟和王右木，张秀熟和袁诗尧，正能量讲他们之间的“师生情、同学情、战友情”的说法虽然很多，但何盛明主任公开发表的文章，也把袁诗尧和王右木、张秀熟和王右木，张秀熟和袁诗尧之间的一些“微妙”关系，挑明摆在了人们面前。

事情也不奇怪，王右木和袁诗尧先后牺牲后，张秀熟在中共四川省委中的地位自然上升。如张秀熟是省委五位成员中负责宣传的，袁诗尧只是中共川西特委负责宣传的。袁诗尧牺牲后，张秀熟很快上升为代理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但袁诗尧的被捕牺牲，没有张秀熟组织营就和处理后事的“口传”。相反“口传”1917年秋袁思尧考入成都高等师范学校，1920年3月袁诗尧经老师王右木和同乡袁焕仙介绍加入“重庆组织”。《盐亭党史》一书128页，在“盐亭地方党史人物介绍”条目的第一个人物“袁诗尧（1897-1928）”中说：“1920年，参加了王右木创办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其后，王右木又和袁诗尧创办《新青年旬刊》，宣传革命真理……这年暑假，袁诗尧毕业于成都高师，应张澜先生聘请到南充中学任教务长”。

在1920年3月12日张澜、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四位负责人，在重庆组织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简称“重庆组织”；称研究为“重庆学”）中，23岁的袁诗尧是成员，而没有张秀熟。“口传”1921

月8月14日马林在北京作出《重庆报告》能代转莫斯科的承诺，但建议“重庆组织”必须自行解散。1921年8月29日张澜回到重庆传达共产国际马林的建议后，“重庆组织”于31日正式解散。这之后，王右木很快以个人名义写信申请参加马林指导上海1921年8月初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简称“上海组织”，称研究为“上海学”）。

王右木的信转到上海和北京后，陈独秀、李大钊把在成都地区组织共青团和共产党的任务也很快委托交给王右木。1922年王右木在成都创办《人声》周报，同时组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执委会，就吸收张秀熟和袁诗尧入团。有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教授温勇和马志强发表的文章说：《人声》报的前身是《新四川旬刊》，创刊于1921年1月，其宗旨是配合四川自治运动，建设新四川，“王右木亲任编辑，袁诗尧（王右木的学生）为经理”。1923年1月再经王右木介绍，袁诗尧由共青团员转为正式的中共党员。

王右木1924年牺牲后，是由杨闇公担任的中共四川省委书记。袁诗尧1927年春在盐亭，根据党组织决定去重庆见杨闇公。当时袁诗尧的公开身份是盐亭县的教育局长，杨闇公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左派）负责人。《盐亭党史》一书129页说：“1927年春，袁诗尧以国民党川北特派员身份到三台，任国民党革命军29军政治部主任和田颂尧军长的高级顾问，并任潼属联立高中校校长”；可见袁诗尧是杨闇公、王右木和张澜的得意学生。1927年袁诗尧去成都担任川西特委委员、宣传部长，1928年他被反动派杀害，年仅30岁。袁诗尧的牺牲，当时张秀熟已是他的上级中共省委负责人，不出面也可以理解。为啥关心袁诗尧的是在盐亭的彭健修？如到成都找张澜、袁焕仙出面筹划买了棺材，将袁诗尧的灵柩运回盐亭。彭健修作为盐亭县教育局局长兼盐亭中学校长决定，在盐亭中学校内为袁诗尧设立了灵堂，以供各界悼念。其实袁诗尧1920年加入“重庆组织”，在“重庆组织”的盐亭人何拔儒、杜润之、彭健修等前辈中，就为袁诗尧这位晚辈，也是他们曾教过的能干学生作有安排打算。

笔者无意涉足“重庆学”与“上海学”，是1963年因放电影《怒潮》教育，又受笔者盐中高65级班的杨崇汇班长的启发和鼓动，假期才第一次有意识去收集家乡梓溪河畔龙潭地区解放前地下党的革命故事，引发了这55年来的业余研究。其中记得的有：

第一是，笔者1963年在梓江梓溪河畔玉龙地区乡间走访一些老人的过程中，申秋成和何登甲的名字如雷贯耳，被说成是当时地下共产党、游击队最得力的领导人。例如，玉龙镇申家沟有一位叫申光甫的老人，他告诉笔者说：解放后玉龙区公所

房子，原是玉龙镇的城隍庙，又兼作的存古学堂。上世纪20年代他就在那里读玉龙镇办的第一所完小。1935年被国民党以“闹共产党”杀头申秋成，就曾是与他在这里读过书的同学。那时申秋成在班里小范围讲有个马克思的外国革命家，胸中装有在全球消灭“难民、饥民、灾民、移民”的道理；还说这个“道理”在盐亭前两辈人就有传闻。1927年后这类“时政新闻”收紧了，他也成家立业，要养家糊口，没有与申秋成再接触。再后来就听说申秋成等高灯踏泥坝被反动派砍头前，还高喊“共产党万岁！”“打倒反动派！”等口号。但1964年传闻电影《怒潮》是为彭德怀翻案，被停映；笔者也就专心为考大学，作努力。

第二是，1981年笔者从重庆调回盐亭县科协工作后，发现盐亭县文化馆出版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四川盐亭县卷》一书，关于盐亭龙潭革命老区的革命斗争故事被笔注为“作废”后，不久笔者偶然认识了余国政（1907-1996）。因为1980年代笔者所在的盐亭县科协的办公室，和盐亭县沼办的办公室挨在一起。余国政与县沼办的刘远驰同志人很熟，他经常来刘远驰的办公室小坐一会。有一次刘远驰不在，笔者就把他请到科协的办公室小坐，给他倒开水喝。因为他像是70多岁的老人，身体很虚弱，杵着一根竹棍。这是1983年至1984年那一两年，余国政隔一段时间就去找盐亭县委组织部和其他领导说事，或交申述辩解材料。在科协办公室，笔者问他是什么事？

他说他叫余国政，他的家就在盐亭城北高山庙山背后，回家翻山很累。他与刘远驰认识，路过就想到刘远驰的办公室坐一坐。余国政还说，他曾是中共地下党盐亭早期的县委书记。1950年刚解放他在成都被人民政府逮捕，判了20多年刑，1979年才刑满回家。出狱后他听说有一个新政策，解放前作过共产党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不管什么错误，只要还没有被国民党、共产党所杀，能活到今天的，共产党念其做过一些党的工作，一律给予一些生活经费。他就是为这事在找县委组织部。笔者问他，成都解放时为什么还要逮捕他这个地下党早期的县委书记呢？他说1933年5月因在盐亭身份暴露，逃到重庆、成都去找党的组织，没有找到，就进了一家成都的国民党的兵工厂，在兵工厂仓库作保管。解放后，公安局说这家兵工厂仓库是国民党特务管理的，怀疑他是特务，而逮捕判刑的。

余国政对1935年前中共盐亭地下党的一些本土干部，在解放后被打成“叛徒”，持怀疑；对汪克明是盐亭革命“英雄”，也持怀疑。听余国政说他曾是中共地下党盐亭早期县委书记，而笔者1963年就在开始了解革命老区情况，所以看见在余国政到县委组织部回来再路过时，笔者都要请他到科协

的办公室坐。笔者问他的入党介绍人是谁，他也不愿意说。后来笔者知道是范弘先，而且是第一任中共地下党盐亭县委书记后，就问他范弘先还在不在？如果他 1950 年在成都被以“特务”逮捕，判 20 多年刑是冤枉，为什么不找范弘先证明他曾是地下党县委书记，做过很多党的工作？余国政似乎有很多难言之隐。他绕开笔者的话题，说出的话，使笔者大为惊讶。

余国政说：1950 年后，他在成都被以“国民党特务”逮捕，判 20 多年刑，还算是救了他的命。如果他说出解放前参加过共产党，像他那种情况，押送回盐亭，肯定当时会被枪毙。但等到几年后，公安局即使弄清他解放前参加过共产党的身份，就已经躲过了盐亭的“肃反”枪毙期。因为 1935 年前参加共产党，以后不愿意继续坚持斗争而脱党或叛变活到解放的，当时都可能枪毙了。所以他也安心继续坐牢下去。据余国政说，这种人，盐亭解放初被枪毙的，他知道的就有 10 多个。1980 年代笔者作为盐亭县人大代表，看到群众有反映，虽然不是当事人，觉得不应该把悬念留给盐亭的子子孙孙，需要和只能向组织汇报。由此，笔者曾向盐亭县党史办第一任主任龚荣忠同志，和分管党史办的县委副书记何开文同志，反映过对申秋成、何登甲，和他们带领的被敌人屠杀于盐亭玉龙区塔泥坝和宗峰寺两地 300 多共产党员的游击队战士的“叛徒案”，有疑问的事情。龚荣忠主任说：“这事你不要管”。何开文书记也说：“这事麻烦；解放初已有结论，要改也难”。所以只有等待找有向老革命同志，请教的机会。

第三是，1992 年 10 月笔者调离盐亭，到绵阳日报社工作。1998 年 6 月“首届海峡两岸嫫祖文化学术研讨会”在盐亭召开。王剑清在北京出面邀请并陪同中华炎黄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的冯征将军和中华炎黄研究会顾问、83 岁的胥光义将军等领导，亲临大会指导。王剑清（1922-1998），盐亭利和乡人，中共党员。1934 年上龙潭中学。1938 年奔赴革命延安，1939 年毕业于华北联合大学。先后在《晋察冀日报》、《冀东日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作。作过天津市委宣传部处长、九三学社中央《红专》刊物副主编；湖南省文联副主席、秘书长，《湘江文学》主编；河北省社科院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等职。王剑清的父亲王济钦（王明金 1868-1928），曾任潼川府中学堂校长，1911 年与张澜等人参加组织四川保路同志会，1920 年张澜介绍王济钦加入过“重庆组织”。王剑清在盐亭传为佳话的是，1959 至 1960 年大跃进，李井泉书记主政的四川和西南局“浮夸风”严重，王剑清家乡的利和乡，是盐亭全县饿死人最多的乡之一。王剑清作为中央统战部官

员到盐亭作调查，据原盐亭县党史办主任刘泰焰同志说，王剑清如实向绵阳地委、四川省委和中央反映了情况，引起国家的重视，才给盐亭拨来了一些救济粮，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浮夸风”也很快到了纠正。

鉴于王剑清是 1938 年从盐亭龙潭革命老区，走出的共产党女革命家。她读中学的地方，是梓溪河畔龙潭革命老区地下党游击队，组织领导斗争其声势之大，规模之广之地，她最清楚当时暴风骤雨似的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对如何全面准确地描述盐亭革命老区历史，王剑清也是最有发言权的经历者之一。而且笔者也被应邀和采访参加海峡两岸嫫祖文化学术研讨会，能亲自向她请教“中共盐亭县历史”中的难题。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由此笔者根据从童年到 80 年代在盐亭工作，亲身所见所闻盐亭党史中的难题是：1950 年以后，李井泉书记主政四川，为维护活下来的汪克明一个人的正面形象，将被盐亭革命老区很多群众怀疑是真“叛徒”的汪克明的自辩说法，变成了制造盐亭革命老区在本地直接参加地下党辉煌革命活动事迹的大批牺牲的像何登甲、申秋成等近千名的党员和干部划为的“叛徒”案。由于文革后，李井泉书记仍担任国家领导人的职务，使得《中共绵阳市志》和《中共盐亭县历史》等稿本材料中，对解放后制造的被国民党反动派 1935 年屠杀的盐亭本土申秋成、何登甲和他们带领的那 300 多共产党员的游击队战士为“叛徒”案，难于纠正。

例如，余国政是改革开放后才没有归类为“叛徒”，只是因为他活下来，能自己为自己不是“叛徒”辩护，政策才得到落实。历史的真实是不可改的，余国政说的话是真是假，笔者无法判断。这次王剑清的回答证实是：1998 年王剑清老人回忆起 1935 年前那段革命老区历史，盐亭本土的群众和共产党人在本土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作出的重大贡献，她像早曾想过。她深情地说：“解放初，有些作法是过左了；我对自己家乡利河乡的情况，也知道一些”。她还说，她的两个参加过那时革命的侄儿，解放初也是被错杀的。可见她对李井泉书记的作法，也还是有意见的。解放初期李井泉书记追究 1934 年 10 月“西山坪事件”演变的 1935 年 3 月大屠杀的真相，认定汪克明指挥正确。而被敌人包围的龙潭地区的党团员、“工农前卫团”和农协会员数百人，被定“叛徒”没有公开宣称。所以直到改革开放后，盐亭本土的广大群众与上面的认识有差距。但王剑清毕竟是老革命，她听笔者的反映后，处理的方法是：把当时的盐亭县党史办刘泰焰主任亲自请到跟前，委托刘泰焰主任给中共四川省委写报告，谈追认盐亭为革命老区等问题。当时来参加海峡两岸嫫祖文化学术研讨会的，还有退休的原四

川省委书记杨超同志，但王剑清同志没有直接找杨超书记谈。而是教刘泰焰主任出面，请杨超书记帮助解决“西山坪事件”遗留问题。但刘泰焰主任后来说，杨超书记也没办法。不得其果。王剑清同志会后回到北京，也当年10月不幸去世。这里多说一点：笔者当年采访“首届海峡两岸嫫祖文化学术研讨会”的文章，发表在天津市1998年7月31日的《今晚报》上，题目叫《寻找“不死鸟”》。

第四是，盐亭革命老同志衡超伦主席反映，解放初期李井泉书记追究他“发展党员过右”，是原盐亭县汽车站党支部书记、盐亭天垣乡出生的何开明同志对笔者的“口传”。绵阳市政协副主席衡超伦（1927-），盐亭县金孔镇人。1948年在南充读书时加入共产党。1949年6月经党组织指派回盐亭开展工作，7月组建起中共西充-盐亭边境特支，衡超伦任书记，发展党员30多人。从1950年起，衡超伦先后任盐亭县县长、中共遂宁地委常委、绵阳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绵阳市政协副主席兼绵阳市社科联主席。衡超伦同志是盐亭本土人解放后当盐亭县长的第一人。解放后，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亲自到盐亭县处理地下党问题。衡超伦作为当时盐亭地下党的负责人，也被关押起来询问。当然，还关押有其他的盐亭地下党负责人。一是问他，盐亭发展的80多名共产党和外围组织成员，为何富裕家的人多，是穷人家的少？衡超伦作回答后，李井泉不认可，还说就连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他都怀疑。衡超伦说出了自己的入党介绍人和入党经过，以及拿出了证明材料。二是衡超伦向李井泉，谈他在盐亭发展的共产党员的具体情况。但李井泉也不认可，逼急了，衡超伦还说，如果你不相信，有一次他们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还把那次开会参加的党员名单，写在纸上封存在一个瓦罐中，埋在一处地下的。

于是李井泉派人按衡超伦说的话，去找寻挖出这个瓦罐。但找寻到的这个瓦罐中，只有七八个的名字。李井泉就只认可这七八个人，才是盐亭县地下党的成员。其他人不算数，如要入党，必须重新申请，接受考验批准。可见李井泉是亲自处理解放前盐亭县地下党问题的最高负责人。衡超伦现在已90多岁，人还活在绵阳。

1934年10月李井泉同志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李井泉被任命为中央直属纵队政治部主任，同时兼任遵义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冕宁县革命委员会副主席。5月27日中央红军抢占泸定桥，毛泽东电召李井泉尾随主力归队。李井泉带领一部分“抗捐军”战士，随红九军团从泸定桥跨过大渡河，接朱德急电，迅速进军四川天全，夺取天全河上铁索桥。李井泉与红九军团昼夜兼程，从国民党军手中夺取了三座铁索桥，并攻克天全县城。1936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李井

泉被调至红四方面军第九军任政治协理员。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方针强令部队南下另立“中央”，利用老乡关系拉拢李井泉，遭到抵制，因此被贬为红军大学的政治教员。

李井泉经历过井冈山根据地的“富田事件”。据《黄克诚自述》一书讲：“A B团”是国民党右派在江西省党部中一小撮极端反动分子纠合起来的秘密组织。红一军团攻克吉安后，在缴获敌人的文件资料中，曾发现有关“A B团”的资料，并涉及到中共江西省行委和赣西南特委的某些干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1930年12月初，派方面军总政治部政务处长李韶九率领一连部队，到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实施肃反任务。李韶九一到富田，就采用逼供信的手段，大肆捕人。几天之间，在省行委、省苏维埃及特委机关，抓捕了一百余人。旋即对被抓捕的干部轮番刑讯逼供，屈打成招后，按照口供继续捕人，连家属亦不能幸免。省行委、省苏维埃、特委及江西地方红军第20军的一些负责干部先后被抓捕，搞得机关上下人人自危。在这种情况下，江西省行委及红20军的部分负责人便铤而走险，干了两件很坏的事情：一是模仿毛泽东的笔迹，伪造了毛泽东给总前委秘书古柏的信，制造毛泽东要把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打成“A B团”主犯的谣言。他们故意把这封信送到彭德怀手里，当即被彭德怀识破系伪造。另一件事是，他们鼓动红20军哗变，扣留李韶九（后逃走），放出被抓捕的人，并率红20军西渡赣江，脱离总前委领导，单独到永新、莲花一带活动。这就是当时著名的“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给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以极大震惊，认为“富田事变”是“A B团”里应外合，公开叛变。总前委对“富田事变”采取“坚决进攻的策略”。毛泽东还以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起草了中央苏区打“A B团”的肃反运动，在“阶级决战”的口号之下，不断升格，导致广泛扩大化，给党和红军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惨痛损失。1950年“富田事变”还没有得到改革开放后的正确认识，李井泉政委把汪克明当作“李韶九”，带着对汪克明正确的记忆1949年杀回四川后，从对汪克明的处理，看得出是欣赏汪克明的。应不应该弄清龙潭革命根据地1000多人的游击队的“叛徒案”的真假？应不应该还盐亭革命老区人民一个公道和清白？也许面对解放初主政四川的李井泉政委，大家都是一种困难的选择。因为在1931年至1935年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内各个根据地都发生过不同程度的扩大化的“肃反”斗争。此时与解放初主政四川的省委书记李井泉和省委书记的阎红彦，他们虽不在一起，却有相同的地方。例如，他们反对张国焘分裂红军、分裂党中央，但他们也清楚张国焘针对川陕

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旷继勋、刘志丹等的“肃反”斗争。张国焘还把盐亭地下党及龙潭游击队革命武装，同已解散的“重庆组织”的影响联系起来，进行打击。

现在对 1935 年前的十年间盐亭革命老区，辉煌革命活动事迹只是抽象的泛泛肯定；说到具体的代表人物，就只有袁诗尧、侯伯英这种盐亭人牺牲在外地的，并不在盐亭本土领导革命活动的优秀干部。而具体说到这期间，每个盐亭本土人直接参加盐亭地下斗争而牺牲的，如像何登甲、申秋成等干部和党员，除王光涵等极少数烈士在改革开放后才得到承认外，大多数不是叛徒，就是脱党。应该如何看待追究这期间曾经参加地下斗争的党员，因上层张国焘路线的分歧与“肃反”，暴露下层本土的众多党员遭杀或脱党，就难解了。

## （二）谜中谜释谜

### 五、《报告》是俄国综合稿

原河北电视台纪录片编导张军锋主任的《开端——中国共产党成立述实》一书，第 14 章第 4 节《四川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探疑》一文开头就讲：“提起哥德巴赫猜想，人们都知道这是一道数学科学界至今仍未完全攻破的世界难题。在中共党史学界，也有这样一道被称为哥德巴赫猜想一样的难题。这就是众所周知、长久以来无法完全破解的《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但我们要公正地说：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审、离休干部何盛明研究员，对解开这道被称为中共党史学界众所周知、长久以来无法完全破解的“哥德巴赫猜想难题”，作出了《报告》应是一份俄国人整理的综合稿的贡献——即《报告》，最少要分为 6 个版本。

第一是，1956 年 9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访问莫斯科，要求苏共中央把原共产国际有关中共的档案交还中共。苏共经过仔细研究，答应交还一部分。于是，杨尚昆从莫斯科带回了数箱档案。这批档案作为党内的重要机密，保存在中央档案馆。专家们在查阅这批档案时，并没有看到中共“一大”文件的中文原件（版本），而是在档案的第九卷中发现了三件有关中共“一大”文件的俄译稿：《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1921 年）、《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1921 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与“一大”文件放在一起的还有三件地方组织报告的俄译稿：《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广州共产党的报告》和《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这一卷档案的写作时间均在 1921 年前后，但没有注明作者，也没有收发机关。

即杨尚昆主任 1956 年从莫斯科拿回的《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俄国人的俄文“翻译”稿，实际是俄国人自家综合整理的报告稿子，我们

简称为《俄国综合重庆〈报告〉俄文稿》。

第二是，1956 年从莫斯科拿回包括《俄国综合重庆〈报告〉俄文稿》在内的“一大”档案回国以后，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帮助下，中央档案馆筹备处将这批俄译稿翻译成中文，第一次印刷于 1958 年陆续刊登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编辑的内部机密刊物《党史资料汇报》第一、六、十号上，送请中央领导同志审查。毛泽东主席审查后，于 1958 年 6 月 3 日作出的批示，间接证明这批从共产国际带回来的档案的真实性。1959 年 8 月 5 日中央档案馆筹备处办公室派陈铭康和李玲把关三个译稿文件送到董必武同志那里，1959 年 9 月 5 日董必武写复函：“三个文件虽然是由俄文翻译出来的，但未发现中文文字记载以前，我认为是比较可靠的材料”。随后中央档案馆作出结论：“上述材料‘比较可靠’”。1961 年中央档案馆又把《俄国综合重庆〈报告〉俄文稿》等译成中文。1982 年中央档案馆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为名，内部出版了这批档案。同时附录了李玲《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俄文本的来源和初步考证》。据此，中央档案馆确认李玲等翻译《俄国综合重庆〈报告〉俄文稿》的中文稿版本，成为中共“一大”档案的一部分。

即李玲等翻译《俄国综合整理〈报告〉俄文稿》的中文稿版本，我们简称为《俄文〈报告〉俄国综合稿李玲中译本》。有文章说，新中国成立后，编写中共党史成为现实的需要和历史的必然。1951 年 6 月胡乔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30 周年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文中明确指出：“1921 年 7 月 1 日，在‘五四’运动以后发展起来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举了 12 名代表，在中国工业中心和工人运动中心上海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由于胡乔木在党内“一支笔”的地位和在学界的影响，他的这篇文章自然成为了后来学界编写中共党史的一个参照和范本。到 2002 年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重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正式出版，才对 1921 年中共“一大”前的各地党组织没有再沿用“共产主义小组”名称，而是使用了“党的早期组织”的称法，并把 1920 年 8 月陈独秀在上海主持成立的党组织，由过去的“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改称为“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可见《俄文〈报告〉俄国综合稿李玲中译本》还是“一支笔”法，不是“重庆组织”《报告》中文原稿意。

第三是，1983 年《四川党史研究资料》第 9 期发表了何盛明《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探索意见》，何盛明自称的“只能起破题的作用”的《俄文〈报告〉俄国综合稿李玲中译本》：“可以认定《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就

是重庆“适社”派去俄国考察的成员所写，时间是1921年4-5月他们停滞在哈尔滨的期间，参加写报告的人，应是秦慧僧、廖划平、杜小马、徐敦让四人，1921年6月由秦慧僧、廖划平带到伊尔库茨克，呈交给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即“适社”《报告》的秦慧僧、廖划平、杜小马、徐敦让等四人中文稿，我们简称为《“适社”〈报告〉廖划平中文稿》。

第四是，重庆“适社”秦慧僧、廖划平、杜小马、徐敦让等四人，实际并不精通俄文，且为“上海组织”物色。有文章说：重庆“适社”被物色的“其余的因为钱没兑来，或是钱不够，所以一时不能动身，只好在上海学习俄语和世界语，俄语是杨明斋教授”。张军锋主任的《开端---中国共产党成立述实》一书“忠厚长者杨明斋的生死之谜”一节介绍：杨明斋是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1988年9月已经为杨明斋的身世耗费了近十年时间的余世诚教授，为了彻底查明杨明斋最终的结局，执笔用汉语向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写信，叙述杨明斋在中共创建中的地位和贡献，赞扬他为中俄共产主义事业的奋斗精神，诉说查找这位老布尔什维克的过程和遇到的困难，请求总书记能给予帮助。1989年2月已得到解决。即帮助把《“适社”〈报告〉廖划平中文稿》翻译成俄文的，有可能是杨明斋教授，我们简称为《“适社”〈报告〉杨明斋俄译稿》。

第五是，“口传”1920年3月3月12日张澜、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当时在日本）等四位负责人，在重庆组织成立的共产党后，北京李大钊传来维金斯基被共产国际和俄共派到中国了解建党情况。张澜与吴玉章、王佑木等商定，由王佑木向共产国际起草了《报告》。1920年3月31日王佑木写好的《报告》，经张澜、吴玉章等通过，但送到北京请李大钊转交共产国际时，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第一位正式代表维金斯基1920年4月，才和他的妻子及翻译---长期在海参崴和西伯利亚地区打工的华工代表、十月革命前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杨明斋等到达北京。但维金斯基在张国焘的蒙蔽下，推迟收下《报告》。

张澜听说后，要李大钊在共产国际再派人来时，再通报并告诉“重庆组织”要面见他们。1921年6月列宁派的马林来中国正式建党的消息，张澜从李大钊那里知道后，张澜再次与吴玉章、杨闇公、王佑木等研究，由王佑木在1920年3月31日那份原稿上修订。由此我们把此前后《报告》简称为《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且莫斯科可能保存有两种稿：1920年3月31日最先的；1921年7月15日定稿的。《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张澜1921年8月10日带到北京后，北京大学教授杨怀中是张澜与何拔儒留学日本时的同学和朋友，张澜

通过他作掩护找北京大学的李大钊。李大钊找到张圣英完成俄文翻译稿后，8月14日就带张澜一起面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马林同意将《重庆报告》和上海“一大”材料一起转交带回莫斯科。但马林建议解散重庆组织，以个人名义愿意的再加入“上海组织”。1921年8月15日张澜从北京-武汉-重庆原路赶回，1921年8月30日开始举行的解散会议。马林的意见得到王佑木、杨闇公、吴玉章等大多数人同意，并决议不允许任何人以重庆组织名义活动；愿意加入“上海组织”的以个人名义申请；由此“重庆组织”不再存在。

第六是：由李大钊找张圣英翻译的《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的俄文稿，我们简称为《重庆〈报告〉张圣英俄译稿》。

以上杨尚昆主任1956年从莫斯科拿回的实际是俄国人自家综合整理的《俄国综合重庆〈报告〉俄文稿》，除开我们分析俄国人综合整理参考有《“适社”〈报告〉廖划平中文稿》和《“适社”〈报告〉杨明斋俄译稿》，以及《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和《重庆〈报告〉张圣英俄译稿》等这两组的外，是否还参考有其它中国组织的《报告》，这里不作讨论，但来自四川的可以肯定地说，只有《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和《“适社”〈报告〉廖划平中文稿》这两组。

正是由于《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的存在，它才奠定了“重庆组织”和“重庆学”的基础，也才打开了“上海组织”和“上海学”的大门。“重庆组织”的存在，出生四川的朱德、陈毅、刘伯承、聂荣臻等新中国四大元帅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设计师”小平同志应有所闻。就是参加上海“一大”的毛主席和董必武主席也有所闻。

然则《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的存在---不但对中国，而且对苏俄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昨天、今天和明天都是一道政治难题和敏感问题。清华大学吴大辉教授说，中国和俄国是“亲兄弟明算账，市场原则，同等优先”；是不是“亲兄弟”？只要看苏俄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能不能答应把存放在俄国的原共产国际有关中共档案的中共“一大”文件的中文原件（版本），让中国官方复印就可说明。因为1956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访问莫斯科，要求苏共中央把原共产国际有关中共的档案交还中共。但当时苏共经过仔细研究，交还的只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俄译稿；以及《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广州共产党的报告》和《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三件地方组织报告的俄译稿。

让中国官方复印《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

报告》俄译稿整理用的《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用给钱才准许复印都行：“市场原则，同等优先”，也算吴大辉教授说的“中国与俄罗斯打交道，不吃亏就是占便宜”。因为由此“重庆组织”将会不是四川党史学者杨世元主任说的是“一道哥德巴赫猜想题”——杨世元主任 1932 年生于重庆，建国初期被调任重庆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邵子南的秘书，文革结束后调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1998 年他在《四川党史》第 4 期发表的《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再探索》一文，说“重庆组织”是道哥德巴赫猜想数学难题。这是太悲观了。

笔者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属于“哥德尔计算机”——是可解又不可解的“拓扑斯逻辑”——能给出定量的自然数都可确定解，而不能给出定量的无穷大自然数都是不确定解。但“重庆组织”的存在是可解的——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一是学《开端——中国共产党成立述实》书中提示的，如山东党史专家、山东石油大学余世诚教授所采用的类似方法——给当今俄国总统普京写信，请求普京总统给予帮助，允许在不要回原件——如今科技发达条件下，能复印或录像回《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和《“适社”〈报告〉廖划平中文稿》最好。

二是学中共绵阳市党史研究室在网上写张秀熟主席《舌战王灵官(王陵基——重庆卫戍司令)》的文章提示：采用查找解放前的敌伪档案的类似方法，在全四川省和重庆市范围内，从省、市到各市、县保存的解放前 1936 年以前各年的敌伪档案中，查找有关《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中可能是“重庆组织”成员及联系人员坐监牢的审问详细记录，甚至可以包括这期间“上海组织”成员坐监牢，类似汪克明书记这种表现“坚贞不屈”，后又“登报脱党”人员坐监牢的审问详细记录。还可以查找解放后 1950-1953 年期间公安机关追究处决“叛徒”可能是“重庆组织”成员及联系人员坐监牢的审问详细记录——类似盐亭任望南被公安机关处决前的审问详细记录。因为 1949 年 12 月解放军兵临成都，省主席王陵基逼迫任望南一道外逃，任望南不仅拒绝，“而且令财政厅全厅人员保护卷案，等候接管”。

1952 年任望南被处决，王陵基却留下。“口传”他和何拔儒一同参加过“重庆组织”；1915 年还陪送何拔儒到长沙，是盐亭唯一能亲眼知道何拔儒教过青年时代的毛主席的人。笔者 1952 年虽才 6 岁，也听大人们说任望南被处决，布告说他是国民党“川康省主席”；《布告》原件还有吗？而为啥以“川康省主席”之名处决呢？是否解放前夕国民党四川省和川康省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真正川康省主席的王陵基，解放后虽然被抓，也许能说出他曾帮助过张秀熟主席要的枪支；而张秀熟又有中共川康特委书记马识途的帮助——1950 年初张秀熟主席曾对

自己的入党和出狱说清楚缺乏自信，找过马识途部长——绵阳市党史研究室官网说：“解放后张秀熟经贾子群介绍，找到了原中共川康特委书记、时任成都军官委员会兼组织部副部长的马识途。马识途把张秀熟的党组织关系，转到川西区统战部”——1982 年底张秀熟主席，曾拿着北京交来的《俄文〈报告〉俄国综合稿李玲中译本》，也许也找过马识途部长——但据四川省党史办的“岷啸”先生写的《1949 年中共川康特委机关被破获案真相初探》披露，马识途部长曾干预四川省党史办改革开放后，对中共川康特委机关“叛徒”案的调查落实工作叫停，这“岷啸”先生在退休后也想不通。

错杀任望南，如今难于追究责任。但如今 104 岁的马识途部长是中共四川省委内的老资格革命家，他 1915 年生于重庆忠县。1931 年在北平念高中。1936 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工学院化工系。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 年到昆明西南联大中文系学习，1945 年毕业。1946 年调成都任川康特委副书记。解放后历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中科院西南分院党委书记，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四川省人大副主任，四川省文联主席，四川作协主席等职。著有长篇小说《清江壮歌》、《夜谭十记》、《马识途讽刺小说集》等作品。笔者曾对马识途部长应该说很早就知道——那是 1966 年 4 月初到 6 月初，《武汉晚报》每天连载马识途部长以第一人称，写他解放前搞地下革命工作的长篇小说《清江壮歌》，直到“文革”爆发才中断的时候——1966 年笔者在武汉读大学，被《清江壮歌》吸引住。

因为在 1963 年笔者曾考察过家乡盐亭 1936 年前共产党搞地下革命可歌可泣的事情，马识途部长的影响，是到 2014 年笔者与陈龙先生合作写《盐亭壮歌》，就是曾受《清江壮歌》的书名启发学用《盐亭壮歌》标题。如今的本文，也是难忘革命的可歌可泣追求真理——这也使笔者从 1963 年到 1966 年 6 月“文革”爆发前这段期间，能自觉利用课外业余时间，读完了马克思的三卷《资本论》，和《列宁全集》1-33 卷，而使笔者受益匪浅。这里背景还有：笔者从小就听母亲讲，谢表婶和她儿子张子才和儿女张子琼一家，1930 年代从南部逃荒要饭到盐亭的苦难。当时张子琼才三岁，虽然我们家也很穷，但笔者的祖母还是收留了他们。后来张子琼长大后与笔者的堂兄王德培大哥结婚。张子才解放后读书，完小毕业就当上村里、乡上的干部。那时家乡人民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热爱，认为再“逃荒要饭”是对社会主义的污蔑。笔者 2003 年在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解读时间简史》一书，在第 14 章《从无限可分之弹到求个说法之食》中，就提到经历的事——1959 年大跃进出现自然灾害，家乡陷入大饥荒。

1960 年初夏的一天早上，笔者从读初中的盐亭



玉龙区中学赶回家，就听大人讲，在邻近天垣的大碑垭有位老婆婆饿慌了，半夜爬到大碑垭的高山躲起来。三天后人们才找到她，已饿死在红苕地里。人们说她是宁愿饿死，也不去讨口给社会主义丢脸。这个观念从解放初到四清运动，我们家乡确实消灭了讨口现象。但1965年高中毕业考上武汉钢铁学院。上学从绵阳坐火车在郑州转车时，出车厢看见很多忙完了生产出去要饭的河南农民，笔者惊呆了：“四川人真傻，何不学河南人的聪明，不搞‘一刀切’呢？”其实笔者自觉抽空学马、恩、列、斯、毛主席的著作，就是从1960年读初中开始的。到1966年6月笔者看完三卷《资本论》，和《列宁全集》1-33卷，加深了“口传”的一个认识：马列主义的精髓强调阶级斗争，是围绕全球治理“灾民、饥民、难民、移民”现象，其中包括了“抓革命，不放弃搞生产”。

特别是《列宁全集》中，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对“无产阶级文化派”主张一切无产阶级革命化的批评，以及重视继承过去的优秀文化遗产等的文章，给笔者以极大的震撼。所以笔者认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个年代，“重庆组织”的职业革命家们从法国巴黎公社失败后传入的马克思主义，以及经历保路运动失败的考验，他们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全球治理“灾民、饥民、难民、移民”办法的精髓，会更深刻和贴近实际接近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在全球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共治”政治理念的地步。1920年“重庆组织”成立时成员的单纯性，比1921年“上海组织”成立时成员的单纯性更高，也许是“重庆组织”成员没被公开暴露的原因。

三是能证实“重庆组织”存在有关材料，是张军锋主任的《开端》一书502页提到，中国共产党1921年3月“各组织的代表会议”召开的“三月会议”之谜。《上海党史网》2018年报道上海党史作家、诗人缪国庆，他在2016年写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登上共产国际舞台始末》一文说，1921年1月在北京的维金斯基临行前，要李大钊派一名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代表同去远东书记处协助工作。李大钊就决定派已大学毕业的张太雷去。这要说到张圣奘；张太雷虽出生江苏省武进县，比张圣奘大五岁，但张太雷在天津北洋大学法科读书时，与周恩来都是天津学生领袖。由于张圣奘的家在天津，先后在南开中学和北大读书，由周恩来介绍认识张太雷，又因同对俄文学习有爱好相识相交。后张圣奘把张太雷介绍给北大教书的李大钊和俄国人鲍立维作英文翻译，鲍立维又再把张太雷介绍给维金斯基作汉语翻译的。

张太雷协助维金斯基在华第一次逗留的9个月时间，维金斯基并没有新成立起全国性组织，只是

指导李大钊和陈独秀分别在北京和上海组织起共产党早期组织。虽然他知道1920年3月12日已经在重庆开会组织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而且1921年3月又要召开第二次代表会议，及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以前很多组织活动的经费，已有“重庆组织”的支持。但维金斯基初次来华，建党经验还不多，加之张国焘的蒙蔽，和当时复杂的各种类似进步思潮在多地风生水起，并不容李大钊、陈独秀和维金斯基乐观。例如缪国庆先生说：一是由姚作宾等人组织的所谓“共产党”（姚作宾南充南部县人），曾参加过“五四”运动，担任过全国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早在1920年5月，他曾专门前往海参崴请求援助，得到承诺后回国秘密组织，又转赴莫斯科要求加入共产国际。二是由江亢虎组织的“中国社会党”，自称党员数达到52万之多，建立有490个支部。江亢虎原是无政府主义者，作为北大名教授，当时的社会影响不亚于李大钊和陈独秀。获知创建共产国际，他即与之取得联系，并在北京的《京报》《晨报》上撰文介绍俄国十月革命，还写了《列宁小传》、《托洛茨基传略》、《向赤俄政权屈服》等令人注目的文章。所以1921年1月张太雷与维金斯基同行离开北京前，李大钊暗中交代张太雷必要时，可以亮出代表1920年3月12日已正式宣布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出席1921年6月22日在莫斯科要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列宁选派在印尼已有建党经验的马林到中国建党是英明之举，1921年6月莫斯科大剧院召开“三大”时得到印证。因为当杨明斋带张太雷和俞秀松等三人到达莫斯科时，江亢虎和姚作宾以“中国社会党”和“东方无产者”的身份，已取得了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代表证，并获表决权。张太雷本身是北京李大钊组织的成员，也算是“重庆组织”的成员；“重庆组织”的成立报告在1920年4月初交给过共产国际，维金斯基和杨明斋可以作证。所以张太雷心里有底，能有理有据与江亢虎和姚作宾展开斗争。这就是1921年6月“上海组织”还没有正式成立，《开端》一书提到张太雷致共产国际“三大”报告，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已得到国内中共中央的任命，报告1921年3月又已召开过的“各级组织的代表会议”——所以解答张太雷的“三月会议”之谜，只能是1920年3月12日成立的“重庆组织”。

那么为啥到1956年时，前苏联还对《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和《重庆〈报告〉张圣奘俄译稿》敏感？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访问莫斯科要求苏共中央交还原共产国际有关中共的档案时，才觉得是一道政治难题；莫斯科要把“重庆组织”和《“适社”〈报告〉廖划平中文稿》和《“适社”〈报告〉杨明斋俄译稿》综合整理成《俄国综合重庆〈报告〉俄文稿》，交还中共呢？这是因为

苏共对自己的不自信,而且源自1920年苏俄远东书记处和情报处对“上海组织”和“重庆组织”的不自信。同时刚发生过影响深远的1955年毛主席要收回的旅顺港,更加强了1956年前不自信的政治背景,

与1997年我国收回香港不同,后者不存在“上海组织”和“重庆组织”的错位---1955年5月24日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在旅顺苏军司令部签署了最后议定书,确定驻旅顺口地区的苏联军队将在1955年5月31日以前全部撤离。到5月25日至27日苏联驻军指挥机关及陆海空三军约12万人分批撤离,旅大地区60年后终于回归了祖国。但在苏共高层内部,对中共收回旅顺港是分歧的。况且苏军撤离后,我国把留下的中方在原旅顺港苏联政府任职的高级行政人员,全部送去“再教育”,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全部“解放”---类似1949年重庆解放后,国家把留下的在原国民党政府办事的高级公务人员,全部送到新疆“再教育”,直到年老退休才可回重庆与子女团聚一样。这是笔者1970年代在重庆18冶3公司机修连工作时,听锻工班工人李敬明、李胜利等摆谈他们家的情况时,知道的。

而1989年9月10-15日第二届国际气功会议在西安召开,笔者在会上认识一位来自大连市的郭弘历老先生,他告诉他曾留学日本筑波大学和东京大学的经济系,1955年前是原旅顺港苏联政府财政部主管。苏联撤走后,全部政府高级主管的中国人,都被送到大连地区的一处“学习班”学习,直到“文革”结束后才被“解放”。他就是在此期间喜欢上气功的。所以笔者才知道,中苏之间是有原则的。也可见毛主席对“乌奸文化”的痛恨。但也使得“滞留”苏联的王明等人的恐惧。王明和一些苏共书记处老人,是知道1920年成立的“重庆组织”和被用来干扰前者的“适社”的一些情况。也许两者一拍即合,就把储存在档案中的《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和《重庆〈报告〉张圣英俄译稿》,以及《“适社”〈报告〉廖划平中文稿》和《“适社”〈报告〉杨明斋俄译稿》等难题,综合整理的《俄国综合重庆〈报告〉俄文稿》抛给中国。以致被如今的何盛明主任评为“不伦不类”。

因为何盛明主任的文章说:“何以秦慧僧会加入写报告,因为四川去了17人的大团队,经上海无政府主义组织的帮助和安排,秦慧僧作为领队参加了这个团队,也就是四川赴俄考察队的成员。落款四川四人,并不是指四川籍贯的四人,应该是代表四川这个共产主义组织派去俄国考察的四人。综上所述,可以认定写这份报告的‘四川四人’应是秦慧僧、廖划平、杜小马、徐敦让四人。落款‘四川四人’却把这个《报告》搞得不伦不类,既是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就应落组织名称,是四人所写就

不应是组织报告,何以要写四川四人呢,自有其特殊用意”。其实这是何盛明主任弄错了,把苏联综合整理的《俄国综合重庆〈报告〉俄文稿》等同于只有《“适社”〈报告〉廖划平中文稿》和《“适社”〈报告〉杨明斋俄译稿》这一组文件,不承认还有另外《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和《重庆〈报告〉张圣英俄译稿》这一组文件,可见王明和一些苏共书记处老人比何盛明聪明。

即如果只单纯抛出《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和《重庆〈报告〉张圣英俄译稿》这一组文件,虽然能打击“上海组织”,说明后者之前也有来者,以此可表“羞辱”,但这等于促使中共树“重庆组织”,而帮倒忙。所以更妙的是,本来他们曾策划的“适社”,就是用来干扰1920年成立的“重庆组织”的,何不一箭双雕,把两者的《报告》综合整理成《俄国综合重庆〈报告〉俄文稿》抛给中国。

这里还有一个政治背景是,1955年2月9日张澜去世不久,何拔儒也去世;而这之前早已把李大钊、杨明斋、冯玉祥送走。1921年8月14日与马林一起商谈“重庆组织”解散条件的关键当事人,是李大钊和张澜,以及杨明斋作他们两方的俄语和汉语翻译共四人。李大钊的牺牲虽然与张作霖有关,但内幕是苏联使馆没尽到保护的责任。知情人之一的冯玉祥曾与张作霖、张学良有联系。何拔儒是1913-1917年曾教过毛主席的老师,也知道其“上海组织”的情况。再说王明对剩下的关键当事人毛主席如何判断,他是打过交道的。

何盛明主任的文章把“适社”说成“重庆组织”也是贡献---因为她自己也觉得是“不伦不类”,那“适社”就不等属于“上海组织”。何盛明主任还说“适社”攻击“陈独秀”,说明陈独秀也不全等属于“上海组织”。何盛明主任的文章是这样说的:“新华学校是上海无政府主义组织的联络点。重庆《人声》杂志的上海代派处,就是上海北四川路新华学校。萍水他们组织了安那其同志社,社友很多。表明上海无政府主义组织还有发展。现刻广州那边,布尔塞维克的人,如陈独秀们在广州方面狠活动,他时常在报上狂吠,说是‘主张安那其的人早生了几百年’,你们看他混账不混账。这一段最能说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派是极不友好的。廖划平写信的时候,已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显然思想并没有多大转变”。

何盛明主任想把“适社”攻击陈独秀,说成就表明与“上海组织”无关,但她没有想到在1937-1938年的延安时期,王明和康生也攻击“陈独秀”。张军锋主任的《开端》一书682-683页上说:1937年1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诬称陈独秀是‘每月拿日本300元津贴的日本间谍’。当有人对此提出异议时,王明说……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

间谍，也应该说成是日本间谍”。在 683 页张军锋主任还说：康生在 1938 年 2 月 8 日出版的《解放》周报上发表长文，诬称陈独秀与日本国达成合作默契，“日本给陈独秀……每月 300 元津贴，待有成效后再增加之”。这一切的原因，在 681 页张军锋主任说：“任建树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道：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依然坚持认为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搞”。

“乌奸文化”虽是 1992 年苏联解体后，因苏联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引发的争论才产生的“名词”。其实在何盛明主任的文章中，提到早有一个不伦不类的名称在装饰：“无政府共产主义”、“无政府共产党”=“乌奸”，后来居上。何盛明主任是这样说的：“1920 年 5 月陈独秀在上海组织‘社会主义者同盟’，无政府主义者袁振英、郑佩刚和尉克水等都参加。郑佩刚还负责宣传，建立了‘又新印刷所’，第一次印刷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刘师复在《无政府共产主义释名》中称‘吾人所主张者无政府共产主义也’，吾党为‘无政府共产党’，他们还自认是社会主义中最坚决，彻底的一派，并且认为布尔塞维克革命是到达无政府主义的过程，最终目标是一致的。因此，他们的组织自认是‘共产主义组织’。查 1920 年重庆建有无政府共产主义组织‘适社’，并曾派出廖划平等人去俄国考察，这表明是一种政治倾向，他们不仅信奉无政府主义，也十分关注俄国十月革命和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

今天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领跑全球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才使人们明白：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炮声，实际类似 1871 年法国“巴黎公社”起义。“巴黎公社”起义失败，并不代表马克思主义的不正确。同样，“十月革命”炮声失灵，也并不代表列宁主义的不正确；而且昭示处理好“上海组织”和“重庆组织”的历史误会，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类似“李大钊和陈独秀不参加‘一大’之谜”、“李大钊牺牲的背后之谜”、“冯玉祥之死的背后之谜”、“小平同志解放后到去世不回家乡广安之谜”----不少文章说：李大钊和陈独秀是因为工作忙，分不开身；或因争取资金，显得更实在，才不参加“一大”的。这实际是说建党大业，不如地位、金钱重要----这就是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崇高形象吗？小平同志解放后到去世不回家乡广安，是小平同志无孝敬生前早已过世的父母、想见他一面的乡亲父老的心愿吗？其实，从李大钊和陈独秀到小平同志等谜中谜，都与他们关心和考虑“重庆组织”这道难题正名在未来的影响有关。

## 六、“此地无银三百”释谜

到我国改革开放后，才证明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后背列列宁和马克思主义的不成熟之处，

毛主席和中国人民是付出多大的代价----即使像杨明斋这样最先反感陈独秀的人，后来也明白。在 1920 年代杨明斋为苏俄工作，先是物色组织“适社”，干扰“重庆组织”。1921 年“上海组织”成立后，杨明斋帮助调教陈独秀，转变陈独秀不听苏俄指挥的态度，策划触发陈独秀生气犯错，使他在上海租界两次被外国巡捕拘留，这时马林又才拿钱去让巡捕放人，终于让陈独秀明白了苏俄背后拿钱的意义。但张军锋主任的《开端》一书 681 页上说：到 1929 年 11 月 1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后，“当时几乎没有人敢于反对，只有忠厚的杨明斋持异议”。愤而不平的杨明斋偷越国境，向共产国际为陈独秀鸣不平----但装在鼓里的杨明斋，到死也没明白帮忙打压“重庆组织”也会被抛弃。

杨明斋(1882--1938)山东平度马戈庄人，与李大钊、陈独秀、张国焘等一起工作过。他 16 岁辍学，1901 年辗转到海参崴做工谋生。1908 年以后在西伯利亚地区，边做工边读书，与在那里从事开矿、修路等繁重劳动的华工联系密切，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并被推选为华工代表。因十月革命前他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曾被派到帝俄的外交机关当职员，秘密为党工作。十月革命胜利后，动员华工参军参战，为保卫十月革命成果做了大量工作，后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0 年被派回日本人占领的海参崴，以华侨负责人的公开身份，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0 年 3 月以维金斯基为代表的共产国际工作组到中国活动，先后多次在北京向李大钊和到上海与陈独秀等会谈，误导抛开“重庆组织”另建中国共产党。杨明斋为小组成员，担任维金斯基的翻译和作协调。

1920 年 5 月杨明斋参与建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适社”，担任负责人。1920 年 8 月中旬他和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 2 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了取名为“中国共产党”的“上海组织”，陈独秀为书记。杨明斋由俄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经手在上海渔阳里 6 号租赁了一幢房子，开办中俄通讯社和外国语学社并担任社长，还指导建立了中共领导的工会----上海机器工会，参与一些理论宣传和对“适社”的教学活动；参与决定将《新青年》杂志改为发起组织的机关刊物，并创办《共产党》月刊。1920 年至 1921 年杨明斋具体安排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等，以及“适社”成员赴苏俄学习。在此期间他往来于北京、上海、济南等地，推动各地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如 1920 年秋天他回山东，在济南与王尽美、邓恩铭等会见，回平度向乡亲宣传俄国革命。

1921 年春杨明斋陪同与张太雷作为中共代表赴伊尔库次克，也难劝说纠正张太雷按李大钊的意

图，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汇报中共建党情况及与共产国际建立关系，以及提交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起草关于建立共产党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报告等事情。所以同年6月杨明斋与张太雷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杨明斋没开完会就立马返回北京，担任马林的翻译和协调马林作张澜解散“重庆组织”的工作。1921年9月陈独秀由广州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局书记，成立党的支部，杨明斋为支部成员。

1922年7月杨明斋出席了中共二大，后任苏联顾问团翻译，并先后在《工人周刊》(中共北方党报)、劳动通讯社任编委，还参加了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工作。1924年6月杨明斋出版约14万字的《评中西文化观》一书。杨明斋1925年夏在广州任苏联顾问团翻译，10月在上海接收和选送学员，率领包括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伍修权等在内的第二批学员百余人，赴苏联到新组建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在中山大学负责总务工作。1927年初杨明斋奉命回国，经上海秘密到京津地区工作，所以了解李大钊没有被保护成功的内幕。杨明斋在白色恐怖与李大钊和陈独秀同时出局的内外苦闷中，积极进行理论思考，他用两年时间写出版约18万字的《中同社会改造原理》一书出版，就有有反思曾协助打压“重庆组织”的认错之意。

杨明斋因为已涉初次的“离经叛道”，他被组织安排到河北省丰润县车轴山中学任教。1930年1月杨明斋秘密越境赴苏联治病后，一直在哈巴夫斯克扫盲站当中文教员。后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在当地报社和无线电台工作，1931年被当作叛逃者流放到托姆斯克当勤杂工。1934年8月行政流放期满后到莫斯科，进入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工作，先后任投递员和校对员。1938年2月被捏造的罪名遭逮捕，并于同年5月牺牲。1989年1月苏共中央为数十万，在30-40年代及50年代初被处决和迫害的人平反，杨明斋是搭“顺便车”恢复名誉。杨明斋的悲剧是苏俄把他杀错了吗？但为啥王明有没有搞错呢？

王明(1904~1974年)，安徽金寨县人，原名陈绍禹。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王明从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开始，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又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至1934年间他在党内推行以教条主义、媚苏亲苏为特征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1950年10月25日王明第一次赴苏养病，一呆就是三年多。1953年12月9日王明回国，在1955年10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召开前，王明提出因长久不能工作，请求解除中央委员的职务。但并未撤销他中央委员的职务，这时王明身体不好，经中央同意，王明和夫人、孩子等一行，在1956年1月30日从北京乘飞机，2月1日飞抵莫斯科，从此未归。1956

年叛逃到苏联的王明，1966年“文革”爆发后被戴上了“机会主义头子、苏修代理人、大叛徒”的帽子，受到深入揭批，中央也和他逐渐断了联系。

1974年3月27日70岁的王明，病逝于莫斯科。王明去世后的第二天，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就刊登了《追悼王明同志》的文章，称其为“国际共运的老战士，中国共产党的著名活动家”，“苏联的老朋友，苏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和合作的积极捍卫者”。而我国国内的报刊，对这位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长达四年间，在共产国际的操纵下一定程度上控制着中共主要领导权力的王明的逝世，却没有任何报道。

其实作为对等，苏俄的报刊在毛主席逝世时也如此。与杨明斋、冯玉祥和李大钊之死诡异连在一起的，如果冯玉祥不离开北京，也许他们后来的命运，不会那么令人怀疑与苏联有关。冯玉祥(1882-1948年9月1日)，生于河北沧州市，有“倒戈将军”、“布衣将军”之称。李大钊(1889年-1927年4月28日)，河北乐亭人，毕业于东京早稻田大学。中共建党后，任二、三、四届中央委员。1924年参与“国共合作”，任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委。冯玉祥与李大钊的关系不一般，又与张学良有往来---1911年冯玉祥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参加滦州起义到1921年7月后任陕西督军，1923年曹锟、吴佩孚控制北洋政府后，冯玉祥在李大钊的推动下，决心寻机推倒曹、吴军阀统治。

1924年9月张作霖挑起第二次直奉战争，冯玉祥任直方第三军总司令，趁直、奉两军在石门寨、山海关等地激战，接受张学良50万银元的帮助，被任命为“讨逆军”第三路军总司令，出古北口迎战奉军，导致山海关一路的吴佩孚失败。10月冯玉祥率部返回北平，包围了总统府，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总统曹锟，驱逐清废帝溥仪出宫，推翻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并将所部改称为“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1军军长。在李大钊帮助策划下，冯玉祥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在邀请孙中山进京一事上，冯玉祥事先也和张作霖、段祺瑞有过协商。冯玉祥在准备发动北京政变前，就和张作霖的代表在古北口谈过合作，双方约定：推翻曹、吴后，奉系军队不入关。

直奉战争胜利后，张作霖虽然打进北京，任陆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实际张作霖与冯玉祥在共同控制北京政权。但李大钊和冯玉祥的联手，可见1914年12月31日孙中山抵达北京，李大钊是“四两拨千金”。或许中国的道路和他们的命运，本不会像后来那么的“诡谲”---即使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不病逝---如果中国人把握自己命运与正确的中国

革命的蓝图，即使与苏俄把握的中国革命蓝图有不一致。

历史没有“或许”。中国“筌路蓝缕”不管如何努力迎合，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一道说不完变数的难题——这是先后产生“重庆学”和“上海学”的必然——何盛明主任的文章千方百计把“适社”的秦慧僧、廖划平、杜小马、徐敦让等四人，说成《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和《重庆〈报告〉张圣英俄译稿》中落款的“四川四人”，以代换 1920 年 3 月 12 日张澜、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四位负责人是“重庆组织”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四川四人”。按理说，杨明斋开办的外国语学社所物色的秦慧僧、廖划平、杜小马、徐敦让等四人，是亲近苏俄的，本可以参加“上海组织”的第一次会议，为何又不让他们代表“四川”参加呢？也许“上海组织”的背后还有把关的人物李大钊，即使他没参会，也指示他的代表张国焘不让秦慧僧、廖划平、杜小马、徐敦让等“适社”参加——因为他们是太露骨了。

当然对“重庆组织”的解散，李大钊也是赞同的。1920 年 3 月 12 日“重庆组织”成立时，杨闇公不在重庆。成立“重庆组织”，是张澜、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在 1911 年保路运动前后，产生学习接受马克思指导法国巴黎公社起义经验教训，就开始形成的一个想法。1917 年后杨闇公赴日求学，先后在成城学校和日本士官学校深造，因响应五四运动，在日本领导留日学生运动被扣留，直到 1920 年 3 月 12 日“重庆组织”成立后，杨闇公才从日本返回四川的。

而“重庆组织”1920 年 3 月 12 日成立，真正背后操控的“四人”，其实就是李大钊、张澜、吴玉章、王佑木。但为啥李大钊也赞同“重庆组织”的解散呢？其实马林和杨明斋，先后来北京早在做李大钊的工作，不断向李大钊挑明：“重庆组织”的纲领及实现蓝图，如“建立川陕根据地，以迎接全国解放”；“‘强军’不‘强君’，以保家卫国”；“建立乡镇工业园，经开区，以减少产生灾民、难民、饥民。移民的压力”等，在苏俄看来，是行不通的；杨明斋等物色“适社”进行干扰，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李大钊一直是把列宁看作中国的“老大哥”，对列宁的著作《进一步，退两步》的思想，深有研究。

《进一步，退两步》是列宁批判孟什维克机会主义组织路线，阐述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著作，写于 1904 年 2 月至 5 月，同年夏天在日内瓦出版；1917 年十月革命后大量运用，战无不胜。例如，“进一步，退两步”是指放弃十月革命后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制度，改而实行带有“新经济政策”。因为“战时共产主义”高度垄断，激化社会矛盾，并

在国际上极为孤立。列宁为了缓和社会矛盾，重启与西方国家的贸易，正是利用这种韬光养晦之术，避免了帝国主义的联合打击，争取宝贵的时间巩固政权——这也是小平同志改革开放讲的策略。1917 年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但十月革命成功的第二天，列宁起草的《和平法令》建议立即进行公正、民主的和约谈判，签订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实现和平。当时苏俄政权面临着诸多危机：社会混乱、经济凋敝、反革命势力蓄意反扑，列宁深思熟虑，做出单独和平谈判的决定。但是当时列宁在中央领导层内，处于少数地位，大多数领导人反对他的判断，一些基层党委以及一些普通党员也不同意列宁的立场：正如列宁要把沙皇占据的西伯利亚交还中国，现在也依然遭反对一样；1918 年 1 月 28 日德国向苏俄提出愿意立即接受和约条件的最后通牒，而担任谈判代表团团长的托洛茨基违背同列宁的约定，拒绝在和约上签字，2 月 18 日德国发动全面战争。

在这危急关头，在列宁的坚决要求下，党中央会议经过激烈辩论，终于在当天晚上决定向德国发出接受的电报。但此时德国已无照继续进攻，攻占了大量城市。列宁发出《社会主义在危急中！》的法令，与此同时他决定分开为缔结和约而斗争。他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抨击拒绝和约就是把党、把苏维埃政权，推上冒险和生存受到威胁的道路。23 日苏俄接到德方的短短答复，但它又提出新的、更苛刻的要求，并限定 48 小时内接受。为此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托洛茨基继续反对签订和约，并声称辞去外交人民委员职务。列宁在会议中先后作了 8 次发言，力排众议说：“如果你们不签字接受这些条件，那么 3 个星期之后，你们就得在苏维埃政权的死刑判决书上签字”。在列宁坚定不移的态度下，中央委员会终于通过了他的建议。当天深夜，全俄中央执委会会议也接受了同样的决议。这样历时 3 个月的对德和谈，冲破重重阻力，1918 年 3 月 5 日苏俄和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赢得了恢复经济、建立红军、巩固工农联盟的和平时机。

至今中国人难辩前苏联前后的“宏伟意图”——我国长期的“以苏解马”教育，培养了一些人把自己的“爱憎”说成是李大钊“亲俄”。如 2017 年 4 月 29 日“百家号”网“万象”特约作者“宁馨儿”发文说：“1922 年（33 岁）李大钊根据共产国际指示，赴上海会见孙中山。1924 年参与‘国共合作’，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任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委。李大钊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演说：‘本人原为苏联党员、第三国际共产党员……’。李大钊曾公开向北洋政府请愿，要求正式承认苏联政府，并且支持苏军驻兵外蒙古。据北洋政府外长顾维钧回

忆，当时李大钊激昂地宣称：“把外蒙置于苏俄统治下，那里的人民可以生活得更好”。以上“宁馨儿”即使指证李大钊说的是事实，但并不代表李大钊的真心。

因为李大钊读过1912年7月15日列宁发表在布尔什维克的《涅瓦明星报》上，严厉批评孙中山的文章《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李大钊当然懂得复制列宁还有《进一步，退两步》的这种韬光养晦之术，明白努力服从苏俄的意图为的避免打击。1924年他的这种运用不是第一次：他同意马林和杨明斋要求解散“重庆组织”的建议后，就曾借故不参加1921年7月“上海组织”的成立，为过去、现在及将来留下“上海学”和“重庆学”解题“醒梦”——这和他真正得意的学生毛主席，服从苏俄意图的一些作法的意义一样。

所以1927年4月6日李大钊的牺牲，公开的说法类似“基因组学”——因1926年3月李大钊领导并参加北京“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三·一八运动，不久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军队进入北京。张作霖派军警突袭搜查苏联大使馆，李大钊全家同时在苏联大使馆被捕。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等20名国共人员，以“和苏俄里通外国”为罪名，绞刑处决。有文章还说：是李大钊自己要求实施绞刑，而非枪决。为此张作霖还自掏腰包，从欧洲进口了一具绞刑架——刽子手为何对李大钊如此“听话”？又为何找不熟悉新刑具的性能的人，要把李大钊绞了三次？苏俄大使馆及其有兵营，为何不能保护李大钊？

或许这不是“借刀杀人”——李大钊和孙中山合作的中国革命蓝图，是与苏俄要求的中国革命蓝图不一致的，难道李大钊不清醒？也许向未来揭示这一点不是“借刀杀人”，李大钊用苏俄不懂国际法的“苦肉计”，学谭嗣同走向刀丛。问题没完的是，1948年8月22日冯玉祥将军在苏俄严密的保护下，为啥在苏联客轮“胜利号”上又发生意外被烧死呢？2018年11月14日《晚霞报》上黄金生先生，发文《冯玉祥之死背后的家国恩怨》中说：“有一种怀疑指向苏联。但当时的冯玉祥已经宣布与蒋介石决裂，与中共和苏联日益走近，所以说此案若与苏联有关，其作案动机就成了问题。再者，火灾中一共烧死70名国际乘客，这个作案代价明显过高”。

但与为前苏联前后的“宏伟意图”实现比起来，策划这次损失中可能产生的损失，策划者也许认为并不高。《冯玉祥之死背后的家国恩怨》文中也说到疑点：“冯夫人当时回忆说，即是8月22日，放映员在回倒电影胶卷过程中，不慎拷贝起火。正与两个女儿在舱内谈话的冯玉祥立即带着夫人、女儿向出口处冲去，不料离房间最近的那扇门竟被从外面锁死，怎么呼唤也无法打开。为寻找出口，小

女儿冯晓达冲向走廊的另一端，竟被烈火所吞噬。他们三人被困在胶片燃烧的化学气体充溢的走廊里，直到儿子洪达和四女婿、冯的秘书赖亚力几人把他们一一抢救到甲板，此时冯玉祥心脏已经停止跳动”。

而类似“暴露组学”的公开说法是，作者周海婴在文汇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说：“冯玉祥将军的夫人李德全叙述的全过程中，她没有提到曾有苏联船员前来救援，只说到救生艇是由船员带领的。这件不应发生的灾难屈指算来已经超过半个世纪，应当也可以解密。我所能提供的情况是，在全国政协一起开会期间，冯弗伐曾向前国民党军统头目沈醉提出过她对父亲遇难的疑问。沈醉的答复甚可回味。他说：‘蒋介石对于冯玉祥在美国演讲反对援蒋反对内战是恨之入骨的，可惜他的手没有那么长’。赖亚力本来是潜伏在冯玉祥身边的共产党员，当年冯玉祥遇难时，他就现场，但后来他却对此事守口如瓶。直到1982年夏天，赖亚力夫妇在青岛疗养时，才对冯玉祥的小儿子冯洪达及其夫人余华心透露了一点真相。赖亚力告诉他们：胜利号出事后，苏联方面有一个调查报告，说那场大火是‘烈性炸药引起的’。冯洪达问：‘为什么没有公开这个调查报告呢？’赖回答说：大概是‘出于国际和政治上的种种因素考虑吧’。经过一番追问，赖亚力才承认冯玉祥是死于谋杀，而不是意外事故。为什么要把谋杀伪装成是意外事故？无论是赖亚力‘出于国际和政治上的考虑’，还是李德全害怕‘影响中苏关系’，苏联解体后，许多档案资料皆已解密公开，但仍未见到当年的那份调查报告”。

其实冯玉祥的死与相连李大钊、孙中山，和苏俄解决中国革命蓝图及远东共和国始末部分有关——1924年12月31日孙中山抱病抵达北京，即使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如果苏俄有正确的中国革命的蓝图，也不会像后来那么漫长：1924年10月冯玉祥搞北京政变，与李大钊策划响应列宁十月革命后归还北方领土声明的蓝图，大手笔只有冯玉祥和张作霖合作从实力上说才能做到。其次能防止日本乘机占领其远东地区，构筑这幅蓝图，探讨当时远东地区各力量间的制衡因素，孙中山也不可小视。1923年9-11月孙中山就委派蒋介石到苏联访问，会见苏联有关方面的领导人，商讨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支援。蒋介石这三个月的苏俄游看到：“在苏联的社会中，或是俄共中间，斗争正是公开的与非公开的进行着”；苏联在他看来，是比其前任沙俄更具野心的帝国主义。11月29日蒋介石启程回国。

这个背景，韩福东先生在“腾讯文化”网2016年6月29日发表的文章《以俄为师：孙中山与苏联

的结盟之路》中说：1922年陈炯明于6月16日发动武装叛乱，围攻孙中山的总统府。1922年6月29日至8月9日永丰舰事件之后，孙中山很快委蒋介石以重任。1923年2月15日孙中山离沪赴粤，21日抵达广州就任大元帅之职，先后四次电催蒋介石赴广州就任大本营参谋长一职。6月17日，孙中山又改任蒋为大元帅行营参谋长，直属孙中山领导。越飞1922年7月26日被任命为苏俄驻华特命全权代表时，与北京正统的中华民国政府谈判，同时暗地里与吴佩孚和孙中山联络。苏俄已改变此前放弃所有在华特权的宣言，不仅在中东铁路问题上有自己的盘算，且出兵进驻了中国享有主权的外蒙古。在与北京政府的谈判中，越飞虽有意在这两个问题上对中国让步，但这种想法不被联共（布）中央所接受。

1922年底的共产国际四大上，一份秘密决议中记录有这样一段话：“如果说张作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附庸，那么一刻也不应该忘记，昔日南方民主政府的首脑——孙逸仙过去和现在都在与张作霖联手合作，因此，支持孙逸仙同吴佩孚做斗争，不仅是支持一个反动派张作霖，而且还支持日本帝国主义”。在这之前，苏俄政府发言人曾公开指责孙、张是“邪恶的联盟”。但广为人知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公开发表于1923年1月26日，这篇宣言称：“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政时代中俄条约（连同中东铁路等合同在内）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这个说法，它其实是改变了此前对华宣言所声明的废约和无偿归还领土、资源的立场。

苏俄的这个新诉求，在北京政府和吴佩孚那里都不能获得确认，但已被陈炯明抛弃正孤立无援的孙中山，则愿意接受它——孙并未代表中华民国合法政府，但苏俄愿意利用他。从“应与张作霖将军商洽”这一点可以看出，孙中山此时对苏联尚未全情投入，仍为和张作霖及日本合作预留空间。孙中山的计划是，北伐消灭吴佩孚，这需要苏联派军队佯攻东北以牵制张作霖，迫使其交出北京政权，帮助孙中山夺权。按照这个方案，苏联要援助孙200万金卢布。苏联部分答应了孙中山的请求。这催生了孙中山创建黄埔军校的热情。越飞在1923年5月写给孙中山的信中，代表苏联政府答应分期援助200万金卢布给孙中山，武器方面则承诺最多支持8000支步枪、15挺机枪、4门奥里萨卡炮和两辆装甲车。越飞表示，孙中山可利用苏联援助的军事物资和顾问创建军校。接下来是孙中山委派蒋介石率团赴俄考察，而鲍罗廷作为苏联派驻国民党的代表也抵达广州。

1924年冯玉祥和李大钊商谈的北京政变成功后，10月27日孙中山致电冯玉祥等人，表示：“建

设大计，亟应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先此电达，诸维鉴及”。11月13日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登上永丰舰自广州出发，至香港乘“春阳丸”轮赴上海。孙中山在上海11月22日搭乘轮船转道日本。到日本后，他与日本右翼政治领袖头山满有过会谈。头山满关心的是否要收回旅顺、大连？孙中山回答说：“旅（顺）大（连）收回一事，余实未想到此……旅大如不扩大其势力，则无成问题之必要，香港亦然”。12月4日孙中山由日本乘坐轮船刚到达天津，就登门拜访张作霖。其实苏俄已在背后做张学良的工作，所以张作霖劝孙中山对于废除不平等条约之事，暂缓施行。孙中山表示不能同意。1924年12月31日孙中山抵达北京。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后，冯玉祥迫于奉、皖两系军阀的压力，同反直系的军阀张作霖、段祺瑞妥协，组成以段为临时执政的北洋政府。冯玉祥赴张家口就任西北边防督办，所部改称西北边防军；8月任甘肃军务督办仍兼西北边防督办。此期间在李大钊帮助策划下，冯玉祥接受共产党人和苏联专家帮助，建立各种军事学校。中共兰州市委党史办公室袁志学主任还说：在1925年9月冯玉祥任命刘郁芬为代理甘肃督办率军入甘时，李大钊就曾选派宣侠父、钱靖泉、贾宗周、邱纪明、李印平等共产党员随军进入甘肃。

1926年初，冯玉祥在直奉联军进攻下通电辞职。但在李大钊帮助联系下，冯玉祥1926年3月赴苏联考察。1926年5月7日冯玉祥将军取道外蒙古库伦，到达莫斯科。冯玉祥到苏联考察，当时在苏联东方大学学习的刘伯坚，参与接待冯玉祥。刘伯坚(1895-1935)，四川平昌人，1920年赴欧洲勤工俭学；1921年与周恩来等发起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入东方大学学习；此时邓小平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冯玉祥的旧部国民军，在南口败退。又是李大钊先后三次电请冯玉祥回国，希望他收拾残局，整理旧部，配合南方的国民军北伐。

冯玉祥将军接到李大钊等的电讯后，于1926年8月7日偕同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和中共党员刘伯坚，以及随行人员等从莫斯科昼夜兼程返回。之前邓小平等在苏联学习的20多人也约定，放下学业准备到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开展政治工作。冯玉祥在途中遇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于右任，两人联袂一道去达内蒙古五原县。冯玉祥接受李大钊的建议，提出“进军西北，解围西安，出兵潼关，策应北伐”的战略方针。1926年8月中旬冯玉祥回国，即被广州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1926年9月初冯玉祥到达内蒙古五原，国民军的流散部队，听说冯玉祥回国，纷纷携枪归队。

冯玉祥在同于右任、邓宝珊等人商量后，决定

成立国民军联军。1926年9月17日国民军在五原城内举行誓师授旗典礼，参加典礼大会的有官兵万余人。冯玉祥当场宣布忠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国民军全体将士加入中国国民党。誓师大会后成立了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冯玉祥就任联军总司令。在李大钊帮助协调下，用共产党人刘伯坚任政治部副部长，聘请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为政治军事顾问。誓师大会后，冯玉祥将军采纳李大钊的建议，随即率部参加北伐战争，挥师西进，过宁夏，出陕甘，11月解西安之围。对于刚从广东开始的北伐战争，这是一个有力的支持与配合。然后又挥师北上，进北京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完成了伟大的北伐革命。

冯玉祥分别与张作霖和孙中山的合作，即使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如果1926年进北京冯玉祥不出北京，到1927年4月他不会让李大钊躲到苏联大使馆及其兵营，也会让不会张作霖绞死李大钊。但冯玉祥实际在1927年1月26日就被苏俄保证李大钊安全承诺下，安心离开北京去西安搞“改革地方行政机构，扶助工农运动”，造成不久汉宁对立形成。冯玉祥为啥离开北京？有没有苏俄的保证？

《冯玉祥之死背后的家国恩怨》文中说有一段后发效应：“原来，蒋介石于1927年6月和冯玉祥在徐州会面时，提供了比苏联更具有诱惑的条件。因此，蒋介石在东南‘清共’，冯玉祥随之也在西北‘逐共’”。但这是李大钊牺牲后的事情，其实黄金生先生这是点明之前，对冯玉祥提供帮助的是苏联。如果李大钊被捕和牺牲时，苏联大使馆和苏联兵营在李大钊牺牲前后，有保护李大钊实在的行动表现，冯玉祥也不会心怀苏俄有“背信弃义”的嫌疑：冯玉祥以对下层简单“逐共”，只表示他无赖的“愤懑”。这在刘典先生2012年12月18日“新浪网”发表的《李大钊被判死刑的来龙去脉》文中，有“披露”。

刘典先生说：1926年3月李大钊领导并参加了北京“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三一八运动，当时北京各界人士在天安门举行反对日本等国要求大沽口撤防的大会，并到皖系军阀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遭到了政府的血腥屠杀。在惨案发生后，李大钊继续领导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北方组织坚持斗争。不久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军队进入北京，250多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和宪兵，分别控制了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各路口，包围了苏联使馆旁邻的中东铁路办公处、俄款委员会、远东银行，所有便衣侦探一律胸系红线为标记，准备充足后直奔苏联使馆的旧兵营，躲避在苏俄使馆的李大钊等50多人被捕入狱。

为什么李大钊屡试不爽的避难招数，这次落空？有说李大钊不是一个人去那里避难，而是把国

民党和共产党在北京的机关也带入了使馆区。但为什么苏联使馆故意不懂得这“违背了国际法的原则，在国际法上不很占理”呢？而且这种现象连其他国家的驻华使馆，都能引起不满和怀疑。如日本使馆和法国使馆人员相继发现，苏俄使馆军营，中国人来往频繁，夜间也经常大声争论，举行会议，并将此信息通知当时的北京政府。另外张作霖之所以能够这么迅速地反映，是苏俄使馆没有情报人员或情报网吗？因为张作霖得到其他使馆的及时情报，很快京师警察厅就派来密探，装作三轮车夫等监视侦查跟踪，不久逮捕了重要嫌疑人----李大钊在北大的学生李渤海。

李渤海1923年入党，任过中共北京市委的宣传部部长等职务。李大钊躲进苏联使馆后，他直接负责李大钊和外面的交通联系工作。李渤海在被捕后非常合作，将苏俄军营内部情况全部招供，换来秘密释放。苏俄情报工作世界称最，但这时苏联使馆不对直接负责李大钊安全的中方人员作考察，反指导他们帮俄秘密从事大量军事情报工作，并且藏匿了一些军火。这些军火送冯玉祥，不就是苏俄提供的不如后来蒋介石1927年6月提供的“比苏联更具有诱惑的条件”吗？苏俄支持南方政府，提供大量的援助，北方政权会感到威胁；其他外国领事团因意识形态，也对苏联颇有如此微词：“苏联使馆宁愿不受《辛丑条约》保护，其实也就是默许了张作霖抓捕李大钊等人的行动”。

当然，李大钊也不是没有“情报”信号----杨度是李大钊的好友，他在参加熊希龄长女的婚礼时，正好碰上旧友外交部总长汪大燮，得知张作霖已决定进入东交民巷搜查俄国兵营。杨度赶紧离席，当夜即把这个消息通知了俄国兵营的共产党人。有人反说：李大钊是过于自信，觉得张作霖没有胆量去触碰“治外法权”----据时任中共天津负责人的王德周后来撰写《李大钊先生传》，说李大钊当时认为：中国军阀看帝国主义“那是无上的”，“他们拿我们没有办法”；结果聪明一世的李大钊，一不小心栽了等----李大钊是死得其所冤，但像他处理“重庆组织”一样，仍有教育意义----认识苏俄。

2012年2月29日《晚霞报》上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李玉贞研究员，发文章《列宁为何要严厉批评孙中山？》中说：列宁批评孙中山的“和平”发展道路，是孙中山踏入了关于革命道路争论的“雷区”。但平心而论，列宁引发的“关于革命道路争论”，列宁的做法，只仅属于“理论”讨论。这在今天的新时代，不是也还在研究“全球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商共建共享共治”等理论问题？所以这并不等列宁，是直接指挥苏俄其他人和组织，干的一些类似不怕“违背了国际法的原则，在国际法上不很占理”的行为----况且列宁去世很早。李玉



贞研究员是资深中苏关系、共产国际与中国关系问题专家。她在文章中最后也认为：“值得注意的是”，1927年国共分裂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成为苏俄严厉批判的对象；《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把列宁的观点固化“成了经典”。

那么原委的1912年7月，流亡国外的列宁在布尔什维克的《涅瓦明星报》上，发表评论孙中山及其政治主张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说的是些啥呢？李玉贞说，列宁是遵循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精神，直接由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主张走“迅速开刀、使无产阶级受到的痛苦最少的道路”。那么在这之前的三天，孙中山在卸任临时大总统前一天发表的演讲，又说的是些啥呢？李玉贞说，1912年7月12日被译为法语发表在比利时的《人民报》上的孙中山的讲话，可把孙中山的期望归结为：通过和平建设而非暴力革命途径，图国家发展，造成数十个上海。列宁虽然批评孙中山，但也抓住孙中山的“造成数十个上海”，评说孙中山是“同情被剥削劳动者，相信他们是正义和有力量”。可见列宁说的搞阶级斗争的暴力手段，和他认为孙中山搞革命要达到的目的，仍有相通之处。

李玉贞还说：孙中山留给国民党的，在1924年1月20日召开的中国革命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首次提出：“现尚有一事可为我们模范，即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应该先由党造出一个国来”，“以党建国”，“把党放在国上”。所以从李玉贞介绍的情况，列宁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说的搞阶级斗争的暴力手段，并不代表1927年后的“以苏解马”——所谓“列宁遵循的基本是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关于通过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彻底砸烂旧世界的观点”——篡改马列主义的“以苏解马”，是把“搞东西方对立”的阶级斗争作为“雷区”，说孙中山触上列宁的“雷区”——但列宁及其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习近平新时代，并没有“以苏解马”的永久搞“东西方对立”，是不可逾越的“经典”。列宁的“走迅速开刀”，是指推翻反动的旧政权，根除腐败、暴政、好战等问题。

## 七、“重庆组织”正名意义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作指导，中国自己独立组建共产党，和在苏俄帮助下组建共产党，都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和中美建交及1月小平同志访美，到1992年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将设为中心的精神，实际已经给“重庆组织”正名。

而列宁当时再派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出面协调处理之意，也有让其他领导人看：如果1920年3

月中国自己独立组建的“重庆组织”，和1921年6月苏俄派去的马林，又帮助组建的“上海组织”，都被共产国际承认，那么“内乱”今后如何办？这个问题焦点在哪里？

我们还是拿今天“书报公开”的材料说话，《传承先烈风范 建设伟大工程》，是2017年11月13日《绵阳日报》刊登的“纪念王右木诞辰130周年学术研讨会发言摘登”的8篇文章。其中第一篇是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李蓉主任的发言，她在《不忘初心 高举旗帜 不懈奋斗》的文章中说：1920年3月12日“重庆组织”的成立，“证明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第一篇是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的宋键处长的发言，他在《深化王右木和四川党的创建史研究》的文章中说：1920年3月12日“重庆组织”的成立，“这是四川特有的深刻的阶级和社会根源决定的，进而也有力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而对于它的消亡，宋键处长也说：“我们还应该清楚地看到，四川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在革命的洪流中，以顾全大局的宽阔胸怀为后人所称赞”。

这话说得十分到位和明白：李大钊和张澜同意马林和杨明斋解散“重庆组织”的建议，是“顾全大局的宽阔胸怀”；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自信”。而1956年杨尚昆主任从苏俄拿回的，不是《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和《重庆〈报告〉张圣樊俄译稿》这组材料，而是苏俄的综合整理：是把《“适社”〈报告〉廖划平中文稿》和《“适社”〈报告〉杨明斋俄译稿》这组材料，塞进《俄国综合重庆〈报告〉俄文稿》的。1982年底张秀熟主席看到的《俄文〈报告〉俄国综合稿李玲中译本》，何盛明主任在《四川党史研究》1983年第9期，发表的《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探索意见》等文章中披露说：张秀熟主席在中央1982年末内部出版前，叫《俄文〈报告〉俄国综合稿李玲中译本》“待查，暂不宜发表”。

苏俄拿出类似《俄文〈报告〉俄国综合稿李玲中译本》，是苏俄对中国的不自信；也源自1920年起，苏俄远东书记处和情报处对“上海组织”和“重庆组织”的不自信——“以苏解马”——以所谓“列宁遵循的基本是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关于通过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彻底砸烂旧世界的观点”之名，篡改为就是要“搞东西方对立”的阶级斗争方针。如果这是对话，那么“改革开放”到“重庆组织”当然不对，而且始终是中俄过去、现在和未来难解之谜和敏感课题。

这里诚然国际上，存在“东西方对立”的事实；各个国家内部，也有掌权和没掌权的组织和个人、派别、阶层交错的各种矛盾等诸多惊涛拍岸的问题。

变局激荡，动荡的世界，合作还是对抗、开放还是封闭、共赢还是零和，人类携手走出危难与困苦的历史回响——不永久搞“东西方对立”阶级斗争的现实抉择，笃行的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始终坚守合作共赢，始终坚信多边主义，为民族复兴、为人类进步，任乱云飞渡，向着创造新稳步改革开放永不停步，和平发展初心不渝，命运与共大旗高举，通盘运筹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及多边外交。例如，2018年中美经贸摩擦颇具挑战性，关键时刻，元首外交再次发挥“定盘星”作用——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长达150分钟的会晤“摁下暂停键”，增进互信，聚焦合作，双方同意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

为啥要改“以苏解马”立的永久搞“东西方对立”的教条？什么是“西方”？“西方”有什么“高大上”？2019年1月9日《中国科学报》发表中国人民大学刘永谋教授的文章，他在《科技哲学不能“砸科学的锅”》的文章中说：“在科学时代，以科学为敌，结果只能是碰壁，就是我说的‘吃科学的饭，不能砸科学的锅’——没有科学大兴，哪里来的什么科技哲学？……当然，既然是朋友，就不是喽啰，可以有诤言，可以有批评，但根本上还是友善的，还是要做朋友的”。刘永谋，1974年生，湖南常德人，中共党员，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因为马克思主义也是科学，以科学为敌，苏联解体了。为“重庆组织”存在正名，之所以成为中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难解和敏感课题，不在于“社会主义”的本身。问题正在于存在有两个方面的建树，还有待完善——第一是对科学的建树和认识；第二是对法律的建树和认识。

科学属于第一生产力，要有对科技创新的自信。法律是全球引进“共商共建共享共治”的法理完备，没有“法律”理念，或总是按照各国原来法律一元论，“统一”进行“一刀切”，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永久搞“东西方对立”就很难。这里先说“科学”。

“重庆组织”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相连，有四川省蚕丝学校前身校史讲：该校址原在四川南充县仪凤街，原为南充县立中学校，是张澜联络家乡有识之士创立于1913年。据1947年商务印书馆发行、经张澜校正的《四川蚕业改进史》载，省立高级蚕丝学校于1913年创立，当时的校名为南充县立中学。次年在高等小学内开办南充县立乙种实业学校，创办当年招收实业班。1921年和1923年春季，学校相继招收二年制蚕丝速成班。1924年南充县立中学校与南充立乙种实业学校等合并，设制普通、师范、工业、农蚕、医学专业。

实际张澜早在1911年保路运动后，就致力于

蚕丝产业发展，计划通过教育与实践相结合实现“无地不见有桑，无户不事养蚕”的局面，就制订了实施兴教育，建桑园，办蚕社，开工厂，促进南充蚕丝产业发展的方案。1921年8月30日“重庆组织”解散后，1921-1926年张澜为啥要任“蚕桑丝绸”校长？这有何昭示？

张澜（1872-1955），西充县莲池乡人。1903年被选派赴日本留学东京弘文书院师范科学学习。1904年因倡言慈禧太后应归政于光绪帝被清廷驻日公使押送回国，任四川顺庆府（南充）官立中学校正教习。1911年张澜任川汉铁路股东会副会长，发起组织四川保路同志会，领导四川人民开展保路运动，反对清政府卖国。1911年12月10日四川都督尹昌衡，聘请张澜任军政府参赞。1912年任四川军政府川北宣慰使。1913年4月张澜当选为中华民国国会众议员，结识了蔡锷。1914年张澜因袁世凯解散国会离京返回南充，与地方人士创办南充县立中学、南充实业学校和南充果山蚕桑社。1915年袁世凯称帝，蔡锷在云南起义，张澜联络川军师长钟体道立既响应，在南充宣布独立。1916年8月14日北京政府任命张澜为嘉陵道道尹，主持川北庶政。1917年升任四川省省长。1918年在北京设立“四川省省长行署”。1920年他在北京以四川省长名义与当时北洋政府交通部商洽，将川汉铁路股款利息拨出，救济就学于京、津等地生活困难的川籍学生，并以部分利息捐助他的好友吴玉章等组织的华法教育会作为基金，资助留法勤工俭学的川籍学生，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成员。1920年回四川办中等教育，并创办《民治日报》。也就是在1920年3月12日，在李大钊的支持和指导下，在重庆与吴玉章和王右木负责创建“重庆组织”。

1920年8月22日张澜母亲在南充逝世，张澜在《晨报》上发表《哀启》；12月30日北京政府免去张澜省长职。1921年8月底“重庆组织”自行解散后，张澜返回南充，在南充市西桥河畔创办全国唯一的蚕丝中等专业学校——四川省蚕丝学校——原四川省立南充高级蚕丝科职业学校，一时间丝绸厂家风起，也带来了生产技术的改进和提高。1922年张澜任南充县立中学校长时，又把县立中学、县立小学和实业学校合并为一校，内设中学部、师范部和职业部。职业部下设农业、工业、蚕丝和医学等专业班。1923年张澜考察南充实业发表《南充的实业自治》，认为南充举办教育和实业从蚕丝业入手，“养蚕缫丝，所得较别项特产独厚”——以上只是用1920年代科技热点词汇“蚕桑丝绸”，搜索的张澜年谱片段。

由此看张澜似乎和“重庆组织”没有一点关系，更不用说张澜是创建“重庆组织”主要负责人之首。其实，正说明张澜的隐蔽和对组织要求的严密——

要不是解放初盐亭“土改运动”，错杀个别“重庆组织”成员一事——缘起何拔儒认为当初解散“重庆组织”时，张澜传达他与马林商谈好的约定，何拔儒才向他最亲近的四弟等吐露曾参加过“共产党”，留下“口风”。2019年1月9日《晚霞报》，发表的《袍哥往事——四川乡村的暴力与秩序》文章更是说张澜，“他是大袍哥，国民时期曾任四川省的省长，成都大学的校长。他同情共产党，参加民主运动，在1949年以后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这还只把张澜看成“他同情共产党”，是“袍哥里也有高大上的人物”；但还有“指桑骂槐”，暗示他是《四川保路运动真相：贪污犯闹革命》的。这中间背景，张军锋主任的《开端》一书589页揭示说：2010年夏天在北京，举行过“纪念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90周年学术研讨会”——这是我国公开讨论“重庆组织”疑问第一次“解冻”的信号。这前后引起的反弹，抹黑四川保路运动这个源头，自然关键。

所以，不说张澜建什么“重庆组织”，就是“死有余辜”都够格——2010年4月11日从上海的《东方早报》，发表陆建德先生写的《烈士之死——关于四川保路运动的札记》的文章开始，到2011年5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教授，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1911年中国大革命》一书之后，2011年6月22日马勇教授在“人民网-文史频道”大讲堂，开讲《辛亥百年温情回望：一个王朝的隐退》，说什么四川保路运动领导人“并没有本钱，完全向四川7000万人民去集资……当时有人挑动人民的情绪，希望事情闹大，可以就此掩饰挪用这笔钱的责任……结果在四川总督府门前，卫兵开枪打死了集结的群众30多人”——上海和北京的学者、平台，带头冲锋了。

其实，张澜1903年被选派赴日留学东京弘文学院，在1904年被清廷驻日公使押送回国之前，已与弘文学院同寝室同学黄兴、陈润霖、杨怀中等好友，在日本和孙中山接触，参加了同盟会，到1911年组织保路同志会、组建保路同志军，已积累有经验教训。再到1912年后，张澜知道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区别——1912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俄代表会议上，布尔什维克派自己组成了一个独立的政党，将孟什维克中变为反对革命的消派分子清洗出党——列宁是把绝不隐瞒布尔什维克最后要，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其目的作为宗旨的。他坚持建立一个高度集中的党；在党内，不容许民族的或其他的团体有自主权。列宁要求党的最高领导，具备强有力的权威，依靠这种权威，决定政策（或党的路线）和管理各级组织的全体人员等。列宁的学说和经验，使张澜懂得“重庆组织”要干大革命，比他原来积累的经验教训更需要隐蔽

和对组织严密要求的重要。

1920年3月12日“重庆组织”成立时，他们制定了建立“川陕根据地”预案，来与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的目的结合。这不能用“孟什维克的教条主义”，而应有“持久战”的思想。因早在1911年保路运动吴玉章组建的保路同志军，在荣县宣布革命起义后，其暴露立即引来反动派的军事大规模围剿。加之“无产阶级专政”，不是走极端和搞恐怖，说到底是一种“法律制度”，是非的标准只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天府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王笛教授的《袍哥往事——四川乡村的暴力与秩序》文章，揭示其中的外围背景说：“湖广填四川”，大量的移民进入四川，相效于南方传统的大家族，四川的宗族控制相对薄弱，这给社会组织发展留下很大空间。川西平原按契约办事，所以为什么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两湖、两广、江西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在川西平原看不到。如何判定它在历史上的角色和作用，经常需要我们根据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事件、不同个人、不同前因后果等，才能揭示这个组织和人物的真面目。

王笛教授说的不是像“以苏解马”教条的“一刀切”。不管“重庆组织”和“上海组织”，都不是“四川袍哥”——即使有人为作掩护参加。为啥1930年代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后期，在苏俄的支援和代表的极左路线指挥下也守不住？为啥改革开放后，与“以苏解马”教条的斗争仍然存在？王媛媛教授在《谷牧 开放前线总指挥》的文章中说：1979年谷牧在一场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要引进外资，没法律人家怎么敢来？……按小平同志讲的，我们实际是用法律来宣示我们的对外开放”——小平同志不愧为他父亲参加过“重庆组织”。

相反，“以苏解马”阴魂不散，这使人想起建国后任四川省政府副主席、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的阎红彦（1909-1967）。有人说：阎红彦同志与康生将小说《刘志丹》与高岗联系在一起，在中央全会上向习仲勋同志发难，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而这件事直到2003年还没有完，如阎红彦同志生前的秘书组组长李原，在《百年潮》第3期发表《阎红彦和小说〈刘志丹〉》，仍坚持阎红彦同志当年的观点，并称八十年代中央再次同意禁止小说《刘志丹》。李原在文中还说，小说“把本来是土豪劣绅，反对刘志丹革命的他的父亲硬写成了革命的正面人物”。此文引起了刘志丹亲属的愤慨。有人说：刘志丹的亲属刘景范、刘荣、刘玉兰、刘海燕、刘德润联名给《百年潮》写信，对李原的文章进行批驳；阎红彦与习仲勋的矛盾是政治矛盾——本来一部历史小说中，含有某些与事实有出入的内容，是常有的事，这完全可以通过文艺批评或学术批评来解决。而像小说《刘志丹》这样在政治上株连了许多为中国革

命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刘志丹的战友，甚至连刘志丹烈士的父亲，都要受到无端的攻击，令人费解。

这也不难知解放初，盐亭“土改运动”错杀“重庆组织”成员一事的缘由。再说为啥张澜在“重庆组织”解散前后的1920年代看到科技生产的热点是“蚕桑丝绸”，到如今也不是“热点”？难道张澜错了？从王笛教授说的“需要根据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事件、不同个人、不同前因后果等，才能揭示”看，这正是不在于“社会主义”的本身，而存在于科技属于第一生产力认识。李进良教授是中国移动通信领域的奠基人之一，1929年生，湖南省攸县人；1952年清华大学毕业；曾任信息产业部电子第七研究所总工程师，《移动通信》杂志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研究生导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他说：所谓“创新是找死”，本质就是创新的不确定性极大。国外有人统计，能取得经济成功的科技项目不到十分之一。有人甚至提出：随意否决一个创新项目，有六、七成的把握是对的。创新的这种特点，迫使我们改变思维和做事的方式。通俗地说，在创新工作中，过于追求研发工作“靠谱”，恰恰是“不靠谱”的。由此看来，搞创新的人不能害怕失败，“创新是找死”的态度本身就是错误的。创新的风险大是事实。对于这样的问题，正确的态度不是回避创新，而是学会创新。企业的技术来源主要是引进、购买和模仿并伴随少量的改进；很少企业拥有自己拿得出手的独创技术。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贸易战的兴起，这种模式走到头了。在资源配置的要素中，技术的重要性越来越强。这时，“技术创新”才真正变得重要起来。

李进良教授说的是“科技创新的自信，有理论还待完善”的这个事实。例如2019年初，华为获得2018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成果就是华为基站在世界比智能手机厉害——成果具体名称是“新一代刀片式基站解决方案研制与大规模应用”。华为刀片式基站2015—2017年三年累计销售收入达2788.49亿元，利润为418.3亿元，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华为的刀片式基站是把室内基带处理单元、电池、蓄电池柜都做成刀片式的外观，并且能达到射频拉远单元一样的防护等级，从而使得电源、备电等整套基站，都能在室外挂杆安装，不需要机房，可应用于物业协调难度大、无机房、需快速开站等场景。因此华刀片式基站解决方案，在全球大规模部署，并成为无线行业基站形态的事实标准。其实科技发展的断层，包括数学及叠加问题，也是一个国家能否成为强国的关键。

例如，苏俄之所以称霸，早在彼得大帝和卡捷琳娜时代，就把数学之王瑞士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欧拉找来，指导俄国的数理科技的发展，直到死在俄

国。这类“强君”能想到这一点，就可以知道苏俄的后劲。这一点，复旦大学李大潜院士在2013年迎新大会上讲：数学是一个人一生中学得最多的功课，然而为什么要学习数学？为什么要学好数学？可能并没有太多的人认真地思考过。数学这个学科逻辑性强，整个体系十分严谨，一环扣一环，前面没有很好掌握和理解，后面学习就会有本质上的困难。形象地说，数学学习和在食堂里打饭不同，是不能“插队”的！因为需要使用研究性的思维，要掌握深入的内容，这都是刚走出高考体制的普通中学生所难办到的。

在硅谷，尤其针对欧美的软件外包业，印度裔高管的比例越来越高，中国送出国的“精英”，从给美国做外包，转为给印度做转手二包。为啥？首都师范大学数学系王永晖教授说：我曾经看过美国“可汗学院”创始人的数学教学想法：“如果一个学生，在数学知识上，这一部分内容如果没有达到100分，就不应该往下学，而是应该先达到了，然后，再接着往下学下一部分的内容。我是很赞同其中的思想的，原因是，数学是一门叠加性学科”。对所有的同学来说，努力学习数学，学好数学，尽可能学得出类拔萃，不仅是现阶段对你们的学习要求，也是对你们未来发展的战略性的投资，是终生受用不尽的。这一放松，等到发觉大事不好，想要抢救过来就难了。

叠加性的断代，对我国“蚕桑丝绸”生产和科研创新，造成的危害也一样。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四川盐亭县的“蚕桑丝绸”发展虽然进入高潮，一吨丝卖到50万到100万元，盐亭和邻近县都出现内部和互相间丝绸厂大打“蚕桑争夺战”。笔者当时在《自然杂志》上看到报道：法国基因科学家，能让野蚕和家蚕从一根蚕只能是一个基因吐丝的历史，通过基因工程变到一根蚕可以是五个基因吐丝的创新，实现“养蚕栽桑丝绸一条龙，比一根蚕一个基因吐丝可一年五倍增收”。有报道：中国西南农学院有一位姓蒋的教授，上世纪20年代留学日本时，就是专攻家蚕基因研究的，但1957年“反右”被错化为“右派”坐牢，改革开放后西南农大请他回校时，身体已经残疾。如果蚕丝基因工程，像抓原子弹科研没有叠加性的断层，今日“蚕桑丝绸”生产，也许不集体“溃败”。所以如今看当年张澜抓“蚕桑丝绸”，不是直接抓生产，而是抓教育，也许张澜正是想到这一点。

张澜当年是有能力直接组织开办“丝绸厂”，获取资金利益的。但他没有这样去做，让别人去干，是很了不得的——“重庆组织”不让干，“上海组织”干过终会明白。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教授说：“当今四个社会最活跃的单元：政府部门、舆论界、学术界和企业界里面，会有一些惰性比较大

的人，或不知新兴产业的重要性，或出于短视的利益考虑，给经济的发展设置了很多阻力。但是通过坚持教育、坚持创新，尤其是寄希望于，具有新思维和创造性的年轻一代，完成这个使命”。优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郭朝晖教授说：获得“改革先锋”称号的联想创办人柳传志，头脑冷静---联想能发展成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大公司，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配置”了“中国廉价劳动力资源”。企业的技术来源主要是引进、购买和模仿并伴随少量的改进。很少企业拥有自己拿得出手的独创技术。柳传志对于联想的主流产品正面临着市场萎缩的困境，能讲“守成是等死”。

而造就了今日之华为的董事长任正非，《观察者网》的作者奕含教授有评论说：中国工程院院士、联想前总工程师倪光南教授称，联想与华为这30年犹如“龟兔赛跑”。联想估值曾一度是华为的5倍，而现在华为估值已是联想的50倍。外部环境一样，联想和华为的差距在什么地方？倪光南归结为把华为董事长任正非和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的个人股权进行对比。他称，投入资产的任正非，最初在华为公司的股权为80%，目前变为1.4%。而没有投入资产和知识产权、最初是副总经理的柳传志，一开始没有联想股权，在股改后，其股权不断增加，目前为15.9%。“一个没投入知识产权和资产的公司高管，拥有那么多股权，这在中外高技术企业中，是很特殊的”。

由此看张澜，也许既像当代的“柳传志”，又像“任正非”。现在一些媒体发表文章，攻击张澜领导的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是“贪污闹革命”；把张澜和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1920年3月12日成立“重庆组织”，硬要换为苏俄为组建“上海组织”而利用“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秦慧僧、廖划平、杜小马、徐敦让等参加的“适社”---“重庆组织”成立背景，是在北京的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国马列主义者得知1920年3月俄共（布）远东局成立，才支持张澜返回重庆成立“共产党”。事后又得知在1920年4月6日的“贝加尔沿岸工人制宪大会”上，远东共和国宣告成立，定都上乌金斯克，但它仅获得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承认---正式承认远东共和国是在5月14日。正式成立后苏俄才给予远东共和国最初的财政，外交，人力，经济和军事援助---莫斯科得以控制远东共和国的内政外交；在部分红军基础上，为远东共和国组建“人民革命军”---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国马列主义者怕苏俄也在中国这样做，先下一着“棋子”；即使以后成立“上海组织”，他们也明白中国要有自主权。幸好张澜和吴玉章没有组织办企业开工厂，不然真像“贪污闹革命”。

1920年8月30日“重庆组织”开会集体决定

自行解散，以张澜为首，大多数成员后来没有个人单独申请参加“上海组织”，而转入搞教育或把西式普通教育和科技教育相结合，如张澜自己。张澜是有考虑的：“强君”与“强军”分不开，但是“强军”与“科技”分不开的；然“科技”除有“强军”-“强君”的一面外，却还有造福人民和民生的一面。刘永谋教授说：“不尊奉科学西方就不再是西方”，“科学仍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基本盘和根本点。西方文化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最大的就是科学和民主，这两点乃是西方社会最深的烙印”。当然刘永谋教授也说：不是说“不能批判科学，而是说不能走到极端的反科学主义上去，以诋毁科学为主业、为主旨，闭口不谈科学的巨大贡献”。其实这就涉及科学里，有马列主义的“东西方交流”。其实苏俄以欧拉为标志，也是搞科学“东西方交流”起家的。

在“以苏解马”年代，中苏关系密切，中苏科学交流作为主流，双方也各有所收获。但“以苏解马”的核心，是“东西方对立”。所以那个年代自然科学，在纯理论方面也就存在“东西方对立”的错位事例。我们赞成中俄关系正常、友好，承认俄国科学家和人民对科学、社会的贡献。但“既然是朋友，就不是喽啰，可以有谗言，可以有批评，但根本上还是友善的，还是要做朋友的”。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强大，主因就在于此。如2018年3月5日顶级科研刊物《自然》（《Nature》）杂志，连刊两文报道石墨烯超导电性的研究新突破及相关专家---为啥这两文的第一作者，是同一位中国科学家，而且论文发表时年仅22岁的曹原？Nature发布2018年度十大科学人物，为啥其中位列第一的也是这位年轻科学家曹原？

马列主义的真谛是“东西方交流”---曹原只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例如改革开放仅中科大少年班，就产生了张亚勤、陈晓薇、马东敏、庄小威、胡伟武等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为啥中苏友好时期没有这类“井喷”？从马列主义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谛，是“东西方交流”---不是喽啰，可以有谗言；还是“东西方对立”---是喽啰，不可有谗言？小平同志有谗言：1991年1月他在上海提出开发浦东，不要“囿于‘姓资还是姓社’的诘难”；《解放日报》发表了署名“皇甫平”的几篇社评，转述邓小平的意见。但这些文章招致了来自北京的围攻，质问改革“姓资姓社”？而此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因改革滞后民怨沸腾，政局出现连环动荡。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东、西德国在1990年10月实现统一。1991年发生“8·19政变”，导致苏联解体，有着74年历史的超级大国轰然倒塌。

自1990年12月起，令共产党在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先后失去政权，显示马列主义的真谛没有

含糊。但否定改革的人们打出“反和平演变”的旗号，推波助澜，逐渐成为当时的主流舆论。有人主张将“反和平演变”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列为中心。中央党校办起了省部级反和平演变学习班，农村准备重搞“社会主义教育”。在国内外政治气氛下，小平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开创的改革事业，面临半途而废的危机。他不得不以打破常规的方式，捍卫显示马列主义的真谛没有含糊——“东西方对立”不是“以苏解马”一家的独创，早在自诩为“第三罗马”的俄国，异曲同工但都有高度的救世情怀，就为“以苏解马”所继承，这大大促使了后来对抗性意识形态的“东西方对立”，形成今日世界难逃“三国演义”难题。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还说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早在1835年就预言：“当其他国家受到限制、或者无所作为之时，唯有美俄两家，一个自东向西，一个自西向东，迅速扩张。两个版图急剧拓展而‘似受天意密令指派’的新兴大国，总有一天会成为各占一半世界的两大霸主”。这种法律根据何在？难道20世纪中期美苏首先拥有核武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国的“共商共建共享共治”的法律理念，就是“核威慑”、“核恐怖”？

各个国家虽然有权根据各自国内的情况，制定法律，别国无权干涉。但这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国的“共商共建共享共治”的“大法律”比起来，仍然属于“小法律”，不能超越“反人类罪”。例如，2003年俄国加强联邦中央权力，抓捕掌控国家能源命脉的最大私营企业家赫特尔考夫斯基。这是俄国自己根据国内的情况制定的法律，别国无权说三道四。冷战终结后，中俄关系的稳定发展，俄国已不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俄的紧密关系，属于平等和改革开放不停步的元首外交，别国也无权说三道四。即使像世纪之交的科索沃危机，中国驻南使馆被美国导弹轰炸，中美两国也能根据国际法理予以解决，走出90年代转型的艰难，印证了中国新时代“大国外交”，惊涛拍岸风鹏举，同步推进中俄、中美，加强法治建构的实践。

所以讨论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然涉及未来“法律”的完善。这是必备的——冷战时代，即使在各国间的共产党交往，也有“法律”理论的交流和分歧。例如，2019年1月10日《晚霞报》刊登杨敏教授文章《“伦敦版”英译毛选诞生前后的那些事》中说：“伦敦版”是1953年1月外文出版社起草《初步意见》建议在伦敦出版英译本；版权属英共劳伦斯出版社。对此《毛泽东选集》印出来后要全世界卖的，当时中国的印刷水平各方面都还比较落后，没有把握自己来印刷发行。5月25日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代表人与英国劳伦斯出版社代表

人在北京签订《关于〈毛泽东选集〉英文版出版与发行的合同》。1954年3月29日英共中央总书记波立特致函中共中央，建议在英国出版《毛选》第二卷英译本时，删去《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关于资本主义国家暴力革命的两段话。其理由是，武装革命的主张不符合英共“走向社会主义之路”的纲领，英国的法律也禁止一切公开出版物出现推翻政府的言论。5月11日中宣部起草了中共中央复信稿，表示同意。8月13日中宣部陆定一收到毛泽东的批示：不同意删去。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按毛主席的意见重新起草了复信，表示不同意删去。“因为毛泽东同志在该文件中所说到的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不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需要作什么修正。而且《毛泽东选集》已经出版俄文版及其他外国文版，都没有作什么修改”。但是，英共最后仍然删掉了这两段，出版了《毛泽东选集》前三卷，起印1.2万册。这里就存在国际上两党之间的“法律”与理解现象：英共中央总书记波立特的：“武装革命的主张不符合英共‘走向社会主义之路’的纲领，英国的法律也禁止一切公开出版物出现推翻政府的言论”，和毛主席给中宣部陆定一部长“不同意删去”的指示，也并不就等于——中宣部陆定一部长复信解释：“资本主义国家暴力革命”推翻政府，“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马克思读大学是专攻学法律的；列宁读大学也是专攻学法律的——这在各国共产党创始的伟大领袖中，还是少见的情况。他们一定会知道“推翻旧政权”在法律中是一种常态，但是否绝对用“暴力”推翻就是“普遍真理”，而根据各国的具体实践不用暴力能推翻的，就不是“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的原话原文，被其他各国语言翻译时，是否也有类似陆定一部长那种理解的翻译宣传，至少“以苏解马”是这类。

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强世功院长说：“中国在全球提出‘共建共享共治’的政治理念，这与中国古代‘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的理念一脉相承。落实到法治上，就是包容并鼓励自我立法的多元主义法治，用国家法治来鼓励和包容多元群体，自我立法来推进多元自我治理”。强世功，1967年生，陕西榆林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副院长。1990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1996-1999年北大法学院获硕士、博士学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2001-2002）。借调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研究部工作（2004-2007）。2011年被聘为重庆大学兼职教授。

强世功教授说：在今天的中国，法治如何包容其“大”？法治如何推动“文明”？随着“道路通向城市”，这种法律多元局面也会最终消失。且不说清帝国面对满、蒙、藏、汉所建构起来的庞大的

法律多元主义结构，仅仅其内在的礼法结构，就应当被视为一种法律多元主义的典型。正因为如此，中国的主流法治理论一直都存在两个问题。一方面中国的法治理论往往无法有效指导法治实践。多样化的地理环境、不同程度的经济发展条件、多种文化传统、多个族群和宗教信仰，而且这样的帝国或大国往往深度参与到全球秩序的建构中，这必然要形成法律多元主义，并建构起多元一体的法治秩序。西方文明走向全球，从而与非西方文明的法律之间构成了法律多元主义局面。“空间的法律多元主义”和“精神性的法律多元主义”，实际上普遍存在于人类历史中，属于任何国家建构法治秩序都必须面对的常态。中国的法律已经告别了移植法与本土资源之间对立所形成的“转型的法律多元主义”，从过去强调国家法一元论转向常态的大国法治的建构，乃至全球秩序建构中的“空间的法律多元主义”，转向在重建核心价值过程中展现出来的有更高道德追求的“精神性的法律多元主义”。

强世功教授还列举“乌克兰宪政危机与政治决断”，从“朕即国家”到“主权在民”的转变就是政治权威正当性的转变，说明什么是政权？什么是法律？——乌克兰的选举悖论，来自所谓的选举，即通过社会契约，来缔造新的政治权威；因为没有政治权威就不可能形成政治秩序——通过单个的选民投票完成的，甚至是通过党派有组织的投票完成的，意思是“主权在选民”或者“主权在党派”。如果选举的结果不符合某些选民个人或者党派的意志，那么，他们就不会服从选举结果，由选举产生的政治领导人也就不能确立其政治权威。由此乌克兰选举中失败的反对派不承认选举结果，认为选举存在着舞弊。这样尽管民主化的乌克兰希望通过民主选举总统作为国家的政治权威，但目前选出来的总统恰恰是最没有权威的。但即使选举中不存在弊端，那么选民难道能不承认选举结果吗？强世功教授说迷惑人是，人们把政治问题理解为真理问题，以为不存在选举舞弊的话，那么人们就会承认选举结果。但事实上，这种想法恰恰忽略了政治的特殊性。政治问题的关键不是对与错的问题，而是服从与不服从的问题。只要不服从政治权威，“说你错，你就错，做对也错”。因此，所谓的选举舞弊不过是不服从选举结果的理由或者借口。因此，在这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选举是不是舞弊，而是是否承认选举的结果。

强世功教授从“党争”撕裂政治权威，解读为什么美国当年的联邦党人，对民主选举和政党政治持怀疑和警惕的态度。他们为美国选择了共和政体，而不是民主政体，并高举“法律至上”。典型例子是2000年美国大选，也存在计票上的问题，但是最后最高法院一锤定音，重新计票也就中止了。民主

党也就接受了选举结果，因为最高法院的判决在美国比计票数字的科学真理更具有政治权威。其实“法律”、“道德”、“共和政体”仍然是一种“社会契约”。2018年中信集团出版清华大学王绍光教授的专著《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一书，从批判西方践行的民主，没有做到选举和抽签两开花，释放法治想象力——避开强世功教授的“政治”、“党争”，最高法院的判决一锤定音办法，试图发展与抽签相关的“选举制度”——不让选举产生的议会搅和，是因为议员们都各怀鬼胎，让他们改革自己从中受益的选举制度，无异于与虎谋皮。让没有既得利益的普通民众讨论选举改革，结果才会更客观、更公正。公民大会经过反复商议形成的改革建议，最后需要经过高门槛的全民公投批准。与以前的试验相比，近年来的抽签试验适用范围更广、影响力更大。抽签的理念开始引起越来越多国家政治人物的关注。例如，香港中文大抽签逐步摆脱边缘地位、引起越来越多主流学术界人士的关注，这说明代议民主框架内的思考已近枯竭，有必要另辟蹊径、探索民主新路。

其实“抽签”决定选举，仍然是一种“社会契约”——“契约”的背后，也存在有比看比“暴力”的，包括“核威慑”、“核恐怖”也在其中。但英国作家，深度调查记者尼古拉斯·萨克斯森说：“全球协调与合作是值得做的，我们不需要非等着大家一起行动才好。通过呼吁实现国家自身利益，我们可以争取最广泛的支持者”。他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表示：“一个执着于竞争意识形态的政府，不可能制定出好的经济政策，就像一个致力于创造主义的政府不可能制定出好的科学政策一样”。问题是联合国的“契约”有国家不遵守咋办？例如，中国人讲究和为贵，也不希望四面树敌，但树欲静风不止啊。如果对这样的行径还能大度容忍吗？

例如，有人说，现在的波兰，不是以前的波兰。以前建交的是共产党执政的波兰，和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兄弟；苏东剧变后，现在的波兰，是“新欧洲”的领头羊。一个很有意思的地缘政治现象是——老欧洲，就是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美国的老兄弟，但也是美国最讨厌的对象，经常不大听话，还喜欢对美国指指戳戳。新欧洲，就是波兰、波罗的海国家、克罗地亚等，曾经是美国的敌国，现在是美国最亲密小兄弟，自然，他们与俄罗斯关系也最糟糕——俄国还是产党执政，还是社会主义阵营吗？俄国去掉“核威慑”、“核恐怖”手段了吗？当年乌克兰事件后，波兰追随西方制裁俄罗斯，俄罗斯立刻反制，道理仍类似“以苏解马”；由此，禁止进口波兰的苹果和蔬菜——波兰是世界上最大苹果出口国，其中三分之二出口到俄罗斯。但俄罗斯理

由也“翻新”：抽检的 90%波兰苹果，杀虫剂水平超标。

没办法，当时波兰苹果不好卖了。也就是从那时起，波兰苹果还努力开拓中国市场。但 2019 年 1 月 12 日晚间，波兰突然对华下手，华为波兰代表处员工王伟晶，因个人原因涉嫌违反波兰法律而被逮捕调查。该事件对华为的全球声誉造成了不良影响——波兰，不看今年还是中国和波兰建交 70 周年。由此有人说：华为公司发出的最新官方中英文回应不对——华为的波兰代表处员工王伟晶，因个人原因涉嫌违反波兰法律而被逮捕调查，依据公司劳动合同相关管理规定，华为决定立刻终止与王伟晶的雇佣关系——这是华为公司用乱用“法律”吗？波兰的指控王伟晶，是“间谍罪”——这个罪名即便能证明纯属子虚乌有，也是对华为形象的狠狠一刀——华为公司就不能事后在国际上，采用“法律”追回公道吗？这类似像回到了为“重庆组织”正名的意义问题，以及对“叛徒”、“投降”定义的法律问题。

也许在张澜 1955 年世纪前，向中共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主任谈过“重庆组织”成立的情况，以及盐亭 1934 年 10 月“西山坪事件”数千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游击队员，在解放后被打成“叛徒”、“投降-反水”现象。杨尚昆（1907-1998），重庆潼南县人，1920 年考入成都高等师范学校附小，后转入附中。当时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是吴玉章。杨尚昆 1925 年加入共青团，1926 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并入上海大学学习。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和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要职。1988 年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的父亲杨淮清，家里人丁兴旺，族中的叔伯就把孩子“寄养”到他家，希望“托福免灾”。所以杨尚昆有 11 个兄弟，9 个姐妹。但杨尚昆的亲叔父杨宣蔚却没有子女，所以，杨尚昆四哥杨闇公便被立为他的嗣子。杨淮清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但喜欢读书，并主张子女都要读书；男孩子书读得越多越好。杨尚昆的大哥杨剑秋、二哥杨衡石、四哥杨闇公都曾涉洋过海到日本求学。

杨尚昆的四哥杨闇公（1898-1927），本名杨尚述（1898-1927）。

杨闇公 15 岁时便远走他乡求报国策，1916 年杨闇公因策动江阴水师反袁，在南京遭追捕。1917 年后他赴日求学，先后在成城学校和日本士官学校深造，又因响应五四运动而入狱。1920 年杨闇公自日返回四川时，在 3 月 12 日“重庆组织”已经以“张澜、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四人公开的名义成立。1921 年 8 月 30 日自行解散后，杨闇公继续投身革命，按程序 1924 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 年转为正式党员，任中共重庆地委执行委员会（相当于省委）书记兼军委书记，与吴玉章、肖楚女、

童庸生、朱德、刘伯承等合作，为“上海组织”在四川建党建团，促进国共合作，开展反帝反军阀斗争，策划顺泸起义，策应北伐，为推动国民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1927 年“三三一”大惨案中，杨闇公自会场脱险后复落敌手。军阀震惧割其舌，剜其目，断其手，1927 年 4 月 6 日杨闇公牺牲于重庆浮图关前。

张澜为啥向杨尚昆主任谈“重庆组织”，也许关系杨闇公是他的亲四哥，有些事情杨闇公曾向杨尚昆谈过。也许像“西山坪事件”，上千共产党游击队及其追随者，被田颂尧的军阀部队包围，后来田颂尧临解放起义又融入新中国——“重庆组织”的自行解散，也是世界革命的大潮为“以苏解马”左右而被包围，作出“以退带进”的决策。“西山坪事件”数千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游击队员，被打成所谓的“叛徒”、“投降-反水”，是因被包围的共产党游击队成立临时的党组织决议——300 多游击队员以愿意集体被县保安队收编的名义解围，法理是即使中共三台中心县委书记、军委书记王克明党内“暗线”曾密告他已“叛变”，不是“叛徒”，但他的决策让上千共产党游击队及其追随者被田颂尧的军阀部队包围，也有错。为了避免上千人的同时牺牲，被收编解围是不得已的办法——这也许是何拔儒 1955 年世纪前，又通过辗转关系向张澜求解“口传”的消息，或者张澜在 1935 年盐亭 300 多共产党游击队员壮烈牺牲后，就知道次事件情况。

杨尚昆主任当然知道，“重庆组织”和“西山坪事件”的复杂性。难解的事情，最好的办法是交给后人去解决——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击鼓传花”，法治有正反两种说法——也许这是“重庆组织”和“西山坪事件”留给人类命运共同体未来“法律”，必然涉及探讨的案列意义，能不能解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法律”不要再留遗憾。

## 八、“击鼓传花”到“三张”

笔者是孤陋寡闻，直到 2019 年初才从网上搜索到华东师范大学沈志华教授 1996 年至 2002 年间与中国社科院合作，个人出资 140 万元，专程到俄罗斯和美国等搜集俄国解密档案，并组织翻译、整理、出版了 34 卷《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简称《选编》）。沈志华教授 1950 年生，北京人，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还担任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兼职研究员等职务。《苏联历史档案选编》是经中央书记处决定内部出版发行的大型档案资料汇集，国家““九五”重点研究课题，经中国社科院组织近百名专家多年翻译整理、编辑加工、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选编》内容丰富，涵盖上起 1917 年初下迄 90 年代初，近 70 年期间前苏联内政、外交、军事、社会、国际共



运各个方面，有会议记录、电报电话、往来公函、请示报告及批示、审讯案件及申诉、日记及回忆录、私人信件等 10000 余件档案文献。这些文献来自俄国 10 余个档案机构的原始卷宗以及美、德、荷兰等有关国家档案馆、图书馆、研究机构，弥足珍贵。

1992 年苏联解体，苏联档案可以开放给外国人复印。可当时中国各院所都没有研究经费，沈志华于是立即个人筹集资金，最终也得到中国社科院的支持。随后他成立“苏联历史档案集”课题组，组建《选编》编委会，在 1995 年 10 月沈志华带领一行人飞往俄罗斯。可到了俄罗斯后才知，俄罗斯开放档案最繁荣时间是 1992 年到 1993 年，等到他去时已经开始收紧，而且外国人想复印的话，费用极贵。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复印，一页 1 美金；苏共中央档案馆复印，一页 2.8 美金；且国家档案局每天只工作三个小时。为了复印档案，沈志华毫不犹豫地一掷千金。事实证明就在他拿到档案后不久，俄罗斯政府就下令封存所有国家档案，不再开放。当然美国在 1995 年时，对俄罗斯档案可说是开放最规范、档案收集最便利、档案利用最有效的。

所以沈志华还又两次跑到美国，收集美国早期获得的苏联档案。两次下来带回复印的苏联档案十多箱，比从俄罗斯带回的还要多。至上世纪末，沈志华已收集、带回的前苏联档案共计 15000 余件之多。他把这些文献复印两套，一套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套放在华东师大冷战史研究中心。同时沈志华教授在全国组织翻译编辑队伍，一起对这些档案进行分类，整理目录，并选择专题译成中文，经历了整整 7 年终于一套 34 卷的《选编》问世——但查遍 34 卷的目录，却没有类似杨尚昆主任 1956 年从莫斯科拿回的实际上是俄国人自家综合整理的《俄国综合重庆〈报告〉俄文稿》，以及分析俄国人综合整理参考有《“适社”〈报告〉廖划平中文稿》-《“适社”〈报告〉杨明斋俄译稿》，和《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重庆〈报告〉张圣英俄译稿》这两组等内容的、早期国际共运和苏共与中国共运交往的文献档案——但网上有《选编》是 36 卷的说法，是否“重庆组织”-“上海组织”原件秘史文献档案作为中俄世纪难题，仍被封存不对外开放，或者沈志华教授等专家没有认识到它们的历史意义而放过。

其实看沈志华教授早期遭遇的几次不幸打击，从第一次遭遇 1966 年“文革”爆发开始，就与搞“文革”宣称的两个口号——“打到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的当权派”和“反修防修”两个目标产生的误区有关联。同时也与“重庆组织”-“上海组织”相连相似的“击鼓传花”有关——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是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独立自主成立的。同样，“重庆组织”也

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独立自主成立的。但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俄国与日、英、美、德、法、意等列强为争夺“远东共和国”等接壤我国地方的控制权，开始在外国复制克隆自己的组织模式——当然这是那时世界革命洪流发展出现的必然和必须。“革命”发生武装“暴力”，是矛盾双方的争执不可能一开始都以“和谈”解决，不然需要“革命”干什么——毛主席说“战争是流血的政治”，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出现的必然和必须。

问题是，“革命”，不可能是蒋介石说的“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中国人改革开放后到美国旅游，在华盛顿国会广场看到有关朝鲜战争历史情况的石碑介绍，其中美国兵参军的开头教育，就有讲在哪种情况下——如在重兵包围下，胜利无望时——可以“投降”——使人十分难解和不能相信。但这是美国一种“法律”判据。其实，到上世纪 60 年代苏俄国外“击鼓传花”，克隆复制自己的模式已不灵验。更何况各国兄弟党之间出现互相建议、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情况——类似 1954 年 3 月 29 日英共中央总书记波立特，致函中共中央建议在英国出版《毛选》第二卷英译本时，删去《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关于资本主义国家暴力革命的两段话。其理由是，武装革命的主张不符合英共“走向社会主义之路”的纲领，英国的法律也禁止一切公开出版物出现推翻政府的言论；毛主席对“修正主义”斯大林特供体系模式分配的批评等，国际上也难用第三国际共运的办法，去压制压抑解决。

“击鼓传花”是我国的一种民间游戏。玩法如，数人或几十人围成圆圈而坐，另有一人背着大家或蒙眼击鼓，敲响时众人开始依次传花，至鼓停止为止。此时花在谁手里，谁就表演规定的行事等；偶尔如果花在两人手中，则两人可通过猜拳或其它方式决定负者。“击鼓传花”引申到非法集资，或者即使如前段时期的所谓合法集资——各地成立的投资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是由国务院出文件，各级政府部门审批，国家银行管钱；但如果国家没有对此的“破产”或“资金链断裂无以为继”的“法律”规定处理办法，就类似各国“共商共建共享共治”遇上其中有一国政权更替出现较大纷争，而事先没有对此的“法律”规定处理办法一样，问题很多，显示人类头顶仍悬杀气。

“以苏解马”出现的中、俄世纪“击鼓传花”，看“重庆组织”研讨传到的“三张”——一是指“张澜”；二是指“张秀熟”；三是指“张军锋”。这里首先说人们为啥很难把张澜，与 1920 年 3 月 12 日带头成立“重庆组织”联系起来？一是大家习惯“以苏解马”，这与张澜不符。二是提“重庆组织”，怕也会与历史上忌讳说“陕北救了中央红军”一样，

必须批判和阻住----据习仲勋著《红日照陕甘》记载,1945年秋在延安一次西北党史座谈会上,原陕北根据地有人谈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精疲力竭、衣单被薄的情形说:“是陕北人民给他们发了皮袄,送去粮食,不是中央红军救了陕北,而是陕北救了中央红军”。他的这个说法立即被在场的习仲勋制止。他严正地说:“这句话该倒过来:中央救了陕北”。习仲勋列举毛泽东和党中央长征尚未到达陕北前陕北根据地的情况,说:“当时陕北外受国民党军队重兵‘围剿’;内遭‘左’倾路线的危害,许多优秀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下级军事指挥员被枪杀、被活埋。毛主席不到陕北,陕北根据地就完了”。习仲勋说的指陕甘根据地开展错误肃反,指责刘志丹同志等不全部没收富农的土地和牛羊,不在游击区分配土地,是“不实行土地革命”;说同杨虎城有联系,是“‘秘密勾结军阀’----这跟张国焘在川陕根据地通南巴错杀旷继勋一样。

据齐心著《仲勋,我用微笑为你送行》记载,刘志丹等人被关押起来后,陕甘根据地的其他领导人习仲勋等100多人也被扣押。起初,他们被关在王家坪,后又押到瓦窑堡,和刘志丹等人一起关在两个旧当铺里。大搞逼供信,搞法西斯审讯方式,天气很冷,不给他们被子盖,晚上睡觉绑着手脚,绳子上都长满虱子,一天只放两次风,看守人员拿着鞭子、大刀,看到谁不顺眼就用鞭子抽,刀背砍。陕甘地区的许多优秀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下级军事指挥员被他们枪杀、活埋。刘志丹和习仲勋也被他们挖好了坑,准备活埋。习仲勋后来告诉夫人齐心说:是党中央、毛主席到达陕北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指示“刀下留人”。如果毛主席晚到四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

张澜和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1920年3月12日成立“重庆组织”,提出创建“川陕根据地”的方略,纯粹是他们根据在四川1911年的保路运动,特别是在盐亭了解“陕西会馆”的厚重历史启发想到的。盐亭县城“陕西会馆”,是明末张献忠60余万农民起义军在张献忠战死西盐边境后被打散,留在盐亭的陕西籍张献忠和李自成的伤残与脱队士兵,利用隐藏的资金在唐朝的县云庵和严震的家墓地看守房及家庙附近修建的同乡联谊馆留下的基础。这里唐朝的县云庵,李白、杜甫都曾在这住过。李白的老师赵蕤,也在这里县云庵读书、著文生活过。清初时的“招民填川诏”,陕西来盐移民定居的也比较多----其中不排除同乡中有工商业者,以及由各种行帮,扩建商品房,以“商业开发”做掩护和交流,来此活动的。正是这些缘故,到1929年5月1日范弘先、侯伯英、余国正等,建立中共盐亭特支时,也把这里作接头地点。在这前后盐亭“陕西会馆”,都是他们的一处秘密开会活动处。更不

说早之前,袁思尧等还是“重庆组织”成员时,也把盐亭“陕西会馆”作为一处秘密开会的活动地点的。

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时,张澜和罗纶等回南充西充老家路过盐亭,也曾到盐亭“陕西会馆”与盐亭本土的保路同志会领头人聚会过。而江油出生的王右木在青少年时代,在读书后得知出生江油的李白,教他最近的名师赵蕤是盐亭人,于是也曾到盐亭“陕西会馆”李白和赵蕤活动遗址探访过。特别是王右木从日本留国归国后,教到袁思尧这位出众的盐亭好学生,也同袁思尧一起来过盐亭。当张澜和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开始商量成立“重庆组织”时,因为他们都是国外留过学的,懂得西方的法律和国内情况的差别----更重要这是中国人独立自主完整践行耳目一新的马克思主义----“马列”是一本科学书、法律书,书要一页一页地翻开。马克思是打开了“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科学的第一页;但“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那时还是一种“理想”和一种“实践”,这本书也要一页一页翻的。

如果用“数学”和“物理”来描述,这不是一页书能装下。例如,追求未来社会“大同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产主义理想”,是类似数论的“虚数”、“复数”。这在物理类似“真空”、“真空量子起伏”,可引出虚、实对等----“实践出真知”。张澜和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理解马克思和列宁的共产主义蓝图,从“湖广填四川”历史,看中国、世界当时和过去最为现实的,是治理“难民、灾民、饥民、移民”。这种干劲干大“革命”,才是最能和减少牺牲,追求推翻反动政权,及一切不合理旧制度的办法。以数论投影映射,可类比似“自然数”“实数”的正负“量子起伏”;此间的物理“物质”、“实在”,只类似停留在原子、分子和实在粒子和量子----成功的“革命”,也容易断送“革命”----“马列”承认“虚数存在”对应的“物质”,它不承认。当然“革命”不是“绣花”----不是像以上映射的数学、物理做文章;参加者也像“马列”全懂“法律”。

看“以苏解马”,只拿“马列”讲“实在物质”教育。如推论存在“实数超光速”,以错反对“马列”的虚数存在及“虚数或复数超光速”----“马列”的书,是要一页一页地打开。1918-1920年从俄国救灾、考察回来的李大钊和瞿秋白“打开”的是,与张澜和吴玉章密商成立“重庆组织”。他们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类似全球化治理“难民、灾民、饥民、移民”的理想及实践持久战。这自然是也把“湖广填四川”苦难历史兴衰轮回的巴蜀,作“革命根据地”的首选对象。

张澜和吴玉章从北京回来,再与王右木和袁思

尧等忠实成员规划，又把“巴蜀根据地”具体收紧为“川陕根据地”——原因也跟四川和陕西有“盐亭陕西会馆”类似的群众历史基础；也有秦岭和大巴山等大山脉迂回，可作革命武装进退攻守的屏障。更重要的是，李大钊与张澜和吴玉章、王右木、杨闇公等，为成立“重庆组织”还研讨复制克隆列宁俄国十月革命发动“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参加起义的“军运”经验，因为张澜和吴玉章早有组织“保路同志军”的经验教训。

所以“重庆组织”把搞“川陕根据地”和“革命武装”，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实践的纲领，在其成员中秘密灌输，也首选保密——这本“马列”的书，他们曾早翻过了几页；即使与“以苏解马”发生撞车，也“自信”：一是看作为“上海组织”输送人才；二是类似也许影响到毛主席和刘志丹、习仲勋等，产生根据地思维。四川出了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和小平同志等，就是证明的事实说话。

“以苏解马”不能完全地对待马列主义，所以这本“大书”它翻不下去。即使它对待科技，只从唯物的“实数”出发，也能研制出原子弹、导弹。但“翻下去”的，是以“东西方对立”为本。类似疑对方打导弹怕“首先使用原子弹”——把“核威慑”变成真。

张澜和吴玉章、王右木、杨闇公等，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践，看成是“法理”；因此坚持自己“遵守”，也希望别人“遵守”。所以他们反对单纯只为了夺取政权，不顾死伤无辜群众，盲目使用搞“爆炸”、“恐怖”等手段——这类记录，夺取政权后即使不允许公开，但“法理难容”。张澜后来参加其它爱国民主派，也许也是他想隐藏组建过“重庆组织”的身份，不让他先前的“判断”、“预言”干扰别人“翻书”，而被作为“翻不下去”的借口。

其次，张澜为啥 1921 年 8 月以后不再申请加入“上海组织”，也有对他共同负责带头成立“重庆组织”的战友之一的王右木，参加“上海组织”后的 1924 年去出席会议，回来在贵州被地方武装杀害，认为安全没保证“上海组织”有一定的责任。继后，指导成立“重庆组织”的李大钊，在苏俄大使馆及其兵营又被张作霖的军警逮捕杀害，认为苏俄有一定的责任，况且事后苏俄没反应，他有意见。特别是李大钊 1918-1920 年在苏俄国内战争时期，遭遇严重的粮食危机，苏俄的饥民甚至影响到中国社会的稳定——穿越边境的苏俄难民，中间混杂着数不清的武装分子和间谍；面对这种严峻形势，李大钊等号召中国各界捐款捐粮，合力组织“俄国灾荒赈济会”，集粮数百车过境救济俄国灾民无数。当时李大钊和彭泽湘等人，最初就是以“俄国灾荒赈济会”的名义，奔赴苏联，对苏联一片真心。但苏

联 1927 年对李大钊的不负责任，张澜终生难以释怀。

四川经历明清时代的“湖广填四川”，但现在一些四川年轻人，只想到川外去问祖寻根，对于“马列”如何去治理全球的“难民、灾民、饥民和移民”等真谛无动于衷，这也是今天对 1920 年 3 月 12 日“重庆组织”的成立，不理解的根本原因。“重庆组织”难题“击鼓传花”到今天，为啥还要说二是指出“张秀熟”，不是别人？

在张秀熟之前，北京的当事人或知情者为啥没有一个说破的？或为啥不指认是重庆“适社”和秦慧僧、廖划平、杜小马、徐敦让等四人？他们不想乱说。张秀熟表面也采用北京类似的办法：“待查，暂不宜发表”。但改革开放后，他一直是自己或让下属宣传自己解放前对敌斗争的壮举，而对曾跟自己同生死共患难的亲密战友袁思尧烈士、亲近老师王右木烈士等，即使不尽名誉保护和公正评价的责任，他完全可以把“重庆组织”难题，“击鼓传花”推给张圣英(1903—1992)。因为张圣英也在成都，作为省政协副主席的张秀熟，是知道“万能教授”大名的张圣英，是四川省政府参事、省文史馆特约馆员——张圣英 20 岁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之前上天津南开中学即与周恩来同学；进北京大学参加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又结识毛泽东；在法国留学经周恩来介绍又与邓小平认识；张圣英是知道“重庆组织”1920-1921 年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的还活在世的人之一。

但张秀熟主席指导和何盛明主任，都没有这样做。也许他们不理解自 1871 年“巴黎公社起义”和马克思总结的《法兰西内战》等“时政要闻”，民间“口传”和“书报公开”传入我国的 147 年间，先进的中国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一批中国早期和近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 1911 年四川保路运动的“跟跑”，到 1920 年成立“重庆组织”和 1921 年成立“上海组织”的“赶跑”，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领跑”，充分地说明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独立自主地成立的“共产党”，是一件合理合法的大好事。这本可把 1921 年国际共运及苏俄指导帮助在上海成立的“共产党”，和为“重庆组织”正名妥善处理结合起来。不像苏俄远东共和国书记处和情报处“小心眼”，得知 1920 年成立“重庆组织”后，搞个“适社”1920 年在重庆等处干扰。

张秀熟主席是知道“适社”的，旁证是：“重庆组织”成立的疑难 1982 年底传给“张秀熟”后，正遇上改革开放后何盛明主任报道张秀熟主席《刑庭激辩震山城》等文章公开发表，谈张秀熟主席曾在敌人的法庭上舌战“王灵官(王陵基)”的壮举。一位网名“向北堂主”的先生写的《访张秀老》的网

文说：他还看到张秀熟的在大革命失败时，说在成都报纸上与社会民主党党魁孙倬章，关于“国共之争”论战的文章。“向北堂主”1985年5月24日为核实这场论战，便上张秀老在成都的宅院专访了他。当时张秀老已是90高龄，但思维还非常清晰。他留下张秀老回忆内容的记录是：“1926年3月，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和孙倬章经常见面，是好朋友。孙倬章主办的《民力日报》的态度越变越坏，就有《评国共之争》的文章发表。虽然面对的是好朋友，但在当时的成都，社会舆论一般认为他是革命的，广大的进步人士、特别是青年受其影响；我的文章发表后，对他的看法就不同了。我一共写了两篇文章，我的第二篇是针对他的答复写的，直接寄给他，要求在《民力日报》发表，他没有发表”。

再从何盛明主任介绍“适社”1920-1921年在重庆建立搞宣传，与1926年社会民主党党魁孙倬办的《民力日报》宣传，性质也差不多。张秀老多次与“孙倬章经常见面，是好朋友”，区别只是“原则问题不能让”。这当然使人联系到王右木，1922年在成都办《人声》报，是否跟回击1920-1921年“适社”在重庆办《人声》杂志有关---因为“适社”与1921年“上海组织”成立前后的活动指导有关---王右木加入“上海组织”后，为了挽回“适社”对“上海组织”的不良影响，不惜再采用《人声》这个刊名曾被“适社”使用过，也要一而再再而三用《人声》这个刊名，发正面文章改变社会对“上海组织”的负面记忆。这正是“王右木精神”的“爱党”、“护党”精神。

在2017年11月13日《绵阳日报》上，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委党校原副校长冯铁金，发表的《王右木创办的〈人声〉报沿革考》文章说：“此前他还创办过《新四川旬报》，最后创办了《人声周报》”。冯铁金校长说：“王右木成为了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从他起草的《本社〈人声〉报宣言》提出的八条主张可以得到证明……或加入第三国际团体，作一致的行动。七、讨论马克思社会主义之学术的及实际的一切问题。八、讨论新社会之一切建设问题”。

但也有别的文章说：“这一时期有《人声》独树一帜地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在革命群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在《人声》报创刊及其前后一段时间内，成都思想界仍然是比较混乱的，各种主义都在社会上流行，最有代表性和拥有较多青年支持的是无政府主义，连王右木也曾一度受过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王右木是“无政府主义”？创办《新四川旬报》时，王右木已参与1920年3月12日“重庆组织”的成立---“重庆组织”不是准备参加议会竞选的党派；作为秘密革命组织成立，为避免敌人的打击，“重庆组织”没有对外公开宣传

自己的名称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这种策略不是“无政府”。

其实王右木1921年底已经加入了《上海组织》，这是他直接写信给李大钊和陈独秀解决的---“重庆组织”中王右木是第一个最早加入“上海组织”的负责人之一，而且一加入“上海组织”后，就以无产阶级的大无畏精神，担负起解决“以苏解马”搞“单极化”的误区，把“重庆组织”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统一到“上海组织”的方向中---也许这遭到党内外极端左、右翼的不满，是他1924年遇害的一个外因---“以苏解马”极端强调“两条路线斗争”，在革命队伍内部划分左、右两翼，而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解决---“两条路线斗争”说法，是到1979年我们党的11届3中全会才确立的。王右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以从他写的《〈人声〉报宣言》中“八、讨论新社会之一切建设问题”来分析。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孟捷教授说：“前苏联经济改革---就是没有改革。最后只能来一个休克疗法，而且休克不是疗法，光有休克没有疗法。因此苏联经济那时候是一个急剧的滑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啥不搞“以苏解马”？也许与李大钊等先于“上海组织”指导张澜等出头成立“重庆组织”时，就引出“新社会之一切建设问题”---，在革命的延安时期“南泥湾生产大运动”，是其端倪之一。

“以苏解马”在苏俄的革命，上层有“特供制度”；下层是“计划经济”。“重庆组织”虽然存在时间才一年多，但受到它影响的情况---笔者在家乡盐亭县天垣场看到1950年刚解放初的景象，问其原因听说，即使解放前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天垣场这个极其贫瘠的离河又远的在山半坡的一块山垭口狭长台地，由于这里有“盘古故里”的传说和“盘母石”及“龟碑”等遗迹，何拔儒等“重庆组织”在盐亭的一些成员，策划要在这里搞“重庆组织”的乡村“工业园”、“经开区”等纲领的实践。1921年8月后“重庆组织”虽然解散；以及1929年7月在天垣场申家沟成立的盐亭县第一个中共农村党支部，到1935年3月后盐亭龙潭地区中共地下党组织，又被国民党反动派扑灭。但胸怀马克思主义理想存活下来的成员，在没有政权、没有组织的有限的条件下，仍然坚持鼓动“工业园”、“经开区”的探索。

笔者1950年刚解放虽然很小，才5岁，也还能亲眼看到天垣场这条狭长不到半里，人户不到20家的小街，最显眼的就有董连周的调味品生产厂、董怀德家的染布厂、王永祥家的面粉厂等。在天垣场周围附近乡下农村，有寇家坡的榨油厂，董家河坝的烤酒厂，何家坪的纺纱片区、姚家湾的纺纱与织布片区、文家观的纺纱片区等。这类厂和家庭“工

业作坊”，虽然规模、产品，与改革开放后到 21 世纪现在各地县城镇及周围普遍开好的“科技园”、“工业园”、“经开区”比起来，小和初级，但它是“重庆组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联系当时贫穷山区农村解决“难民、灾民、饥民、移民”实际的产物。解放后受“以苏解马”的冲击，天垣场变成农业户口化搞合作社、人民公社外，不准走“资本主义道路”。到目前当年那些调味品厂、染布厂、面粉厂、榨油厂、烤酒厂、纺纱织布作坊等，时过境迁已不能再恢复，农民到外面上大中城镇打工，比在家乡务农收入更丰。

但是当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联系实际的“工业园”、“经开区”探索，对盐亭天垣、玉龙那一带人们及后代还是留下影响。例如，在笔者初中同学和认识的人中，就有天垣的黄辉煜及儿子黄强、黄斌目前，办在绵阳市的劳动保护用品有限公司，黄辉煜先生说他们办的口罩厂在川也算大的。玉龙三星的王云白和儿子，21 世纪初到南非打拼，到现在他们在南非与在国内江浙联合办厂，生产厨房金属餐具制品，也干得不错。黄辉煜、王云白等虽然与华为总裁任正非的规模、气度不能相比，但他们跟着新时代的步伐，前进是一样的。而任正非与吴大辉教授、苏晓晖研究员等一批精英学者相比，也不同——任正非显得更懂“进攻性的马克思主义”，和对“以苏解马”的批判。

吴大辉，1967 年生，吉林人。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1990 年本科毕业于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俄罗斯语言文学系。1999 年调入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工作。2002 年毕业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俄罗斯外交专业，获博士学位；2005 年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获法学博士学位，同年晋升研究员。曾任总参谋部某部中校团职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战略研究室主任，兼任全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秘书长、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俄罗斯方向高级顾问等职务职称。苏晓晖，1981 年生，北京人。2004 年获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士学位，随后进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2009 年获外交学院国际政治系硕士学位。现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从这两位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可看未来。

吴大辉教授 2017 年 11 月 7 日在“凤凰国际智库”，发表的《中国与俄罗斯打交道，不吃亏就是占便宜》讲话中说：“与俄罗斯打交道不吃亏就是占便宜，我们虽然是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但是我们要以不结盟为处理两国关系的准则，亲兄弟明算账，市场原则，同等优先，适当照顾。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存在长期性。如果说存在一个反俄、仇俄的阵线，只要中国不加入，这个阵线的性质也不会改变。俄罗斯的外交始终谋求建立一个反西方同盟，

中国不愿意与俄罗斯合作形成反抗西方的地缘政治同盟”。看来吴大辉教授的头脑还是清楚的：“亲兄弟明算账，市场原则，同等优先”——其实俄国也是这样干的。

例如，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专家委员会主席张国宝主任的新书《筚路蓝缕——世纪工程决策建设记述》说：石油部门从 20 世纪 90 年代就开始与俄罗斯方面接触，探索从俄罗斯西伯利亚的油田建设到大庆的管道，以弥补大庆原油产量下降造成的供应不足。最初双方商定的是从俄罗斯的萨哈、恰扬金等油田建设管道到大庆的“安大线”。但俄罗斯后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亲兄弟明算账，最终谈判时俄方说：“安大线”只是将管道建到中国，向中国出口石油，应该考虑面向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的管道方案。俄方推说，“安纳线”的方案是由日本提出的。线路走向从伊尔库茨克州安加尔斯克油田出发，沿着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和中俄边境地区，通往俄罗斯远东港口纳霍德卡。即“安纳线”全程都在俄境内，而不是只通往中国。俄罗斯可以从太平洋岸边的纳霍德卡港，将石油输往东亚其他国家的“大手笔”——2003 年日本两次与俄罗斯专门讨论能源合作问题，日本为俄西伯利亚油田开发和管道建设，提供 75 亿美元贷款。说白了就是要搅黄“安大线”。中国不改“照顾”、“不吃亏就是占便宜”的头脑秉性，“安纳线”胜利；2004 年 12 月 31 日将“安大线”走向，向北推 400 多公里，解决了俄国内争论的贝加尔湖环保问题。

但吴大辉教授毕竟不如，任正非是在毛泽东时代生活过干实际工程的人，懂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美俄中”、“俄日中”的精髓，不搞类似“三国演义”象棋的“三归一”。吴大辉教授说“与俄罗斯打交道，不吃亏就是占便宜”，是够出格了。而苏晓晖所长更甚，2013 年 11 月 4 日她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的《日本能把俄罗斯“撬走”吗》文章中说：“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具有牢固基础。日本试图在中俄之间打入‘楔子’只能自讨没趣。但从俄罗斯的反应来看，日本的一厢情愿已然化为泡影”。看来与张国宝主任说的事实不符，苏俄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

吴大辉教授和苏晓晖所长为啥要这样宣传？吴大辉教授 2017 年 11 月 7 日说得很清楚：“俄罗斯通过强调周边安全威胁，力推独联体地区安全一体化——俄罗斯原西部军区司令，被任命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参谋处参谋长，想打造成与北约对抗的小华约组织。乌克兰危机给俄罗斯外交带来了转换的机会，一个被迫的机会——在乌克兰问题上，俄罗斯建立了强大的特别军事防御区。而且俄罗斯不接受以土地换和平，克里米亚默认了，但是要求在其它

地区保持高度自治的和平局面。关于俄罗斯和欧盟的关系，矛盾点在于，第一，俄罗斯想与欧盟搞合作，但是俄罗斯被迫与东扩的北约搞对抗。第二个矛盾，俄罗斯的老朋友是德国、意大利这些老欧洲国家。但是新加入北约的这些成员国，原社会主义国家波兰、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把俄罗斯当成了死敌。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存在长期性。如果说存在一个反俄、仇俄的阵线，只要中国不加入，这个阵线的性质也不会改变。俄罗斯的外交始终谋求建立一个反西方同盟，中国不愿意与俄罗斯合作形成反抗西方的地缘政治同盟”。

按吴大辉教授的说法：俄罗斯谋求建立反西方同盟，是“被迫的”。可见中国“默认”的种子很多，在过激的 21 世纪国际潮流左、右翼对立的难解难解的难题中，把准方向不容易：把“东西方的对立”等价于对方“瓦解共产党”的政治宣传，要回到像任正非总裁讲的“进攻性马克思主义”上来难。例如，苏联“和平演变”了，但并没有改变“俄罗斯谋求建立反西方同盟”，“以苏解马”是“进攻性马克思主义”吗？1921 年苏俄帮助成立了“上海组织”，实现中国大部分领土解放，为啥没有完全解放？甚至经济走到崩溃的边缘？“核威慑”罩在头顶默认了，“重庆组织”解散了，但为啥改革开放的声音又重现祖国大地？“以苏解马”能呼唤强起来、富起来的祖国吗？21 世纪国际潮流左、右翼对立难题，没有“反俄、仇俄”的说法。要像苏俄曾经帮助中国建立“上海组织”一样，中国也要义不容辞回报帮助俄罗斯，走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未来。

## 九、结尾：历史智能人工智能

国际上传说左翼是提倡照顾穷人，也对。但掌权后为啥遇到经济不顺和腐败？是“西方捣乱”？是“以苏解马”搞“特供制度”——实权人物与他们提倡照顾的穷人，长期收入相比差别很大？是不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放在抓穷人的教育等方面，只宣传是右翼抢夺了穷人的财富，只有抢夺回来一条道？但右翼像我国“八九风波”中的科技代表人物，把近现代科学都说是来源西方及至古希腊；中华民族古代科技发现，如“有生于无”、中医经络、元气、阴阳等超前的量子起伏思想，都反“唯物”；中国现代科技创新，只能完全跟从西方的步子等。那么，只能说“八九风波”的处置，中央是正确的。

在 2017 年 11 月 13 日《绵阳日报》上，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调研员简奕主任，发表的《王右木与“四川三人”》文章说：“以王右木方案为起点，以四川早期党团组织改造民团为革命武装的过程和结果为研究对象，对这段历史进行全面梳理和系统考察，得出一个结论，即对民团的争取和改造，是

中共早期农民运动的重要形式和客观事实”。简奕主任说的这件事与“重庆组织”密切相关，是证明“重庆组织”存在过的重要形式和客观事实”——“王右木方案”来自张澜和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 1920 年 3 月 12 日成立“重庆组织”，提出创建“川陕根据地”的方略，以及李大钊与张澜和吴玉章、王右木、杨闇公等，为成立“重庆组织”时就研讨过俄国十月革命发动“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参加起义的“军运”经验。

特别是张澜和吴玉章就有组织过“保路同志军”的经验教训，所以“重庆组织”把搞“川陕根据地”和“革命武装”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实践的纲领，在其成员中秘密灌输有关——“民团”和“军运”是一个内容的两种说法，即对民团的争取和改造，是“重庆组织”1920 年 3 月 12 日成立时，就主张早期农民运动的重要形式和客观事实。

2013 年 1 月 13 日 新浪网《何盛明的博客》上，发表的“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再考证”文章中，何盛明主任说：“《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在 1982 年末内部出版前，中央档案馆曾函讯四川革命前辈张秀熟同志，那时笔者正在张老身边工作，张老嘱我回信说明 1920 年四川没有共产主义组织，此件（指《报告》）待查，暂不宜发表。张秀熟是五四时期四川爱国学生运动的领军人物，是四川学生联合会的理事长，《四川学生潮》主编，通过学联与刊物和各地先进青年都有联系，张老是当时历史的见证人，他的话应属实可信”。由此从张秀熟主席嘱咐何盛明主任“属实可信”，佐证“重庆组织”难题“击鼓传花”到张秀熟，也“属实可信”。

那么“重庆组织”难题“击鼓传花”，为啥还要说是到“张军锋”呢？张军锋主任是河北电视台高级编辑、文学硕士。河北人，70 后资深纪录片制作人。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河北分会会员；也是一位优秀的党史研究专家，目前已调到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笔者与他打交道属偶然——2011 年 3 月 12 日《重庆日报》和 3 月 13 日《光明日报》长篇发表有关“中共创建史上的一个未解之谜”、“我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成立于重庆”的报道后，是当年《晚霞报》对此的转摘报道。笔者看到后才引起关注和知道张军锋的。

张军锋主任的 90 余万字的书《开端：中国共产党成立述实》，虽然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年 7 月才出版的，也许张军锋的书稿在交出版前没有看到《重庆日报》和《光明日报》的公开报道。但从《开端》中 588 页“四川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探疑”文章，他已经知道 2010 年夏天北京开过《重庆日报》和《光明日报》报道的研讨会，以及，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何盛明主任在《四川党史研究》杂志 1983

年第9期发表的《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探索意见》，和杨奎松教授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资料》1992年第12期发表的《关于重庆“共产党”及其他》等几篇公开的文章。

杨奎松，1953年生，重庆市人。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毕业。历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编辑、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及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代史，主攻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对外关系史、中苏关系史、国共关系史及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从张军锋主任书中的《四川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探疑》一文介绍，全国最早公开发表文章否定1920年3月12日重庆成立了共产主义组织的专家，第一个就是解放后了解采访过张秀熟主席的何盛明主任。她公开发表的《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探索意见》一文，是我国最早否定1920年3月12日张澜、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四位负责人，在重庆组织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文章，影响很大，直接带动了如杨松奎、杨世元等出生重庆的学者“知难而上”，依样画葫芦“进行了分析破解”。

但为啥认为只有何盛明主任的分析，具有“综合”的重大价值呢？第一，她采取的是用“书报公开史”考证的传统党史研究方法，据理力争，是重庆当时的无政府主义组织“适社”所为。这实际把她说的参考有领导她的老前辈——张秀熟讲解的“口传地方史”，考证升华“整扎实”了。也许跟着张军锋主任书中也说：“由此可以推知，我们今天还能见到的这份《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很可能就是廖划平等四人在途径伊尔库茨克时提交给共产国际远东局的”。

2017年在江油市11月12日召开全国“纪念王右木诞辰130周年学术研讨会”之前大约一个多月，笔者联系上了张军锋主任。在通电话中，笔者问张军锋主任：“廖划平等四人提交《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认定，你作过亲自考察吗？因为1935年前盐亭革命老区地下党的当事人，有知道“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原因是它还遗留与张国焘等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及解放初开展的‘肃反’扩大化有关。何盛明主任再三发表类似《1920年重庆究竟有无共产主义组织》等文章，指名道姓矛盾直指1920年代的盐亭袁诗尧烈士，说他混迹‘无政府主义’等，与背景的真实有出入。她称‘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是‘适社’廖划平等1921年所为有失公允”。

张军锋主任在电话中回答说：他没有去作过核实的考察，他依据的研究结论只是“公开出版的书籍和刊物上发表的资料”。2017年11月12日在江油市召开的全国“纪念王右木诞辰130周年学术研讨会”刚好过去一年，2018年11月11日上午绵阳

市社科联的《绵阳论坛》杂志特约编辑刘文传先生，给笔者打来电话告诉：“绵阳市党校刘仲平校长说市党校要成立‘王右木烈士研究中心’，晚上刘仲平校长要约几个人一起作一些交流”。晚上见面后，只有刘仲平校长、刘文传先生和笔者三人，主要是研讨中央民族大学姜秀荣教授在《光明网-学术频道》，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翻译之梳》文章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在1899年最早传入中国的观点，无疑更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笔者认为姜秀荣教授的观点，只属于党史研究中归类于“书报公开史”的考证结论，不属于“口传地方史”的考证结论。

到此时刘仲平校长才告诉说，不是绵阳市党校要成立“王右木烈士研究中心”，而是在绵阳的西南科技大学在筹建“王右木烈士研究中心”。进而刘仲平校长问笔者：“王右木烈士参与过成立‘重庆共产主义组织’，你哪里知道的？”。笔者回答：“是‘口传’知道的”。聚会此时结束，但笔者过后不断思索：为啥很多人怕把王右木烈士与成立“重庆共产主义组织”联系？才意识到张军锋主任，他也许类似发现石墨烯超晶格中“魔角”火红的曹原。

在“重庆组织”难题“击鼓传花”，最后发现了“张军锋魔角”——《在魔法角度下石墨烯超晶格中的半充满关联绝缘体行为》和《在魔法角度下石墨烯超晶格中的非传统超导性》两篇论文，是21岁的博士研究生曹原，把“超导”和“石墨烯”联系起来——石墨是一种碳的单质，由一层层的平面层叠而成；石墨烯，就是单层的石墨。曹原的“石墨烯超导”针对单层的石墨烯取两层石墨烯，让它们之间偏转1.1度左右，在这个偏转角下，双层石墨烯的体系表现出了惊人的性质，所以把这个角度称为魔法角度，简称“魔角”——马克思主义是一本“大书”，实践是要一页页翻开的。但“张军锋魔角”把马列主义的“两页书”不用再翻，而是“偏转”一个“角度”——张军锋主任虽说的是以“公开出版的书籍和刊物”为准——这最保险、最可靠，有问题也是别人的，但“张军锋魔角”还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真实的一页——马克思主义从历史智能，向人工智能升华中还能看到的——像王右木1924年在贵州，被反动派杀害，反动派应该被消灭；但王右木烈士的血，不会白流。

一种源于古代中国、却不局限于中国的概念，它能处理“全球化动态形成过程中”的普世性问题。这个概念像桥梁一样把古代中国，与21世纪的全球化联系在一起——在全球化时代，受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和霸权争夺，定义的各种政治概念，正在逐渐失去意义；主导未来的新兴力量，是全面的、包容的、普惠的全球网络。这也正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理念，它把在王右木烈士牺牲的地方出生成

长起来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主要创始人总裁任正非，即使在不惑之年 43 岁才开始创业，也能一手把山寨公司变成震惊世界的科技王国，并且能同时创立开中国企业先河的企业治理大法——“进攻性的马克思主义”，他甚至概括成“狼性的文化”，实际这是“与狼共舞”。

我们把任正非等这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简称为“进攻性马”。

由此可知“张军锋魔角”的另一页，是“进攻性的马克思主义”——2019 年 1 月 20 日任正非，在接受央视和国内外媒体采访中讲的主旨：“我是永远地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但是绝不会做伤害世界任何国家的事情。比赛是和平的竞争，技术竞争是和平竞争。我们有很多东西，欧美国家最终非买不可。我们是市场经济，当他们要买的时候，我还是会卖给他们的。但是我重点，把想买我东西的国家做好。教育是最廉价的国防，只有长期重视基础研究，才有工业的强大。没有基础研究，产业就会被架空”。联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赵汀阳，2016 年出版的新书《天下的当代性》中说：“深入探究中国文化根源就会发现，天下之外再无他物，因为‘天’笼罩全球。正如儒家理想所说的那样，天下要大同，才是顺应于天”。可知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主要创始人任正非，对“进攻性马”的广度认识，是何等的深刻。

因为任正非对这种“进攻性马”，联系华为的实际的解释是：“我们不是上市公司，不是为了财务报表，我们是为了实现人类理想而努力奋斗。华为过去 30 年，为世界偏远和贫困地区的进步做出了努力，甚至有些人献出了生命，不要忘记华为为人类社会做出了贡献，更不要用猜疑来诠释事实。华为的文化是以进攻性，高要求著称……华为卖的是一个裸设备，这个设备上没有意识形态。这个设备是由运营商来掌控的，不是华为。所以，我们不要回到工业革命砸毁纺织机的时代。华为公司的政策和基本商业准则，是遵守业务所在国所有适用的法律法规，包括联合国、美国、欧盟适用的出口管制的法律法规”。

对“进攻性马”的这种可见证，任正非说：“在日本海啸引发福岛核电站泄漏时，与难民逆向前进的是华为员工。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在两周内恢复了 680 个基站，为抢险救灾做出了贡献。印尼海啸，我们有 47 个员工，在 13 小时内就把海啸灾区 668 个基站恢复了，支持了抢险救灾。非洲不仅有战争，而且是疾病频发的地区，我们有很多员工都得过疟疾，大量员工在这些疾病和贫穷地区穿越。人类信息社会未来的膨胀是无限巨大的，所以任何一个市场机会都不可能由一家公司独立完成，需要有千万个公司共同承担。随着人工智能大规模在工业和管

理中的使用，过去工会问题、福利问题、罢工问题……都会随之而解。现在西方有些人认为华为设备运作有阴谋，这种意识形态就像工业革命时期砸坏纺织机一样，认为先进的纺织机破坏了世界。又比如，美国突然不采购华为手机这种大事件出现时，中国有些民众提出要抵制苹果手机。我们的态度是不能为了我们一家公司牺牲了国家利益，牺牲了国家的开放改革政策。当我们近期在西方受到很严厉的挫折，我们还是支持我们国家继续走向更加开放。因此我认为，中国只有更加开放，更加改革，才会形成一个更加繁荣的中国”。

任正非 1944 年 10 月 25 日出生于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县。1963 年就读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毕业后参过军，入了党。任正非用的什么办法把“进攻性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历史智能引向人工智能的呢？实际仍是马克思主义功能的本身——2018 年 9 月 17 日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贺信中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孕育兴起，正在深刻影响世界发展格局，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小平同志说得好，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实际这不仅是科技发展为人类社会进步，在发挥更大作用的重要途径。“进攻性的马克思主义”对国际各国之间形成左、右两翼的“东西方对立”，以及一些国家内部也形成左、右两翼两翼的“东西方对立”等世界性、世纪性难题，也能从加强科技产业界和社会各界的协同创新，促进各国开放合作，得到逐渐解决。即搞革命，也需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进攻性的马克思主义”。

“以苏解马”主张“东西方对立”，左、右翼都容易产生“过激行为”的大量人群。我国改革开放，把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翻开的那一页，实际也类似把这种“过激行为”的一部分，扫进历史的垃圾箱，减少了对搞“改革开放”时代的压力。“重庆组织”难题“击鼓传花”的尖锐性，1963 年四川盐亭出生的专家、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的高翔教授，在《观察者》网，发表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文章中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了从创立、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中国人民迎来了从温饱不足到小康富裕的伟大飞跃。三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揭示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伟大真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科学指南。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和中国历史、国情、实践紧密结合，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科学思想”。

高翔院长说：“在新中国前 30 年的探索中，我们经历了严重曲折，走过不少弯路，但历史的学



费不会白交”----这就是从历史智能到人工智能的升华----高翔教授不会去理会他母亲出生的盐亭高灯镇, 1935年300多共产党游击队员, 在高灯踏泥坝被国民党反动派砍头英勇牺牲的壮举, 被冤屈为“反水”----由于张国焘分裂中央的错误造成1934年盐亭石狗场“西山坪事件”, 解放后却把忠于革命、忠于党的盐亭本土参加革命人, 看成“反水”、真“叛徒”; 按杨崇汇书记的说法: “革命老区搞成不是革命老区”的冤屈----但像高翔教授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后代盐亭县人及其后代, 已经不再比计较。

另外盐亭人: 北邮大杨义先教授、博导, 是我国著名的信息安全专家和攻破世界数学难题的专家; 罗玉兵毕业于读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高能物理, 研究“格论”的计算机分析, 成为银行方面的高级计算机专家; 钟鸣是杨义先教授的研究生, 又到美国深造, 成为硅谷的谷歌高级计算机信息专家等, 为啥作为1935年前曾是革命老区地方盐亭出生的后代人, 他们给笔者的一个共同感觉是: 21世纪向前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上海组织”也是“重庆组织”的继续; “重庆组织”与“上海组织”的目标, 共同是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到一起了, 还有什么大不了想不通的事。

所以对“重庆学”作的探索, 笔者只是业余, 前提仍应以今后官方公开的真实事实为准。众所周知, 解放后“上海学”, 人们耳熟能详。而“重庆学”, 仅到2011年《重庆日报》、《光明日报》和《晚霞报》等有公开报道, 除外几乎是秘而不宣。解放前, 提“重庆组织”话题, 已是噤若寒蝉。即使到1956年, 我国从苏联获得《重庆报告》的俄文翻译稿之后, 至今也没有再从俄国档案中找回中文原件。今天公布的《重庆报告》, 是俄文翻译稿的再中文翻译稿, 也仅是部分内容。但时代在前进, 在华为中心的接待大厅, 我们看到任正非说的内容更新是: “我们自己培养了大量的科学家, 公司至少有七百多个数学家, 八百多个物理学家, 一百二十多个化学家, 还有六千多位专门做基础研究的专家, 还有六万多工程师, 使我们快速赶上人类时代的进步, 抢占更重要的制高点”。这是我国、也是政府的参与和相关政策的支持的结果。而且政府的参国外也如此。

例如, 当初韩国的三星, 能够从一个给日本代工做百货的企业, 发展成现在全球屈指可数的芯片巨头, 就类似。但其中影响国际各国之间形成左、右两翼的“东西方对立”, 只有“进攻性的马克思主义”才更有出路可为。任正非说: “人工智能是什么? 计算机与统计学就是人工智能。大数据时代干啥? (就是) 统计”。

其实华为的5G基站创新的科学办法, 也为打

下“核威慑”的霸气, 提供了借鉴----用类似量子色动化学、量子纠缠等科学原理, 科技创新研制“核引爆”----当代世界所有的原子弹、氢弹及其核导弹等核武器, 应由人类命运共同体联合国统一管理、储存。“核引爆”一旦研制成功, 联合国事先通告“契约”达成的行事规则。对任何违反要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家和地区, 那么启用“核引爆”装置, 使它“归0”, 做到让科技发展为人类进步发挥重要途径不说空话。

从今天科技、云计算强势出现看, 美国股市也是科技股为王; 板块大幅领跑, 都处于涨幅榜前列。但历史智能向人工智能的提升, 随着产业的深化和精细化, 比如说芯片, 不光是资本市场, 实体经济和产业转型, 很多产业的前期投入就高达几百亿需要科技的力量。在当下大背景下, 中国“进攻性马”举动, 没有落入美国的节奏陷阱中。

任正非总裁说的道理是: 世界上做5G的厂家, 就那么几家, 做微波的厂家也不多。能够把5G基站和最先进的微波技术结合起来, 世界上只有华为一家能做到。基站不需要光纤, 就可以用微波超宽带回传, 这是一种非常经济、非常科学的方式, 它特别适合地广人稀的农村。不要认为农村, 就是穷的地方; 美国大量的别墅区, 就是很分散的高档农村。如果不靠华为, 它需要非常高的成本才能实现; 到时不是这些国家禁止华为的5G, 而是求华为把这种5G卖给它。

任正非说: 在5G上达成了一个标准, 是为迎接人类社会走向一个智能社会, 打下基础。但人为地把它分为两个世界, 对世界智能社会的进步, 是有害的。技术科学家的理想和政治家的智慧, 会决定人类社会的未来。如果问我想通过媒体对美国说一句话, 那就是“合作共赢”。只要把产品做好, 总会有人想买的; 产品不好, 再怎么宣传, 别人都不会买。公司谁是接班人, 不知道----在循环更替中自然会产生, 因为我不是沙特国王。中国这个国家唯有开放、唯有改革, 才能有希望。不能为了华为一家公司, 中国不开放。

与主张“东西方交流”的进攻性马克思列宁主义, 相对立的一页, 是“以苏解马”主张的“东西方对立”----这同西方激进派一样。任正非类似说“以苏解马”是: “随着马克思主义设想的社会主义, 在现实当中变成了前苏联版, 苏联版分属条块的国营和地方国营企业被固化, 成为人们头脑中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代名词。本来市场主体的企业要由职业的企业家去主导, 而职业企业家是要靠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产生的。但我们是把他们当成党政干部去任命调配。同一级别的党政干部调到国企去当领导, 反过来也是一样。国企领导的待遇薪酬, 也要兼顾同级官员, 不能市场化, 必须由政府限薪。这

样的企业领导，眼睛当然主要盯着书记市长，而不是盯着市场。美国有非常多伟大的领袖、政治家、哲学家、科学家，大部分出自穷困的东欧，我们为啥不能再把东欧的优秀人才引进到中国来生蛋？让他们有幸福的生活，让他们也感觉到环境，这样中国能把大量世界人才，像美国一样把科学家吸纳到中国来，这个国家怎么不能‘井喷’呢？”。

从“张军锋魔角”到“纪念王右木诞辰 130 周年学术研讨会”，还揭示会上一些专家有避讳，怕把“王右木精神”引向自信——但 1920 年 3 月 12 日“重庆组织”的成立，实际“证明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也是中国发展的历史必然”。为啥？“中国出了个邓小平”和“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本是统一的。“重庆组织”的正名，揭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能弥补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中还存在的缺失。

其次，与任正非对比，有一些知名学者对存在的“核威慑”不那么自信。这也可以理解，为啥？《俄国综合重庆〈报告〉俄文稿》，中央从 1956 年到 1983 年放置了 27 年，都是不想包办代替；直到 1982 年底才让基层的老同志出面澄清。如把《俄国综合重庆〈报告〉俄文稿》和《俄文〈报告〉俄国综合稿李玲中译本》这种政治难题和敏感问题，交给四川省政协张秀熟主席处理。何盛明主任说他有这个资格：“张秀熟是五四时期四川爱国学生运动的领导人，是四川学生联合会的理事长，《四川学生潮》主编，通过学联与刊物和各地先进青年都有联系，张老是当时历史的见证人”。这也许正是上面对他的政治智慧的信任；也看在他是王右木烈士最亲近的学生、是袁诗尧烈士最亲密的同学面上。但“张军锋魔角”说明方向，有“偏移”。

## 第二部分

### 世界秘史：维京人与“天下人”世界比拼科学解读

#### 0、引言

上海“观察者”网从 2019 年 1 月 15 日开始连载的《“70 年对话 5000 年”之中华早期文明》的长文值得一读。该文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文扬教授对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主要民族社会历史人文地理演变的原理大分析，很有深度。2019 年 5 月 18 日--5 月 31 日笔者到“北欧四国丹麦、瑞典、挪威、芬兰+爱沙尼亚+俄罗斯”旅游，这之前读文扬教授的该连载文章，总还觉得有美中不足之处，但说不出来。旅游期间一路听北京国际旅行社领队李志杰导游（留学俄罗斯，生于哈尔滨），瑞典导游段博士（已入瑞典籍，留学澳大利，生于山东省）和圣彼得堡导游宋美博士（生于哈尔滨，圣彼得堡大学留学）讲古“维京人”在欧洲和世界打拼的历

史，觉得有意思。

2019 年 6 月 16 日在绵阳市“王子大酒店”参加“第七届四川省嫫祖文化活动暨古蜀文化研讨会”，听四川省嫫祖文化促进会会长段渝教授作《巴蜀艺术与近东文明》、西南科技大学李德书教授作《东汉以前有关大禹治水的文物佐证》、雷波县总工会苏杰兵主席作《古蜀文明与“宇宙人文论”的历史渊源之我见》等报告，以及四川省原副省长李进同志讲话，提到嫫祖诞生地除绵阳市盐亭县外，国内其它省市也还有争诞生地的，她希望我国的专家学者能最后确证下来。李德书教授也提到有关大禹的“涂山”除在四川北川外，还有省市多说。

6 月 14 日连载的《70 年对话 5000 年（11）：中国“是一个伪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该怎么理解？》一文，似乎能把古欧洲“维京人”与中华民族远古历史与现代争论中的不确定的难题联系起来，作类似原理性科学分析，供抛砖引玉。

#### 1、什么是“天下人”？

笔者说的“天下人”，泛指“中华民族”，是借用文扬教授的《70 年对话 5000 年（11）：中国“是一个伪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该怎么理解？》文章中，他对文明原理分析总结的归类。文扬教授说：在汉人看来，匈奴是“蛮夷之人”，居于“苦寒之地”——典型的无天下的定居文明，如历史上的印度社会，有大规模的定居，但支离破碎、各成一体，不成天下。典型的游牧-游猎文明，例如历史上中国北方的戎狄或诸胡和欧亚大草原上的各个骑马民族社会，没有固定的都城和要塞，只有移动的毡帐。典型的游商文明，例如历史上往来于欧亚非三大洲枢纽地带，使用骆驼以及地中海上使用船舶的各个行商民族的社会，城市就是商路驿站，经济就是长途贩运。典型的游盗文明，例如历史上西北欧和俄罗斯一带，专以入侵南方定居社会家园，并鹊巢鸠占为能事的森林里的蛮族社会、草原上的骑马民族社会、或海上的海盗民族社会——这里文扬教授说的就是与“天下人”的“中华民族”相对的北欧导游们讲解的“维京人”。

文扬教授还说：他系列文章一直在交替使用以下几个概念说明中华文明的唯一性：一个是唯一延续的文明，一个是“广土巨族”，一个是“天下”型定居文明——这就是“天下人”说概念的来历——第一个，是流行已久并流传很广的定论；第二和第三个，是他本人近几年创造出来并尝试着用于理论建构的——他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在论述中三个概念会交替使用，但在逻辑上，这三者却不是并列的。在他的概念体系中，前两个其实是后一个的结果——“广土巨族”是文明的空间特征，5000 年延续未中断是文明的时间特征，归根结底都源于“天下”型定居文明这个本质。因为是天下定居，所以最终形

成了广土巨族；因为是天下定居，所以生存下来并发展至今。概言之，“天下”型定居文明，是中华文明区别于所有其他文明的一个本质性的特征。为了清楚地论述这个问题，需要界定一些基本概念：从逻辑上讲，天下与无天下相对，定居与游动相对，广土与狭土相对，巨族与小族相对，文明延续与文明覆灭或中断相对，文明社会与蛮族社会相对，农耕社会与狩猎采集社会、渔猎社会和畜牧社会相对，中原与草原地带、森林地带、戈壁地带和高原地带相对。

文扬教授的《70年对话5000年》，阐述中华文明诞生历史是一个“天下”型国家——“天下国家”，或称“内含天下结构的国家”——是“天下”型定居文明独有的也是必然的产物，是对“天下”型定居文明的守护，确保它不解体，不灭亡。文扬教授的这一思想与赵汀阳教授的书《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和杜钢建教授的书《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以及李后强教授的“天府学”等中的思想，是连贯性和一致性的，是对新时代党中央致力于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的响应。

这是一种新的《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的梳理和探索，他们各自的缺环可相互补充和校正——如杜钢建教授等推动的“人类文明起源于湖南热”，与巴蜀远古文明及中华各民族人，“本是来自世界第三极的青藏高原，那里的河流和堰塞湖因大地震溃坝形成远古巴蜀盆塞海，及其远古山寨城邦海洋文明和远古联合国”不矛盾——杜钢建教授说：“从历史文物看，关于有巢氏记载的历史文物有四川绵阳地区盐亭天垣盘垭村的盘古王表龟碑。该碑相传是禹王时期所立的盘古王表石碑”——杜钢建教授的《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一书，揭示华夏文明是世界文明的源头，也推翻了20世纪考古发现所带来的判断，即北非与亚洲，包括西亚两河流域、东亚大陆的中国，同属于世界农业起源中心。对此“天府学”也赞成谢维扬教授的《21世纪中国古史研究面对的主要问题》一文中的意见：中国古代史迄今未能在一系列主要和重要问题上建立起公认的解释的基础，这需要新世纪的古史研究有突破性的进展。

如《非洲多贡人与四川贡嘎山初探》文章中说：2007年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考察队邓涛等专家，在喜马拉雅山西部海拔4200多米的扎达盆地中，发现的一具远古完整的披毛犀头骨和下颌骨后，推证全世界的人类起源的“动物”类，来自青藏高原雪岭地带的“雪人”类。因为这表明西藏披毛犀，有带着对寒冷的适应能力基因，走出西藏，扩展到包括北极圈在内的欧亚大陆北部的干冷草原地带，最后演化为最成功的冰期动物之一。由此的

贡嘎山视角是：人类进化到类人猿，与人类文明起源于非洲是有区别的。因为世界亚、欧、非、美等各洲都有类人猿，以及中国有类人猿，这只与生命起源来源于共同的动物祖先有关，而与后来人类文明起源的孵抱地的单一没有关系。即人类社会的起源，不是从一盘散沙开始，而与有早先优胜动物社会群体的传承性有关。“贡嘎山雪人”约200万年前到非洲，其杂交后代约20万年前从非洲，沿陆路和海路走出，是已经进化到“智人”的一部分现代人种。

其次，出生在四川盐亭县的何拔儒先生说：“山海”就是“盆塞海”，《山海经》就是以“盆塞海”文明为中心的古联合国史地志书。何拔儒曾把《山海经》看成是《涸海古卷》，并以盐亭县榉溪河两岸，距今8000年左右犹存的规模宏伟、气势壮观的山寨聚落遗址，以及围绕山寨的处于半山腰的大围坪，延伸数百里的地貌作为具体考古平台，提出西部远古地震--堰塞湖--盆塞海--大围坪--海啸有关联的假说。他说这种文明失落的证据，是四川盆地几经盆塞海、几经干涸，由此人类早期起源地的青藏高原，四周河流，江水入川，围绕古巴蜀盆塞海形成过山寨城邦海洋文明，是先于农耕文明的。此期的迁徙实是围绕青藏高原与盆塞海的起落，周期流转，与后来盆塞海彻底干涸后的迁徙也有区别。这个“远古联合国时期”存在的事实，解决了“多地区起源”和“非洲起源”的中现代人种与中国类人猿不分的错误。

第二个孵抱期“远古联合国”的巴蜀盆塞海文明，有没有形成原始的先进的科学文化？斯克兰顿的《物理学家多贡人》文中的解读方法，提供了新的视角。例如，斯克兰顿说：“过去也没有一个人人类学家会去把一个简单的部落涂鸦和神秘的科学图表进行比较。但是当这样的比较一旦发生，我们就会发现二者令人惊奇的相似”。

斯克兰顿对多贡文化研究提供的模板，正好供我们去理解非洲多贡人与四川贡嘎山“雪人”的现在品种繁多的现代人类学、考古学、科学之间的联系。因为在远古嫫祖发明“丝绸”和开辟“丝绸之路”，类似“高科技”——多贡人物理的贡嘎山解读比较——如果我们不怀疑原始的非洲多贡人有“高科技”的需要——因为最基础物理、数学原理，是不分时间、空间、物质、能量，逻辑也都能成立，是一种抽象思维“智力”，更是自然运动的组合，不然宇宙也不会诞生出“人”这种复杂的东西。在《被禁止的科学》一书中，斯克兰顿的《物理学家多贡人》解读多贡人的许多物理学的例子和方法，都可以联系华夏上古文明，和新中国解放后70年来的事情，作比较学解读。

例如，斯克兰顿的《物理学家多贡人》后半部

分，抬出国际主流前沿科学的“弦理论”来作评判标准，这使他和嫫祖之间获得有了一个共同的比较基础——丝绸也类型“弦”。斯克兰顿在《物理学家多贡人》中说得很清楚：“弦理论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时走在了科学研究的最前沿。弦理论认为物质的最小组成部分是一些微小的一维闭合圈，即闭弦，这些闭弦像橡皮筋一样按不同速度在振动。这些振动反过来就形成了不同类型的量子力和基本粒子……根据弦理论，能量弦的一个功能就是产生粒子的四种基本作用力——重力、电磁力、强作用力和弱作用力……在每年一次的宗教仪式上，多贡人会在地上画一个图形用来代表阿玛神的 266 个种子或者符号。这个图形由一个大圈和大圈里面的一个小圈所构成。在这两个圈之间的空间里画满了一系列的曲线……这个完成的图形和现代科学所画的量子弦的一种典型的振动模式图非常相似”。由于研究嫫祖不是国家主体或国际主体的科学，而是在没有科研经费和弦论专业培训下的社会基层的业余自学；独立研究弦论的道路，也类似是非洲“多贡人”——是“贡嘎山”多贡人，研究丝绸“弦论”。

非洲多贡人，生活在马里中部高原尼日尔河的一条近 200 公里长的有河湾的大峡谷。列维·斯特劳斯在《原始思维》书中认为：原始人类的思维是一种与现代人类思维一样具有逻辑性、抽象性和富于理智的思维方式，有其存在价值和理由。即原始人类也具有很强的抽象思维的能力，例如多贡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就很强，多贡人弦学的思想体系要比绝大多数的其他非洲民族来得更为抽象，而连接古今一带一路。如数年前由四位顶尖学者倾十年之功完成的六卷本《哈佛中国史》——无论这部被认为代表了“新史学”中国史研究世界水平的著作，取得了多高的学术成就，获得了多少赞誉，被多少名牌大学当作教科书，但它的先天缺陷却是如此的显而易见。

如文扬教授说：秦汉不是中华文明的“古典”时代，夏商周才是；秦汉之于中国，完全不同于古希腊和古罗马之于西方，两者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秦汉不是中国最早的统一时期，从“天下一统”的角度看，周朝是第一次，秦汉是第二次；没有春秋战国时期，就没有秦汉大一统国家的建立，不提前者，后者就好像天上掉下来的，这不是历史——周初建立的是“天下国家”，秦汉建立的也是“天下国家”，都不是普通王国或帝国，都是“天下”型定居文明独特的也是必然的产物。而整套“天下”体系和政治结构，则是周初的创造，并经过周朝八百年，特别是春秋战国五百年三大历史进程的反复糅合塑造，最终才孕育出现代化的“天下国家”秦和汉。

## 2、什么是“维京人”？

维京（Vikings）一词带有掠夺、杀戮等贬义。维京人对欧洲历史尤其是英格兰、法兰西和俄罗斯的历史进程产生过深远影响。

据“百度百科”解释：维京人，古挪威语：vikingar，别称北欧海盗——他们从公元 8 世纪到 11 世纪一直侵扰欧洲沿海和不列颠岛屿，其足迹遍及从欧洲大陆至北极广阔疆域，欧洲这一时期被称为“维京时期”（Viking Age）。在古英语中，“viking”是在海湾中的人，而“wicing”代表海盗；“vikingar”在冰岛的土语中也意味着“海上冒险”。

维京人的老家是挪威、瑞典和丹麦，开始只是打劫西欧大陆沿海的修道院，后逐渐对其他欧洲国家进行有组织的入侵，从爱尔兰到不列颠，从法国到东欧，维京人的身影随处可见，除了征战，维京人还是伟大的航海家，向西他们逐渐发现了冰岛和格陵兰岛，并最终到达北美。向东他们一度到达了里海，最早见于历史记载中的维京海盗，是在公元 789 年一次对英国的袭击，当时他们被当地官员误认为是商人，这些海盗杀死要向他们征税的官员。

第二次记录是在公元 793 年。以后 200 年间维京不断地侵扰欧洲各沿海国家，沿着河流向上游内地劫掠，曾经控制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据说他们曾远达地中海和里海沿岸。其中一支渡过波罗的海，并远征俄罗斯，到达基辅和保加利亚。有些船队远航至里海，前往巴格达和阿拉伯人做生意。而更为著名的一支维京人向西南挺进，在欧洲的心脏地带掀起轩然大波。他们大肆劫掠不列颠群岛，并且还向欧洲大陆进行了侵扰。11 世纪时的德国海盗们在西兰岛聚集了大量的黄金，这些海盗被他们自己人称为维京（阿斯考曼尼），向丹麦国王纳贡。13 世纪时英格兰国王哈罗德一世将这些海盗从苏格兰及附近岛屿清除出去，部分维京人逃到冰岛。

北欧的传说将维京人描绘成无畏的英雄，但到了 18 世纪的传奇中又把他们描绘成强盗——他们被认为是斯堪的纳维亚农民，业余去做海盗，但斯堪的纳维亚人认为，可能这些人只是非法的强盗。又有一种说法认为，是斯拉夫人中的海盗逃亡落脚在北欧。维京人从他们在斯堪的那维亚的老家散布开来，会以龙船——因为在这种小船的船头和船尾雕上龙头而得到这个称号——横渡海洋并突然作出攻击。

他们会先作出突袭然后洗掠，在任何庞大的抗抵部队能作出攻击之前就会自行撤退，不过他们的行径却逐渐变得更为大胆。到了后来，他们甚至占领并定居在欧洲重要的地区。身为异教徒的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杀害教士和掠夺教会的财产。一般人都会惧怕于他们的无情和残暴，他们就像来自地狱的魔鬼。在当时，他们是卓越的工匠、水手、探险家和商人。维京的老家是挪威、瑞典和丹麦。他们和后代曾一度控制了大部份的波罗的海沿岸、俄罗斯

的内陆、法国的诺曼底、英国、西西里、意大利南部和巴勒斯坦的部分地区。他们在 825 年时发现冰岛并在 875 年定居下来。985 年他们又在格陵兰殖民。证据显示，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的五百年，他们就曾到达纽芬兰并探索了部份北美地区。

### 1) 文扬教授谈维京人“海洋行国”分化延伸

维京人与“天下人”世界比拼解读，定居等于文明，游牧等于野蛮，这组恒等式在文明史上长期成立——在地中海地区，亚述人和希腊人的古代文献都记录了在他们定居区周边四处游动的蛮族部落。罗马时代也是如此，他们将所有的非罗马人都称为野蛮人。但这种分化是在世界的另一端的地中海，大约在中国的商周之际，毁灭掉东地中海沿岸各个定居王国的民族，却主要不是骑马民族，而是一种乘坐船只的“海上民族”。文扬教授认为：相对于地中海的城市文明，海上民族毫无疑问属于蛮族，而且与骑马民族一样，属于游牧的蛮族。正如那些游走在大陆上的游团一样，人们根本无从知道他们的行踪。

他说埃里克·H·克莱因写道：除了埃及人的文献记载之外，我们对这些人知之甚少。对于海上民族的起源我们也无法确定：一说源自西西里岛、撒丁岛和意大利，一说来自爱琴海地区或安纳托利亚西部，甚至塞浦路斯或地中海东部地区。迄今发现的古代遗址中从未找到他们的发源地或出发点。我们推测，这些人一直在不停地迁移，所经之处，一个个国家和王城皆被征服。在埃及，虽然拉美西斯三世成功击溃了海上民族的进攻，可是整个国家也被拖得精疲力竭，滑向了衰弱和分裂。最终的结果，不过是蛮族以某种“和平渗透”的方式，在此后两百年的时间里逐步建立了对埃及的统治。而在希腊地区，却是“突然死亡”的方式，曾经毁灭了米诺斯社会的迈锡尼社会这一次遭遇了更为彻底的文明毁灭，“石工技术湮没无闻，制灯行业无人问津，黄金销声匿迹，从米诺斯文明继承下来的精美服装样式也已弃而不用。文化财富之源枯竭殆尽。”地中海世界与这些海上民族，长期以来完全不在中国人的视野之内。

中国人不知道，与自己所在的中原类似，在地中海也有一个定居农耕社会和游牧蛮族社会相互混合的“天下”；在那个以海洋为中心的“天下”，定居社会沿海岸呈半环形分布，而中心区域却留给了游牧的蛮族——海上民族。在东亚，最终秦国统一了中国；而在地中海所对应的事件，就是罗马海军击败了迦太基海军，成为地中海唯一的海上霸主，将地中海变成了罗马帝国的内湖。布匿战争是海洋霸政的杰作，尽管迦太基英雄汉尼拔以劣势兵力围歼优势之敌给罗马以沉重打击，但罗马海军所创造的接舷战，深刻影响了此后的海洋争霸史。此后在

地中海历史上出现的一代又一代强权，通过在地中海上无数次罗马模式的激烈海战，磨砺出一种特殊的战争能力。就像草原行国通过经年累月的草原作战培养出横扫一切的铁蹄政策一样，海洋行国也通过持续的海战获得了从海洋上发起进攻的炮舰政策，并在大航海时代之后将这种政策强行施加在了原本没有持续性海战传统的所有地区。围绕地中海这个“海洋中原”的海洋行国争霸战，持续了约 1000 年，直到伊比利亚人从大西洋方向冲了出来，先后绕过了诺恩角和好望角，打破了原来的小天下格局，进入了大天下新时代。

此后，在历史上就不再有两个大洋而只有一个大洋，并且从那以后世界贸易就转到了跨大洋的水手们手中，因为货物经由海上运输更节省能量。文明的又一个伟大进步就此得以实现。达·伽马从印度回来后，不到五年时间，过去常常带来香料的来自亚历山大港和贝鲁特的桨帆船，进入威尼斯港时就成了无货可运的空船。在他回来后的 12 年内，葡萄牙完成了对东印度群岛的征服，阿拉伯人在阿拉伯海和马六甲海峡被击败，葡萄牙在印度沿岸建立了自己的势力。直到这个时期，中国人才第一次在闽粤外海遇到了来自西方海洋行国的舰船。由于从来不了解海洋行国的情况和它们的海洋争霸史，从那以后的几个世纪里，与最初遭遇草原行国时类似，中国也先后经历了惨痛的失败；在 19-20 世纪之交，一时间各大海洋行国齐集中原居国，让中国度过了一段堪比于公元 4 世纪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最黑暗时期。

中国人还不知道，这些游牧的海上民族始终未被定居的王国打败，事实上，正是由于海上民族的长期传统，当地中海地区各个强国先后崛起时，都发展成为拥有强大海军的“海洋行国”。关于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海洋争霸战，即希腊与波斯之间的萨拉米斯海战，詹姆斯·费尔格里夫写道：一个海上民族只能通过一个海上强国去征服。因此，波斯最后是使用其属地的船只，尤其是腓尼基人的战舰，也有西利西亚人甚至埃及人的战船，试图征服大海另一边的希腊。但是，与波斯相比，希腊是一个更为典型的海洋行国。在战争开始时，小小的海上城邦国家雅典竟然完全放弃自己的城市，所有市民全部集结到海上与波斯人决战；最终结果，是更懂得海洋的希腊摧毁了偏重大陆的波斯，迫使波斯舰队在数量仍然占优的情况下收兵撤退，从此失去了制海权。从此以后，海上民族各自为战的时期被此起彼伏的海洋行国称雄争霸时期所取代，地中海这块海域成了地中海这个“天下”的中原；逐鹿中原的争霸战，在这里成了制海权的争夺战。

### 2) 维京人特征的早期记录

公元第八世纪的后期，丹麦人攻击和掠夺英国

东北海岸的在林狄斯芬上有名的海岛修道院，这种攻击和掠夺开始成为趋势。由于突袭英国、法国和日耳曼的规模和次数增加，因此逐渐变成为入侵。从公元 780 年开始，维京人越来越多的外出活动。他们需要更多的贸易市场，需要更多的掠夺场地。他们主要偷盗牲口和谷物，也不放过任何有价值的财宝。他们迅速出击，得手后同样迅速的离去。附近的居民深受其害，将维京人视作蛮人，冷血的战士。

### A、维京小镇考古维京人

2014 年 5 月 15 日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瑞典南部海岸小镇 Foteviken 生活着一群维京人，他们沿袭着古代维京人的生活方式，却也热爱和平，悠闲的生活方式也是自得其乐，引来不少游客参观。

维京人，又称为北欧海盗，是一群凶猛的战士，以其可怕的海上攻击和难以置信的创造能力闻名于世。Björn Jakobsen 是一群生活在瑞典马尔默的现代维京战士的领头人，他和自己的子民向世人展示，维京人的时期虽然已经过去，但维京人从未走远。

Björn 和他的维京战士们在这个小镇的生活非常简单，他们在周围的田野工作，工作完后尽情喝酒。并且，如果某个维京人某件事做的好，例如成功地将船靠岸，就会得到烈酒和肉类食物的奖励。小镇的生活尽可能真实地还原海盗维京人的生活，但只有一部分内容不允许重现，那就是发动突袭。但现代维京人也有自己特有的生活方式，Björn 说：“欧洲各地都有现代维京人，我们会去拜访他们，参观彼此的集市，交换维京人的工具”。

### B、维京人社会记录

维京人的社会体系包括三个阶层：王侯，多为大领主，世袭的贵族。自由人，军队的主力，武士阶层。最底层的奴隶。但这种划分不绝对，一个自由人可以变成奴隶，如果他丧失了所有自己的份地。一个奴隶也能变成自由人，忠诚侍奉主人，就会得到赎身的机会。贵族与自由人定期开会，决定重大事件，解决争端。最早的时候，国王是最大的贵族，他做出几乎所有的重大决定，以至于部族会议只负责一些地方事务。但在冰岛，由于从来没有国王，部族大会决定一切，全岛的贵族与自由人都要参加，每年定期在某个地方召开，为期两周。

维京人无条件接受国王和大会的全部法令，这些法令为每个人所熟知。违背的人将被开除出部落。被放逐者，不能耕作任何土地，不能接受任何人的帮助，他们只能住在山洞中，过着躲藏、偷盗的生活。

### C、维京人军事记录

从孩提时代开始，维京人就喜爱种种竞争激烈的游戏，他们比试马术、举重、划船、操帆和游泳，每年的部族大会同时也是北欧的奥林匹克。最热衷

的运动是摔跤，划出一片空旷的场地，中央放置一块尖头的界石，比赛的双方用力将对方推到石头上。此外他们还比试射箭、滑雪、溜冰。所有这些比赛，都是为了锻炼出更加强壮的战士。哪怕冬天躲在屋里玩的游戏也是如此，从阿拉伯流传来的棋盘游戏，内容总是围绕着攻守技巧。维京人是强悍的战士，他们的人数较少，于是就得依靠周密的策划与出其不意的突袭。在战斗中他们又表现的异乎寻常的狂热，悍不畏死，于是人们谈海盜色变。

他们的突击常分成两节：先在远距离上投掷长矛；然后用剑和战斧做近距离的了断。在海上相遇时，海盗遵守古老的传统，一声不吭的将船系一起。在船头搭上跳板，然后依次上场单挑，每个走上跳板的人都面临这样的命运：或者将对方统统杀光，或者自己战死，由后面的同伴替自己复仇。如果感到害怕，可以转身跳进海里，没有人会追杀逃兵，但放弃战斗资格的人与死者无异，从此连家人都会忽视他的存在。因此排在船头第一个上阵的，通常是最精锐的战士，他们在战斗中赤裸上身，发着粗野的吼声，忘情的享受战斗的酣畅。他们知道，脚下的跳板浸透着祖辈的鲜血，自己的后代也会落脚在同一个地方。愤怒使维京海盗显得强大而骇人，这种战士即被称为狂战士。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这种原始的战斗会激发出这么惊人的人类本性，狂战士的故事被代代相传。战斗中生存下来的男人慷慨分享胜利。

维京人的第一位国王名叫哈罗德，绰号细头发，他统治的地域就是今天的挪威。一个夏天他出发去讨伐打劫他领地的海盗，征战时间过长，以至不得不在奥克尼（苏格兰北部岛屿）过冬，顺带就占领了苏格兰、设得兰和赫布里底群岛。第二年开春大队人马要回挪威，这位国王就把新的领地交给罗根伐德伯爵统治，因为这位伯爵在远征中失去了唯一的儿子。因为齐格尔德伯爵在战斗中救了他一命，所以罗根伐德又把领地谦让给齐格尔德伯爵。今天苏格兰还有以齐格尔德命名的港湾。

### D、维京人文化记录

北欧海盗喜欢听故事和诗歌，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就用这种方式来纪录历史。每个部落中有人专门记录这种故事，并编写新的传说。将这些冗长的故事用文字刻到骨头上显然需要很长的时间，维京人在漫长的冬季躲在屋子里讲述父辈流传下来的故事。职业的艺人或吟游诗人四处采风，参加每年三次的节日，也参加婚礼和宴会。这种场合总需要歌唱与舞蹈，讲故事的人会得到某种形式的礼物，戒指或者项链。他们的故事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可能有点夸张，某人杀死了屋子那么大的野猪；某主妇一天挤完了一千头奶牛。维京人的逻辑是这样的：值得描述的功绩不是已经做了什么，而是能够做些

什么。

北欧人喜欢玩文字游戏，他们的沙加满是比喻的复合词，用来指代某种事物而不用直接提到名字。比方说，剑被称为战斗调料，这样的比方让后世的考古学家迷惑了很久。他们还喜欢猜字谜，交换各种字谜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部分。维京人信仰很多神灵，有男有女，不同神灵照看着日常生活的不同方面。他们时不时的在各处显灵，让适当的事情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发生。故老相传，神灵都住在一个叫阿斯加德的地方，相当于天堂所在。在地底的世界自然也有地狱，叫做尼夫海姆。海盗们坚信，如果一个男人光荣战死，灵魂就能进入天国阿斯加德的神宫瓦尔哈拉，勇士的英灵在那里饮宴、欢歌、讲述传奇。如果生为战士而很黯淡的是死在床上，那就只配进地府。

从这点出发，维京人相信人死不过是去另一个世界旅行，他们就在死者的墓穴中堆放很多的陪葬品，供其路上花用。有吃有穿，各式工具，诸般兵器。更有甚者，如果死的是国王或者了不起的大英雄，会将死者生前的战船与之一起埋葬，即是很有名的“海盗的葬礼”。维京人认为，在动物中亦埋藏着神性，他们据此将动物分成善良的和邪恶的，相信幽灵的存在，地精和大地精也来自维京人的神话。维京人相信，有人可以预知未来，他们将这些先知称为真言者，这些隐士居住在偏远的乡间，受着四方膜拜者的供养。

### E、维京人的帐篷

维京人过着家族生活，父母子女祖孙姑侄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他们彼此忠诚，家族中的一员受了欺负，全家人就一起去部落大会要求公正。如果一名男子被杀，他的家族多半会要求得到金钱或是土地的赔偿。如果部落大会认为他们确实有权力做出这样的要求，凶手的家族爽快的付了赔款，那就万事照旧；但如果死者的家族觉得裁决有欠公正，他们就会私下里杀死对方的一名成员，于是怨怨相报，没完没了的世仇可能成为古老家系的额外传统。

女性谈婚论嫁由全家人决定，但她有权力从列出的清单中挑选一名。婚后她还保有以前的财产，并且在丈夫出远门时负责照看家里的土地。离婚很简单，夫妇俩发表一个声明，当着公证人的面说清他们离异的原因。有些理由看来很可笑，比方说有丈夫抱怨他的妻子老是穿裤子而不是裙子。孩子们则与长辈住在一起，直到他们成年后，出去加入另一个家庭。在这之前，男孩子学习耕作、战斗技巧和航海术，以及工具和武器制造；女子则学习纺线织布，制作黄油与奶酪。

大多数维京人平时是职业农夫，他们住在乡间。荒蛮之地没有大城镇的概念，只有少数几个重要的港口如约克和博卡，更多的维京人与其家族一

起生活小农场上。根据记载或者挖掘到的遗址，可以复原当年的房屋，发现所有的农场几乎都是一个样子。主建筑是幢长方形的屋子，考究一点的，会额外增加一些独立的小屋，充当牲口栏和手工作坊，农夫在作坊内自己制造工具和武器。

在早期的长屋中，只有一到两个房间，全体家庭成员就在一间屋子工作、生活。并且与饲养的牲口混居在一起。这样的屋子一般有20米长，6米宽。厕所同时也是浴室，北欧人喜欢洗蒸汽浴。正对着进门的地方，是一个火塘，全家做饭或者取暖都在这里。这间屋子同时也是储藏室。每面墙上固定着木质的长椅，白天坐、晚上睡，底下还堆放着各式杂物。每户人家有一到两张高背椅，只有一家之主才有资格坐坐，或是来了什么特别尊贵的客人。除了见过世面的国王以外，北欧海盗没有床的概念。

长屋中阴暗潮湿，没有地板，踩的就是泥地。北方苦寒之地，树木稀少，偏偏石头都很少见，维京人垒墙用的是草砖，即将草和泥土的混合胚子稍加烧制，在冬季这种砖很保暖。有些人家在砖墙内侧用木板再做一道夹墙，中间要空开一段距离，以免木板受潮发烂。长屋通常有两扇门，窗很少，实在要有也就是一个简单的窟窿。可以自由开合的窗户对于他们来说是多余的装饰。全部的采光来自门，火炉上方为了排出炊烟的小孔。夜晚照明用蜡烛，但是用动物的油脂做的，在密不透风的房间里点起来，可想而知是什么味道。

妇女在屋里纺线织布，所有衣服都是家庭手制的，手巧的主妇会加上较多的装饰。她们把羊毛或者亚麻纺成线，织成布。用蔬菜汁染上不同颜色，无外黄、黑、绿、褐、蓝、红等鲜艳的颜色，维京人喜爱这种醒目。最后将布剪裁成衣服。整个过程复杂漫长，所以每个人没有几件衣服，身上所穿的连续用上好几年。其实日常维京人的衣服只要舒适就好，并不讲究式样，弗论什么时尚，以至于数百年的时间中，他们的装束一点没有改变。

大多数农场规模是很小的，依靠单独的家庭经营。较大的农场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农夫可以雇用没有土地的自由人，或购买奴隶。这种古老的耕作方式至今没什么变化：春天播下种子，晚秋收获。不能留过冬的牲口在秋天最肥壮的时候被宰杀，肉经过熏、腊、腌的方式被保存下来。农夫的另一种身份是海盗，劫掠与耕作相交替。海盗每年外出两次，春播或秋收之后，妻子会顶替他在家中打点一切。冬季的气候总是很恶劣，北欧人躲在屋里修补工具，缝制衣物，硝制兽皮。当时家居的遗址和维京人的垃圾堆还有保存的，揭示了他们的饮食结构。维京人的主食以肉类和鱼类为主，他们饲养猪、鸡、鹅、鸭、牛、羊，得到肉、奶、蛋，偶尔还打猎捕鱼。他们种植黑麦和大麦用来做面包，用甘蓝和洋

葱作调味品，此外还有大蒜和水芹。他们用木杯或镂空的牛角喝啤酒、牛奶以及一种用蜂蜜自制的酒。一天照例吃两顿，早上 8 点左右是早餐，晚上 8 点左右是晚餐。全家人聚在一起，用木制的锅碗瓢盆做饭。维京人用刀和勺进餐，但没有叉子。

## H、维京人的船

维京人的一切都与他们的船有密切联系。维京船制造的材料主要取自高大笔直的橡树。维京船分为战船和货船两类。战船较轻，船窄，灵活轻便，又很耐风浪；而货船的船身又高又宽，船体也很重，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载重航行时可保持稳定。两类船都有通常所说的弯曲船首，用一整块完整的橡木精雕细刻而成。

## G、维京人奇怪的信仰

一是维京人相信世界上的第一个男人和女人是一个巨人的臭腋窝里的汗变的；天空是由四个矮人在四座高山上托起的，那四个矮人的名字叫：东、西、南、北。二是维京人相信在战争里死去的维京人死后会升上维京天堂，那里有桑拿、美酒、盛宴和一切美好的事物；而在战争外死去的维京人会被贬下维京地狱，在那里，维京人会被关进一个寒冷刺骨的狭小空间里，全身被锁链锁着，没有吃的，没有喝的（除了山羊的尿），头顶上每秒都会滴毒液下来。三是维京人相信他们的神“索尔”，曾经男扮女装去欺骗一个巨人，那个巨人偷走了他的神锤，索尔要把他的锤子骗回来，令人吃惊的是，他成功的夺回了他的锤子。

## M、维京人的贸易

维京人的农场出产几乎全部日常生活用品，从工具到衣物，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擅长制造某种器具的人慢慢成了专门工匠。他们随处开设店铺，但铁匠的铺子总在镇子的边上，因为炉子有失火的危险。工匠生产的器具经过更多的装饰，他们制造工具、武器和珠宝。维京的珠宝享誉至今，有很复杂的制作工艺，胸针通常是用白蜡为胚，白银或青铜浇铸，加以打磨制成，上面镶嵌彩色的石子或者珠宝。琥珀和染色的小石子可以制成项链。黑玉和绿松石则制成骰子和筹码，用来下棋，来往的货郎冲州撞县的兜售这些做工精美的首饰。维京人与很多地区保持着贸易上的往来，考古学家从北欧的墓葬群中也找到了不少别的产品与钱币。不过他们更加喜欢白银，商人随身带着天平，用银块充当砝码。

石刻与传说记载了他们的旅行：公元 860 年，沿着伏尔加河下溯的维京人来到了俄罗斯（其时还不叫俄罗斯）。他们同当地的斯拉夫人作交易，从诺夫格罗德南下，沿河来到波尔加，用奴隶换取蜂蜜和毛皮；再顺着伏尔加河进入里海，换乘骆驼，一直来到巴格达，交易丝绸和香料。另一条贸易路

线是沿着第聂伯河到达基辅，进黑海，到达盛产葡萄酒、丝绸，出售精美的珠宝首饰之地。维京人是很好的水手和船匠，相比较，别国的船去不了远海，设计也很笨重。维京人的船分量轻，船身狭窄，吃水浅，可以在欧洲所有河流中航行。

维京人在冬天建造或者修补他们的船只，通常在露天建造，偶尔会搭个工棚。船身和船桨用橡木制造，桅杆用松木，可以在大风中适度的弯曲，先用整条原木加工成龙骨，以保证强度。弯曲的头尾单独加工，然后用铁钉固定到龙骨的两端。接着在龙骨上架好横梁，就完成了整条船的轮廓。沿着轮廓在船的两侧铺上蒙板。这种整条的木板层层相楔，上面一层刚好覆盖住下面一层的边缘。最上层的蒙板开凿了若干小孔，五米长的木桨从孔中伸出。最后铺上地板，架上桅杆，在桅杆顶上装上金属制的风向标。槽则安装在船体后部的右侧。船帆的两侧挂上麻绳编制的网，防止船帆在强风中撕裂。这样的船最常见，全长 20 米左右。水手们随身带着一个小箱子，装着衣物和武器。划桨的时候就坐在上面，但他们很少划桨，他们是操帆的好手。

每艘船的首尾都有一个舱室存放食物，储藏着黄油，奶酪，啤酒，淡水，肉食，苹果和干栗。此外还有各种炊具，帆具和上岸用的帐篷。他们穿着毛皮大衣，就在船上和衣而睡。船上还能生火做饭，用一个装满沙子的盒子做炉灶。在海上，他们用日月星辰做方向标。天气差的时候也用指北针，一块简单磁化过的铁片。在维京人漫长的旅途中，船是他们移动的家。桅杆可以放倒，蒙上船帆就是很好的帐篷，海盗们甚至像阿尔戈英雄一样扛着座舰前进，从一条河到另一条河。因为水运更省力，可以运载更多的人和装备。

不能坐船的场所他们就骑马，沿着古罗马的驿道前进，或者他们在冬日出门，可以借助滑雪和溜冰。用鲸鱼骨制作冰刀，绑在鹿皮鞋底上就成了冰鞋。雪橇可以运载病人和老弱，或者大量的装备。不管怎样说，他们讨厌步行，因为既慢又要背负沉重的行李。为什么维京人一直在旅行，有很多种说法，有人认为是天性使然，更得到公认的看法就是，他们在寻找着可耕作的土壤。北欧有这么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一家之主死后，长子继承家业，别的儿子成年后必须离开兄长，自己组建家庭。这样随着人口的增长，北欧原本不多的耕地更加不敷使用，于是维京人四海为家，寻找着好的地方开辟农场。

## 3) 维京人在西欧和罗斯公国

在公元第六和第七世纪，维京人开始在波罗的海东部沿岸作出突击，然后再安置下来。到了公元八世纪的末期，他们就从今天的俄罗斯遁河而下，展开长期的入侵，并沿途设置要塞来作防卫。在公元第九世纪时他们统治了基辅，并于 907 年以二千



艘战船和八万人的部队攻击君士坦丁堡。不过他们被拜占庭的皇帝以最优惠的贸易条件成功收买。维京人奥列格与9世纪中叶--12世纪30年代,在东欧平原上建立的以基辅为首都的早期封建国家基辅罗斯,又称古罗斯、罗斯国。当地人管新来的维京人称为“罗斯人”,意思为“精于航海的人”。这是最早的俄罗斯国家,当时它只是一个南自基辅、北到拉多加湖,西从普斯科夫、东到木罗姆的一个东欧内陆小国。

笔者在从北欧芬兰首都赫尔辛基转圣彼得堡旅游的路上,听李志杰导游讲:俄罗斯作为一个能源大国,前苏联解体后,80%的财政靠石油和天然气涨价支撑---当时油价高达约260美元一桶,后来美国制裁伊朗,油价跨到约60美元一桶,俄罗斯几乎支撑不住。是中国与俄罗斯签订长期合作,以约120美元一桶大量购买石油和天然气。

众所周知,俄罗斯在欧洲的地块并不比其它西欧国家的地盘多产石油和天然气。那么它的石油和天然气从哪里来?从东亚及西伯利亚的巨大板块来。其实在元朝灭亡到清朝兴起的17世纪前,从东亚及西伯利亚的巨大板块,还是属于中华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管辖。是“维京人”的侵略扩张,才改变了亚洲面貌。所以今天西方把“维京人”记述历史上的海盗抢劫、贩卖奴隶、侵略扩张等行为,看得有价值。

从伊凡四世起,俄罗斯开始向周边扩张领土,随着多民族帝国的形成,这种“救世”的使命感和“第三罗马”的思想,就根植俄罗斯历代统治者,成为对外扩张的理由和动员民众的口号。今日的俄自由民主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就说:“俄罗斯的确自古就负有一项历史使命……俄罗斯应当南下,到达印度洋沿岸。这不是妄想,这是俄罗斯的命运。这是地缘政治,我们的发展需要这么办”。

### A、维京人在英国苏格兰和爱尔兰

公元789年,一伙维京海盗洗劫了多赛特郡,从此英格兰就受着不断的骚扰。当地人与强盗英勇的战斗过,但更多的时候,他们缴纳赎金,让灾星快快离去。但钱不是总可以解决问题的,海盗有好几股,这个大王离去,另一个头领翩翩登场。在防守薄弱的地区,维京海盗很是猖獗。当阿尔弗雷德大帝执政威赛克斯期间,他跟主要的维京部族达成协议,允许他们定居在英格兰东北部的地区。即便如此,脆弱的和平还是时时被打破,因为每一方都想得到更多的土地。

在865年大批的丹麦军队入侵英国,并一直控制大部份的英国地区达两个世纪。在1066年之前,喀奴特是整个英国里面最后的国王之一,他同时统治了丹麦和挪威。在871年,另外一支庞大的舰队从塞纳河溯流而上攻击巴黎。他们围攻这个城市

达两年之久,最后才被巨额的现金报偿所买通,并被允许可以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之下,掠夺法国的西部地区。海盗的族群众多,意味着劫掠永远不会停止,哪怕是加涅特,挪威和丹麦的国王,征服了英格兰之后,他的领地还是常常被瑞典的海盗骚扰。不胜其害之下,这位强大的君主也不得不缴纳赎金。苏格兰离北欧很近,公元795年奥克尼群岛被维京人占领,然后是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海岸线为海盗所控制。他们在这里建立了与挪威的贸易路线,并且以此为落脚点,向更西部发展。

苏格兰是挪威人的天下,相安无事。爱尔兰复杂很多,挪威人、丹麦人还有爱尔兰海盗都不是好相处的角色,于是常常爆发大规模械斗。直到公元902年,挪威人才暂时离开爱尔兰,之所以说暂时,是因为他们于公元917年就卷土重来,占领了都柏林作为贸易港湾。1100年都柏林才被诺曼人接管。但是众所周知,诺曼人正是丹麦海盗在法兰西留下的后裔。

### B、维京人在法国及诺曼底公国

公元911年法国的国王让诺曼底的维京首领成为公爵,以换取他们皈依基督教和停止入侵。他们还建立殖民作为继续突击的基地。在法国西北方的维京人的殖民地,即一般所知道的诺曼底,在那里居住的人就被称为诺曼人。法国国王查理先是老实交付了赎金,后来又学着英国人的做法,把最大的海盗头子罗勒封作诺曼底的大公---这位老兄是征服者威廉一世的曾曾曾祖父,他的后裔在1066年终于成为英格兰的国王,即早期北欧挪威、瑞典、丹麦和俄罗斯的“维京人”,是学习更早期的后来叫英国、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等地区的“维京人”发展的。自从诺曼底的公国成立后,就不断出现“卓越的战士”,包括在1066年征服英国的威廉一世、在1060年和1091年之间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取西西里的罗伯吉士卡特和他的家族,和由十字军战士所建立的耶路撒冷王国的国王鲍特温一世。

1066年征服者威廉一世,带着诺曼底士兵踏上英格兰,他的暴戾连海盗都望而生畏。北海固然是满目疮痍,维京人越过直布罗陀,在地中海沿岸继续肆虐。与强大的对手做生意,面对弱者就成了盗贼。这些不法之徒甚至打劫修道院,因为修道院中总有大量储藏的食物与财宝,僧侣又不动手反抗。沿着欧洲海岸线前进的维京海盗成了整个欧洲的噩梦。公元844年西班牙的阿拉伯军队在康多巴组织了一次成功的反登陆,伊比利亚半岛从此风平浪静,只有和气的维京商人来交易葡萄酒和奴隶。

### C、维京人在冰岛

挪威维京人离开家一直往西远航,寻找新的家园。公元860年他们来到冰岛,原先住在这里的僧侣在一片恐慌下纷纷出逃。公元920年他们来到格

陵兰开始定居，但那里的气候一年比一年寒冷，不能种植庄稼，终于1500年全部的维京人离开了这块冰冻的岛屿。

#### D、维京人在美洲

维京人寻找北欧人到过美洲大陆，有证据称，1969年在丹麦的一个海盗墓中，找到了一枚石制的箭头，后经测试证实确为美洲的产物，海盗们确实到过北美洲——人们常认为哥伦布是第一位发现新大陆的旧世界人，但维京人莱夫·埃里克松早在哥伦布登陆美洲的五百多年前发现了新大陆的存在。据说他们是在到达了格陵兰之后，再向西行，到达今天之加拿大。他们在那里发现了许多有用之物资，包括木材、葡萄、毛皮等的东西。不过他们在美洲大陆待了大约十年之久，就离开了这个物产丰盛的大陆了。原因是他们在美洲大陆生活了不久，就遇上了印第安人。好勇斗狠的维京人与他们发生流血冲突，因此导致他们的报复，而这个比维京人更早到达美洲大陆的民族，最终也成功把维京人赶出这片丰饶的土地。再次入侵美洲大陆的，就是五百多年之后，带着旧世界的枪炮刀剑及农耕技术而来的其他欧洲人。

### 3、文扬教授对“天下人”原理的阐述

“观察者”网连载文扬教授的《“70年对话5000年”之中华早期文明》，对“天下人”中华民族的社会历史人文地理演变原理的阐述，很有独到之处。例如，他说：在空间上，全新世气候到来之后，文明在地球表面不同地区先后出现。由于不同地区的人类社会面临不同的气候变迁、地质变迁和动植物变迁，文明的演化在不同的地理区域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历史过程。如黑格尔所说的，各民族历史都有自己的“地理基础”，或杜兰特所说的“地理是历史的子宫”。

#### 1) “天下”是个政治概念，也是一个科学概念

文扬教授说：不同文明虽然被理解成为与不同种族、不同民族或不同文化紧密相关的一个概念，与不同文化的盛衰兴亡保持同步，相互之间有了对照和比较的意义。但文明与文化不同，与政治的昌明关系更大。其次，虽然一般来说文明本质上是文化实体而不是政治实体，而且一个文明可能包含多个政治单位，但对于中华文明这个“天下”型定居文明来说，文明和政治实体几乎是重合的、一体的。正如某些西方学者所说，中国“自命是一个国家的文明”，中国“是一个伪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华文明作为最为持久、最成规模的定居农耕文明，始终离不开一个能够履行维持秩序、制定法律、确立制度、征缴税收、进行战争、谈判条约等职能的政治实体。

在很大程度上，中华文明就是靠中华政治传统支撑的，中华政治传统所致力于解决的基本问题，

也正是中华文明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两者密不可分。今天的学者们在说到他者文明或异质文明时，往往缺省地联系到西方文明，自西学东渐、西力东击之后，关于中西文明互为他者、互为镜像的文章著作就多如牛毛，不胜枚举。但实际上，在中华文明5000多年历史上，西方文明进入视野不过是近几百年的事，而在绝大部分的历史时间内，中华文明长期以来面对的他者文明，是欧亚大陆干旱带上的草原文明。所以，要讨论中原定居农耕社会，必须同时讨论与之相对的草原骑马民族社会。

但这里文明也还包含有“科学”区分，这是“政治”背景的学者不愿意说或含糊解读的——事情不简单，现代人类历史开始于20万年前智人的出现，而农业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大约1万年前，这就意味着人类历史95%的时间并不从事农业，而是从事狩猎采集，人类过上依靠驯化动植物维持生计的农业生活，也是最近5%的历史里才发生的事。好比一个活了100岁的人，95岁之前从来没有固定的住所，最近5年才相对稳定下来，不再四处迁徙了。而95岁之前的他，还经历过两次漫长的冰川期。第一次从大约他不满1岁的时候开始，一直持续到他不不到40岁的那年。但刚刚才暖和了几年，第二次冰川期又来了，从他45岁那年开始，一直持续到92岁半。这也就意味着，可怜的他在95年四处流浪狩猎采集生活中大约90%左右的时间，还是在严酷的冰川环境中度过的。

需要记住的是，95年来各种环境通过压力和刺激所引起的所有基因突变，都在他今天100岁的身体里。相比之下，那些自由自在地四处迁徙、杀气腾腾地围捕大型猎物、所到之处天当被地当床万物皆备于我的狩猎采集者，不是与此前95%生命历史里的演化逻辑更为一致吗——1215年的亚洲大陆，蒙古人的成吉思汗帝国之外，中国北方是通古斯女真人建立的金朝，中国南方是中原汉人退守南方后以杭州为都城建立的南宋；西北部的甘肃和鄂尔多斯是西夏国的领地；塔里木河西北居住着回鹘人；楚河一带由喀喇契丹帝国统治；整个伊朗由花刺子模的苏丹统治；塞尔柱苏丹们则瓜分了亚洲剩下的地区。

虽然此时距离1万多年前最早的定居社会出现已经很久了，距离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起源时期也已经过去几千年了，但实际上，13世纪的这几个社会，仍然各自保持在从文明初期就开始分岔的演化轨道上。南宋之时，程朱理学正盛。二程说：“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大纲不正，万目即紊”。“名分正则天下定”。朱熹说：“纲常千万年磨灭不得，只是盛衰消长之势，自不可已，盛了又衰，衰了又盛，其势如此”。二程和朱熹都没看到南宋灭亡。但即使是北宋，在当

时也是个收缩的、偏安的“小天下”。南宋时更是退到了淮河，连华夏族发祥地中原都丢了，“登临莫向高台望，烟树中原正渺茫”，与秦汉和隋唐时期的“大天下”早已不可相提并论了。

设身处地为其时的士大夫们想想，家国天下破碎如此，大纲名分紊乱如此，还在继续坚持“天下之定理”、“纲常千万年”毫不动摇，真是不容易。这说明了什么？至少说明了两点：一、中华政治中的正统性观念，与定居文明的本质极为相符，根本不能动摇；二、中华文明中人，对于自身文明的信仰极其坚定，根本不会动摇。什么是正统？欧阳修说，“王者，所以一民而临天下”。意思是：天下是地缘概念，不是血缘概念，民是天下人的概念，不是某一族的概念。

所以，王者是华夏人还是蛮夷戎狄，并不重要，王者是正还是篡，也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能够“合天下于一”。尧舜夏商周秦汉唐，属于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这固然好；可是如晋、隋，王者不得其正，但乱世里奋力而起，有功有德，最终也合天下于一，所以也是正统。70年对话5000年，今天回顾地看，中国历史上“王者不得其正”的情况很多。不正，名分不正、上位手段不正、种族不正、包括阶级不正，都算。但是在中国社会，这些不正而王的情况都能接受。因为中华政治传统中有“民贵君轻”和“天下为公”的思想，“合天下于一”才是终极目的，“一”就是“公”，就是“同”。而天下不是别的，就是万民，与天地合为一体的万民。而与一块土地建立起家园关系的定居，则意味着无论自然界所赋予的植物生长季多长多短，定居者都要通过耕种和养殖，将土地上的生长改造成能够符合自身的生活需要。这在当时算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既然定居在了这里，就再也不离开了；既然转变成了农民，就再也不回头了。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从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就开始了一场席卷全部家园土地的农业革命。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从各民族普遍的图腾崇拜，很快转向了地理方面的山形祭祀、山镇祭祀、封禅行典、五岳行典，直到中华民族独有的岳镇海渚祭祀。而“天下”这个中华文明最为核心的观念之一，正是从“五岳四镇”、“四海四渚”、“大小九州”等这些地理观念中自然而然浮现了出来。这也正是中国定居农耕社会“家--国--天下”三层结构的由来，没有大规模的定居和农耕，不太可能建立起从家国到天下的固定联系。为什么中国人最早完成了从神意政治向天意政治的转变？而天的观念也从“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的人格神转变成了“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的抽象物？归根结底，也是因为定居农耕生产与生活与家园土地这个地理环境之间形成了固定联系所导致的。

概言之，定居农耕生产生活方式不变，天也就不变；天不变，道亦不变；道不变，纲常千万年——这里文扬教授用“天不变，道亦不变”，解读就是为什么程朱理学即使在南宋“小天下”、“小朝廷”之下，仍讲得那么“理直气壮，理所当然”就有缺憾：因为它还有一层科学解读的是：“天变了还是天，地震了还是地”，才是“道亦不变”的双赢意思——“地震”过后，地上还是需要勤劳才能致富——天变黑了，第二天还是天，爱国爱家，“天下为公”的思想，“合天下于一”才是终极目的，其“道”是不能变的，没有“颜色革命”之说。

## 2) “天下道”的胜利——中华蒙古族入侵欧洲失败

“天变了还是天”的“道不变”更科学精明的话对不对？事情是中原定居农耕社会几千年了，而中华的蒙古族，是公元9世纪才似有似无从那个被称为“蒙古地方”的位置出现——与“天下人”城市的不可比性，如陶寺遗址考古发现的尧都，绝对年代主体为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900年之间，面积达300万平方米以上。所发现的宫城东西长约470米，南北宽约270米，面积近13万平方米。墓地面积在3万平方米以上。年代更早的良渚古城面积290万平方米，如果包括外城，面积竟达到800万平方米。

而当时的中华的蒙古族人，一个真正的城市也没建设过。其他如典章文物、礼器乐器、文学艺术、饮食服饰……所有代表文明程度的东西，更是不能比——他们是仿效代表欧洲“维京人”，游动社会新一代的“缩影”——此起彼伏、到处出现的“游动社会”，从未在文明历史中缺席。与定居农耕社会在演化路径上分道扬镳之后，游动社会通过诞生出骑马民族，最终又以更加强势的介入，回到了文明演化的主流中来。定居农耕社会中出现了城市，这是文明演化中的一个突变。按说这个突变，可以将游动社会远远甩在后面。但是上帝没那么仁慈。与定居社会中城市的出现相对应的，是游动社会对马的驯化——与城市代表的演化方向正好相反的一个突变。考古学家发现大量马匹的遗骸，在俄罗斯南部草原地带公元前4200--前3700年的德瑞夫卡遗址，这说明马匹的驯养并且用于坐骑大约在公元前5到前4千纪，时间在车轮发明之前。在哈萨克斯坦北部，在公元前4到前3千纪的一个村落里所挖掘出的所有的动物遗骸中，有99%属于马的遗骸，这表明那儿的人们曾专门进行马的培育。

第一个成功驯化了马匹的部落到底是哪一个？这已经没办法考证，但回顾地看，这个部落却位列于最早打开人类历史潘多拉魔盒的人群之一。可以说游动社会的农业发展，到了马的驯化和使用这个阶段，不仅与自己过去徒步进行狩猎采集的历

史拉开了距离，而且反过来形成了相对于定居农耕社会的竞争优势。在整个欧亚大草原，对马匹的驯化，让这一地区从东部到西部成为了一个覆盖面积巨大的文化整体，考古学家在相距遥远的不同地区发现了具有惊人相似性的文化遗存。他们有些是定居农耕部落，有些是狩猎采集部落，有些则是赶着牧群、依照季节的变化作定期巡回流动的早期游牧部落。

但是自从实现了对马的驯化之后，出现了一种文化统一的趋势，过去是哪一种生活方式变得不重要了，马、大草原、弓弩和金属刀剑共同造就出来一种新型人类---具有高度机动性的、好战的“骑马民族”---文扬教授的这种区分也存在科学遗憾：中华蒙古族并不是真正像欧洲同时期的“维京人”，而含有学习效仿的成分多。就像很多历史书说，中华文明起源于农耕文明，欧洲文明起源于海洋文明一样。因为世界第三极青藏高原才是“天下人”与维京人分水岭的原理。

因为在到了青铜器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早期，被考古学家们统称为“斯基泰-西伯利亚民族”的新型人类，在中欧亚地区的势力急剧膨胀，四处出击。亚述人和希腊人的古代文献记录了这些四处游动的蛮族部落，并分别命名为“辛梅里安人”、“斯基泰人”、“塞种人”日久天长，一个离开了马的草原人等于废人，而一旦坐到了马背上，废人就变身成了超人。“骑马民族”相对于所有徒步的民族---特别是“天下人”在战争中的优势，一直持续到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坦克车和卡车的出现才宣告结束。历史上先后出现的那些大的征服，如喜克索斯人对地中海世界的征服、匈人对欧洲的征服、欧洲人对北美洲大陆的征服，无不是建立在马上战士相对于徒步战士的战斗优势基础之上的。之所以在13世纪的蒙古族是历史上所有“骑马民族”中最伟大的征服者，正是仿效代表欧洲“维京人”游动社会新一代的“缩影”---如果联想到不仅是草原上骑马民族的游动社会，同时还有森林里游猎民族的游动社会，还有游商民族的游动社会、游盗民族的海行游动社会，那么定居农耕社会本身的文明和政治传统就应该从独特性上来考察，而不是从“维京人”的人种普世性上来考察。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超级智能脑，是全人类之间一个统一的“外围脑”。70年对话5000年，为什么中国政治传统追求“大一统”，追求“天下为公”，追求“小康”和“大同”，而不特别强调“自由”、“权利”和“个体主义”，就因“外围脑”的人类文明起源，存在有相对非洲的第二个孵抱期，以致出现在远古联合国的巴蜀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合一的时期---从而归根结底，也是“天下”型定居文明独特性出现的使然---通过对定居农耕社会与骑

马游动社会之间的文明对比，可以更深刻地解释中华文明和中华政治传统的独特性。能解答李进省长说的嫫祖诞生地除绵阳市盐亭县外，国内其它省市也还有争议的难题。所以处在“天下人”与维京人分水岭这个二元论的对比中，今天的中国实在不必要单纯纠缠这个难题，这仅是今天中国的旅游热中出现的必然---从文明是多彩的，文明因互鉴而发展的，而不唯中原文明与草原文明数千年互动历史的描述方法，能展开更多的关于中华文明和中华政治传统与未来的科商解读。

说中华蒙古族入侵欧洲失败是“天下道”、“天下人”的胜利---因为中华蒙古族多少还是含有“天下人”的基因，而且他们入侵欧洲时，也使用了一些“汉人”。蒙古人效仿“维京人”的入侵者行为，使“天下人”的追求“天下为公”，追求“小康”和“大同”这类“基因”，处在矛盾和变味中，失败是必然的。蒙古族属于第二个孵抱期的远古联合国的巴蜀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合一时期的上层人物中之一带领的人群，盆塞海干涸后，只因比下层人群“汗族-汉族”这大支向北迁移走得更远。发展到1215年，中华蒙古族走出成吉思汗，他的蒙古大军才攻克了当时金朝的中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

此前，中华蒙古族人已经接受了金朝女真人的臣服和纳贡，但最终他们还是在劫掠了所有的财物之后，彻底毁灭了这个城市。虽然成吉思汗日后的继任者们，逐步懂得了如何统治和管理中原的定居社会和城市，而在当时，蒙古人对于这些繁华的城市却完全不知所措。同一年，蒙古大将木华黎短短一个秋天，即在金国土地上“取城邑凡八百六十有二”，但最后或者屠城，或者丢弃，总之是不要。

蒙古人效仿“维京人”使自己没有城市，最多仿照城市模样将毡帐围成一个圆形。但是他们在定居民族土地上攻城拔寨的速度奇快：每次进攻一个城市，蒙古人会首先清除四周所有的乡村，一方面用这些做了俘虏的当地农民做攻城的前锋，一方面通过断绝城市的供给线困死城中居民。既然城市和周围四域的农村对于蒙古人都是不可理解的，也是不需要的，那么连同建筑物和人口一起消失掉，变成平地或牧场，就是最好的结果。城市就是文明的象征，文明通过城市朝向复杂性增加和能量流、信息流聚集的方向演化---蒙古人效仿“维京人”的屠城和烧城，毫无疑问也被解释为野蛮毁灭文明，是文明的反面。

蒙古人按照其非中原式的统治模式，将投诚的汉族将领，封为万户。这个政策也被后来的窝阔台、蒙哥两任大汗所继承，并一直延续到了忽必烈成为大汗的前期。这些万户的起源，更早时候可以追述到北宋的地方民兵以及辽国南部的汉军部队。所以在接触蒙古人之前，他们就是有一定组织和军事训

练的。蒙古人在前几代统治者时期，给予他们的优厚条件，也是他们选择投诚的重要原因。万户门几乎就是地区内的独立统治者，权力比很多西欧封建制度下的骑士领主还要大。除了基本不用交税之外，地区内的军政大权都是自己一把抓。军事、民事、法律都自己来，甚至有自己发行货币的权力。

而且他们死后，位置与权力都可以直接传给后代或任何指定继承人。这些汉族将领的军队，基本上也是蒙古人征战中原地区的步兵主力。他们的加入，让蒙古军队有了攻克大城市的能力。这也让金国和南宋的坚守城池战略，逐步失效。甚至于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在蒙古地区交战时候，也出兵北上，帮助忽必烈获得胜利。但历史演变的事实是，虽然蒙古军队 1125 年灭契丹族的辽朝政权，次年灭北宋，与南宋对峙于秦岭淮河一线，1234 年在蒙古和南宋的联合进攻下灭亡，但蒙古灭亡南宋建立的整个元朝，后被明朝推翻。17 世纪女真族在东北地区再度兴起。1616 年努尔哈齐建立“后金”政权，1635 年其子皇太极改女真为满洲，次年改“后金”为“清”，1644 年入主北京，渐次统一中国，直至 1911 年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所推翻。

### 3) 今日明白背离“天下道”的中华蒙古族胜利预示是失败

成吉思汗铁木真兴起以后，中华蒙古族崛起发动西征，灭花刺子模，扫荡广阔的欧亚草原，征服了中亚细亚地区。成吉思汗死后，窝阔台即位为蒙古大汗，是为元太宗。1234 年蒙古与南宋联军灭金国。

1235 年窝阔台召集蒙古诸王部落大会，决定由拔哥继承成吉思汗遗志，发动蒙古人的第二次西征，征讨钦察、斡罗思等国。命各支宗室均以长子统率出征军，万户以下各级那颜也派长子率军从征。以拔都为诸王之长，以速不台为主帅，领衔统率各系宗王居长者出征，因此这次远征又称为“长子西征”。

1236 年秋灭不里阿耳。1237 年春拔都灭钦察汗，进兵斡罗思，攻取也烈赞（梁赞）城。1238 年初蒙古军连破科罗木纳、莫斯科、罗斯托夫等十余城。二月，攻进斡罗斯公国首府弗拉基米尔城，斡罗思大公战死。蒙古军兵锋南指，所向无敌，抄掠了斯摩棱斯克、契尔尼果夫等地。并继续略取钦察（乌克兰）草原西部地。钦察余部逃入马札儿（今匈牙利）。拔都率军经略亦的勒河以东诸地，并在钦察草原休养士马。1239 年蒙古军灭高加索山北麓之阿速国，拔都控制了黑海北岸的海滨土地后，许多突厥系人民归顺于他，并被编入蒙古军队。拔都再次进入斡罗思，遣使至基辅罗斯首府乞瓦（基辅）城谕降。但被拒绝，使节被杀。秋，拔都亲统大军围攻乞瓦，蒙古军攻入城内，纵兵杀掠。1241 年春蒙古军分兵二路，一路由拜答儿·兀良合台等率领侵

入孛烈儿——即波兰。

一路由拔都兄弟、速不台等率领侵入马札儿。蒙古军在列格尼卡战役击败孛烈儿军队，攻入克拉科夫，将其烧毁，然后乘筏渡过奥得河。神圣罗马帝国的昔烈西亚（西里西亚）大公爵亨利二世集结孛烈儿（波兰）军、日耳曼圣殿骑士（十字军）与条顿骑士团（捏迷思，日耳曼）3 万人，迎战蒙古军，激战于里格尼茨。蒙古军避其锋芒，侧面袭击击败联军，杀死了亨利二世。继而南下攻入莫刺维亚，前往马札儿与拔都军会合。拔都率军分三路侵入马札儿。同年三月蒙古军进逼匈牙利都城佩斯（今布达佩斯，《元史》所记之马茶城）。1241 年 4 月 11 日蒙古军与匈牙利军队在赛育河右岸与蒂萨河汇流处展开战斗，别拉四世亲自督军迎战，但匈牙利军一战而溃。别拉四世单身逃脱，乌克兰大主教战死，匈牙利士兵生还者无几，积尸绵延两日路程，赛育河水染成了红色。

蒙古军取得了赛育河歼灭战胜利后，攻破佩斯城和布达城，纵火焚烧，屠戮居民。拔都命合丹穷追别拉四世的残部，别拉四世逃往奥地利。他致书罗马教皇格利高里九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菲特烈二世求援，均被回绝。1241 年 12 月别拉四世逃到亚德里亚海上的小岛上。合丹军在亚德里亚海东岸相继攻取多座城镇，于 1242 年 3 月取道塞尔维亚与拔都军会合。1241 年夏秋西征军各路兵马驻营于多瑙河畔，休整兵马，分兵四处劫掠。1241 年冬季多瑙河结冰后，拔都分军两部渡多瑙河向西扫荡。冬，拔都大军渡过秃纳河（多瑙河），攻陷格兰城。1242 年初遣诸王合丹率军追击马札儿王别刺四世（匈牙利王贝拉四世），中路的蒙古军抵达维也纳城郊的诺伊施塔特城。至此蒙古西征军完成了对匈牙利全境的占领，南路蒙古军向南进军意大利，进逼威尼斯共和国的达尔马提亚。

俄罗斯乌克兰成为蒙古帝国的属地——1241 年冬 12 月成吉思汗继承人、元太宗窝阔台在蒙古本土去世。1242 年 4 月窝阔台汗去世的消息传到西征前线，拔都下令全军东返，为时 7 年的蒙古军长子西征至此终结。拔都带领窝阔台汗的子侄率军徐徐东行，于 1243 年初抵达伏尔加河下游东岸，在此修建了钦察汗国都城萨莱城。拔都东归，至此蒙古军队的西进方告结束。拔都立萨莱城（今俄罗斯阿斯特拉罕）为国都，统有东起也儿的石河，西至斡罗思的辽阔地域，史称钦察汗国（因以原钦察部地为中心而得名），也称为金帐汗国。里格尼茨之战使欧洲诸国十分震惊，感受到蒙古入侵的严重威胁。

从 1236-1241 年的五年征战，拔都率军征服欧亚草原的突厥钦察人，征服伏尔加流域的保加利亚、基辅罗斯、加里西亚、摩尔达维亚、立陶宛大公国、波兰王国（“孛烈儿”）、匈牙利王国、保加

利亚第二帝国、波西米亚与捷克、摩拉维亚与斯洛伐克、拉什卡、奥地利、威尼斯共和国等国。蒙古军席卷东欧与中欧，击败神圣罗马帝国联军，使基辅、布达佩斯等三十个城镇遭受摧毁与屠杀。1242年拔都建都于伏尔加河下游河畔的钦察的萨莱，正式立国，史称金帐汗国。

此后三百年，几乎大部分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成为隶属于蒙古帝国麾下金帐汗国的属地---当时蒙古帝国的中心就是中国上的元朝，它版图比前苏联+今日的中国还要大，也遇到前苏联类似的消化不良---以上中华蒙古族攻占欧洲的胜利，背离“天下道”，在元末朱元璋等农民起义，推翻元朝建立明朝后，没有继承中华蒙古族仿效“维京人”的作法，蒙古族攻占欧洲的部分失去了后方的物质和精神支援，自然被瓦解---今日明白，以前胜利预示的是失败而已。

#### 4) 丝绸之路历史的回光返照

这种预示是据《元史》密昔儿---埃及在元世祖忽必烈时代，曾经被蒙古西部汗、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和其麾下的汉军将领郭侃所征服，成为蒙元帝国在西亚的西土。综合元代史料：郭侃（1217年—1277年），汉族，字仲和，华州郑县（今陕西省华县）人，乃蒙古帝国大将。出身世代军门，其祖父郭宝玉，父亲郭德海，皆为成吉思汗麾下汉人名将。公元1252年郭侃率领汉军火炮兵跟随蒙古汗王旭烈兀远征西亚。郭侃在西亚屡破阿拉伯军，攻克百二十余城。

其军队足迹远至麦加、埃及以及叙利亚。1258年郭侃军攻克阿拉伯帝国哈里发的京城---巴格达（“报答国”）。郭侃于底格里斯河畔接受了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投降”。立国达509年之久的阿拉伯阿拔斯王朝至此倾覆。郭侃武威为其征服之地的人所畏惧，对手惊呼其为“东天将军，神人也”。旭烈兀在波斯创立了伊利汗国。在13至14世纪，波斯伊利汗国作为蒙元帝国的西部汗国，统治着西亚、东南亚从尼罗河、阿姆河到印度洋，从幼发拉底河到信德（今巴基斯坦）及小亚细亚（今土耳其）和高加索的广大地域。13世纪在1204年中国的元朝时期，威尼斯人领导的第四次十字军以小击大摧毁了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15世纪后奥斯曼伊斯兰帝国兴起，控制丝绸之路，欧洲维京人的金融资本，由意大利半岛向西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不列颠和法兰西转移，威尼斯金融业就逐渐衰落。

1797年威尼斯共和国被拿破仑灭亡，成为奥地利帝国的一部分。19世纪后威尼斯并入意大利国家。其实从18世纪末期开始，俄国和西欧的考古学家开始对欧亚大草原进行考古挖掘，欧亚大草原西起欧洲的多瑙河流域，东至中国的大兴安岭地区，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草原。这片广袤的草原曾孕育

出许多骁勇善战的游牧民族，匈奴人、回鹘人、突厥人和蒙古人都曾在这里留下过自己的足迹。此外，由于伊斯兰教的作用，原本当时波斯地区佛教已基本消失，但在旭烈兀统治时代，由于他本人信奉藏传佛教，独崇拜弥勒佛，当地出现了大量喇嘛，佛教活动在伊朗再次出现。

从1262年开始，欧洲教皇与旭烈兀数次派遣使者来往。小亚细亚的十字军欲与蒙古结盟共同征服耶路撒冷。在旭烈兀写给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的信中，他表示愿意攻下耶路撒冷作为赠送给教皇的礼物，可是由于各种原因，旭烈兀和他的继任者们最终没能与欧洲建立任何真正的联盟。希腊罗马与日耳曼人没有文明联系。宣称现代西方文明即日耳曼文明、盎格鲁撒克逊文明，是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继承者。但是，在古代的希腊罗马人眼中，却似乎并非如此。希腊罗马人把日耳曼人、白种人看做野蛮人---蛮族。蛮族，即野蛮人。

希腊罗马人认为，这些鸟语民族是野蛮的或者不开化的，因此他们属于野蛮人即蛮族---在他们眼中，西徐亚人（即匈人、匈奴人）、高卢人、日耳曼人、阿勒曼尼人以及西亚人、非洲人，都属于野蛮人，蛮族。地中海民族也不是纯白色人种，他们看来自北欧森林地区的日耳曼白种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如同野蛮人。金帐汗国是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次子、成吉思汗的孙子、西征统帅拔都所建，疆域极其辽阔，比元朝的地域广大得多。东起额尔齐斯河，西至今匈牙利、波兰一带，都城萨莱在今俄罗斯阿斯特拉罕以北。

由于拔都宫殿模仿蒙古包“大帐”而使用金顶，因此在欧洲史书中这个汗国被称作“金帐汗国”。金帐汗国是当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和商业贸易中心。金帐汗国统治长期保持了相对稳定。而在隶属于金术赤兀鲁思帐汗国体制下的罗斯人（及斯拉夫人）的各公国，出现了一位新的“大王”，即伊凡四世。伊凡以莫斯科大公国为核心，逐渐发展成一个新的强大的国家俄罗斯。而与之同步发生的，是金帐汗国中央权力日渐下降，开始分裂为喀山汗国、克里米亚汗国、西伯利亚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大帐汗国等区域性的蒙古汗国。原来政治核心为蒙古人和突厥人为主的金帐汗的大帐汗国，被为附庸国的北欧白种人和中欧斯拉夫人的俄罗斯从大帐汗国中独立出来，最终灭亡了蒙古--突厥人的大帐汗国。但这种灭亡反过来的侵略、占领的胜利，背离“天下道”，不管过多少世纪，不管什么旗号，预示也是失败。

#### 4、何新教授谈希腊文明伪造与《盘古王表》求真

研究维京人与“天下人”世界比拼，遇到西方无信史等质疑---北京学者何新教授不但接连在2013年出版《希腊伪史考》和2015年出版《希腊

伪史续考》等书外，近一年多何新教授还在“新浪网”“何新老家伙的博客”等互联网站，发表有《古希腊是个啥？》、《聊聊希罗多德伪史中的胡说八道》、《笑谈西方历史的谎言之父希罗多德》、《何新：古希腊殖民地也是欺世神话》、《亚历山大港和图书馆不可能存在》、《何新：虚构出来的荷马及其史诗》、《西方无信史》、《何新：正本清源---键陀罗艺术与希腊》、《为什么《圣经》中没有提到过希腊人》、《西方古代历史的系统大规模伪造》、《何新对希腊文明问题的质疑》、《何新：关于荷马史诗问题》、《何新：谈谈荷马史诗》、《何新对希腊文明问题的质疑》、《一问一答，关于希腊以及苏格拉底》、《何新：古代的希腊半岛没有形成过国》等数十篇文章。这是一件好事，它不但为人类五大古文明起源的统一性提供了新的视角，而且把维京人学者存在“伪造”，和“天下人”学者存在的“去真”，也推向统一，获得了《盘古王表》求真的态势。

人类自然起源本来是一元的。人类文明分区和形成国家呈现多元，也是一种自然，但未来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大同世界全球化，也是一种必然趋势---追求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并不代表主张自己所控制的范围也绝对搞多边主义，在“智商”和“情商”等平衡、求衡中，16世纪出现“科商”的再平衡、求衡的比较、选择和去伪求真---人类的一元化，允许多边主义和单边主义去实践，证明其真。

## 1) 古希腊历史的伪造---何新谈维京人伪造历史

### A、何新教授指证古希腊文明各项伪造简说

#### a、何新质疑亚历山大帝国和亚历山大大王

何新教授以中国藏学出版社 2013 年出版 [法]F·B·于格、E·于格的《海市蜃楼中的帝国-丝绸之路的人神与神话》等书为据说：那个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被尊为伟大传奇的亚历山大，以及横跨欧亚从地中海直到印度洋的亚历山大帝国等，一些煞有介事的说法，其实都只不过是文艺复兴运动以后不断地被完形塑造的一个虚拟人物和欺人之谈而已。历史上根本从未存在过一个横跨欧亚两洲，从希腊半岛一直征服到印度恒河流域的神话亚历山大帝国---那只是一个出自文艺复兴时代文学想象的伪历史的神话故事而已---目前流行的这一切说法统统是近代西方史学制造的欺世谎言。

亚历山大征服故事和所谓“亚历山大帝国”，完全是文艺复兴以后近代欧洲人根据一些神话传说虚构的伪史。如公元前 3--4 世纪（中国春秋时代后期）的亚历山大帝国、关于亚历山大---马其顿王国，事实上找不到任何一部可信的原始史料。关于亚历山大的历史资料，据说最初是来自曾随他远征的一些目击者的记录。其中最著名的一位记述者，是据说

曾作为亚历山大远征军随军史官的卡利斯西内斯。这位人物据说还是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亲戚，他曾经记录下有关亚历山大远征军的资料。注意，当时没有纸张，不知道此人随军是如何记录一切的。但是这个人的记录，却并没有完整地流传下来。于是后来有作家利用另外一些目击者的叙述，这后一群体（“二手资料”作者）的史料，则成为了研究亚历山大历史的基础。在诸如此类完全不可靠的传说的基础上，西方主流史学竟然构筑起整个公元 4 世纪以后的亚洲“希腊化”历史故事：包括腓力二世---亚历山大大帝的亚洲征服史，包括腓力时代发明并向希腊地区推广雅典式样的希腊语言及文字，而后亚历山大把这种语言文字推广到小亚细亚和南亚的全部伪史。

亚历山大被西方史家捧为战无不胜的天才，征服欧亚大陆建立了一个世界帝国的传奇英雄。但是真实身份可能来自波斯或者阿拉伯的民间传说，他的诸多传奇，仅仅是出于臆造的一系列伪史骗局---亚历山大三世---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 356 年--前 323 年），据说是巴尔干半岛马其顿王国的国王，出生于首都佩拉城，幼年时由著名的哲学圣人亚里士多德为其导师，从学到 16 岁。18 岁亚历山大随父出征希腊，20 岁继承马其顿王位。亚历山大的远征使得古希腊文明向小亚细亚和亚洲地区得到了广泛传播，由此开启了把欧洲文明带到亚洲和中国的“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帝国乃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帝国之一，其疆域从地中海一直延伸到喜马拉雅山脉。亚历山大一生征战，以少胜多，曾经用 3 万步兵击败波斯的百万大军，一生从来没有打过败仗，因此被认为是历史上唯一的战无不胜的军事统帅。

据说亚历山大大帝在亚洲建起数 10 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最著名的就是埃及的亚历山大港。亚历山大将西方文化一直向东传播，导致亚洲文明希腊化时代的到来。亚历山大的原型是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阿喀琉斯，最终亚历山大也成为了一个神话中的人物。

亚历山大最早是流传于亚洲的波斯和阿拉伯人民间传说中的一个传奇人物。他的最早传说，可能出自于波斯的口头民间文学“列王记”。有人曾经收集到关于亚历山大大帝传说的各种不同民间版本接近百种之多，而欧洲的亚历山大传说，是在波斯--阿拉伯的亚历山大传说故事之后出现的。关于亚历山大的神奇传说，起初欧洲人并不相信。17 世纪之后欧洲人开始系统编造“古希腊”伪史，19 世纪德国学者提出所谓亚洲的“希腊化时代”概念之后，欧洲人才逐步把“亚历山大大帝”的各种神话传说改编成欧洲征服亚洲的“真实历史”。

通过阿拉伯流传到欧洲，亚历山大被伪造为欧

洲人的世界征服者，很晚才从阿拉伯地区流传到基督教欧洲。有书说：“亚历山大远征史是一部由最优秀作家们写成的历史，但也是一部在港口和沙漠骆驼队客栈讲述的故事集……从11世纪起，有关亚历山大东征史的通俗语言译本日益增多，那些信徒撰写的著作也都彼此之间互相交错和互相借鉴，但它们全部都取得了一种巨大成功”。

#### b、何新质疑所谓的“古希腊哲学”，

何新教授说：被称为古希腊哲学鼻祖的那些著名哲人中，几乎没有真正的希腊人，而族源却接近是苏美尔、埃及、闪族以及巴比伦人等亚裔或古波斯人种。所谓的“古希腊哲学”作为整体根本不存在——一是违背人类发展系统逻辑：若古希腊是存在的，整个西方社会发展史将是一个逆向发展史：从科技、哲学、制度高度发展的“古希腊”，到与野兽搏斗、全民淫乱的“古罗马”，再到全民皆兵到全世界打劫的“十字军”——若“古希腊”、“古罗马”是真实的，西方的社会发展史无疑是一个逆向发展过程。这样的过程不符合人类社会、智商发展的基本逻辑。二是违背信息载体逻辑：古希腊时期，古希腊语形成只有约100-200年左右；作为信息编码必须有一个信息编码与事物结构、过程、参数一一对应过程，有信息层级总结、归纳，概念形成、进阶抽象、抽象信息编码形成对应等系列过程。科技理论中的信息多数为进阶总结性、进阶抽象性信息编码。希腊语的形成时间过短，难以建立实现这样的信息编码体系。而初级语言只能描述简单信息。何新谈，我青年时期读顾准的《希腊城邦制度》谈到希腊民主的起源，以为是理想化的政治文明之楷模。

早年读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黑格尔说：希腊令欧洲人有回归家园之感，深受感染。黑格尔讲希腊哲学，不仅生动而且深刻，曾经成为引导我理解哲学为何物的启蒙读物。早年读《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以及伯利克里的“阵亡战士纪念演说”，深感震撼。所以我早年极其崇拜希腊文明，惊叹雅典城邦作为一蕞尔小邦，其思辨及文化，何以如此深刻、卓越、灿烂。但是中年以后系统研究世界史，乃逐渐发现，西方所述之希腊、罗马以及印度历史，令人愈读愈感到糊涂，不仅文献来源含糊不明，而且所谓考古文物多有后人伪造之痕迹。关于希腊问题，历史上根本不存在一个雅典为中心的希腊古文明。历史中从来不存在一个以雅典为中心（都城）的希腊国。希腊哲学起源和繁盛于地中海东岸的小亚细亚地区。所谓“希腊”的历史，主要是小亚细亚地区的传说和历史。著名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一位传疑人物），也是小亚细亚地区人。

#### c、何新质疑古希腊神话、质疑荷马史诗

何新教授说：“希腊”地区之名，本来来自爱琴

海地中海东岸的小亚细亚半岛。而那里的悠久古代文明，近代文艺复兴以后被西方文人移花接木给了雅典为中心的格里斯半岛，于是这里被冒名顶替而称为古希腊，改造和转嫁了许多原产于小亚细亚地区的神话、哲学以及古文明。近代西方人伪造了雅典卫城、包括某些可疑的考古发现和文物。例如，克里特岛的牛头王——米诺斯神话考古。于是，这个伪造的雅典希腊，就被谎称为欧罗巴（欧洲）文明的起源地和曙光区域，而写入了近代西方人编撰的世界历史。荷马史诗是伪托之作，却被作为虚构信史的主要基石。在诸如此类的虚构想象基础上构拟的所谓古希腊历史——全部都只能叫做伪史。

有充分根据可以断言，西方所谓的“古典学”——其实就是一种虚构的现象学和准文学。西方史学家在18世纪后才开始创造的一系列古希腊神话，其根据主要是口头传说，如荷马史诗、圣经故事及没有编年的各国轶事；早期被大家接受的概念，被称为“古希腊神话”，里面充满很多神、半神半人，宙斯、雅典娜、阿波罗都是其中的神化人物，特洛伊木马也是其中的神化故事。从故事情节内容上看，还可以发现很多模仿亚洲国家神化传说、亚洲文化的部分，如星相星座。荷马史诗所述传说与希腊及雅典基本无关。不断深究之乃更发现，所谓古希腊历史与古罗马历史、古印度历史，其实全部是欧洲人于文艺复兴后有组织而系统大规模人工粉饰和制造的伪历史。

也许荷马史诗等有文学价值，但不是真正存在过的历史。历史上根本不存在雅典文明的东进——所谓的“希腊化”进程。荷马史诗以及书中宙斯体系的所谓希腊神话，其原型实际来自现在土耳其地区的小亚细亚半岛，本与雅典希腊无关。所谓荷马史诗本身也是来历不明。但现代西方学术界普遍承认，该史诗所述传说与希腊的雅典无关，来源是今日土耳其所在的小亚细亚地区的一些古代传说。希腊哲学起源和繁盛于地中海东岸的小亚细亚地区。

#### d、何新质疑亚历山大图书馆、古希腊雕像、建筑

何新教授说：亚历山大图书馆是古希腊史的“重建信息源”，亚历山大图书馆不可考证，连一块建筑废墟的石头碎片也没发现过。

人们对“古希腊”的怀疑，是从18世纪此概念提出之日就开始了，18世纪西方社会就出现大规模质疑“古希腊史”的活动。今天西方国家用以展示证明“古希腊”存在的各种文物，如雕刻、石像、建筑废墟等，都有明显的过于崭新、仿古、不符合文物掩埋土壤化学改变的结构特征；部分用以证明古希腊存在的古董，其发掘地是在土耳其其中、东部，属于古波斯文明的地区，牵强附会不足以证明古希腊史；“古希腊史”中许多历史人物、事件不符合简单的事理逻辑及数理逻辑。所谓真实的“古希腊



雕像”发掘地是在希腊吗——是参与“古希腊伪史”打造的，有法国的文学家雨果，还有一群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所有十字军国家的各个学界精英。

庞贝城也是意大利在数百年中，打造出来的，至今还在搞仿古建筑，对外说它们在“发掘遗址”……这些雕像的仿古很简单，把鼻子、耳朵、生殖器敲掉，往上面泼药水就可以达到那样的效果了。西方化学家也是参与古希腊伪造的一大群人。法国南部地区有很多伪造的古罗马建筑，一看就是泼药水造出来的：大理石质的建筑与雨水接触后，石头表面会产生很多孔洞，雨水接触越多与接触少的区域，孔洞结构、分布是不一样的，可在这些仿古建筑表面，用泼药水模拟水侵蚀的石头，孔洞结构、分布都跟是否与雨水接触都没关系了，天花板上的孔洞分布，与外墙上的孔洞分布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到西方去看所谓古罗马、古希腊建筑，要带着思考，细腻去看，不要只带着敬仰膜拜去看。西方基本上所有古迹都是人造的，很多古董是从别国掠夺的，埋在西方的土地里，已经很多年了，现在模拟“考古现场”，一看就知道是埋进去的别国古董。本地发掘出来的真实古迹就一堆堆乱石头，是本地古代原始部落留下的篝火。大多数希腊式样的建筑和古代雕塑作品，其原型来自小亚细亚地区，即今天的黎巴嫩、约旦、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土耳其，并且至今仍可在那里保存着的大量古代建筑奇迹遗址中见到。西方学界早就有非主流学者曾经揭露，那些所谓的希腊雕塑作品——没有一件是来历清白，流传有序，可以验明正身的。这些雕塑作品，包括什么维纳斯，阿波罗，以及米罗的掷铁饼者——尽管人们耳熟能详，但却没有一件流传有序出自古希腊雅典。其实都是所谓的文艺复兴时代，突然出现据说来自东方的君士坦丁堡的——那些雕塑作品，毫无古风，崭新如昨，与文艺复兴时代雕塑大师们的作品同出一脉，毫无二致——其实都是当时意大利雕塑家的伪托托古之作。

#### e、何新质疑希腊风艺术影响了犍陀罗

何新教授说：并非希腊风艺术影响了亚洲的犍陀罗，而是亚洲犍陀罗艺术通过君士坦丁堡和文艺复兴，影响改变了近代的意大利和欧洲的造型艺术——起源于古巴基斯坦印度河及阿富汗喀布尔河流域的犍陀罗艺术，在人类艺术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犍陀罗是古印度河流域古国之一，本部在今巴基斯坦北部印度河与流入阿富汗的喀布尔河交汇处的白沙瓦谷地。犍陀罗为印度西北边境的古地名、古国名。此地是由兴都库什山脉通向印度河平原必经之路线，自公元前5至前4世纪间，此地隶属于波斯，此后，先后有大夏、释迦、安息、贵霜等民

族角逐活动其间。印度河以东的塔克西拉曾为犍陀罗的首府，被认为是犍陀罗艺术发源的摇篮。白沙瓦谷地北边的斯瓦特河谷、西边阿富汗喀布尔河流域的哈达、贝格拉姆等地，也被认为属于犍陀罗艺术流派的范围。

犍陀罗艺术的主要贡献在于佛像造型艺术的创造。佛教在前5世纪末兴起于尼泊尔地区后，通过克什米尔高原向西南亚传播，公元1世纪前后，受印度河流域自古流传的民间雕塑艺术影响，转在犍陀罗地区，形成了独特的佛像的制作和浮雕的艺术风格。现存最早的犍陀罗石雕佛像出土于巴基斯坦马尔坦地区。事实上，犍陀罗艺术纯粹起源于西南亚，很可能是月氏族人或者古波斯人的伟大创造。后来，这种造型艺术风格，由东方向西方传播，通过君士坦丁堡，在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早期传播到意大利半岛，影响了文艺复兴时期大师们的雕塑作品，包括那些伪托为古希腊风的雕塑作品。关于犍陀罗艺术来自希腊亚历山大这个流程百年的欧洲伪史谎言，应该予以揭穿。

#### B、何新教授指证伪史后台共济会及区域认知的错误

##### a、何新发现金融共济会在丝绸之路上形成和政治需要

何新教授说：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地区出现共济会银行家控制下的独立城邦（威尼斯、佛罗伦萨等），这些共济会银行家（以梅蒂奇家族为代表）从十字军（圣殿骑士团）手中购买了大批劫掠自“圣地”——中东、近东（阿拉伯）地区的文化物品和古代书籍典籍，他们雇佣的学者、艺术家模仿以至剽窃其思想和艺术风格，重新复制、编撰、包装、改编——这就是所谓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于是一个历史上莫须有的“古希腊文明”被重新发现，出现了经过杜撰的古希腊史、古希腊哲学以及古希腊民主的种种新文化神话。

现代的希腊共和国、希腊王国在世界历史上本不存在。19世纪初有希腊半岛人在乌克兰敖德萨建立秘密组织“友谊社”（从属于共济会大东方会社的分支），策动希腊独立运动。1821年3月25日希腊半岛爆发反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独立战争，同时宣布建国独立。于是由英、法、俄、德根据西方政治和文化的需要，共同扶植建立起了一个新国家——希腊国。历史中从不存在一个雅典为中心的希腊文明或者文化区域。历史中从不存在一个古代雅典人为核心族群的希腊民族，和一个雅典为首府的大希腊殖民地。

所谓的古希腊文明，是近代西方出于主导世界的政治和文化需要，而订购出来的一种意识形态的虚构产品——西方学术在文艺复兴以后，一些学者为了政治和文化原因，杜撰编造了关于希腊或者雅典

的历史, 帝国, 民族、民主制度、古典语言、人口数字, 商业文明, 以及僭主和王朝, 跨海大殖民地, 科技哲学文明文化的种种说法, 都是出自想象力的虚构作品。包括荷马史诗、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的历史等, 无不是出自于文艺复兴以后的近代产物。

所谓“古希腊哲学”的存在, 纯属文艺复兴时期和启蒙时期共济会银行家资助的欧洲人文学者的一种文化虚构。共济会虚构这一概念的目的, 与文艺复兴学者虚构似乎存在一个统一的古希腊城邦文明体一样——最初只是为了建树一种反抗天主教学术的传统, 后来则是要为近代新兴的资本主义市场文明找到一种源远流长的“根”。西方古希腊史, 被认为是西方在殖民时期, 西方文学界主导、组织, 西方各国参与、持续长达数个世纪之久的大规模历史造假事件。有两个被认为是西方大规模伪造历史的原因: 西方自十字军东征开始, 在别国掠夺的不仅是土地、财富、人力, 也包括历史、文学、科学、技术、文化、哲学、政治体制等软性无形财富, “古希腊史”可以作为一个赃物袋, 打包盗窃从别国掠夺的软性无形财富。

当时西方社会正在朝着资本主义转变, 创造“古希腊历史”可为西方当时的社会变革找到法理依据。今天, 西方政府仍旧在试图通过树立“古希腊文化”的威信, 来提高西方国家对全世界的影响力。在全世界各国的百科网站, 有大量西方资助的写手, 控制并恣意篡改当地的百科信息, 如百度百科, 随意更改历史年代, 历史事件、历史人物, 以让“古希腊神话”“古罗马故事”故事情节更符合逻辑性, 更趋向于“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近 30 年来, 在西方科技文献中, 西方科学家开始大规模使用“古希腊文化”概念, 各种神话人物开始成为现代科技、哲学、文化、政治制度的鼻祖, 还配套了这些人物创作、发明的各种详细故事情节; 虚幻的“古希腊文化”“逐渐转变为现实存在的”古希腊文化“史学概念, 并通过各国科学家对西方文献的引用, 在全世界大规模传播。

这些被转变的概念不仅充斥各国科技文献, 还在报刊杂志、影视作品、艺术作品等各种信息传递载体、信息传递链网中大量出现, 从不同角度、在各个社会层次, 冲击人类的视觉, 不知不觉中, 把“古希腊神化”概念转变成很多人接受的“古希腊文化”、“古希腊历史”, 成为了一种“真实存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西方学界意图将“古希腊神话”“转变为”古希腊文化“史学概念的行为, 是西方多国政府、多专业领域的专业人士, 参与组织的一场大规模历史造假活动, 因此, 近期一股批判西方造假”古希腊历史“的活动在全世界各国掀起。古希腊人在哲学思想、历史、建筑、科学、文学、戏剧、雕塑等诸多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这一文明遗

产在古希腊灭亡后, 被古罗马人破坏性地延续下去, 从而成为整个西方文明的精神源泉”。

#### b、何新谈区域认知的错误与维京人划界

何新教授说: 所谓的希腊, 是一个在历史中没有国与族的非实体存在。伟大的文明都起源于大河流域: 亚洲的中华文明起源于长江黄河, 印度文明起源于恒河, 苏美尔文明起源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北非的埃及文明起源于尼罗河。西方学术界通过推测、拟想、幻想、文学虚构, 制造出来关于希腊的虚假历史和虚假文明, 令人叹为观止。19 世纪以后新的考古实证越来越多, 被诸多谎言虚构包装起来的希腊雅典故事, 日益找不到可信文献和实证支点, 谎言要露馅。1822 年希腊宣布独立之前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被称为“希腊”的国家。这个半岛, 古代既不叫希腊也不叫雅典。由于半岛古代没有实现过政治统一, 因此并没有统一的名称。由于没有真实历史记录存在, 西方学界中至今也是众说纷纭, 说不清楚。

如何定义谁是古代希腊人? 如何定义古希腊的文明与文化? 根据现代的研究, 亚平宁半岛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居住, 到了新石器时代, 利古里亚人从非洲经过西班牙, 法国来到意大利。公元前 2000 年左右的青铜时代, 一些讲印欧语的部落从多瑙河和喀尔巴千山脉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 其中一支拉丁人进入拉提乌姆平原, 约于公元前 800 年移至后来罗马城所在地, 居于帕拉提乌姆等山丘。与此同时或稍后, 萨宾人居于邻近山丘。其后伊特拉斯坎人也来到这里。前 8 世纪-前 6 世纪, 希腊人向意大利南部移民, 并建立城邦。

公元前 7 世纪, 以帕拉提乌姆为中心开始部落联合过程, 由单一的拉丁人部落联合包括萨宾人和伊特拉斯坎人等 3 个部落组成罗马人公社。公元前 7 世纪末~前 6 世纪末, 罗马人公社处于伊特拉斯坎人的统治之下。此时, 完成了由氏族部落公社到城市国家的过渡。前 5 世纪末, 高卢人从阿尔卑斯山以北进入波河平原。这些部族经过长期融合同化, 形成了意大利人的祖先。古希腊城邦的出现作为文明概念出现则相对较晚, 最早希腊文明“克里特文明”公元前 2000 年出现。较为著名的迈锡尼文明, 出现于公元前 1600 年--前 1100 年之间, 但仅仅是爱琴海文明的一支, 却并非古希腊文明。

克里斯文明出现时古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早已经进入王朝时代(公元前 3100 年左右), 中国文明, 和印度河文明早已经有良渚、陶寺、哈拉巴等大型城市出现, 早已进入邦国时代晚期。古罗马文明是西方文明的另一个重要源头, 起源于意大利中部台伯河入海处。古罗马在建立和统治国家过程中, 吸收和借鉴了先前发展的各古代文明的成就, 并在基础上创建了自己的文明。古罗马文明对西方乃至

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中最重要贡献有两方面：前半期的罗马律法和后半期的基督教。在西方文明发展史上，古罗马文明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古罗马通常指从公元前 8 世纪在意大利半岛中部兴起的文明，历罗马王政时代、罗马共和国，于公元前 1 世纪前后扩张成为横跨欧洲、亚洲、非洲的庞大罗马帝国。据西方史学家描述，“古希腊持续了约 650 年（公元前 800 年-公元前 146 年）。位于欧洲南部，地中海的东北部，包括今巴尔干半岛南部、小亚细亚半岛西岸和爱琴海中的许多小岛。公元前 5、6 世纪，特别是希波战争以后，经济生活高度繁荣，产生了光辉灿烂的希腊文化，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何新教授论证古希腊罗马哲学、宗教、神话、建筑及语言文字之根在亚洲。

但他还认为这种地缘关系，丝毫没有改变这些早期哲学和科学思想内在于自身的伟大性格。只是这些古代思想并非产于雅典却被近代欧洲人伪托于希腊雅典而已。何新认为，近代以来西方科技及工业包括后工业文明所取得的成就，在整个人类史上同样是伟大的。一切伟大文明不可能孤立自生，而都是通过取长补短的沟通、传播、学习、交流、借鉴而互相融合而形成。试设想，没有十九世纪中后期中国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对西方政治、军事、文化、科技进步的学习、借鉴、取舍和消化，以至对来自西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接受，会有现代中国的伟大复兴吗？

## 2) 徐松岩教授支持与何新对希腊古史的不同意见

西南大学西亚研究所所长徐松岩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4 期，发表《古希腊文化重见天日，是欧洲人的发现还是发明？》一文，是不同于何新教授的观点。他说：近年来有认为古代希腊，并不存在一个被称为“希腊”的国家，也没有一个被称为“希腊”的政治实体，由此断定希腊古史是“伪史”，是文艺复兴以后西方学者“杜撰”或“发明”出来的。值得注意的是，倘若有人把“伪史论”挪移到埃及、印度、中国等其他文明古国的历史上，那这些文明古国历史的真实性，甚至其是否存在都很成问题。

### A、徐松岩用族群、文化、语言论希腊半岛来龙去脉

徐松岩教授说：正本清源，以希腊为例，从概念史的角度，探讨古代“希腊”的概念究竟是如何产生的，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希腊”的古史是否存在，如何理解其真实性等问题——一个多世纪以来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已经证明，印欧语系希腊语族的居民，大约自公元前 2500 年开始的千余年间，从巴尔干半岛中北部分批南下，逐步占据一些地区，征服当地居民或与其和平杂居。其中希腊人大规模移居希腊半岛（“皮

拉斯基亚”）是在公元前 1900 年以后。“希腊人的到来”是该地区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

从语言上说，希腊人显然包括那些操希腊语的希腊移民和原不操希腊语后又改操希腊语的异族人。近代以来的考古学和语言学也证实，在希腊人来到希腊之前，希腊各地主要是来自亚洲和非洲的移民。

从族群和地理意义上说，荷马史诗提到皮拉斯基人是居住在色雷斯、阿尔戈斯、克里特等地；希罗多德及以后的作家都将希腊及地中海地区的前希腊语民族统称为“皮拉斯基人”。希罗多德《历史》指出：拉栖代梦人属于多利斯族，雅典人属于伊奥尼亚族。这两个民族从古老的时代起就在希腊占着极为突出的地位了。雅典人在从前属于皮拉斯基族，拉栖代梦人是属于希腊族的；皮拉斯基人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居住的故土，而希腊人却是经常长途迁徙的。在丢开里昂统治的时代，希腊人居住在弗提奥提斯的地方，在希伦的儿子多鲁斯统治的时代，他们便移居到一个叫作希斯提埃奥提斯的地方；他们在被卡德摩斯人驱逐出希斯提埃奥提斯地区以后，就定居在品都斯，称为马其德尼人。从那里再一次迁移到德里奥皮斯；而最后又从德里奥皮斯进入伯罗奔尼撒，结果他们就变成了众所周知的多利斯人。

希罗多德还断言，皮拉斯基人是非希腊语的民族，属于皮拉斯基族的雅典人，在他们成为希腊人的同时，必定是更改了自己的语言的。希腊民族自从他们出现以来，就从来没有改变过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希腊人起初人数不多，势力弱小；然而，他们却逐步扩大和成长成为一个多民族的集合体，这主要是由于许许多多的非希腊语部落主动加入到他们行列当中的缘故。这就是说，在皮拉斯基人所居住的皮拉斯基亚，随着希腊人迁入、定居、融合，操希腊语的族群居住地不断扩大，皮拉斯基亚逐步缩小。

### B、徐松岩用从无到有，从小变大论谈希腊动态演进

徐松岩教授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简略考察“希腊”从古到今的演化过程，可以看到，在 1822 年希腊宣布独立之前，这片土地及其居民长期处于异族统治之下，确实没有一个称为“希腊”的国家存在。但自“希腊”概念的出现直到 19 世纪初，在这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以希腊半岛为核心区域的“希腊”历史和文化，始终是真实存在的。学界传统上把古代“希腊罗马”并举，使人们容易误认为古代“希腊”是一个国家。研究古希腊史的视角可以是区域史、族群史，也可以是城邦史、文化史，但绝不是什么“伪史”。在语言、地理、族群、文化意义上研究其历史，正如在同样意义上研究古代

“中国”、“印度”、“一带一路”一样，都有各自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用经历过从无到有，从小变大的动态演进过程论，最早进入“希腊”地区是阿凯亚人，他们自北向南进入伯罗奔尼撒半岛，很可能就是迈锡尼文明的创建者，所使用的文字（线性文字 B）被证实是希腊语；稍晚进入这一地区的有伊奥尼亚人、埃奥利斯人，最晚进入“希腊”并建立斯巴达城邦的多利斯人，南下的时间在特洛伊城陷后的 80 年（约前 1160）。古典时代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在追溯希腊民族历史起源时，记载了古希腊人的共同记忆，也转述了他们的共识。希罗多德、修昔底德都确信，“希腊”的这个地方，最初并非为希腊人所居。希腊人在此定居，希腊语在此普及，是“希腊”这个地理概念出现的前提。

### C、徐松岩使用古风时代论考古基本具备的历史条件

徐松岩教授说：古风时代希腊人是指移入的希腊人和“希腊化”了的非希腊人（主要是皮拉斯基人）。古风时代希腊人在地中海各地广泛建立的殖民城邦，不同区域沿用各自地名。如西西里和意大利半岛南部的希腊殖民城邦，就被称为“大格里西亚”；爱琴海东岸、小亚细亚西部有希腊人居住的地方，自北向南分别被称为埃奥利斯、伊奥尼亚和卡里亚，赫勒斯滂和黑海地区希腊人殖民城邦，也有其各自的地名，并未统称为希腊。考古资料早已确证，自公元前 1.1 万年起，希腊和爱琴诸岛的居民生活和海上交往未曾中断。

皮拉斯基人留下的遗迹很多。据修昔底德记载，雅典卫城上有一段皮拉斯基人的城墙，直到公元前 431 年还保存着。修氏很可能就是这段城墙的目击证人。现代研究者指出，皮拉斯基康系指雅典卫城的古城墙，但也有学者认为修昔底德是把它与卫城城墙明确区分开的。考古资料证明，在希腊人到来之前，雅典卫城已有城墙建筑。雅典卫城曾是皮拉斯基人的居住地，他们在此建设设防要塞。古典希腊语中保存着的大量前希腊语的词汇，可为皮拉斯基人广泛居住此地的佐证。某些具有社会、政治特色的名字，如“王”、“奴隶”等；一些神祇、英雄的名字，如雅典娜、赫尔墨斯、米诺斯等；一些动植物、奢侈品、休闲用品的词汇，如橄榄、葡萄、无花果、杉树、樱桃、水仙、浴盆等，都可以看到皮拉斯基人语言的残存。修昔底德对远古希腊各地居民状况的概括性论述，反映了希腊人的成分相当复杂。

罗马帝国时代直到欧洲中世纪后期，希腊人和希腊文化的核心区域，依然在希腊半岛及爱琴海沿岸地区。罗马帝国在文化上大致分为两个部分，西部的拉丁文化区和东部的希腊文化区，后者即历史

上的“东罗马帝国”或“拜占廷帝国”。她虽被称为罗马帝国，但其统治区域主要是操希腊语的“希腊人”。希腊语不仅是帝国民众日常用语，也是从事文学、教育、宗教、法学、贸易活动的官方语言。在东罗马帝国存续的千余年中，古希腊文献的传抄、整理和研究未曾中断，官方或民间重要文献均以希腊语写成。1453 年奥斯曼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后，大批希腊学者携带古希腊抄本逃往意大利，成为“文艺复兴”运动的重要诱因。西欧诸国文人墨客时隔千年，再次看到辉煌灿烂的古希腊文化成果时，不禁为之惊叹不已。对于近代欧洲人而言，重见天日可算是他们的“发现”，绝不是他们的“发明”。

徐松岩教授说：及至古典时期，希腊作家已很难弄清楚希腊人定居此地之前的族群成分，一般统称他们为“皮拉斯基人”——一种被称为“鹈”的水鸟，暗示海上移民——称他们的居住地为皮拉斯基亚。随着希腊人一批批南下，居住在这里的皮拉斯基人或者被驱逐、屠杀，或者被同化。这是一个文化、族群上相互融合的过程，一方面是当地居民的“希腊化”，另一方面也是希腊人的“皮拉斯基化”；同时并行的历史进程，是“皮拉斯基亚”逐步缩小，而“希腊”则不断扩大。

来自西亚、北非（古希腊人所称“东方”）的移民，携带着较为先进的文化成果，自东向西进入爱琴诸岛（基克拉底斯群岛）。

移民在希腊本土，在阿提卡和东伯罗奔尼撒较为常见，在色萨利和马其顿也有，在西部和西北部就很少见了。这说明移民的分布东部较稠，西部渐稀，暗示这些居民来自于东方，自东向西在希腊各地扩散——这是否与人类起源及文明的第二个孵抱期论——青藏高原第三极原理及考古证明存在源于约公元前 5070--公元前 4171 年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及远古联合国有关呢？

徐松岩教授没有说，但他提供的国外 N·G·L·哈蒙德研究是：“延续长达 3000 至 4000 年的新石器时代，几乎完全是以来自东方的影响为特征的。这是一个和平、安宁、从事农业、航海并有艺术风雅的社会”——这也许是巴蜀远古盆塞海干涸前后巴蜀文明的证明。

### 3) 研究西西里岛和克里特岛文明及区块链延伸讨论

#### A、维京人涌动“学习”丝绸之路上的那些科商

古希腊文明是罗马文明的源头，罗马文明是其发展创新，这实际可看作青藏高原第三极原理考古，存在源于约公元前 5070--公元前 4171 年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远古联合国的女娲、伏羲鼎盛时期延伸的后传。盆塞海彻底干涸后，嫫祖和平地把人类起源及文明的“第二个孵抱期”的远古

联合国的权柄，交到黄河文明中原人手中，是一件幸事。但嫫祖故里那些偏僻的山区的贫瘠，5000年多的今天除留下众多密集的山寨城邦和大围坪地貌遗迹，劳动农民更多还是靠外地打工致富。问题在哪里？研究维京人与“天下人”世界比拼，何新教授其实没有看到维京人伪造历史，并没有全把约公元前1000年以前古克里特岛和西西里岛上最早的居民，归入欧洲早期有抢劫行为的维京人行列，而是被抢劫的对象，还算有点“诚实”。

因为抢劫如果没有别人大量而有组织的货物生产、贸易在后面支撑，哪有可抢劫的东西？所以欧洲早期的维京人只依靠“海盗行为”，那么绝不可能形成如今的国际科学主流——维京人的“科商”也来自善于向“天下人”学习。持续数千年的海洋文明中经商遇到不可预测的大风大浪，以及你争我夺战争高情商和高智商结合的窝里斗尴尬的需要——事实上，近代资本主义最早的起源地，是中世纪意大利半岛上“桑林生臂手”的银行城邦国家：威尼斯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和热那亚共和国，而不是这之外的今天强盛的英国、法国、德国和俄罗斯。意大利半岛早期的城邦，也如同远古巴蜀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的位置，恰似古丝绸之路带金融和商业的中转站，控制了丝绸之路——它的存在期由5世纪直至18世纪。公元5世纪后匈奴及北欧维京入侵，引起欧洲大动乱，一些罗马的犹太资本家跑到这里避难；8世纪以后，威尼斯形成城邦获得自治权。中世纪后期，威尼斯城邦由于控制了欧洲通向远东的贸易路线，而变得非常富裕并开始向亚得里亚海方向扩张，统治了希腊半岛以及爱琴海内的很多岛屿。

因为说起城邦，人们会想起古克里特岛和西西里岛，由于是海岛、水域等地理分割，整个古希腊被分成数以百计的独立城邦。城邦组织公民会议、实行开放社会，其手工业、商业、航海业高度发展。嫫祖考古对盐亭数十处密集度高的古山寨城邦遗址的调查，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后认为情况何尝不是这样，而且时间比古克里特岛和西西里岛早，即在5000年至7000年前之间，这片古西陵氏的城邦一直是一个巨大的丝绸及家禽家畜贸易和国家文明观念传播的中心。

这项研究的第二波兴趣，是1980年代改革开放，盐亭县结合发展蚕桑兴起的“嫫祖研究”热，到1992年10月4日成立盐亭县嫫祖文化研究筹备委员会，1993年公开出版《嫫祖研究》一书，并得到退休后的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杨超书记和时任中共绵阳市副书记廖世孔书记等的支持。但据盐亭县志办主任也是盐亭县嫫祖文化研究筹备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赵均中主任对笔者讲：杨超书记虽然支持嫫祖文化研究，但他多次向杨超书记汇报请示工作时，

杨超书记每次都强调嫫祖文化研究不能脱离中原文明是历史进程的主线，西陵氏嫫祖是向中原的黄帝献丝……赵均中主任说：“‘文化研究’说明是时事需要，不是历史求真”；所以他也不赞同《盘古王表》和盆塞海的讨论。

其实这还与四川省政协常委胥端甫先生(1906-1992)说的信息有关——1982年胥端甫先生在中国驻美使馆精心安排下从美国返回祖国成都定居，受到小平同志和胡耀邦总书记的接见。胥端甫先生1988年在盐亭县政协听到笔者在研究嫫祖历史，后来他找到笔者告诉说：他是盐亭金孔区人，和任望南是亲戚，并由任望南帮助曾任国民党甘肃定西榆中田粮处督导处长等职。1948年到台湾，任中国文化学院教授。1950年代他与到台湾老兵中的一位基层士兵、干木工活的四川三台人发起“台湾易经研究会”的成立。他回四川后，在杨超书记的支持下，在省政协也成立了“易经研究会”。研究上古史，他想到解放后任杭州市政协副主席的钟毓龙(1880-1970)，1933年支持盐亭何拔儒依据当年叠溪大地震及堰塞湖，联系推证盐亭大围坪地貌和天垣发现的石龟碑《盘古王表》，把我国远古文明立足于山海之争。

钟毓龙在1933年叠溪大地震后，巨大的人员伤亡激起他以新的视角写作《上古神话演义》一书。在书中，他提出史学的上古梁州，“梁州”指海水淹没山丘，只剩下山梁之背图像的转义，赞成四川上古梁州以盆塞海和大围坪地貌得名，和上古黄河曾流入过四川。钟毓龙认为懂得有远古巴蜀盆塞海、堰塞湖及先后大溃坝，也就懂得由此分别造成后来的长江下、中游的良渚河姆渡文化和江汉湘楚文化——约公元前8000-3150年在川、甘、陕为一个大地震多发地区，长江三峡和剑门关山峡因大地震的山崩地裂有合有开，在川西北地区造成过无数的堰塞湖。如果其中有的大地震的山崩地裂，造成长江三峡山崩堵塞而剑门关山峡地裂分开的组合，那么还引起长江的断流。

黄河通过渭河与嘉陵江连接的剑门关山峡分开的峡谷流入四川，古蜀盆地就有可能从堰塞湖演变为盆塞海。而在约公元前4170-2070年，如果相反的组合——其中有的大地震的山崩地裂，造成长江三峡地裂溃坝而剑门关山峡山崩堵塞的组合——即引起盆塞海下面的长江三峡溃坝，盆塞海上面的渭河与嘉陵江连接的通道剑门关山峡的重新堵塞，黄河重新向东流入大海，那么四川盆地的盆塞海就会干涸，发达的盆塞海文明大部分就会向中原转移。

钱山漾古文化遗址的发现者慎微之先生也是非考古专业的考古专家，1896年出生在离钱山漾湖边不远的已衰败的曾富裕家庭。1940年在上海沪江大学毕业后，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哲学

博士。学成归国后当浙江大学开设人类学专业课时，他曾一次次把珍贵的石器标本捐赠给教学收藏室。而早在钟毓龙创作《上古神话演义》的1934年夏，湖州适值大旱，钱山漾湖中的水位落至1857年以来的最低，干涸见底占全湖总面积的2/3。而慎微之当年就是趁着暑期在湖底收集到大量古石器，随后在1936年5月写出《湖州钱山漾石器之发现与中国文化之起源》，发表在《吴越文化论丛》上，让沉睡了数千年的钱山漾遗址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慎微之说：“若大规模发掘定能获得大量石器以及化石，可使吾人了解原始南方人之生活习惯及生产方法等”。何拔儒从钟毓龙处得到过慎微之的论文，他对年富力强的慎微之也所有了解，并且感谢慎微之对他的支持说：“不但对于整个人类学有空前贡献，即对于以前文化来自西北说，亦不攻自破矣”。

1936年钟毓龙完成约120万字的《上古神话演义》在中华书局出版。1985年2月浙江文艺出版社在1936年版本基础上重新编排出版。钟毓龙和慎微之先生都是属于研究视野更为广阔的人，深知人类学考古比拼的仍只能是求真的世界秩序历史，而并不赞成卫聚贤等学者只强调吴越古文化的独立地位。慎微之曾向钟毓龙打听何拔儒，钟毓龙告诉通过朋友圈，知道1952年何拔儒被聘为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新中国一解放，小平同志领导发现了轰动世界的“资阳人”头盖骨化石，这实际是抓人类上古史大统一方向的基础研究，被认为与完善经济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得到毛主席的支持。但社会人间潮流、风云际会是可变的，由于历史的惯性和条件限制，能跟进的不多。

中国历史学界、哲学界和思想史界会出“去真”问题吗？一是去真作“信史”，否定“资阳人”考古，否定青藏高原第三极原理考古存在源于约公元前5070--公元前4171年四川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远古联合国的女娲、伏羲鼎盛时期，是当中的许多人，也许一辈子都没有想到过：西方历史著作和西方思想史著作与中国的历史学著作和思想文化著作的产生条件，与《盘古王表》有联系，而与时间顺序逆转完全不是一回事。二是他们大多习惯中国的治学习习惯，看不清楚西方历史著作因为存在基督教教会参与杜撰的“伪”问题。

1998年4月28日《绵阳日报》“天下大观”版发表了一篇《盐亭螺祖考古大发现》的文章，报道从盐亭榨溪河畔到梓江、涪江流域有数百座密集寨子山的古生态景观与寨子山下半坡的大围坪台地。如从盐亭境内盘古圣地的天垣盘垭村袖头山、五面山以及螺祖故里的云毓山、烟鼎山、螺村山出发，如目角寨、新寨山、大牛山、寨子山、仁和寨、保和寨、大碑寨、母猪寨、子母寨、四面山、罐子寨、猫儿寨、麒麟寨、凤凰寨、锣锅寨、毛达寨、

金铧寨、点灯山、古龙山、炎台山、大佛寨、长生寨、摩天岭、烽龙寨、四方山、佛贡寨、金垭寨、蚕丝山、水丝山、马鞍山、太皇山、石马山、阳鹤山、白象山、丝源山、王岗咀、打鼓山、铜钟山、笼子寨、玉龙山、高梁观、仁广寨、江家寨、大寨山、伏龙山、刘家寨、白虎寨、青龙寨、登高寨、南瓜寨、水秦寨、二龙寨、太阳寨、七庙寨、空相寨、天生寨、狮子寨、金凤寨、金龙寨、观台山等60多处古山寨。

它们一般相距3至4里，海拔约600米，上下相差约80米。它们的主要特征是，山寨半坡的大围坪一般在海拔约450米处，弯月形包围山寨，或背靠山寨。现在95%以上的农户已从不当道的大围坪搬家到沟坝或靠近沟底的不规则的台地居住；并且古山寨城邦原有建筑已经荡然无存，但早在明清时代及以前修建、留存的一些小寺庙，被兼容变为当地人家子弟的书院也不少。而这里远古文明的心灵，没有被撼动过。有网友说：“探索产生了有人类远古联合国的猜想，以此也能解答世界大同走和平崛起的多元一体的形态，而不是走国家、民族以各自的利益纷争的世界分裂的多元伦理道路”。这是拉开了研究西西里岛和克里特岛文明及延伸区块链模型讨论的序幕。

这篇文章发表后，1998年6月11日至13日'98四川--海峡两岸螺祖文化研讨会第一次在盐亭县城召开。笔者作为《绵阳日报》社派出记者，特地带上10多份1998年4月28日《绵阳日报》到会，分送给来自海峡两岸的主要专家和领导，重点是四川省中华文化学会会长杨超书记。笔者还向杨超书记摆谈了《盐亭螺祖考古大发现》发表中的故事：文章很早就收稿，但报社要求发表时要配发古山寨城邦遗址相应的照片。笔者作为编辑，想到盐亭县委宣传部部长马宗舜部长是支持螺祖研究的，就向他求援。马宗舜部长亲自带队请上盐亭知名的摄影师、盐亭县电影院的顾国钧先生等人士，开小汽车在全县区乡走访了解，还到自己熟知的山寨，一共跑了两天，自认为拍摄最好的如一些山崖边长得茂盛的大巴茅草等照片，但无一张可用。笔者才知道，山寨城邦遗迹考古，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

幸好笔者十多年来业余读了这方面的不少书刊，如草原遥感考古，遗址本身同周围未经改变的自然环境就存在种种差异，如古代护城河、壕沟等遗迹内含水分、有机物和腐植物比较多，上面植物的长势就比周围的植物要好。相反，若地下有古代的墙基或夯土，上面的植物根系不够扎深，也缺少水分和营养，就会比周围的植物显得萎缩。笔者老家在盐亭天垣乡农村，那时老家还有一位年迈的母亲，每个月笔者都要趁星期六、星期日回老家一次看望母亲。于是决定趁回老家考察传说和盘古有关

的天垣乡与黄溪乡交界处的“大风洞”山垭。读高中那些年，吃饭笔者要背粮到盐亭城，虽要过河翻山但也愿走经过“大风洞”这条近路。当年整个天垣乡和黄溪乡的山头都是光秃秃的，“大风洞”冯家坪这边有座“目角寨”山，解放前还有豹子伤人，此时也是光秃秃的，笔者每次过河翻山走赵家沟过冯家坪就经过“目角寨”山旁，所以有些熟悉。但1998年4月初笔者爬上目角寨山垭时，这里满山都长上了柏树林，当年天旱，冯家坪的不少人到目角寨大风洞一处有流水的山崖下，用桶接泉水吃，这给笔者考查壮了胆。

但令笔者失望——跑遍目角寨山顶山头，除还能看到一些壕沟的痕迹外，5000年前的山寨城邦遗址遗迹难定。因为目角寨大风洞一处垮崖虽有石砌城墙遗迹，但够不上5000年。笔者闷闷不乐正准备下山，对面山头有位放牛的老大娘警惕地叫住笔者问是谁？笔者说出自己的住家和母亲的名字，她居然认识笔者的母亲。冯家坪说来奇怪，除少数人家姓冯外，大多数人家都与笔者同姓，而且还传说是同宗。因为冯家坪人赶天垣场要经过笔者家，所以认识母亲。而且据母亲说，那些年因笔者喜欢独自一人到一些山寨考察，外面有传说儿子在“寻宝”，她很担心。既然放牛的老大娘很热情，笔者就向她打听附近古山寨的情况。真是喜出望外，老大娘说她放牛的山头叫“新寨山”，叫过去看看。笔者虽是本地人，而且也多次走过“新寨山”下，居然不知道它也是一座古山寨。“新寨山”离“目角寨”山不到半里路，山势更高，虽是个独山头，但成刀背形——在冯家坪的背面是悬崖，一直到河谷。笔者爬上新寨山顶，回头再往下看“目角寨”，却被惊呆了——像草原遥感考古，目角寨山头遍山的柏树林呈现出一个巨大的近似圆环形的圈带，扣在目角寨的山头——如地下有古代的墙基或夯土，上面的植物根系不够扎深，也缺少水分和营养，就会比周围的植物显得萎缩——这个圆环形圈带的柏树长势就比周围的柏树矮些。

笔者跑遍“新寨山”山顶山头，好不容易才在面向天垣场的一处悬崖边发现，有一些残留的石砌城墙遗迹，比目角寨垮崖处石砌城墙遗迹古老，石质坚硬。星期日早上离开老家时，正遇上玉龙乡初中学校校长王善金回老家看望母亲和祖母，他是笔者的堂侄子。笔者说明情况，请他帮助拍摄此处照片，才达到目的。1998年4月28日《绵阳日报》登出时，正是用的王善金校长拍摄的配合照片。但事情并没有完，据报社同事说：《绵阳日报》综合新闻部主任李昭富老师对“盐亭新寨山城邦遗址”照片有异议，认为5000年前的石头全都会烂掉了。李昭富主任是1961年笔者在玉龙区初中读书时的化学老师，笔者很尊敬他。但笔者回答说：“古埃

及金字塔有5000年前的石头，没有全烂掉，难道只有我们中国5000年前的石头就都会烂掉？”

笔者在海峡两岸螺祖文化研讨会上分送1998年4月28日的《绵阳日报》还是有收获——与会代表中来自台湾永达专科学校的杜英贤教授找到笔者交谈，他说他研究过世界养蚕史，发现海岛地区养蚕有利于隔绝蚕病的传染，因为蚕瘟病的蔓延对养蚕业的威胁是颠覆性的。他读了《绵阳日报》报上的《盐亭螺祖考古大发现》文章，看到远古巴蜀有盆塞海和山寨城邦文明，想到在当时没有专门的蚕种制种场和蚕药厂的情况下，这对螺祖大规模发展养蚕有利。据他了解，中国的养蚕传播到日本和台湾这类海岛地区后，蚕瘟病发生得少，他听说曾经大陆发生蚕瘟病断了种，还从台湾蚕种制种场引过蚕种。

受杜英贤教授“蚕瘟病”断代的启发，使笔者想到如果再以远古巴蜀盆塞海干涸划段，之前从非洲海路和陆路走出的现代人，向东直走到太平洋西岸的中国东海边，无法前进后折回才在青藏高原西南的远古巴蜀盆塞海，建起第二孵抱期的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的远古联合国；由于坝坝沿着长江，它的主体向东达到了良渚地区。向西延伸分流，主要路线是沿古印度陆路，海路进入波斯湾海峡，上游进入两河流域陆地，再延伸进入古埃及和找海路到古克里特岛与西西里岛等地区为止。它以丝绸文明和界碑字库文化为标志，先后发展带动起两河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和古克里特岛与西西里岛文明。

但没有专门蚕种制种场和蚕药厂的远古，蚕瘟病蔓延颠覆性打击养蚕业，这些延伸的几个远古文明，仍然需要与母体的远古联合国保持联系。但远古巴蜀盆塞海干涸后，螺祖把丝绸文明和界碑字库文化带到黄河流域的地区，她深知蚕病传染的危害，所以一生都到四方与黄帝巡游教民养蚕缫丝，成为中华文明的各处亮点。但原先主体向东到达的良渚地区和巴蜀盆地本土，以及延伸带动发展起的两河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和古克里特岛与西西里岛文明，却因断掉第二孵抱期的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的哺育而先后衰落。

1998年6月13日上午杨超书记在海峡两岸螺祖文化研讨会上作《螺祖文化再上新台阶》的总结性讲话。打动笔者的是，他中途放下稿子讲了一段“山寨城邦和古文化有联系”，不能搞“半螺祖文化”。他说他曾“强调螺祖文化研究不能脱离中原文明是历史进程的主线，西陵氏螺祖是向中原的黄帝献丝”，但这次来看了《绵阳日报》刊登的《盐亭螺祖考古大发现》等材料，加之改革开放后新的考古，专家们也在说中华文明是多元一体，那么长江文明源头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原

先规定“嫫祖是向中原的黄帝献丝”不一定正确。反之也要含蓄，不要太露。如果“嫫祖故里申遗”，桑化石、文物陶器、石器、玉器、唐碑这些东西很重要，但要分别鉴别断代。嫫祖文化是口碑文化，是传说时代，那时无统一的文字，民间故事、民俗文化，为什么几千年被保留传下来？为什么现在规定文物修复“要修旧如旧”？都是为求真。盐亭保留至少60多处密集的古山寨遗迹和大围坪地貌，不可能人工伪造，而且也与盐亭几千年的贫瘠和现代也无大规模的工业、矿山等开发，生态没有被大规模破坏有关。方向发展是委托类似中国建设设计院建筑历史研究所，作《巴蜀盐亭古山寨城邦遗迹保护总体规划》，在更高层级、更大范围内，作统一协调遗迹保护与社会发展事宜的向国家申请“特区”模式的大遗迹保护管理。

但1999年1月内部出版《首届海峡两岸嫫祖文化》一书时，发表的杨超书记《嫫祖文化再上新台阶》讲话，文后标注“何子远同志根据录音整理”，实际杨超书记的这段讲话被主编赵均中主任删掉了。

## B、《盘古王表》读

徐松岩教授说：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主要源头之一，古希腊文明持续了约650年（公元前800年--公元前146年），是西方文明最重要和直接的渊源。西方有记载的文学、艺术都是从古代希腊开始的。古希腊不是一个国家的概念，而是一个地区的称谓，其位于欧洲东南部，地中海的东北部，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和爱奥尼亚海上的群岛和岛屿、土耳其西南沿岸、意大利西部和西西里岛东部沿岸。

这里说的“公元前800年--公元前146年”的时间戳，类似在区块链上古希腊文明可供参考对比查阅不可篡改的记录数据。而作为数据共享平台的远古联合国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遗存的天垣《盘古王表》，也不是孤证。

如浙江学人钟毓龙的《中国上古史神话演义》巨著，公布的尧年王表也与此多有相似。现从天垣流传的盘古王表能整理出：（一）五方区系时期，约公元前8000-6390年：东、南、西、北、中，五方都有分布的原始社会。（二）法天法地时期，约公元前6390-6210年：1、盘古；2、天皇；3、地皇，4、人皇，5、五龙纪，6、摄提纪，7、合雒纪，8、连通纪，9、叙命纪。（三）叩向自身时期，约公元前6210-5770年：1、巨灵氏，2、句疆氏，3、谯明氏，4、涿光氏，5、钩陈氏，6、黄神氏，7、巨神氏，8、犁灵氏，9、大隗氏，10、鬼隗氏，11、掩兹氏，12、泰逢氏，13、冉相氏，14、盖盈氏，15、大敦氏，16、云阳氏，17、巫常氏，18、泰壹氏，19、空桑氏，20、神民氏，21、倚帝氏，22、次

民氏。（四）重铸烟火时期，约公元前5770-4070年：1、辰放氏，（共4代），2、蜀山氏（共6代），3、虺傀氏（共6代），4、儿遽氏，5、希韦氏（共4代），6、有巢氏（共2代），7、燧人氏（共4代），8、庸成氏（共8代）。（五）立足山海时期，约公元前5070-4070年：1、浑沌氏（共7代），2、葛天氏（共4代），3、女娲氏，4、伏羲氏，5、赫胥氏，6、东户氏（共17代），7、皇覃氏（共7代），8、启统氏（共3代），9、吉夷氏（共4代）。（六）城邦之美时期，约公元前4070-3150年：1、仓帝史皇氏，2、柏皇氏（共20代），3、中皇氏（共4代），4、大庭炎帝氏（共5代），5、粟陆氏（共5代），6、昆仑氏（共11代），7、西陵氏（共5代：文昌、夸父、歧伯、金二伯、嫫祖）。（七）跃起中原时期，约公元前3150-2230年：1、轩辕氏（共3代），2、祝融氏（共2代），3、昊英氏（共9代），4、古皇有巢氏（共7代），5、朱襄氏（共3代），6、阴康氏（共3代），7、无怀氏（共6代），8、神农氏（共8代）。（八）大同王土时期，约公元前2230-2070年：1、黄帝有熊氏（共3代），2、颛顼，3、帝喾，4、尧，5、舜。（九）夏朝时期，公元前2070-1600年：1、禹，2、启，3、太康，4、仲康，5、相，6、少康，7、予，8、槐，9、芒，10、泄，11、不降，12、扃；13、廛，14、孔甲，15、皋，16、发，17、癸。

而世界上公认的五大文明古国，发源地时间从大到小排列分别是：美索不达米亚（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2000年之间）、古埃及（公元前3200年-公元前500年之间）、古印度（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1700年之间）、中国（公元前5000-3000年之间）、古希腊（公元前800年-公元146年）。当然这个公认不仅时间先后有争议，且还有含义古代不同文明的发源地是分别分裂创造的。这与青藏高原第三极原理考古认为：古文明区块链可证是统一的不合。

推理人类起源及文明的“第一个孵抱期”，是因存在约200万前的第四次大冰川期，而开始迁徙到非洲大陆赤道热带地区的，来自青藏高原的“古蜀人”等古原始人，和非洲那里的古原始人一起生活、杂交，进化为现代人类。在第四次大冰川期开始结束的约20万前，从非洲向东走出进入亚洲，由陆路离开非洲最后的地区只能是古埃及。反之，在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立足起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形成人类起源及文明的“第二个孵抱期”后，其“盘古文明大爆炸”暴涨类似霍金“黑洞辐射”---向非洲“第一个孵抱期”陆路返回的最适合生活地，最近也是在古埃及。所以国际上对古埃及王朝历史的



分期，与古中华文明能对应，大致是：①前王朝时期对应五方区系时期。②早王朝时期对应法天法地时期。③古王朝时期对应叩向自身时期。④第一中间期对应重铸烟火时期。⑤中王国时期对应立足山海时期。⑥第二中间期对应城邦之美时期。⑦新王国时期对应跃起中原时期。⑧第三中间期对应大同王土时期。⑨后埃及时期对应夏朝时期。

而对照盘古王表看古希腊文明在公元前 800 年--公元前 146 年，已晚不在其内，只能大致对应我国的西周末期到西汉初期。我们不赞同徐松岩教授说：“倘若有人把‘伪史论’挪移到埃及、印度、中国等其他文明古国的历史上，那这些文明古国历史的真实性，甚至其是否存在都很成问题”。另外我们也不赞同何新教授说：“杜撰编造关于希腊或者雅典的民主制度、商业文明，以及僭主和王朝，跨海大殖民地，科技哲学文明文化等种种说法，都是出自想象力的虚构作品；是近代西方出于主导世界的政治和文化需要，而订购出来的一种意识形态的虚构产品”。原因，即使是近代西方在编造古希腊文明和其后古罗马文明的“民主制度、商业文明，以及僭主和王朝，跨海大殖民地、科技哲学文明文化等”，也不是开人类文明之先河，而是类似“暴涨宇宙”期的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的最后回光返照。因为神话、民间传说和文献资料，以及智商、情商，并不能让求真的古文明确立---这里需要“科商”：让事实说话，实事求是；不管是朋友还是敌人，不管是政治需要还是文化需要，都能检验成立。

笔者从童年时代起，就听到家乡老人讲盘古王不少美丽动人的传说：笔者家所在的“王家山坪”，远古叫“芳草沟”---像红原草原一年四季盛开着各种香花，这里垭口叫“老窝垭”，它一面对不远处天垣场山坪的“盘垭”口，一面对较远处的冯家山坪后“大风洞”山寨的垭口。这里特殊的地形地貌引出盘古王的诞生---相传 8000 多年前的盐亭玉龙镇梓江河坝陶器工场的规模宏大，被称为祠堂坝。祠堂坝有一位受人尊敬的发明轮盘做陶盆、陶罐的青年师傅，与西仔山的一位能干美丽的渔家姑娘相恋。但他们的爱情遭人挑拨：说祠堂坝只能建 99 座窑，超 100 座定要出乱子，因为姑娘怀孕的儿子将作人王。由此受陶窑主的迫害，这对情人一天星夜，沿西仔山下的梓溪河出逃，黎明走到天垣五面山一侧的垭口。此时一阵阵扑鼻芬芳花草气从另一侧的芳草沟老窝垭口吹来，姑娘肚痛难熬，就躺倒在一块像碾盘的大石上生下后来赫赫有名的浑沌氏盘古王。盘垭口后五面山（也称五庙山）的观象台老司主得知后，帮助抚养盘古在五面山度过了幼年和童年。盘古在老司主的指教下眼界大开，知识大增，胆慧大发，而萌生了创建天下双赢是一家

的和谐社会思想。如东南西北中青赤白黑黄五帝的设置，正是受五面山的启迪而议定的方略。

盘古开创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的献身精神，相传为纪念盘古，到 4000 多年前的大禹将躺过盘母的碾盘石，命名为盘母石；此处垭口旁边的大山被命名为袖头山，并在袖头山下树立了龟碑。20 世纪初梓溪河畔出了一位学贯中西的何拔儒，他留学东洋期间破译了袖头山龟碑上的文字为《盘古王表》，并组织纪念盘古修建起天垣场。

笔者在大学毕业后又调回盐亭工作前，并不相信这些神话、民间传说和文献资料。因为 1951 年笔者开始在天垣场读小学，亲自看到组织的翻身农民捣毁五面山古建筑---这是学校老师带队学生去五面山下大围坪观看。而且天垣场小学一间教室里，有一人多高装满收缴来的各种古书和少量的古画，任由小学生爬在书山打闹，后来也不知这些古书、古画的去向，有说被烧毁了---直到“文革”都说是“革命行动”，对巩固政权有利。

### C、建立古文明“西西里岛和克里特岛区块链模型”研究

徐松岩教授和何新教授的观点，基本代表了中国学术界主流内部存在类似的两派；而认真研读这两派的论点论据，其实是统一的---他们都因不提有人类起源及文明的第二个孵抱期论的青藏高原第三极原理：考古证明存在源于约公元前 6390--公元前 3150 年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及远古联合国。由此“去伪”与“去真”把人类五大古文明何来何去，搞成了类似“李进难题”---“嫫祖诞生地除绵阳市盐亭县外，国内其它省市也还有争诞生地的”。

因主张实地考察的科学家---如地质学家搞冰川冰白考古的韩同林教授赞同第四次大冰川期地球，除赤道地区外曾是一个大冰球，所以非洲大陆赤道地区成为现代人类的起源地---被称为“人类起源及文明的第一个孵抱期”---如果对应“大爆炸宇宙学”，类似宇宙开端的“奇点”大爆炸。又如中科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的所长邓涛教授，他带领的团队通过青藏科考发现冰河世纪中，许多动物的祖先就起源于青藏高原，此后扩散到世界各地---这类似“大爆炸宇宙学”研究后接着“暴涨宇宙学”研究：这是把青藏高原第三极原理及考古证明存在源于约公元前 6390--公元前 3150 年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及远古联合国，对应类似“暴涨宇宙学”，又称为“人类起源及文明的第二个孵抱期”，可再联系霍金黑洞辐射理论。

即人类从高等动物起源的统一性，联系青藏高原第三极原理的西藏雪山高原，因带耐寒基因的古人下到巴蜀盆地生活，通过吃熟食（烧烤，熟、苏声、蜀义）再进化，在约 200 万前的世界第四次大

冰川期开始后,迁徙到非洲大陆赤道热带地区,与那里的古人类一起生活、杂交,进化为现代人类。在第四次大冰川期开始结束的约20万前,从非洲走出,分陆路和海路在约10万--2万前在亚洲东部海岸折回,终于在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立足起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如果把“人类起源及文明的第二个孵抱期”类比“黑洞”,那么类似霍金黑洞辐射现象:例如,约20万前从非洲走出的还分散在巴蜀远古盆塞海文明外的现代人,也会不断地被吸引进入这个“黑洞”,加入到文扬教授说的“天下人”队伍的“远古联合国”;但逃逸离开的也许就是北京国际旅行社领队李志杰导游一路说的早期“维京人”的祖先。

事情并没有完,“黑洞”---第二个孵抱期的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立足起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及“远古联合国”,并不像霍金黑洞辐射理论说的宇宙黑洞在吸进正量子后,会因正、负量子中和,慢慢收缩变小。因为“远古联合国”的巴蜀盆塞海山寨立足起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还有一个类似的“暴涨宇宙”期---从西南少数民族传说盘古王南迁和夸父追日等神话故事,暗示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古中国中原、古希腊等世界上的五大文明发源地,就是“暴涨”扩散到古印度、中东、埃及和古地中海克里特岛、西西里岛等地领头的人文始祖造就的。最好的说明是这五大文明发源地,都在北纬30度到40度之间的狭长地带内:古黄河中原是东面一端,西面另一端是古西西里岛、克里特岛、埃及、巴比伦和印度,且以青藏高原成大致对称。也许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的“盘古王传说”和《盘古王表》传说,就是亚历山大国王和帝国传说的母本。

#### D、古文明也要讲究“区块链”才能“去伪”和“求真”

解决徐松岩教授和何新教授的观点争论,需要引进一个类似“区块链”的新概念---“区块链”是2008年末化名“中本聪”的人,在论坛发表的《比特币: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文章中首次提出的,特性是去中心、开发性、信息不可修改和自治性等---区块链本质上是一个不断增长的记录列表,区块链上的数据被分组在不同的块中,所有的块都分布在点对点网络中,这些块会彼此链接并用加密技术来进行保护。建立古文明研究“西西里岛和克里特岛区块链模型”,是

把它作的延伸应用:把类似“暴涨宇宙”期的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遗存,比作区块链上的数据共享平台。

后续研究者,可通过基于类似“西西里岛和克里特岛区块链模型”的人类五大古文明在区块链上的研究数据,对比查阅和引用。因为人类起源及文

明源流的统一性行为,均会被区块链网络自动记录下来并载入区块链中---这也类似“天眼、天网工程”中的探头,近年来城市的公交扒窃发案率下降,原因之一是增加了公交车内的监控探头。又如基因破案的广泛应用,因为基因也类似区块链,罪犯的基因在其亲人和族群中会保留有部分相同的密码,公安警察破案利用罪犯残留的基因,可以在大量的人群中缩小调查范围到罪犯的亲人和族群。类此,量子也类似区块链,如量子纠缠和量子信息隐形传输。

再查看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又称两河文明,是指在新月沃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所发展出来的文明,主要由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亚述等文明组成。中心在现巴格达一带,北部古称亚述,南部为巴比伦尼亚。巴比伦尼亚北部叫阿卡德,南部为苏美尔。有学者称古苏美尔现代人类来自青藏高原的“古蜀人”;但这里暂不分析,而看克里特岛文明和西西里岛文明。

笔者没有到此地旅游过,但据中科院邓涛教授到过其一的亲自考查说:“西西里岛不仅是文明的交汇处,也是连接东西方的桥梁。它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接受希腊人的殖民,在公元9世纪遭到阿拉伯人的入侵,自11世纪之后则由诺曼人统治。由于千百年来种族的融合,斯提凡诺教授介绍说,现在的西西里人说一种特别的意大利语方言;因为太特别,也几乎可以说是另一种语言,其他意大利人很难听懂,而对我们来说都一样,就是完全听不懂。只有那些古老的建筑,希腊的、罗马的,拜占庭、阿拉伯,诺曼朝、波旁朝,一直矗立在原地,默默地叙述着历史深处的故事”。对此查阅古希腊文明(克里特岛与迈锡尼文明),即爱琴海是古希腊文明的摇篮。约在公元前2000—公元前1700年间,希腊的克里特岛产生了君主制国家,王宫的建筑群和象形文字的出现是其标志。约公元前1400年克里特文明销声匿迹,中心移至希腊半岛,出现迈锡尼文明。

古希腊不是一个国家的概念,而是一个地区的称谓,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和爱奥尼亚海上的群岛和岛屿、土耳其西南沿岸、意大利东部和西西里岛东部沿岸地区。公元前1000年西西里已有人居住。该岛处于地中海中心,其战略位置使其成为历史的交会点、征服和建立霸权的工具以及来岛上冒险的武士和商人所属十几个民族的大熔炉。前8-前6世纪,希腊人来西西里岛上的城镇定居。前3世纪,成为罗马的第一个省。古希腊紧邻地中海和爱琴海,所以古希腊文明又称海洋文明。克里特岛文明与迈锡尼文明合称爱琴文明,历时800年---即古希腊文明先后经历了爱琴文明时代(公元前20世纪到公元前12世纪)、黑暗时代(公元前12到公元前8纪)和城邦时代(公元前8纪到公元前4纪)。

而罗马文明是古希腊文明基础上的发展——古罗马文明（后期分为两个罗马帝国，再后来被德国吞并，古罗马文明消失）先后经历了王政时代（公元前 753~前 509）、共和时代（公元前 509~前 27）和帝国时代（公元前 27~公元 476）。即古罗马是一个国家，最初古罗马的地理范围仅限于台伯河畔的罗马城，后来扩展到整个意大利半岛，最终成为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

#### 4) 汉语的源头在约 7200 年前中国北方论不完备

如果说徐松岩教授和何新教授争论的观点是统一的——前者含“去真”、后者要“去伪”，都不提有人类起源及文明的第二个孵抱期论的青藏高原第三极原理，那么在语言学上汉语的源头在哪里的问题，目前国内外专家跟进这类不提有人类起源及文明的第二个孵抱期论的青藏高原第三极原理的人更多，更喜欢“去真”。

#### A、汉语源头约 7200 年前的中国北方论完备吗？

2019 年 7 月 21 日《参考消息》网报道，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历史科学研究所的约翰·马蒂斯·李斯特教授等认为，汉藏语系的源头可追溯到 7200 年前的中国北方——如果说汉语最早的规范统一追求在中国北方，还符合语言学起源研究的基本原理的话，那么德国人更不了解，即使汉语在国家政权的高压下，文字语言规范统一了几千年的中国，方言在汉语使用的同一个省内，在不同县的人说的“土话”中同一个字的读音，区别都还很大；外国人没有亲自深入内地长期大范围跟踪了解，如何研究？况且像上海“土话”，广东“土话”，听不懂的其他人不在其数。所以即使在中国的权威专家之间，也有分歧。

例如，有报道川大著名国学大师蒙文通教授为“隗”姓打赌，参与的也是川大著名学者徐中舒教授和冯汉骥教授。蒙文通教授说：“隗”姓读 wěi，徐中舒教授和冯汉骥教授认为的读音又各不相同，三人各有所据，相持不下，还赌了一桌成都中华老字号餐饮老店荣乐园的酒席——起因是 1953 年一位进四川大学历史系的学生隗瀛涛，全班 37 个人，他读大学 4 年，几乎每次考试他都能考第一名，但同学中，有对他的“隗”姓念“鬼”的，也有念“槐”的。所以“隗”字的读音，学校提到中国的权威专家之间来讨论，也解决不了。后来蒙文通教授建议：“姓从主人，喊隗瀛涛本人来问以定输赢”。

隗瀛涛一天突然被叫到校长办公室，看到三位老教授端坐桌前。蒙文通教授亲切地问：“你叫什么名字？”隗瀛涛不解其意，惶惑而恭敬地回答：“我叫隗（wěi）瀛涛”。蒙文通教授一听，望着徐中舒教授和冯汉骥教授抚掌大笑：“我赢也”。这里的事情，幸好汉语拼音的注音后来国务院已公开颁布有统一的标准，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全国统一的

国家权威的汉语拼音注音，今天要传达蒙文通教授和徐中舒教授与冯汉骥教授之间的争论，也难办。

事实一是：同济大学朱大可教授 2014 年出版的上下册《华夏上古神系》一书，主张中华古文明来源于西方。他书中就用到古文字、语言的拼音注音分析，但他用的拼音注音方案不说来自哪里？是否有统一的权威的拼音注音标准？只管自话自说用其自己的标准去解读证明，使人不知所措。二是 1980 年移学美国的朱学渊教授，1965 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1978 年考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他写的《“女真/九姓”是华夏民族最重要的祖先》、《夜郎国在哪里？》等文章，认为汉人起源于北方人。如他说：“关于中国人类、语言，按现代人类学和语言学的表象来辨证一个古人的血缘和语言，华夏民族的祖先是北方民族的同类”。朱学渊教授也是对他用的拼音注音方案不说来自哪里？是否有统一的权威的拼音注音标准？只管自话自说用其自己的标准去解读证明。三是 2019 年 4 月 25 日复旦大学的张梦翰教授及团队发表在国外《自然》杂志的《语言谱系证据支持汉藏语系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起源于中国北方》一文，认为原始汉藏语分化成现代语言的最早年代在距今约 5900 年前的仰韶文化及马家窑文化时期，地点可能在中国北方。这与西南起源假说相比，也不完备。

汉语、藏语、羌语、缅语等 400 多种东亚语言被认为拥有共同的祖先语言，合称为汉藏语系——这正是在第二个孵抱期的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立足起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及“远古联合国”的核心地带。该语系是世界第二大语系，母语使用人数仅次于印欧语系。张梦翰教授等对 109 种汉藏语系语言的近千个词汇词根-语义组合进行谱系建模、重构汉藏语系诸语言间的亲缘关系分析，对用的文字拼音注音方案不说来自哪里？是否有统一的权威的拼音注音标准？也是只管自话自说用其自己的标准去解读证明，闭口不谈“说话的语言并不等于书本记录的文字”等因素。可见一直以来“造伪”和“去真”的各类语言学家之间，对汉藏语系内部各语支亲缘关系、分化时间以及起源地点的争议，得不到过源语实验的统一验证解答。所以都是“北方起源说”，张梦翰教授的约 5900 年前，比李斯特教授的约 7200 年前要晚 1000 多年，李斯特教授期待与上海同行们交流说：“双方研究的数据和方法都是透明的，这样我们能进行一场富有成果的讨论”。

但这种透明，张梦翰教授等讲的是符合语言随农业扩散的观点，说扩散的时间点与考古证据相符——此前的考古证据，揭示出独特建筑形式和陶器类型向南扩散的特征。而马普研究所的李斯特教授等讲的是，采用约 180 个基本词汇，这些词汇在所有进行比较的语言中都有相应的称谓。比如，眼睛，

石头、我、你、早晨等等。然后将这些词汇输入电脑进行比较。除了制定词源谱系之外，还特别关注了农耕家庭的相关词汇。复原原始词汇后他们发现，汉藏语系原始语言中已经有了粟、羊和猪等词汇。考古发现，公元前 5000 年中国北方已经开始种植粟，但还没有水稻种植。即没有稻、大麦或牛等词汇，这同考古学的研究结果相吻合。这里有两个悖论，一是他们的观点是先入为主---先就建立汉藏语系产生于中国北方，才作搜集对大约五十种古代和现代汉藏语言进行的分析比对、制定词源谱系，复原语言源头的基础词汇比较---如两种语言之间存在大量同源词，即可认为这两种语言属于相关语言。反之，同源词越少，说明两种语言的源头相差较大，两种语言分开并独立发展的历史也越悠久。

但马普研究所的专家也承认：人们对汉藏语系语音和语法演变历程的研究不像印欧语系那样彻底，因此语言学家只局限于有充分记录和描述的语言。可见他们违背了“说话的语言并不等于书本知识文字”的基本常识。第二个悖论是，与考古发现的实际不符---公元前 5000 年中国北方没有水稻种植，不说“稻”话，不用“稻”字，不等于中国南方不种水稻，不说“稻”话---2017 年 6 月长江下游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开建开挖地基时，现代器械破开土层，翻挖出 5000 年前堆积的已经炭化了稻米。如果不是真的，国家不会让 400 万的前期投资打水漂，因为这才是硬证据。而且 1988 年湖南澧县彭头山早期新石器文化遗址，发掘出土了稻谷遗存，距今约 9000 多年，将中国的稻作历史推前了 2000 多年。这事实有利汉藏语系起源于西南说。

因为说“稻”话的还有，1973 年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大量距今约 7000 年的炭化稻谷和原始耕作工具，比当时认为最早的印度的稻作历史早 3000 年。1993 年至 2005 年湖南玉蟾岩 4 次挖掘，发现距今约 14000-18000 年的古栽培稻和原始陶片。1995 年湖南澧县八十垱遗址，发现距今约 8000 年的古水稻。1996 年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发现世界最早的古稻田，距今约 6500 年。2004 年浙江余姚的田螺山遗址，出土了大量距今约 6500 年的古代稻谷。2007 年湖南澧县鸡叫城遗址，发现大量炭化谷糠和完好的灌溉系统。2012 年至 2017 年浙江良渚古城遗址，发现大量炭化稻谷及古水利工程。2014 年湖南澧县宋家岗遗址，考古发掘出土距今约 9000 年的炭化稻米。

### B、远古蜀人与野外烧烤的源语统一实验

与汉藏语系北方起源说相对，持西南起源说的学者认为，汉藏原始语言的历史更为悠久，大约在一万年前就已开始分化为不同的语言，该语系来自当今中国的西南部四川。这就要求重视类似上古的语言文字的“源语”、“母语”的研究，统一“源

语”、“母语”可重复实验证明的标准。这类似文字的拼音注音方案要说来自哪里？有统一的权威的拼音注音标准是啥？而不是只管自话自说用其自己的标准去逻辑证明。例如，何新教授出版的《诸神的起源》一书中，以女娲中的“娲”和嫫祖中的“嫫”，“女”旁换成“虫”旁，都是一类物种如“蜗牛”或叫“螺蛳”，以此论说女娲和嫫祖是同一个人。

“去伪”或“去真”的各类语言学家、历史学家等，不管如何文思敏捷，才华横溢，不到盐亭远古遗址乡下扎根住上几年，钻研那里的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遗存等这类进行的实地考察，那么这类学者，从书本到书本，分析加分析，随便怎样写都会有理。1999 年 5 月 1 日《绵阳日报》发表《“蜀人”与烧烤》一文，科普现代语言学的前沿研究---这是把世界上所有语言追溯到遥远过去所说的一种源语。

马普研究所的李斯特教授等讲约 180 个基本词汇，比如他们说的“眼睛，石头、我、你、早晨等”，是“源语”吗？即使是，也难怪可用作重复实验证明的标准。因为所谓的源语是指，或是在第一匹马被驯服，第一只狗不畏缩地被带到篝火旁以前很久，就再也听不到了的最古老的那些原始母语。遗传史和语言史大致对应得出人类群体分裂，并形成孤立的群体时，两者都发生着相似的分化变异。在这一研究大潮中，学者们注意到中国的“蜀”字。传统认为“蜀”为地域称，图腾称，等等，这些解释都对，但都能被现代的母语说或源语所统一。源语的统一实验，类似野外用柴火或用烧得滚烫的鹅卵石，烧烤鱼虾、笋子虫、虫蛾、蚱蜢、粹蛇、蚯蚓等一类统称“虫”等小动物或生鲜肉，会闻到一种食物的香味，听到一种“苏苏”的烧烤响声。

把这幅“蜀”文解字图联系验证上古的语言文字的“源语”、“母语”的实验推论，就类似原始的蜀人扎堆吃这种烧烤的时候，因非常好吃，而且香味扑鼻，随着烧烤发出的“苏苏”响声，有人最先学着喊叫出“苏苏”声，接着大片人群也附和喊叫出“苏苏”声。这就是蜀人最早的源语或母语。后来这类现象成为了一种习惯，外来的原始人群见之，也就把四川这里的原始人叫“苏”人，或“熟”人。再后来变到源语或母语，变成了有语言和文字，“苏”人或“熟”人的叫法，被规范为了“蜀”人。即“蜀”人实为第一批吃熟食的“熟人”，成熟的人，文明程度很高的人；这是其他原始部落对他们的看法和习惯，当然也含有他们本身一些语言和习俗的特征。

例如从“熟”人、“蜀”人到“苏”人，有学者想到两河流域出现的苏美尔人可联系“蜀”人。按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著的《全球通史》讲：“苏美尔人似乎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人

的一支；这一支很奇怪他们的语言与汉语相似，这说明他们的原籍可能是东方某地”。湖北学者胡远鹏先生就直说：苏美尔人就是蜀人，这从《山海经》以及《旧约》可以得到印证，这个“东方某地”就是中国的四川。再据保存盘古王表地方的天垣传说：盘古王在盐亭县祠堂坝领导爆动建国后，并没有实行终生制，而是以“传播发明、天下大同、幸福共享”作为立国之纲，率先垂范。他卸位后带领部分人马行舟渡海到南边云南，进入缅甸，沿印度的恒河水，横穿印度出海，乘阿拉伯海的季风，进入波斯湾沿海峡，再到达阿拉伯半岛和幼发拉底河流域，是第一代苏美尔蜀人的来源。以后又从埃及和两河流域渡过地中海，先后在克里特岛和西西里岛等复制“远古联合国”的巴蜀盆塞海山寨立足起的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因此中国南方多盘古王的传说。

### C、盐亭字库塔与界碑指向文字起源

文字的统一使用与说话不同，而与政权的更替，执政者的选择、规范、强制、推行分不开。如秦始皇推行的“书同文”；新中国解放后推行普通话的汉字拼音注音标准方案。有学者说：“据现在四川的青川木椽文字（这枚木椽现在保留在四川博物馆中）看，可以证明，在公元前 500 年的时间区间中，当时的蜀地已经出现了方块汉字的雏形，而且有了很经受得起时间磨砺的记载的‘木椽’载体。到了秦朝和汉初时代，文字已经完全隶书规范化，其与今天的中文基本上一样了，记载载体也多样化，有了帛书等。但是，尽管如此，中国的史学的发达，还是在东汉时代以后了，也就是公元 105 年蔡伦制造出了纸张和公元 1000 年左右中国发明了活字排印以后，同时也与东汉通过《熹平石经》统一了五经文本有关系”。

那么人类五大文明古国最早使用的文字，是否就与第二个孵抱期的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立足起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及“远古联合国”无关呢？不是的。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称为远古“太极”期，理性、逻辑思维被分为“藏象论”和“藏数论”。象形文字属于藏象论，字母文字属于藏数论。这里先说远古联合国的字母文字卦爻，这是《易经》最早的基本符号文字，由横线的阳爻“—”和横线中空白的阴爻“--”两种爻象组成。但把阳爻“—”减去阴爻“--”等于一个“点”（— -- = •），类似可显示在电脑上一样。如果保留“•”点子显示的卦爻，按每卦三爻重叠排列，可构成 26 种卦爻基本符号，恰好对应 26 个汉语拼音文字类似的 26 个英语字母，而具有集注音、释义、编码、缩写等于一体的功能，可承担起传递上古语言和信息的任务。这就是所谓远古联合国广泛使用的太极语卦爻文字。

这种字母文字是远古联合国集大成的远古文

化科学之一，可以说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古老、最伟大的经典杰作创作。它始于约公元前 6390-公元前 3151 年的远古联合国的“以富扶贫、以下推尖”政治的良性循环时期。后历经神农、黄帝、尧舜禹、商汤伊尹、周文王、周公，孔子等薪火相继 4500 年，上下传承 6500 年不灭，最终约在从 2500 年前以后到秦汉，才结集完成。这奇怪吗？不奇怪。在第四纪大冰期前后两端，形成有过人类共同基因、语言和文化起源的两个孵抱期。特别在第二个孵抱期，这是个“多难兴邦”的特殊时期，大自然灾害逼迫原始社会的人们，团结救灾、团结抗灾，才自然成就形成了巴蜀盆塞海及四周内陆山寨城邦中的远古联合国。但团结救灾、抗灾需要发展生产力做后盾，而科技创新，就成为人们对生产力的第一源泉的认识。在这第二个孵抱期里，游团、部落、酋邦组织形态都有，但只要它们的头人，在远古移民和远古贸易等相互交往中，和谐共处，不以战争和暴力处理内外事物，就都是远古联合国大同世界的成员。而且远古联合国的政权人物，也是以科技比赛来当选的。因为有发达的科技，才能“以富扶贫”；而“以下推尖”的选苗助长的教育模式，也为远古联合国的政权人物以科技比赛来当选的办法打下基础。

那么那时的科技文化水平有多高呢？众所周知，人文始祖嫫祖是以发明丝绸当选远古联合国的政权人物，因为远古发明的丝绸，就类似今天的生物工程高科技。人文始祖伏羲，在教人结网捕鱼，遇到湖塘水面上的旋涡；教人制土陶生火做饭，看到锅中沸水的翻滚，已领悟和觉察到了圈态的线旋。为了表达和传授这一数学概念，他动了不少脑筋。例如，他把摆卦爻用的草节茎棍，带来的蓍茅草叶，圈起来扭转比划，正是在这里发现类似莫比乌斯圈的太极图、八卦图等有趣智慧时，还推进发现的卦爻 26 个供拼音的集注音、释义、编码、缩写等功能于一体的太极语卦爻文字。这也类似美国摩尔斯发明电报机的点、横线电码文字。1832 年摩尔斯把 26 个字母的信息传递方法加以简化，这样电报机的结构才会简单一些。

用什么符号代替 26 个英文字母呢？摩尔斯画了许多符号：点、横线、曲线、正方形、三角形。最后，他决定用点、横线和空白承担起发报机的信息传递任务，为每一个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设计出代表符号，这就是皆由不同的点、横线和空白组成的为每一个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设计出代表符号的电信史上最早的编码----“摩尔斯电码”。也终于在 1837 年他制造出了一台电报机。按下电键，便有电流通过。按的时间短促表示点信号，按的时间长些表示横线信号。这样由电磁铁控制的笔也就在纸上记录下点或横线。此后，摩尔斯的电报机经

过许多改进,被迅速推广应用。神奇的是,约在 5000 年前巴蜀盆塞海干涸前,远古联合国时期也打造过这类由点“•”及横线阳爻“—”和横线中空白阴爻“--”等三种爻象组合的太极语卦爻文字。但随着盆塞海的干涸,和四分五裂大迁徙的人类社会进入游团部落酋邦时期,它就失落了。但另四大文明古国的字母文字,则继承、创新保留了太极语卦爻文字的注音、释义、编码、缩写这部分功能。

那么四大文明古国最早的象形文字——汉字的甲骨文;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古代埃及的象形文字,包括祭祀体、世俗体、科普特体;以及古印度的印章文字等,有统一的起源吗?有。它们都与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及“远古联合国”时期,各游团、部落、酋邦组织,以及众多密集山寨城邦,划分势力范围最早兴设立的“界碑”有关——这也许是从动物世界流传保留下来的划界习惯。界碑分木头和石头两类质料,和有字迹、刻画和无字迹、刻画两类标识。为保留长久,界碑一般是界石和有字迹、刻画类型。界石是一种边界标记物,是用于辨别一个地区与另外地区之间的边界位置和走向,保留至今。

例如,国家、省、州、市,甚至是农场和社区的边界。在两地区之间的边界走向发生方向性改变时,界碑尤为有用,可以作为指示边界走向的标志。界碑在直的边界上也可作为仅表示边界所在位置的标记物,作地界标志的石碑。盐亭发现 4000 多年前的古界碑,1995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何九盈等人的《中国汉字文化大观》一书,披露王襄搜集的盐亭县距今约 5000 年前的一块完整的界碑,上面刻有 50 多行类似文字的符号,与半坡彩陶刻划符号相类似,并公布了其中的 25 个字符。随着界碑文字的出现,因界碑的神圣和庄严,使文字及其载体的意义也变得神圣和庄严,这就是字库文化的产生和兴起。

笔者在童年时代印象最深的是,不准写有字的纸或印有字的纸当手纸,废书、废报、废纸也不行;小孩子用了要挨打。穷人家也一样,家里都有废字纸篓,垭口、村口都有烧废字纸地方的山岩洞,稍大乡镇和村庄还建有字库塔,大小不分。这种保护文字的风俗,也许与《中国汉字文化大观》说的约 5000 年前以来的界碑文化有关。字库塔是盐亭独具魅力的历史文化现象。一座座字库塔,让人真切地感受到弥漫在盐亭大地上的书香气息,感受到盐亭人民自古以来对文字的敬惜,对文人的敬仰,对知识的崇拜。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约留存字库塔 251 座,在嫫祖故里盐亭,至今还保留着 31 座,其中,“惜墨如金坊”是中国迄今为止唯一的字库牌坊。

盐亭堪称中国字库塔“第一县”。字库塔,叫“字库”或“惜字宫”,它是古人专门用来焚烧字纸的建筑。据史料记载,字库塔始建于宋代,到元明清时已经相

当普及了。目前在四川,保存最完好规模最大的字库塔在绵阳市盐亭县,仅图文记载的字库塔就达 29 座。在盐亭麻秧乡檬子村,还有一座全国唯一的关于字的牌坊——“惜墨如金”牌坊。盐亭县的字库塔分布之广、数量之多、造型之丰富,在国内首屈一指,有国内“字库塔第一县”之美誉。

## 5、“天下人”与维京人分水岭青藏高原第三极原理

何新教授的“新浪网”上博客 2019 年 3 月 26 日发表《高级黑:一切文明起源于中国?》的文章说:最近有论坛上出现一批耸人听闻的奇谈——诸如英语来自古汉语,英国人的祖先来自中国湘西;鼓吹一切西方文明都起源于中国的各种胡说八道,无不破绽百出,基本毫无根据,多数用似是而非之论冒充为学术定论。以老夫的眼光看,无非是有人要阻遏近年兴起的对西方伪史的各种合理的怀疑,以耸人听闻的极端主义胡说八道,来解构人们对希腊、罗马、印度伪史的种种合理怀疑,从而把这种合理怀疑淹没进一片貌似文化的胡说八道之喧嚣中。从而,让不明真相的人们发生困惑、疑惑。不过老夫早就老糊涂。老夫有时甚至相信,何止全部文明,也许全人类都起源于中国 DNA——别说老夫是胡说八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但何新教授之前,在“新浪网”上博客还转载发表过《驳斥鼓吹人类起源非洲的洋奴》的文章说:目前非洲起源说不可推翻,但非洲单源说绝对不占上风,亚非都分别出土各阶段年代相近的化石,于是单源论者就找借口他们都不是现代亚洲人的祖宗,他们在非洲人过来之前就已经灭绝,要不被非洲人杀光,这是找不到理由的自圆其说。先来分析灭绝说,单源论者能给出古亚洲人具体灭绝时间的证据吗?他们理由是冰期把古亚洲人都冻死了,他们不知道冰河期波及范围就来妖言惑众。事实上冰河期中国南方并未受到太严重影响,东南亚和南亚仍然一堆跟非洲赤道一样温暖的热带雨林,东南亚也出土了那时代的化石,证明冰河期亚洲人类并未灭绝。

接下来分析屠杀说,先不说原始部落山长水远能一个不漏屠光当地人几率如大海捞针,究竟非洲人有什么比亚洲人优秀的地方?为什么只有他屠杀别人没有别人屠杀他?而且作为外来者对环境适应性不如当地人,部落争斗都是为了生存,不到饥寒交迫地步谁会跟别人拼命,原始人类种族辨识度低,种族内部自相残杀不亚于种族间,谁能保证看着跟自己相似的物种不会误认为同胞互相融合,中国也出土了各阶段化石体征也符合。

于是单源论者就改玩基因,把它们歪曲成只是长得相似的堂兄弟,太久远的化石无法提取 DNA,他们这招其实是自抽,非洲远古人类化石也无法提取 DNA,意味着否认古亚洲人是现代人祖宗,等于

也否认古非洲人是现代人祖宗。他们又拿非洲人基因多样性和最古老的基因。在非洲还有离非洲越远，因素越少说事---假设有这个可能性，非洲其中一支迁徙欧亚，把当地人杂交掉，语言影响当地人，杂交的后代又同化更远的地方如此类推，所以离非洲越远基因越单一和因素越少，至于谁的基因更古老根本无法判断不值一驳。

单源论者把非洲单源论，跟宇宙大爆炸相提并论，请不要侮辱宇宙大爆炸。早期欧亚非古人类化石，化验 DNA 三样其中之一证据，非洲单源论和多源杂交论可能性也就五五开，谈不上哪个占上风。至于生殖隔离，他们把多地起源狭义化，理解成只有各地猴子独立进化成人才算多地起源，多地起源不一定要完全断绝来往，在每一阶段进化过程中，只要各种群一直保持基因交流就不会生殖隔离。有人说：在文史研究问题上，要谨记钱学森先生的告诫：“有几分科学证据，说几分话”---妄自菲薄和妄自尊，大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无助于深入研究问题。但这也不容易，文史研究是政治与科学交汇；科学还有理论的近代与前沿，验证还有先进仪器的使用和一般的分析。

例如，李进省长提出的“嫫祖诞生地除绵阳市盐亭县外，国内其它省市也还有争议”的难题，要解决，面对国内国外的各自为阵，说明不是一批专家单纯用史料和文物能决定下来的。本文借用“维京人与‘天下人’世界比拼”来科学解读，是几十年间笔者与各派专家交流的最新感受---到“北欧四国丹麦、瑞典、挪威、芬兰+俄罗斯”等旅游，看到各路导游宣讲，把早期“维京人”的工匠、水手、探险家、商人和海盗、掠夺、杀戮行为等结合的历史，以致把所谓“宫保鸡丁”说成今天的旅游资源：“宫”是看皇宫；“保”指看城堡；“鸡”指看“基督教堂”；“丁”指看“议会厅”---使后维京很有成就感。

实际却是这样，世界第三极立足于珠峰映射原理---青藏高原是人类共同的舞台，世界淡水塔，是人类最早活动之地；青藏高原东西两面分开形成今天的不同，中国科学院汪品先院士说：青藏高原两边是“东亚文化赶欧洲文化”的实际情况；他呼吁建立“中国学派”。

### 1) 维京人与资本主义社会和无产阶级革命

汪品先院士说，科学创新要求有文化基础，青藏高原两边的东亚文化和欧洲文化，正是当今世界多种文化中的两大主流---现代科学产生在欧洲，占据着自然科学界的主导地位；而东亚文化的主体在中国，一旦也能成为科学创新的基地，也必然会产生出自己的学派。

#### A、中国学派的当代困境

汪品先院士说：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的基

础研究突飞猛进，从追赶尾随开始发展至今，已经到了重新考虑战略布局，实现“转型”，“问鼎”学术引领层，也就是出现“中国学派”的时候。但由于自然科学的国际性质，学派需要国际承认，靠国内宣传或者册封都是无效的---真理只有一条，但通向真理的道路却不止一条。通过师承共事或者学术争论，学术界会形成不同风格、不同观点的团队或者团队群，这就成了学派，各自从不同的角度、通过不同的方法作出科学贡献。拿我自己从事的海洋地质专业来说，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北大西洋，就被认为是海洋的标准。海洋如何产生是海洋地质头号的大问题，北大西洋海盆的张裂过程，于是大家都相信这就是真理。

但汪品先院士说，最近几年在南海三四千米的深海底，大洋钻探计划用六个多月打了 12 个站位的深井，取上来 300 多米海盆张裂时的岩浆岩其研究结果，却挑战了传统的认识---中国的古文化里确实含有不利于科学创新的成分，历史大浪淘沙的结果，现在中国在世界基础科学的舞台上处于被动地位。面对现实，当发现与前人所说不同时就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削足适履”，尽量去凑乎原有的模式；一种是根据新的发现，去完善、甚至去纠正前人的模式。后一类的成果当然不容易发表，因为评审人一般都不喜欢反对派。因此，还需要由管理层面出手，采取措施鼓励新观点、甚至新学派的出现。至于科学家个人，两百年来我们对西洋文明的态度经常摇摆，不是崇洋媚外，就是仇洋排外。这两者的根源其实都是对“外”并不了解，只有知己知彼才能平起平坐，既不尾随紧跟，也不夜郎自大---当前国内评价系统贬值，“国际领先”的标签随意乱贴。在科学上只有建设独立发展能力，形成自己的学派，才会真正确立国际竞争力；只有将民族传统与先进科技相结合，才能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权。

这使笔者想到 2019 年 6 月 16 日第七届四川省嫫祖文化研讨会，段渝会长的《巴蜀艺术与近东文明》学术报告中，用李济先生的“英雄擒兽”图式，把四川三星堆遗址中的部分古文物，与中东西亚等方面的古文明国家的文物作对比，也发现很多类似并有创新的“英雄擒兽”图式，这虽是有学术水平的研究。但在《南渡北归》书中，讲述李济先生在抗日战争中央研究院历史所西迁成都李庄的艰难岁月，不辞辛劳整理研究殷墟遗址上被随同西迁的古文物，但由于我国中原文明发现的古文物遗址，在编年历史上比中东西亚等方面的古文明发现的古文物遗址，时间要晚一些。这使三星堆等考古发现的成就，和这种类似的对比，在今天已却被苏三、朱大可等一批学者著述认定为“中华文明来源于西方文明和中东西亚文明”---这是否正确呢？

其次，当天会上雷波县总工会苏杰兵主席的

《古蜀文明与“宇宙人文论”的历史渊源之我见》报告,谈古彝文---苏杰兵主席是彝族人,曾与吴华清先生发表《浅析彝族古彝文与三星堆金沙图鸟文以及汉文英文的字母关系》论文,都与刘尧汉教授认为:云南金沙江南北两岸是中国文明的源头一致。但古彝族和汉族源流时间上如何统一?

### B、维京人与最先的资本主义及转型之谜

欧洲学者把古希腊和意大利最早居民排斥在“维京人”之外,与以资本主义的兴趣划线有关。14世纪从经济基础上看,意大利已有资本主义的因素产生,新兴的资产阶级在各方面都需要突破封建制的束缚,文艺复兴可以说是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在文化战线上,反抗封建势力的一大胜利。当时的人道主义也就是14世纪至16世纪当欧洲的封建制度开始崩溃,原始资本主义积累刚开始的时期,出现的文艺复兴先进资产阶级宇宙观。当时新兴的资本主义要求解放个人,并废除对于经济的束缚,因此在文学上便发生了主张个人自由的宣传。

在追求理想的社会制度中,当时的思想便转向古代的希腊和罗马,所以人道主义的时代也就成了古代的文学和艺术的时代。那么最先单独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是谁呢?是荷兰。这里有很多因素。1588年英国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成了海上第一强国,于是海外贸易大大地发展起来,资产阶级得以积累雄厚的资本,这就是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情况。而尼德兰原为西班牙的属地,在16世纪时工业已趋发达,而不堪西班牙的重税繁刑。惧西班牙工商业的凋敝覆辙的尼德兰的资本家们,因信仰新教(喀尔文教)又受到西班牙异端裁判所的迫害,甚至尼德兰的贵族和天主教僧侣都感到西班牙腓力二世的排斥(因西班牙想将尼德兰自治区并为行省),因此新贵族与资产阶级于1565年结成秘密组织,发动人民起来向西班牙革命,腓力二世用了阿尔发公爵的恐怖政策,在尼德兰设所谓“除暴委员会”,当时称为“流血委员会”,用宗教法庭残酷地镇压尼德兰人,被处死者超过8000人。尼德兰小贵族们所领导的森林游击队(西班牙贵族称为森林乞丐)也被消灭。

1572年尼德兰北方工人和水手组成海洋乞丐,荷兰和西兰两省的总督奥兰治的威廉,组织了雇佣兵和西班牙人作战。后北方诸省组成联邦径直称为“荷兰共和国”,又由英国舰队的帮助,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腓力二世终被迫于1609年承认荷兰共和国。荷兰的资产阶级的革命到此便因人民的力量,取得胜利,而后他们便独吞革命的胜利果实,并且在海上大力发展贸易,东至亚洲,西至美洲。

经济上富裕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掌握了三级会议大权,所以17世纪的荷兰,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荷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说明了

下层人民及工人阶级是共和革命的主力军,必然会最后占据整个共和社会和联系青藏高原东亚“学习”远古巴蜀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积淀的“天下道”。当然,荷兰革命后的强盛,给英国也给欧洲提供了建立传授“学习”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榜样。同时也完成了欧洲“维京人”改头换面,书写曾创新远古历史的前奏。

例如,当代俄罗斯学者苏尔科夫教授说:“俄罗斯就是一种独特的文明。俄罗斯历史上的国家模式内核形式---作为一种文明型国家,要立于欧亚大陆中心地位,不要做中心的边缘这样的思想,就是俄罗斯的生存发展模式”---“俄国历史上在15-17世纪,伊凡三世所建立的莫斯科和全俄大公国;18-19世纪,彼得大帝建立的俄罗斯帝国的形式;在20世纪,列宁建立的苏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俄罗斯国家模式虽表现不一,但内在本质的国家历史结构要素是一致的”。

苏尔科夫教授著书立说,毫不讳言在俄罗斯的意识中,东方总是落后的,西方是先进的。俄罗斯在历史上国家结构的基础,本质就不是深暗国家,其“外生性”---即日益强大的、领土不断扩张的多民族一体性,“使俄罗斯从来都认为军事的重要性高于经济,高于从事贸易的商人。这也符合俄罗斯国家历史上钟摆式的发展规律:俄罗斯的历史总会有一个爬坡、强盛、崩溃、衰败,再起来再爬坡的过程。在俄罗斯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总有一批这样的人---他们可以是财政预算人员,是公务员,也可能是工人,也可能是农民,散布在俄罗斯国内,做调查也调查不出来,通过社会学问卷也调查不出来,但是当俄罗斯国家历史出现衰败转折的时候,这批人可以把国家拉回正确的轨道---俄罗斯实行保守主义也好,自由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最终实行都是符合俄罗斯传统价值观的发展道路”。

其实,苏尔科夫教授作为欧洲“维京人”的后裔学者,他把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和无产阶级革命发源,混淆联系在一起了;不懂得马克思和列宁,全面地研究了当时资产阶级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揭示共产主义制度的胜利是必然的,反对在他们以前所存在的各种空想社会主义,挑明阶级斗争如果使用暴力,这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目的是类似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马克思和列宁承认虚数。

#### 2) 马克思、列宁论共产主义

把“维京人”的暴力、恐怖特征,和资本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联系并等同统一,这类文章公然指向马克思、列宁,胡说“曾在前苏联、东欧共产国家和中国长期供奉的马克思、列宁,在19和20世纪一系列颠覆各国政府的革命运动,包括巴黎公社暴乱和俄国的十月暴动;已经准备好的文件资



料公布于众，就是《共产党宣言》”。

16世纪俄“维京人”搞扩张时，美英法德日意等后期列强，还远远没有唱主角。在18世纪日后的路上，曾给予俄“维京人”迎头痛击的清帝国，也终于在鸦片战争之后迅速衰落。唯有俄“维京人”帝国，在战火与变局中，艰难地维持了下来。这下一轮的扩张，被俄“维京人”帝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赋予新的名称“黄俄罗斯计划”，便是从海参崴到乔戈里峰那条长长的直线。《尼布楚条约》之后的清朝地图，那条红色的直线，就是“黄俄罗斯计划”。

针对“维京人”沙皇俄国的“发家史”和民族性剖析，马克思在《18世纪外交内幕》中指出：“它把主子的野心与奴才的狡诈撮合在一起，使其对外行为表现为惯于欺诈和扩张的特征”。马克思还在《鸦片贸易史》中讲：“联军全权代表强迫中国订立新条约（注：1858年天津条约）的消息，看来引起了以为贸易将有大规模扩展的狂想，同第一次对华战争结束后1845年时商人们头脑中产生的狂想完全一样。即使彼得堡的电讯所传属实”。可见马克思不但关注欧美新闻，也同时在关注“彼得堡的电讯”。所以，“维京人”列强侵略的所有这些负面，应该说不但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有区别，而且也是无任何关系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马克思、恩格斯曾在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了22篇关于中国事件的评论。这组不朽的檄文，无情地揭露鸦片贸易的卑劣，严厉地谴责“维京人”西方殖民者的海盗行径，热情讴歌了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

而19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揭露了英国等以维护鸦片贸易为目的，以中国禁烟是对英国的“侵略”为借口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鸦片战争起因于鸦片贸易，为什么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英国，不向中国输出工业品，而向中国贩卖印度的鸦片？

表面上看，在中英正常贸易中，英国一直处于入超地位。英国工业品在中国没有市场，而中国的丝、茶，却是欧洲市场的抢手货。当时的中英贸易，主要就是英国用白银买中国的丝、茶。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等侵略者用武力打开了天朝同尘世往来的大门，拉开了充满血与火、奋斗与牺牲的中国近代史的帷幕——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疆域”历史的一转折点，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继以拓展对华贸易为目的，以中国在“亚罗号”事件中违背无中生有的外交礼节，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9世纪中期的马克思，不是生活在共产党掌权的类似社会主义的国家里，他公开发表的文章，不能像我国现在的学者那么尽情表达。马克思不但要为写作来求生存，而且也为自己的观点，经

得起任何有良心的人的推敲，做到知行合一、共建共享。这表现在《资本论》第一卷开头里，马克思一再表达他的这种理论建树原则。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两次鸦片战争发表的许多精辟评述，今天来学习，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这对看世界，看未来，看历史，都是中国的前进值得永久的怀念。

因为今天来看历史上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起因源于鸦片贸易，所以也可以说是和维京人打的最早的“贸易战”。但那时的“贸易战”还不是要改变中国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而是要瓜分中国的领地——即我们要说的“中国疆域”困境，为马克思和列宁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反过来马列主义也能照亮“天下道——大同世界——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研究。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奠基人要把“中国疆域”记在心上？因为结合现实和中国远古文化历史、传说，他们在大量阅读的各种资料和书籍中，对他们绘制未来新联合国蓝图早已有昭示。

例如，远古联合国巴蜀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结束前后的中国，都遇到要解决大量灾民、难民、饥民、移民等难题——办法是向未开垦又可开垦的地方搬迁。由此也许马克思、列宁想到的是：

“西伯利亚”好绘制全世界无产者联合国蓝图——拿起地球仪一看，亚洲的西伯利亚和中国，与美洲的加拿大和美国，类似人的左右两肺叶。在白令海峡建海底隧道接通，亚欧和美洲可连成一片。而西伯利亚和中国以前原是一体，加拿大和美国在建国前也是一体。“两叶肺”配合活动起来，蓝图就活了。所以后来列宁能读懂马克思包容增长的全球化思想从哪里来？也就是从被沙皇流放在西伯利亚时期产生的。

西伯利亚汗国的领地，西至乌拉尔山，东至鄂毕河，向北直达北冰洋，其统治中心正位于额尔齐斯河一带，受其影响和归宿之地，正是《世界境域志》所述人类文明第二个孵抱期巴蜀远古联合国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远古盆塞海干涸，迁徙到西伯利亚荒芜之地聚居的，除蒙古民族外，还有突厥诸部落与诸如奥斯恰克人或是汉特人的远古联合国民族。直到1869年《尼布楚条约》的签订，阻止了俄“维京人”帝国的南下，而被康熙皇帝放弃的外兴安岭以北的土地，则被俄东正文化帝国继续蚕食。18世纪堪察加半岛与阿拉斯加相继并入俄“维京人”帝国，整个亚洲从此历史面目全非。

列宁在西伯利亚流放之时，亲身感悟到马克思从中国鸦片战争研究远古联合国文化和全球通史的睿智。于是列宁埋在心里的，这也才是他亲身感悟到的远古联合国文化的伟大和全球通史。列宁早就设计了未来联合国的远景：他要把俄“维京人”侵占的比中国本土还大的西伯利亚拿出来，交给新联

联合国共管。这可以安置全球因战争、恐怖、天灾、革命等，产生的数以千万计的难民、灾民、饥民、移民。而富国、强国、责任国等，按能力和国家利益的平衡，分配出资帮助这类难民、灾民、饥民、移民家园的重建，天下才能把花在战备、战争上的钱，用来保本土平安和民生，联合国才像联合国，而不是“分好国”。

十月革命炮响后，列宁提出建立欧亚联合国的设想：依法治国，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进出由人民自决。列宁的设计非常英明，不愧为是马克思的学生。一百年已过去，还有大人说这是列宁，埋在俄罗斯大厦下的“定时核弹”，可见英明；又说列宁杀沙皇全家不对。但《列宁在十月》里已说明，杀沙皇全家不是他亲自干的，而类似两人打架，该出哪手拳？不该出哪手拳？是无法避免的。所以不管说列宁有多少不对，但不完整准确理解马列，只通赢通吃难保不解体。

由此来看有中国学者说：1689年9月7日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对疆界划分与归属称谓使用的“中国”与“中国人”称呼，是以国际条约的形式，第一次将“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专称——但这仅是一个事实，并不代表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承认中国疆域就如此开始。例如，刘慈欣先生在获2015年雨果奖的《三体》第一部书中，在开头第8章“寂静的春天”中，刘慈欣用“科幻小说笔法”，借用书中写的人物程丽华的话，记录一段历史事实说：“应该并入苏联，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的一个新共和国，这样国际共产主义的力量就更强大了……”。但这不是真正列宁和马克思要立的“心中的共产主义”，而类似明代儒学大师王阳明说：“破心中‘贼’难，破山中‘贼’易”——反其意表现在身外，这是要立的“山中共产主义”。

因为列宁1917年6月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首次表明要采用“让俄国成为一个自由共和国的联盟”的政策讲话。原因是十月革命后，列宁掌管俄罗斯，面对超级庞大的国土，俄罗斯已经有些消化不良。列宁才倍感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东西是：主张依法治国，合作共赢，管控各国分歧；由此各国就可以按公平、公正、公开的国际公约，进行正常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交流办事的思想——这类似“天下道”，列宁由此，最后完成和登上列宁主义的高峰。

近代东西方文化的传播，是双向的。西方有人到中国经商、传教等活动，会传播西方的一些文化；相反也会有中国人，到西方国家考察、打工等事情，传播中华文化——“天下道”——爱国爱家，“天下为公”、“合天下于一”。在1689年签订《尼布楚条约》之后，俄“维京人”帝国仍肆无忌惮占领别国疆域。所以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真正信仰

的列宁，才是第一个反对侵占中国疆域领土的俄国人。

且不说1922年在原俄“维京人”帝国领土境内，形成的数十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和独立的民族政治实体，在国家面临解体的现实危险下，新生的苏维埃俄罗斯政权面临的迫切任务，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与苏联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坚持依法治国，合作共赢，管控各国分歧，把各民族凝聚在一起。当时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的斯大林，受命主持起草了被人称之为“斯大林自治计划”的方案。斯大林是主张沿袭俄“维京人”帝国文化实行的单一行政区划的，他把这一方案提交给乌克兰、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等已独立的共和国，和俄共中央领导人征求意见。结果是，格鲁吉亚、乌克兰等领导人反对。

鉴于这种情况，斯大林于1922年9月22日，将他主持起草的民族自治化方案和各方面的意见呈报给列宁。列宁是主张不要俄“维京人”帝国文化式扩张的，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不是通赢通吃，就否定了斯大林的方案。列宁指责斯大林，是大俄“维京人”帝国主义，认为他缺少耐心，提出重建合作共赢管控分歧的欧亚共和联合国。但俄共中央全会讨论，也不赞同列宁的提议，而改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74年后的1991年12月25日，苏联依法解体，这是马列主义的胜利，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胜利。

但直到19世纪中后期，俄国历史学家瓦西里耶夫教授颠倒黑白还宣称：签订《尼布楚条约》“是在丧魂落魄的恐惧感和暴力的影响下签订的……一切都给力中国，不曾给俄国一点好处”。到上个世纪60年代，随着两国关系的恶化，更是对这个条约进行了重新评价。比如俄罗斯当代著名汉学家，现任俄罗斯汉学家协会会长、俄罗斯联邦科学院顾问、俄中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荣誉会员米亚斯尼科夫教授认为：“清帝国的北部边界，是阿穆尔河以南几百公里的柳条边”，他还把雅克萨之战说成清军入侵俄国，从而强迫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米亚斯尼科夫教授写了很多类似的这种荒诞不经，颠倒黑白的著作，观点总结起来，就是俄国一直希望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边界问题，但清朝不予理会，只是采用武力的手段来解决，入侵雅克萨，强迫其签订《尼布楚条约》，因此这个条约对俄国是不平等的，是耻辱！另外他还认为，明帝国的边界就是长城。无耻至极。

16世纪俄“维京人”开始侵略中国，到19世纪“维京人”西方列强也开始侵略中国。在历史上，断送中国疆域土地的无数个不平等条约中，作为第一个大清国不平等条约《尼布楚条约》，断送了比现在的中国还要大的约1000万平方公里的西伯利亚割让给了俄罗斯，一直受到马列主义的创始人的

关注和思考。因为马列主义的最终目标不光是搞阶级斗争，建立政权，通赢通吃，而是要为全人类与时俱进、知行合一、共建共享、同舟共济，繁荣稳定，把握好新世界大方向，推动世界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所以马克思和列宁都从“西伯利亚”分析入手，绘制实现这种新世界的曙光蓝图，这也是为知识分子在找正义家园的归宿。因为工农兵与知识分子，历史责任不同：后者最终是以文化教育后人。没有正义，就把握不好新世界的大方向，推动世界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把实践中的失误归结于马克思和列宁搞阶级斗争，是“乌奸文化”无正义可言。

网上有人说：在美国破产发生挣扎的时候，有可能出现核大国相互动用核武，造成地球生物的毁灭这样的情况发生。所以在这样的可能情况发生之前，让我们设想怎么来避免。现在的美国最大的债主是中国和日本，这两国都拥有超过一万亿美元的债券。那么可以进行这样的操作，俄罗斯归还海参崴和库页岛给中国，那么中国可以将现有的百分之90的美元国债转为俄罗斯持有；反正也是拿不回来的财富，不如实际点换回可以为我们创造利益的土地。日本也一样，可以转让手中百分之90%的美元国债为俄罗斯持有，以换取俄罗斯和平归还北方四岛。这样俄罗斯就拥有超过两万亿美元的美债。也就是说俄罗斯拥有随时摧毁美国经济的经济力量。一直处于美国压力下的俄罗斯就可以胁迫美国放弃核武器。前提是，俄罗斯向全世界宣布，不在美国本土使用核武器。虽然美国官员不会相信这样的承诺，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可以避免美国破产和经济崩溃。

美国航母和核武器的销毁，从外部消除了俄罗斯的最大危险，这样就有可能使得俄罗斯同意放弃现有的既得利益，只要中国和日本答应在回收的土地上不驻军，只事实管辖发展经济，俄罗斯是有可能放弃他们并不重要的土地。美国的军事消失，对俄罗斯是一个大好事，对世界也是好事。虽然现在美国人难以接受，但这样的前景总比出现伊拉克或者叙利亚那样的境况要好得多。美国的精英应该明白这样的道理。回过头再看特朗普政府，怎么样的行为都不是很重要了，所以不用在乎特朗普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和手段，让子弹飞一段时间，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我们可以放飞思想，想象怎么使得世界和平持续发展。当然，假如强加的战争来临我们也不怕，敌人来了有猎枪。

### 3) 俄罗斯史记述维京人海盗抢劫、贩卖奴隶

2019年5月18日--5月31日在“北欧四国丹麦、瑞典、挪威、芬兰+爱沙尼亚+俄罗斯”旅游，听导游解说：在蒙古游牧民族占领欧洲两百多年里，和俄罗斯人通婚较普遍。所以西方有“维京人”的

后裔说：“实际上，今天的俄罗斯人以及斯拉夫人也不是一个血统纯粹的族群”---这其中既包括黑发褐色的高加索人种，也包括红发或者金发白种的北欧白色人种。斯拉夫人这个统一名称其实是19世纪泛斯拉夫主义兴起以后才有的称呼。这之前阿拉伯人，日耳曼人和拉丁人从来不管斯拉夫人叫斯拉夫人，而是有各自不同的称呼。只有东方罗马帝国人有斯拉夫人这个称呼。而俄罗斯人（罗斯人）与斯拉夫人的关系，所知较早的文献可能为14世纪中叶的《大波兰编年史》。书中讲到三个斯拉夫民族（捷克、波兰、罗斯）的祖先捷赫、莱赫、罗斯三兄弟的故事。这三兄弟的父亲叫潘，是潘诺尼亚的统治者。

三兄弟各自建立了国家，即：捷克、波兰和罗斯；但19世纪俄国历史学家谢·索洛维约夫和瓦·克柳切夫斯基则认为，斯拉夫人最早居住在多瑙河流域，与罗斯人并非同一来源。罗斯人是来自北欧日耳曼人的分支。斯拉夫人把来自西北的日耳曼人称为“瓦兰结亚人”或“罗斯人”，最初是对北欧的瑞典人（维京人）的称谓，这个词起源于古诺尔曼语，意为“划独木舟的人”，引申的意思是来自北方的商人。而中国史书关于俄罗斯的最早记录---《元史·兵二·宿卫》记载元代军部设置有：“宣忠斡罗思扈卫亲军都指挥使司”。这里的“斡罗思”为元代俄罗斯的音译，这是俄罗斯一名始见于中国史书的最早记录。但是这表明，在元代的时期，俄罗斯人还没有形成国家。

当时的俄罗斯人隶属效忠于元帝国的北方军区，是元帝国的属部落或者部曲。俄罗斯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传疑的基辅公国时期，蒙古帝国殖民地时期，莫斯科公国立国时期。俄罗斯民族的混合构成---俄罗斯位于广袤无际的欧亚草原和俄罗斯平原地区，古代曾经在此居住的人口和民族具有极大的流动性。从公元6世纪初起，东欧的斯拉夫人也加入了民族大迁徙的行列，向罗马帝国进攻。战争和迁徙持续了一百多年，最后东罗马人终于遏阻了斯拉夫人的南侵。

大批斯拉夫人留居多瑙河以南和巴尔干半岛，他们以后建立了保加利亚王国和塞尔维亚公国，形成南系斯拉夫人。居住在维斯瓦河流域的斯拉夫人以后建立了古波兰国，波兰人和住在易北河上游的捷克人形成了西系斯拉夫人。至于斯拉夫人的东系，史料不见记载。据推测，他们从多瑙河迁居到了第聂伯河流域。中世纪以后，从事原始农耕的斯拉夫人成为乌克兰草原和俄罗斯平原地区主要和比较稳定的居民。大约在9世纪中叶，一批从事商业和掠夺的北欧“维京人”（诺曼人）出现在俄罗斯欧洲平原地区的土地上。他们早在公元第六和第七世纪，开始在波罗的海东部沿岸经商和劫掠。

强悍的北欧维京人从事着强盗和商人的双重工作。他们被称为海盗帮，经常抢劫财物，掳掠斯拉夫人口为奴，运到君士坦丁堡出售。他们自称为罗斯人——这个语词的意思是“桨手，驾船的人”。到公元八世纪的末期，维京人沿着伏尔加河南下，控制了航运和交通线，沿途设置要塞来作为防卫。在公元第九世纪，维京人控制了今日乌克兰的基辅地区，成为贵族领主，他们把斯拉夫人变成奴隶和农奴，从而控制了斯拉夫人。9至10世纪时期，在俄罗斯地区出现了一系列瓦良格人的公国。如：诺夫哥罗德的留立克公国，白湖的西纽斯公国，伊兹沃尔斯克的特鲁沃尔公国，基辅的阿斯科里德公国等。

到11世纪初，瓦良格武装商人还控制了黑海沿岸，以至于黑海当时被阿拉伯人称作罗斯海。此外，在中古时代的南俄罗斯草原地区，居住着一个突厥血系的强悍游牧民族钦察人。这个人群对俄罗斯中古时期的历史影响也甚大——维京人、斯拉夫人和钦察人，乃为构成俄罗斯民族的三大基本族群。来自北方的维京人商人和海盗，斯拉夫人称这些来自北方的维京人为瓦良格人，“瓦良格人”这个词的意思是商人。西方史学认为，维京人即诺曼人，属于日耳曼民族北支，原来居住在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瑞典），后来为了开辟东方商路来到东欧平原，活跃在欧亚商路上。

来自东方的丝绸、茶叶、瓷器和香料，是欧洲人的生活必需品。汉代以后，从长安到地中海，通向意大利、法兰西、不列颠群岛，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但是5世纪西罗马帝国覆灭后，蛮族横行西欧，生产萎缩、商贸萧条，地中海渐渐成为一片死海。7世纪以后，阿拉伯人兴起，控制了地中海海运，以及中亚、西亚、北非和伊比利亚半岛，不断袭扰法国南部和意大利沿岸，封闭了经西地中海到东方的商路（丝绸之路）。这就迫使西北欧的人们寻找和开辟一条新的商路以通往君士坦丁堡和东方，于是来自瑞典的维京人打通了从北欧经过俄罗斯、乌克兰通向君士坦丁堡的南俄商路。

瓦希商路的开辟和衰落——瓦良格人为了与君士坦丁堡及阿拉伯人进行贸易，进入第聂伯河和伏尔加河流域。瓦良格人的商队是武装商队，由军事首领统率千百个侍从兵，依靠劫掠来的各种货物，主要是毛皮和奴隶等运到诸如君士坦丁堡和阿拉伯进行出售。从瓦良格到小亚细亚半岛（也叫希腊）的瓦希商路，成为瓦良格人的重要贸易路线。瓦良格人的贸易主要取两条南北向的河道：一条沿第聂伯河南下航行至黑海，并沿其西海岸最终到达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将货物卖掉，换成白银、丝绸和香料，再沿路返回。另一条航线是沿伏尔加河到达伏尔加河中游的保加尔市场，那儿的阿拉伯商人希望取得瓦良格人的毛皮和奴隶。瓦良格人南下进入

里海，在里海纵向航行，然后换乘骆驼，经过长达650公里的陆路进入哈里发帝国的首都巴格达。

通常瓦良格人出卖商品收回的是白银，有时也会换回来自东方的丝绸和香料。瓦良格人成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白银的供给者。而瓦良格人能够交换的除了皮毛、蜂蜜等外，最大宗的商品就是斯拉夫奴隶。瓦良格人打劫各斯拉夫村庄，强迫他们纳贡以至进行抢劫，将掠来的俘虏卖为奴隶。十字军东征重新打通了地中海的商道后，东西方的贸易不再需要穿越广袤而危险的东欧平原。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等商业共和国蓬勃发展。尤其是1204年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后，罗斯人丧失了南方的市场。一度兴旺的瓦希商路归于沉寂。

基辅罗斯的建立——在瓦希商路繁荣时期，瓦良格人在商路的沿途要地修筑了要塞。这些要塞逐渐发展为城镇。最大的商业城镇有两个，一个是北方伊尔门湖畔的诺夫哥罗德，另一个是南方第聂伯河右岸的基辅。前者控制着东西方的贸易，而后者成为南北运输的枢纽。诺夫哥罗德据说是俄罗斯最古老的城市，建城于859年。俄罗斯史家认为，在瓦良格——罗斯人入主之前，东斯拉夫人已形成了三个准国家形态的部落联盟：诺夫哥罗德附近的斯拉维亚，基辅附近的库雅巴和梁赞附近的阿尔塔尼亚。但这些斯拉夫人的部落内部矛盾严重，相互争雄，内战不休。据《俄罗斯编年史》记载：为了避免无休止的冲突，北方斯拉维亚部落于公元862年选派代表邀请瓦良格人的首领留里克作王公，进驻诺夫哥罗德的以维持社会秩序。

留里克偕同两个兄弟西涅乌斯和特鲁沃尔率领武装亲兵来到诺夫哥罗德，自称大公，建立了俄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留里克王朝。其王统一直绵延至16世纪（1598年）。留里克统治的地区被称为“罗斯”。以后整个东斯拉夫地区都被称为罗斯人。由此，中国元明时也称俄罗斯为“罗斯”或“罗刹国”。满清政府时，蒙语转译成汉语时，就成了“俄罗斯”。与此同时，另一支瓦良格人商队的首领阿斯科德和迪尔占据基辅，建立了早期的基辅城，与诺夫哥罗德罗斯分庭抗礼。留里克死后，其子伊戈尔即位，由留里克的堂弟奥列格摄政。

奥列格在公元882年沿瓦希商路南下占领基辅，并迁都于此。奥列格励精图治，四方征讨征服了周围的斯拉夫部落，合并形成一个以基辅为中心的罗斯国家。公元988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与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皇帝联姻，东罗马皇帝将其妹妹安娜公主嫁给弗拉基米尔，条件是要求弗拉基米尔皈依基督教。弗拉基米尔接受洗礼，并以武力强迫他的属民全部信仰东正教。此后，东正教成为罗斯人和东斯拉夫人的全民信仰。在统一宗教文化的熔铸下，来自北欧的瓦良格人统治者和广大东斯拉夫

人融合成为了一个新的民族——俄罗斯民族。

但以上所有关于罗斯古代历史的这些说法，都并无确切的历史年代史料依据，而主要是根据一些传说和推测而已。

对于欧亚草原上突厥种属的钦察人——近代俄罗斯土地广袤，横跨欧亚两大洲。其欧洲部分的人口主要为东系斯拉夫人和维京人。其亚洲草原部分的人口则主要是钦察人和蒙古人。钦察人可能属于突厥人的支脉，现在突厥语西北语支名为钦察语支，有些突厥部落是他们的后人。有人认为钦察人祖先与塞种的康居和月氏、乌孙有关。钦察人是古代欧亚游牧民族。俄国人叫波洛维赤人，罗马人称其为科马洛伊人，阿拉伯人则称之为库蛮，匈牙利人称其为昆人（匈奴分支）。大约在11世纪中期，钦察人从中亚额尔齐斯河流域向欧洲迁徙。俄国编年史在1054年第一次提到他们出现在黑海以北草原，建立了钦察汗的游牧国家，领地西起第聂伯河（包括克里米亚半岛），东北为伏尔加河中游地区直抵不里阿耳，东南到乌拉尔河。

## 6、毛主席和小平同志坚持马列主义方向

把俄罗斯的苏尔科夫教授和文扬教授比较，苏尔科夫教授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俄罗斯国家模式虽表现不一，但内在的本质国家历史结构要素是一致的”——这种读不懂列宁心中坚持马克思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方向，不是无意而是有意的。但文扬教授的无意是，论述“天下人--天下观”是非常精彩的，然而似乎对毛主席和小平同志在新中国刚解放，就在这方面坚持马列主义方向，例如，抓“资阳人”考古等重大战略部署并不理解。例如，他说，秦汉不是中国最早的统一时期，从“天下一统”的角度看，周朝是第一次，秦汉是第二次；没有春秋战国时期，就没有秦汉大一统国家的建立，不提前者，后者就好像天上掉下来的。其实文扬教授说的周初建立的是“天下国家”，不提与第二个孵抱期的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立足起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及“远古联合国”有关，也好像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

特别是文扬教授在提及的全国性的一系列古人类遗址考古中，他把“资阳人”考古被遗忘了，好像新中国曾经的“资阳人”考古是一场“骗局”——这种情况，在目前大多数学者和历史专家中，似乎很普遍，为啥？古人类遗址在20世纪后半叶发现，大多数是荒山野岭、沙漠丛林、人迹稀少的地方。这不奇怪——这些地方遗存容易保护，相反地理、生存等条件好的地方，被人类已经开放而不易保存；更不说类似“文革”扫除一切“封资修”东西的“红色风暴”。然而古人类的活动，就偏爱荒山野岭、沙漠丛林、人迹稀少的这种地理、生存等条件不好的地方吗？古人类就笨吗？

这是学术研究中“唯物”过重的一点误区，这

类似党史研究中，只重视印刷品材料，而对“口传地方史”不予考虑一样——例如2017年6月间，四川省螺祖文化促进会在绵阳市新世界宾馆召开学术研讨会，中午饭后一些参会代表在宾馆大厅休息交谈。坐在笔者旁边一位来自成都的姓王的老学长，他告诉退休前是在四川省社科院作党史研究的，职称是研究员，这使笔者大感高兴。

就问：“王老师，我出生的四川盐亭县龙潭榨溪河畔地区，1936年以前是一个革命老区。1934年10月龙潭地区发生的‘西山坪’共产党游击队被国民党军队包围事件，延伸到1935年3月申秋成和何登甲等300多共产党员的游击队战士，被砍头英勇就义，刑场是公开示众的，所以在当地的传闻很多。直到1980年代中期，盐亭县文化馆出版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四川盐亭县卷》一书中，其中的民间故事还收集到王映维等写的龙潭地下党游击队领导人申秋成（申家成）和何登甲领导当地群众进行斗争的故事。但书出版后又用笔注明这类故事“作废”，问文化馆赵方铭馆长，他说是县上领导通知申秋成和何登甲等300多英勇牺牲的盐亭县地下党游击队员是‘叛徒’。像这种相差很大的口传，王老师，你搞党史研究不？”

王老师说：“我们不研究。我只研究公开出版的书籍和刊物上发表的资料，以及允许公开看的档案材料。对我们来说，这已经够了”。笔者明白王老师说的“够了”，类似“基因组学”的测序负担。而笔者说的“口传地方史”考证有类似“暴露组学”——“除基因外，还要考虑表观遗传、蛋白组、代谢组与日常暴露，甚至还要考虑诸如地理位置、社会经济地位、肠道微生物组等的作用”。

### 1) “资阳人”之乱

政治与科学纠缠，“层子模型”包打天下不行，那么“北京猿人”包打天下行不行？因为任何一个科技强国的成长都不是一帆风顺的。1900年德国一批顶尖物理学家中出现的普朗克，才几经曲折站到了“量子”高地时代。后在发展出的量子隧道扫描显微镜，还有激光、核磁共振、核元素分析等常见的应用，对人类学考古也十分有用，已成人类上古史大统一考古用的主流方法。小平同志说：“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其实，“一带一路”从古丝绸之路经济带，就铸造有这种“中国梦”。

当然研究德国智慧的“量子”高地，也还有值得注意的好经验：如普朗克这类科学家，有了权力不腐败，注意团结、选拔还名不见经传的，像爱因斯坦这类顶尖接力人才。小平同志1904年出生在四川广安，1919年考入重庆留法预备学校，1920年漂

洋过海到法国入诺曼底区巴耶男子中学学习。在欧洲，他当然更有机会知道量子的故事和海洋文明的苦难辉煌。从此，小平同志把“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作为一生的智慧，灵活地运用。所以当毛主席抓类似量子表述的“物质无限可分”探讨的科学搞物理学大统一，稳作为突破口战略时，应该说给毛主席最大支持的，就是小平同志早作的“资阳人”配合。

因为新中国一解放，小平同志从抓人类上古史大统一方向，领导发现了轰动世界的“资阳人”头盖骨化石，为今后发展的双赢，打下巩固和深化量子突破口战略的第一个基础。这与1983年他首肯投资巨大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决策联系，这两件事正如他说的“不会错！”小平同志的这一智慧是从哪里来的？应该说，这和出生他的家乡四川远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分不开。

我国远古文明立足于山海时期，是在约公元前5070-4170年。但我国至今出版的20多种“中国通史”，和汗牛充栋的历史、考古通史类似论文，对上古时期的事情可能还没有摸着门，还不如钟毓龙（1880-1970）从古籍考证四川上古叫“梁州”。因为他说，上古“梁州”，指海水淹没山丘，只剩下山梁之背图像的转义，而赞成四川上古有类似的盆塞海。钟毓龙还认为，上古黄河因发生过类似的堰塞湖，才造成的大禹治水那时的大水灾。钟毓龙解放后任杭州市政协副主席，1936年出版的《上古神话演义》一书，就是他以1933年四川叠溪大地震大灾难为背景，写作的100余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书中提出上古梁州在四川，梁州即以盆塞海和大围坪地貌得名。

张圣英也有钟毓龙类似的观点，《成都日报》2012年3月19日发表的《张圣英 江陵才子掘出“资阳人”》一文中说，张圣英（1903—1992）最大的贡献莫过于1951年3月16日发现资阳人头骨化石。1953年，张圣英到北京参加中科院主持的资阳人头骨化石论证会，据发现的古生物化石分析，他大胆地得出一个结论，四川古时是海，成都是海的中心，而资阳一带则是海的边沿。随后，周总理陪他去毛主席家里吃饭做客，毛主席对张圣英说，资阳人头骨化石是国宝，他发现了迄今为止中国的第三颗人头骨化石，对中国，乃至对世界都是很大贡献。而张圣英认为四川古时是海，但这在那时是个什么样子的海，是类似堰塞湖地震形成的盆塞海？还是更远古地质板块运动形成的内陆海？至今还在争论。

另外还有《“资阳人”发掘过程和品牌价值》一文说：1929年发掘距今70-20万年“北京人”、距今1.8万年的“山顶洞人”化石，至今也不知是在外国古董店老板的底柜里，还是在列强们的博物馆里，而刚刚解放就发现的距今35000年的“资阳人”头骨化

石，可以放心地安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里，永远也不用担心被人夺了去。“资阳人”头骨化石的出土，是由新中国的专家独立完成的，是我国发现的唯一早期真人类化石，是旧石器晚期的真人类化石，是南方人类的代表。享誉中外的“资阳人”头骨化石出土半个多世纪了，在历史教科书和大小百科全书上，仅有文字记载，这无疑是一大缺陷和遗憾。这除开和我国高层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地质学家的个人知识造诣、时代历史的局限有关外，贾兰坡、裴文中、冯汉骥、张圣英、吴汝康、王玉哲等都是我国的顶尖的人类考古学家，他们之间是否还有“资阳人”和“北京人”、成都和重庆等类似竞争的讳莫如深的不团结，而辜负了小平同志抓人类上古史大统一的期望呢？学术腐败也有多种的不同形式。

中药药理学专家李连达院士说：金银花与山银花的药用价值，谁优谁劣？需要进行多方面的比较研究，综合判断，才能得出可靠的科学结论。仅根据某一化学成分的多寡，对“两花”的药用价值进行推测，未必准确。迄今尚未见到可靠的药理、毒理及临床比较研究证实金银花安全性、有效性及药用价值优于山银花。《南方周末》报道，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实名举报，称国家药典委更名金银花涉嫌腐败：把南方金银花被2005版《中国药典》更名为“山银花”，金银花作为国家食药总局前局长、现国家药典委常务副主任委员邵明立老家山东“忍冬花”的专用名，导致南方花农巨额损失，给山东金银花的开发商带来巨大利益。李连达院士说，山银花药价暴跌的真正原因，是不正当商业竞争的结果。

人类学考古容易牵涉有利益的学术拨款，掌权高层也易走偏。程映虹先生1959年生，苏州人，198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曾任教于苏州大学多年。2001年获美国东北大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2014年7月30日程映虹在《种族观念与中国民族主义》一文中，评论中国古文明正统基石的“北京猿人打天下说”时，他说：中国人一直把北京猿人看作自己的祖先，中国人却意识不到国际人类学界普遍认为，北京猿人很早就灭绝了，近十多万年前，从非洲又进来的一批智人是所有人类的祖先。网上有一幅画画有两个人，一个形象是北京猿人披着兽皮，坐在地上点火；另一个形象是汉代壁画里那种，头上戴冠，穿长袍的人，手上拿着一个犁在耕地。画的下面文字说明是“驱除智人，恢复猿人”：戴冠、穿长袍的文明人是外面来的，不是中国本土的，而北京猿人是本土的。

程映虹说：中国考古学家和古人类学家裴文中、贾兰坡等，都是国际学术界培养出来的。中国人把猿人时期也算作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记得过去

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陈列中，“中国通史”是从元谋人开始到 1911 年中华民国成立，就是有 170 万年的时间长度，比北京猿人的时间更长，都叫“中国历史”。学校历史课上也这么教。这是把自然史和社会史混作一团，有意无意地造成“中华民族”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年的历史的印象。这是很荒谬的。但如果程映虹先生把类似小平同志抓的人类上古史大统一的方向，也说成是“中国民族主义”，那我们坚决反对。同时我们也不赞成程映虹把今天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把自己的祖先清清楚楚地追溯到人类起源时期并把它和爱国主义联系起来的”，作为一条禁令。

四川省文史馆员何拔儒（1863-1955）从四川远古盆塞海的“水”上做文章，提出“人类文明起源于大地震假说”，是早把《山海经》看成是《涸海古卷》，并以四川盐亭县梓溪河两岸，距今 8000 年左右犹存的规模宏伟、气势壮观的山寨聚落遗址，以及围绕山寨的处于半山腰的大围坪，延伸数百里的地貌为具体考古平台，加之在梓溪河畔的天垣盘垭村的盘古王表石龟碑以及盘母石等文物古迹等，作的计量历史学或计量地质学的基础，提出我国西部远古地震--堰塞湖--盆塞海--大围坪--海啸有关联的、四川大围坪盆塞海海啸遗迹地貌论的“盘古--嫫祖远古联合国的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史的人。

因为上古四川堰塞湖变盆塞海，必然会形成同时期大面积的沉积物，这要用到计量地质学。上古四川堰塞湖变盆塞海，据何拔儒的分析，不是在约一万年前的四川盆地周缘山脉大量的堰塞湖，几乎全部溃坝的推测，而是推测由黄河及长江造成的堰塞湖--海，且堰塞湖--海不是长时期稳定的地质。由此远古人类从非洲走出，开始开拓有关远古中国盆塞海文明，这是一种全球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即在约 20 万年前从非洲走出的古智人，抓住陆路和海路的信息不难想象，世界文明起源于 8000 多年前的四川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这就有一个完整的全球历史演化序列。这是此后，发生的盆塞海干涸，今天全球其他的各远古大文明，从四川中国盆塞海文明走出分离，但也都打有她的显著山海文明的区域烙印。这就是人类政权现象和政权人物现象的人类文明起源，有两个孵抱期：一是非洲及中东的地区，一是四川盆塞海及周边东南西北中的地区。人类的大迁徙，就在这两个方向有过多次的来回。

再一个证据是四川远古盆塞海其后干涸了的四川盆地，大围坪盆塞海遗迹海啸地貌，也类似档案记录。如果说人类最早的顶尖优势文明，起源于 8000 多年前的四川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那么就能说明在西方海洋文明产生之前，就已经在

四川盆塞内陆海及四周城邦之间演习操练过多时了。程映虹先生似乎无知“近十万年前从非洲来的一批智人，是所有人类的祖先”的人类上古史大统一，是可以追溯到“盘古--嫫祖的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的人类远古联合国的。程映虹说，有人把裴文中、贾兰坡的周口店北京猿人，引为中华文明有几十万年的历史，这当然是不正确。

造成“把北京猿人引为中华文明有几十万年的历史”的这种上层的情况很复杂，而且也许不全是裴文中、贾兰坡等人的错。张森水研究员说：“上周口店工作，裴先生虽是为生计所迫，但一旦加入，他的工作和学习即达到废寝忘食、顾事业不顾家的程度。比如第一个孩子出生时，他在周口店接到电报，回北京到医院探望师母和孩子，手里还拿着一本书”。周口店位于北京西南郊，属房山区，距市区约 50 公里，自 1927 年开始系统发掘，在前后几十年的发掘过程中，先后发现了代表 40 多个猿人个体化石材料，十余万件石器、丰富的人类用火遗迹以及大量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张森水说“一个人的成功都有主客观因素，从客观上看，裴先生开始参加周口店工作，步林、杨钟健在古生物学上的帮助使他很快入门，随后德日进、李济和步日耶等人，又在古生物特别是史前学上给予了重要指导。1931 年到 1935 年是周口店工作最辉煌时期，这一时期裴先生还有卞美年和贾兰坡两位好助手，这些都是成就裴先生的客观条件和机遇”。

此外，对于中国古文明，在追捧北京猿人历史中，是否因为时代的局限而让外国人骗了我们？也难说。近代中华古文明科学研究方法的开创与文物的发掘，如发现北京人头盖骨的发掘和仰韶文化的开拓，由于有国外专家、学者和资金的介入，才取得进展。但外国学者的参与，单一的或传统的意识形态一边倒，恰恰对中华古文明研究有害。有一个例子是，西安半坡遗址纪念馆，我国建国初人才缺乏，请前苏联专家帮助塑造半坡人像。但直到我国改革开放，才允许不同意识形态的西方学者，进入大陆考察古文明的研究。这批学者中有人指出，半坡人塑像属白种古人，我国学者还不以为然。到上世纪 90 年代，有美籍华人学者回国，他们再次指证，半坡人塑像才得以改变。中国有些权威学者爱面子，他们维持的不太真实的中华古文明历史研究的框架，在国内外已造成有影响和冲突。

解放后，说是裴文中 1929 年发现北京周口店猿人头盖骨化石后，才轰动的国内外。1929 年前后，发掘出北京猿人有外国人吗？毋庸讳言，最初北京猿人考古，是由外国人德日进、步日耶等法国学者指导。争“北京人”，据《北京青年报》报道，我国一位少数民族学历史的博士研究生，写了一本 40 万余字的古史专著，论说北京人头盖骨属于是古苗

族人。他的思路可简单归结为：《史记》等古籍记载蚩尤与黄帝、炎帝大战于涿鹿；而涿鹿在今河北怀来县一带；蚩尤是苗人的部落首领，说明那时中国远古苗族人早已从中国东南部沿海发展扩散到河北及北京一带，受到从中国西部向东部发展的炎、黄部落的侵略。既然苗族人早就定居在北京一带，所以苗族人是北京人的祖先。

裴文中(1904-1982)，1927年25岁，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1929年发掘出北京猿人，说裴文中等人先基于西欧石器材料的方法，但在周口店陷入困境。是裴文中、贾兰坡他们作了几方面的改进尝试，才有进展的。时间顺序是，1928年春，在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1889—1971)的安排下，裴文中赴周口店工作，帮助周口店发掘主持人杨钟健(1897-1979)做后勤管理。杨钟健是领导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发掘的。从1929年起，杨钟健与法国地质学家德日进是一直合作的。1955年杨钟健被评为院士，翁文灏没有被评为院士。

德日进(1881~1955)，法国哲学家，神学家，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长时间在中国进行古人类学、地质学考察，是在中国生活了20余载的法国人，在中国参与了对史前文明的研究，参与了周口店著名的“北京人”的发掘工作，被认为是“北京猿人”的发现者之一。其实早在1921年，由中国北洋政府矿政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首先发现周口店北京猿人和一处含动物化石的裂隙堆积后，1921年安特生与美国古生物学家格兰阶及奥地利古生物学家斯丹斯基等人，在周口店当地群众引导下，在龙骨山北坡又找到一处更大、更丰富的含化石地点，即后来闻名于世的北京人遗址“周口店第1地点”。他们在1921和1923年，先后发掘出两颗人牙，并定为人属的人。

由于这一发现，1927年才在周口店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系统发掘，这是由瑞典古脊椎动物学家B.步林和中国地质学家李捷主持；当年又发现1颗人的左下恒臼齿。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科主任、加拿大籍解剖学家步达生，对先后发现的3颗牙齿进行了研究，给这一从未见到过的古人类，定了个拉丁语化的学名“北京中国猿人”。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利普(1870~1946)则给了它一个俗名：“北京人”。现在已把他的“属”、“种”和爪哇人合并，另建立了一个“亚种”，改称为“北京直立人”。在《贾兰坡谈北京猿人》中，如果说1929年因第一个完整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被裴文中发现后，才让“周口店”名扬中外，轰动世界。那么1936年11月15日至26日，贾兰坡在11天之内发现三颗“北京人”头盖骨，再次被说成震惊世界学术界。

贾兰坡(1908-2001)，河北省玉田县人，因发现三具“北京人”头盖骨，被称为是一位没有大学文

凭却攀登上了科学殿堂顶端的传奇式人物，成为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第四纪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贾兰坡1929年高中毕业于北京汇文中学，因家境困难没能力上大学，只好在家边自学边寻找合适的工作。1931年23岁的他由于偶然的机，考入中国地质调查所当练习生，当年被派往周口店跟随裴文中搞发掘。1935年，裴文中到法国留学，贾兰坡挑起了主持周口店发掘的工作。

如果说1929年发掘距今70-20万年“北京人”、距今1.8万年的“山顶洞人”化石，被丢失，那么刚解放就发现的距今35000年的“资阳人”头骨化石的原件，放在哪里的呢？直接用原件做过碳14法、铀系法等现代科技，测过它的年代没有？如果没做，为什么？

反之，复原的被丢失的“北京猿人”头盖骨，是否像西安半坡遗址纪念馆，请前苏联专家帮助塑造半坡人像属白种古人，也许是无意，但移植到“北京猿人”头盖骨复原塑像，是否也搞成了白种古人呢？因为60多年来关于“资阳人”的报道、论著疑点很多，这与“北京人”研究相连。2001年成都画院艺术交流中心副主任黄振富先生，在《文史杂志》第6期发表《贾兰坡和资阳人》；类同的文章《四川日报》上也发表过。他说“资阳人起起落落”，张圣英教授发现“资阳人”头骨化石后，并没有在手上停留，而是很快直接交到了北京他认识的著名考古学家和古人类专家贾兰坡手中。

原因是当时就存在有重庆大学张圣英教授，与四川大学冯汉骥教授等关于“资阳人”头骨化石的管辖权之争。因为主政川西行署的李井泉书记和他主管的成都专家，认为资阳距成都近，应由他们管辖处理，对在远在重庆的西南局插手有意见；从而对张圣英发现“资阳人”有意贬低，造成了后来的混乱。另外也有张圣英为了防备，他当时作的汇报和交的书面材料，以及别人的问话，前后多有不一致的地方。

对张圣英发现“资阳人”头骨化石，毛主席、周总理、小平同志、郭沫若等领导人，都很满意，称是贡献。但为什么他后来的命运，比贾兰坡、裴文中、吴汝康、冯汉骥、王玉哲等学者的命运差很多呢？为什么1986年黄振富访问张圣英时，他要反复说：“资阳人”的发现不能说是我的功劳，如果不是小平同志叫我去参加考古发掘工作，就不会有“资阳人”的发现，所以首先得感谢小平同志哩。这可以从四川大学冯汉骥教授和张圣英争“资阳人”人的发现看出；在冯汉骥的简介中，称解放后最著者，是他在成渝铁路修建期间发现的“资阳人”头骨化石。另外从王玉哲教授2000年出版的《中华远古



史》一书中，也可以看出贾兰坡、裴文中、吴汝康之间也有分歧。该书参考文献，吴汝康、贾兰坡 1955 年发表的《中国发现的各种人类化石及其在人类进化上的意义》，说资阳人“是一个十四五岁的男性个体”。但 1957 年裴文中、吴汝康出版的《资阳人》专著，又说“是一老年女性个体”。冯汉骥和李井泉，北京人和资阳人，还联系多少谜？

1952 年前，小平同志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他为什么会挑选张圣奘教授，而不是冯汉骥教授？李井泉书记与小平同志在“资阳人”的发现问题上，为什么难于沟通？把人类社会政权和政权人物现象引入对有严密组织的动物群体和远古人猿群体社会研究，并不存在绝对的普世的母系社会和父系社会政权和政权人物的分期现象。所谓母系社会和父系社会分期的人类上古史发展规律框架，首先是被前苏联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说成是来源于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的唯物史观在指导。

其实这是苏联人，用恩格斯做挡箭牌，掩盖做学问的懒惰思想。因为恩格斯书中明明说的是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在当时的一些少数民族中作调查，发现的一种原始家庭结构的个案：即一列或数列姊妹成为一个共同体的核心，她们拥有的共同的丈夫中，排除了她们的兄弟。这种婚姻关系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有助于人类发育和繁衍，就连一些动物社会也存在；并且动物社会也不仅是停留在这种水平上，也还有一夫多妻制，一妻多夫制，一妻一夫制等等。因此可以看出恩格斯仅仅是从赞扬摩尔根的深入实际的科考方法来说的，但却被前苏联的一些学者，编造为原始社会分为母系和父系两个前后相衔接的阶段。在王玉哲数十年心力之作的《中华远古史》一书中，沿袭了前苏联的这种教条，当然不单是王玉哲个人的原因，但对中华远古史研究造成长期不讲王表、年表极大破坏性的影响。

按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侵略与遏止史观，所谓的国家，其实就是强势集团依据某一地域对内对外实行的生存保障或侵略。从这一定义出发，不管掌权者的时期的长与短，邪与正，强与弱，在没有新替代者较量取胜之前，都可以近似代表此时的顶尖优势。所以中华古王朝时期的国家模式，不是王玉哲先生困惑的夏王朝那种实际占领控制的版图模式。因为这种版图很小，连王玉哲自己也难相信夏朝在中华民族国别史上是一个王朝。这被称为“王玉哲悖论”。

因为王玉哲的这种看法，用的是秦以后的国家专制更为集中，更为统一的疆域概念，使中华远古史王朝的疆域并不成其为是中华远古实际的疆域。他说的西南没有了，东南没有了，西北没有了，东北没有了，而只剩下中原偏东部分。但秦以前的国

家观念，应看作仍然传承有中华远古海洋文明和城邦文明期的多民族联合国的影子，即王朝的传承是以顶尖优势的阶段性较量为标志的。局部地区的二级政权，有的也如此。以此理解中华民族的远古版图，才更为完整、真实。

王玉哲（1913-2005），河北深县人，1943 年北大文科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毕业。先后受聘于华中大学、湖南大学、南开大学历史系，历任副教授、教授及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先秦史学会副理事长、南开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是我国先秦史的一位代表人物。而王玉哲的《中华远古史》代表的先秦史，并不被国际历史学界普遍认可。例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一书认为：“黄河流域的文明，是在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约 2000 年之后才出现的”。但奇怪的是美国人写的《全球通史》，在“一、美索不达米亚”一节，开篇却讲：“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伟大创建者——苏美尔人，似乎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人的一支；这一支很奇怪，他们的语言与汉语相似；这说明他们的原籍可能是东方某地”。湖北学者胡远鹏先生就直说：苏美尔人就是蜀人，这从《山海经》以及《旧约》可以得到印证，这个“东方某地”，就是中国的四川。

而按西方的学术观点，所谓的源语指，或是在第一匹马被驯服，第一只狗不畏缩地被带到营火旁以前很久，就再也听不到了的最古老的那些原始母语，这是把世界上所有语言追溯到遥远过去说的源语。远古的四川人之所以叫蜀人，正是从人类的源语或母语学可以推证的：蜀人得名与烧烤有关——即蜀人是最早吃熟食的人。再据保存盘古王表地方的天垣传说：盘古王在盐亭祠窑坝领导爆动建国后，并没有实行终生制，而是以“传播发明、天下大同、幸福共享”作为立国之纲，率先垂范。他卸位后带领部分人马行舟渡海到南边云南，进入缅甸，沿印度的恒河水，横穿印度出海，乘阿拉伯海的季风，到达阿拉伯半岛和幼发拉底河流域，是第一代苏美尔蜀人的来源，因此中国南方多盘古王的传说。而盐亭沿梓江河从章邦苏家山，到麻秧的苏家坝、苏家沟，再到玉龙的苏家湾，苏姓原住民很多。如果把朱学渊先生的经由以历史语言、语音、姓氏、地名等文化和文明的考据研究方法，引用来看从“熟”人、“蜀”人到“苏”人，有人想到两河流域出现的苏美尔人可联系“蜀”人，那么朱学渊先生也许也是能认可的。

王玉哲的《中华远古史》书中，已经明确北京猿人是四五万年前的原始人类：“中国原始社会史表”中的“资阳人”，是“新人”中最晚期过渡到“现代人”的中国原始社会的原始人类，这正好说明近十万年前从非洲又进来的一批智人，在约三

万年前已经到达四川盆地。远古人类文明，不在于人种从哪里来，而在于人类文化文明从哪里开始。因为著名进化遗传学家、复旦大学副校长金力院士带领的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团队，通过DNA分析得出结论：现代中国人起源于非洲。金力他们从中国各地找了近1万例男性随机样本做实验，通过研究发现检测的这近1万名中国男性的样品，全都携带有来自非洲的“遗传痕迹”。这是从DNA分析角度，支持“资阳人”带非洲起源又回归盆塞海创造文明说。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金力教授，曾任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终身教职，1999年），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医学院教授（终身教职，2001年）。现为德国马普学会外籍会员、国际人类基因组组织理事、上海市遗传学会理事长、上海市人类学会理事长，以及《基因组研究》等7家国际学术杂志的编委。长期研究人类群体的遗传多样性和人类性状的进化机制，在遗传多样性分析领域提出了多个理论和方法；在基因组水平深入解析了东亚人群的遗传多样性的特征；阐明了东亚人群多个性状的适应性变异的分子遗传学基础。金力教授团队的DNA分析说明，王玉哲的《中华远古史》一书，淡化“资阳人”发现的世界意义，以原始氏族公社分为母系和父系两个阶段为纲，以四五十万前年的北京猿人原始人类为源流的中国先秦史框架，也许是一个失败的探索。而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力挽狂澜。这也许是李井泉书记没有想到的：“资阳人”是20世纪之谜。

从“资阳人”之谜能否揭开北京猿人之谜？天垣“盘古王表”石龟碑，从被何拔儒破译，其中盘古到大禹6组年代数据，最难的也许是开头“法天法地时期”第一个人物“盘古”年代数据的界定；但这也许也是最容易破解的一个数据。原因是当时天垣此地就有“盘古”时代实存的材料，如天垣五面山及周围就有很多古山寨建筑。这里的古山寨建筑有一个习惯，就是在主要房屋的屋梁柱上，都留有建筑时间和人物的姓名。这一习惯延伸到远古，在天垣榉溪河流入梓江交汇的玉龙镇的“祠窑坝”，就是传说盘古的父母劳动生活的地方。

即流入四川的下段西陵河的盐亭县玉龙镇梓江河坝，U字型的河弯因搭救起许多从上游放逐下来的战俘、犯人、叛逆者和西来游客，反而成就了这里“西仔山”对面陶器工场的规模宏大，而被称为“祠窑坝”。广为流传的玉龙“祠窑坝”有99座古“祠窑”，超过100座就会出盘古圣人大变革。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在“祠窑坝”荒岭开垦荒地，群众在挖开的芦苇、石子地下，还可见大量的土陶古陶器碎片。“远古联合国”的繁荣景象，如原始社会大工业等的传说，也许很多人不理解。其实，对存

在原始社会大工业劳动的真实描写，就有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外有考古学家在新几内亚西部山区的朗达村，看到类似五、六千年前远古的石斧大工业制造场的情况：几百近乎裸体的新几内亚山民集中在一起，工场分采石、粗加工和精加工、磨制和安斧柄等一道道工序，把人分成若干工场区。远古落后情况下的石斧制造，已不亚于今日的铁制斧子的制造。如果在20世纪初，何拔儒当时还能拾到较完整的祠窑坝土陶古陶器，上面留有制作时间和人物姓名的蝌蚪文字，那么何拔儒等破译、界定盘古所在的年代数据，并不难。

关心、研究“资阳人”的有志之士，有大量关于“资阳人”的文章见诸报刊和书籍，但离揭开迷局还有多远？小平同志开创的人类上古史大统一的方向，能够复兴吗？习主席提出考察青藏高原世界第三极，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建立新型科技大国”——其意义在多深的程度被众多专家、群众，能理解、领会和自觉去实现？

由于“资阳人”之谜涉及的一些人物已经作古，反思其中的一些人物和谜团，也许可以起到醒世作用。李井泉被称为毛主席的爱将，这是小平知道的。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下达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从命令中可以看出，李井泉当时是能够和刘伯承、小平同志、陈毅、粟裕、谭震林、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徐向前、彭德怀、贺龙等相提并论的战略区领导人之一。1949年5月23日，毛主席在部署各野战军向全国进军的电报中，明确指出：“一野年底以前可能占领兰州、宁夏、青海，年底或年初准备兵分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

根据这个指示，贺龙与李井泉商量，从晋绥分局、晋绥军区机关抽出一些干部，潜入西南，调查了解当地的军事、政治、经济情况。1949年冬，贺龙、李井泉等领导第十八兵团由陕西入四川。之后，他历任川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成都市军管会主任、西南军区副政委兼四川省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副书记、西南军区副政委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四川省政府主席、成都军区第一政委、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直到“文革”。1954年5月，毛主席在京参观全国基本建设工程出土文物展览，虽然特意逐字逐句念过“资阳人”头骨化石的解说词，但似乎已难说对“资阳人”的态度。小平同志了解李井泉，也正能运筹帷幄。

这可以追述到上世纪30年代初，那是小平同志到广西百色组织武装起义，国民党派重兵围剿。小平同志到中央汇报求援，绕道河内，经过香港，最后到达苏区。李井泉这时任红军独立第3师政委，

驻扎在瑞金。小平同志在周恩来的理解下，任瑞金县委书记，负责瑞金的一切事务，李井泉和小平同志两人之间有了频繁来往。这期间，国民党围剿瑞金，小平同志带领李井泉所属部队撤退。后来李井泉把苏区大门被攻破的责任全推给小平同志，一段时间邓被撤销党内一切职务。1949年底，李井泉又成为小平同志的部下，中共中央令18兵团受刘、邓指挥，此时李井泉任18兵团政治委员

全国解放后，李井泉又任川西区党委第一书记、川西军区政治委员兼川西行署主任，直接受西南局第一书记小平同志的指挥。有人说李是邓的人，如1952年小平同志调离西南后李井泉被中央任命为四川省委书记，是小平推荐的。此后李井泉到中央开会，总要带上一些四川的土特产，去看望小平同志。到文革1969年小平同志被下放到江西，两家仍有来往。其实，李井泉被提升为四川省委书记等职务，是必然的趋势。两家关系来往，也是人之常情。这些不能说明，在涉及人类文明历史的理顺和国家未来发展前途上，小平同志也不分轻重、不讲原则；在“资阳人”上正可比高远。

“资阳人”化石涉及人类文明起源与中华文明“中国梦”的伟大复兴，是大非打非问题。解放后小平同志主政西南局，李井泉主政川西，修筑成渝铁路李井泉与小平同志争“资阳人”化石掌控权，小平同志没有给李井泉让步，这恰恰说明，小平同志是能正确处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矛盾与关系的最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然胜利。

从“资阳人”以后发生的乱局，看小平同志把关“资阳人”的重大现实和历史意义——小平没有把“资阳人”化石交给李井泉指挥的成都冯汉骥等专家，而是让张圣奘直接交到北京贾兰坡等专家手中，这既是对国家级专家的鼓励，也给国家级专家和“北京猿人”研究出一道难题——其高远不在于防止了成都地方专家的短见。因为毛主席抓的原子核子物质也可分的物理学大统一，和他要配合毛主席的战略抓的人类上古史大统一，是两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为人类和国家的命运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但为防范国家科学殿堂内专家，研究也难免有的失误，小平同志从以前党内高层处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矛盾与关系发生的“十次路线斗争”的现象中，已经敏锐地预见到，即使掌了权，抓物理学大统一和人类上古史大统一，也不会一帆风顺。

事实正是这样，如果“北京猿人”化石丢失是在解放前，掌控权并不全在我党专家手中，那么“资阳人”化石的发现，完全是我国掌控的解放后，就不应该出问题。但到今天连“资阳人”化石，发现的时间、地点，是否是化石，“资阳人”是男是女，

“资阳人”出现的时间是3万年前还是7千年前，等等，专家和媒体都还是众说纷纭，这又怪谁？今后还会发生吗？人们并不能肯定。

## 2) 与宜昌嫫祖之争

毛主席和小平同志坚持马列主义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紧跟科学的前沿。科技的重要，今天中美的贸易战看得更清楚。中科大教授袁岚峰博士说：当你进入高科技的竞争时，在某种意义上你就已经胜利了。科技竞争并不是战争，战争是破坏性的，甚至是负和博弈。而科技竞争是正和博弈，因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在科技竞争中，并没有传统意义的失败者，实际上所有的参与者都会从科技进步中获得好处。

袁岚峰教授说：在这个意义上，科技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而且是全人类最伟大的事业。科技与中国科技的世界定位，回到产业国际竞争格局的扫描还有第五类，就是由中国开创的这一类，目前只有一个例子，就是量子保密通信。它是人类已知的最安全的保密传输方法。2016年8月16日中国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一年以后，墨子号成功完成了预定的三大科学实验任务，包括卫星和地面站之间的量子保密通信。2017年9月中国开通了世界上第一条量子保密通信的干线“京沪干线”，在从北京到上海2000公里的距离上向金融等部门的客户开始提供服务。这些成果标志着，中国率先把量子保密通信从实验室推进到了接近产业化的阶段。这是近代以来第一次由中国创造一个新的产业，是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

其实这与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物质无限可分说世界科学大战分不开——这是他领导中国人民和科学界的将帅们向诺贝尔科学奖冲刺的一次伟大尝试。这场“战争”虽然远没有结束，但它已使中国的认知天平发生了巨大倾斜；也许沿着这块斜面向上攀登将是一座通天塔。这就是中国科学界应该认真总结这场“战争”的现实意义。而对笔者刻骨铭心的影响来说，就是在盐亭嫫祖研究方面发挥的作用。

宜昌嫫祖研究发起的第一人曾继全先生，当年是宜昌市公安局副局长，后调任作宜昌市建委副主任。原盐亭县嫫祖文化研究会会长赵均中先生，至今还在给笔者说到曾继全的故事——’94宜昌会议，曾继全局长曾向盐亭客人介绍自己研究嫫祖的酸甜苦辣——他自学成才，思维敏捷，观念新奇，出于对祖国、家乡的热爱，为冷落了几千年的轩辕黄帝之元妃嫫祖高唱赞歌，听到哪里有嫫祖遗迹，就要去搜寻资料；夜里挑灯，查了若干典籍；自费打印，出文集；在《湖北日报》、《宜昌日报》上发文多篇。

多年的事实是，研究嫫祖的学者很多，从中国

社科院历史所、考古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图书馆到湖南、四川、河南、江苏、山东社科院、大专院校等各地学者，从民间传说、地缘文化、地方文献、祭蚕民俗、文物古迹，丝帛文明、丝绸之路、女性文化、黄帝与嫫祖、文字与考古、古桑及化石等方面“各抒己见”——我们能体会到解开李进副省长提出的“嫫祖诞生地除绵阳市盐亭县外，国内其它省市也还有争议”的难题解决密码，不在嫫祖研究的盐亭与宜昌之争中——听宜昌市文联周立荣主席创作的“一带一路”主题歌《永远的嫫祖》的深沉、悠扬，你能说嫫祖不是宜昌出生或就是宜昌出生？全国各地多处争同一个人文始祖，是中华民族大家共同认祖归宗。

《永远的嫫祖》也会出她的优秀子孙《永远的任正非》——解答密码，正如2019年6月20日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总裁接受美国财经媒体CNBC的采访时说：“我们形容自己是一架‘千疮百孔’的飞机，具体很多，每个洞都要补，现在有成百上千个洞，每个洞都要补起来，飞机才能继续飞。但是这架飞机的发动机和油箱还是好的，所以我们一边飞一边修补洞”。方法也如2019年5月21日任正非总裁在华为总部接受央视《面对面》独家专访时说：“中美贸易的根本问题还是科技教育水平，国家一定要开放，才有未来”——“李进难题”的解决，只能靠是成千上万的群众和学者能紧跟科学的前沿。

以1994年7月12日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湖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宜昌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94中华嫫祖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宜昌市召开为例，宜昌市委、市府领导十分重视，参加开、闭幕式；市财政拨出全部会议经费；市建委投资数百万元，在明代曾建建有嫫祖庙的西山上恢复古庙——市级有关部门倾注心血，渴望通过研讨、参观、扩大交流，最后确定嫫祖生地。当年赵均中会长与衡平和王映维两位盐亭县嫫祖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带了200本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嫫祖研究》一书，嫫祖纪念章200枚，重要文物如古桑化石、石斧、金蚕、陶蚕等照片80余张和录相带两盒应邀参加。

曾继全局长热情欢迎，盐亭县嫫研会把书全部交给他，说明不收任何费用，只请宜昌在开大会时分送给到会的代表、领导、专家、学者。宜昌的主人们把书放到资料库房里后满口应承。但第二天大会开幕到大会结束，都没有把《嫫祖研究》一书拿出来分发给大家。此期间赵均中、衡平和王映维都提醒过宜昌的主人，回答都是“等一等，要邀请你们大会发言”。就这样，他们摸不着头脑回到盐亭。

后来曾继全局长才打电话告诉已是盐亭县志办主任的赵均中先生，说《嫫祖研究》一书把他们“害惨了”——赵均中主任说，实际他和衡平、王映维等副会长，与曾继全局长想的一致，都不主张嫫

祖研究搞“古年表、王表”和紧跟科学的前沿考古，因此他们和宜昌嫫祖研究发起人曾继全局长谈得很融洽，本以为一切会顺利安排。

《嫫祖研究》一书1993年7月正式出版，分上下两编。上编为《嫫祖诞生在盐亭》。下编为《嫫祖与上古文明》——又分为两章：第一章为《古史迷雾》；第二章为《嫫祖年谱初编》。曾继全局长说的“把他们害惨了”，指的是《嫫祖研究》下编书后说明：“主要参考文献为《科学（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1992年第3、4、5、9、11期，1991年第4、7、8、10、11期”。《科学（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本有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重庆分所出版的中译本公开正式邮局征订发行，但宜昌方面把它当成《科学美国人》的英文本，曾继全局长在1994年会后带一批专家到北京图书馆，借出《科学美国人》的英文本1991年和1992年的这批杂志，进行中文翻译，然后查看中文，花了近两万元的经费，也没有看出个名堂。

《嫫祖研究》下编书后说明之所以简略，是因出书经费紧，为减少篇幅，编委会决定所有文章后不列“参考文献”。衡平副会长是老中学教师，他再三要求，编委会才同意他的一篇《嫫祖考》18页长文后，再列了近两页《附注》。《嫫祖研究》一书是笔者1981年4月从重庆调回盐亭就开始发起的工作，历时12年，到笔者再到《绵阳日报》社工作，组织找马敬洪市长批出书经费，找出版社，找绵阳市新华印刷厂，才把2000本书出版出来。

而笔者能从重庆调回盐亭县科协工作，有机会继续看到《科学美国人》中译本杂志，也得益于受毛主席领导物质无限可分说讨论和重视坂田昌一的基本粒子观的带动。从1965年上大学到1970年大学毕业分配去重庆冶金部18冶建公司工作，再到1981年回盐亭，16年间笔者业余没有间断要找坂田昌一的老师汤川秀树，以及南部阳一郎、海森堡、B·诺伏瑞洛夫等的基本粒子物理学和有关的数理化天地生书刊来自学。1975年笔者在18冶完成平生第一篇科学论文《基本粒子的结构不是类点体而是类圈体——向现代理论物理学中的类点论挑战》。当年10月在家乡盐亭县玉龙公社作妇女主任兼革委会副主任的妻子，生儿子，笔者请假回家乡照顾也把稿子带回有空好修改。

一天玉龙区党委书记何朝伯同志来玉龙公社检查工作，看到笔者身旁放着的手稿，他拿起来翻看了好一会。放下手稿时他说：“写得可以。”笔者非常惊讶。他一个十足的“土改干部”，文化不高，怎么知道基本粒子物理学的？笔者以前没有接触过何朝伯书记，但知道他是笔者家邻乡黄溪乡何家坪的人，和笔者姑父何朝贵是同村。姑父曾讲何朝伯书记解放前家里穷，没读过几天书。1950年刚

解放他约 20 岁，是村上的民兵大队长，因搞土改积极，不久调乡上做干部。到 1958 年大跃进，他已是玉龙区高灯乡党委书记。高灯乡从此一直成为全县的蚕桑生产模范乡，到 1974 年才调到区上作的党委书记。

何朝伯书记看笔者一脸的迟疑，笑着说他一贯爱看党刊党报；1965 年他在高灯乡作党委书记，看到当年第 6 期《红旗》杂志全本刊登日本的坂田昌一的《新基本粒子观对话》一文和编者按以及《注释》，后《人民日报》又全文转载这期《红旗》杂志，引起他高度重视。虽然他看不懂，但一直在捉摸毛主席在为啥？今天翻看你的稿件，才明白可以引导中国人也能科学创新。

就是这次偶然相遇，五年后为解决夫妻分居，笔者请求调回家乡盐亭县工作。在重庆 18 治时，笔者已想到家乡的嫫祖传说和蚕桑生产的发达，想改行搞科普。但县上以专业对口想安排去盐亭县农机厂，征求意见。笔者说想到县科委或县科协，组织上说县科委 5 个人已满，县科协一老一少两个人，但没人签字同意你去。恰巧何朝伯书记 1981 年刚调作盐亭县科委主任，县科委和县科协在县委大院门口一间房子里办公，暂归科委代管。在县委大院门口又一次偶遇上何朝伯书记，他知道情况后，他说他去找组织部，愿意代签字接收。

经过十年的修改补充，《基本粒子的结构不是类点体而是类圈体——向现代理论物理学中的类点论挑战》的稿子，1986 年在《华东工学院学报》第 2 期上，以《前夸克类圈体模型能改变前夸克粒子模型的手征性和对称破缺》为题公开发表后，《北京科技报》、《信息报》、《信息时报》以“一道世界物理难题获解”作了报道。1987 年绵阳市科委主任程宝隆同志，也是绵阳市科学学研究会理事长，当年研究会要评选优秀论文，他组织召开评委会，有来自全市大专院校和在绵阳的国家科研单位的专家参加。会前他和他在科委工作的爱人，亲自帮助笔者填写《申报表》和复印在《华东工学院学报》发表的论文，交给评委推荐参加评选。但不想在评委会上介绍情况后，专家们都说看不懂，不同意评选。程宝隆主任耐心地解释说：“世界上只要一位懂行的专家能看懂，参评就应该评审；况且是在正规大学学报上发表的，说明有多位专家审定过，我们更应该再审定”。

这是给评委会出了一道难题——到会的专家都看不懂，如何审定？最后专家们同意设个“特等奖”，排在一等奖后。多年过后，一次笔者偶然遇到程宝隆主任，他说起评选经过，笔者万分感动。1987 年笔者在盐亭县被选为绵阳市人大代表，第一次到绵阳市参加人代会大会开幕。程宝隆主任是作为市局级领导列席会议，他看到盐亭县代表团名单上笔者

的名字，会后他主动找到笔者说：他看到《北京科技报》等报上“一道世界物理难题获解”的报道，但不认识笔者，也没机会找到笔者；这次借市人代会开会，请晚上到他家去一下，因为绵阳市科学学研究会要评选优秀论文，要填个表，他对笔者的其他情况不了解。晚上到了程主任的家，他和他爱人都非常热情，程主任说笔者的论文材料，他爱人在科委可以帮助复印。笔者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填了申报表就离开了。据说程宝隆主任是作平武县委书记调作市科委主任的，也是一位老土改干部，只是解放前他上过农校。

现在再过头来说笔者紧跟科学的前沿与嫫祖研究有什么关系？嫫祖研究，盐亭与宜昌之争，宜昌市公安局曾继全局长 1994 年带领一批专家也算认真，对笔者主编的《嫫祖研究》一书给予了审定。25 年后笔者可以把曾继全局长说的“把他们害惨了”的《嫫祖研究》下编书后说明：“主要参考文献为《科学 (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 1992 年第 3、4、5、9、11 期，1991 年第 4、7、8、10、11 期”的文献题目公开，并解说其意义。

《科学 (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 1991 年第 4 期是：《现代人类的出现》；第 7 期是：《古代城市的勘查》；第 8 期是：《语言学的发展趋势：原始词语》；第 10 期是：《早期弓的设计与构造》；第 11 期是：《古代秘鲁的铜合金冶金技术》和《南岛诸语言的传播和起源》。1992 年第 3 期是：《基因、种族与语言》；第 4 期是：《骑马的起源》；第 5 期是：《部落战争》；第 9 期是：《分子考古学的动向——意味深长的遗骸》；第 11 期是：《最后的石斧制造者》。

笔者喜欢科学的前沿基本粒子知识，但当时国内能看到的书刊很少。1970 年大学毕业分配到重庆，能在重钢图书馆内看到中国科技情报所重庆分所刚试刊出版的《科学美国人》的中译本《科学》，由此一直坚持看每期出版的杂志到退休。原因是《科学》除介绍有高能物理国际最新的进展外，还有类似以上可联系嫫祖研究的科学前沿的介绍。其实，笔者喜欢基本粒子和现代宇宙学，也是为了研究嫫祖、歧伯和盘古等家乡传说的人文始祖人物——产生宇宙大爆炸和基本粒子是约 137 亿年前，都搞清楚了，难道嫫祖、歧伯和盘古等人文始祖不到 1 万年搞不清楚？实际只从古文献、注释，地方传说、祭祀祭奠遗存考证，只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要让国际上的专家明白和印证，在现代是需要高科技方面的说明材料，才能慢慢统一认识。

所以《嫫祖研究》一书开篇的《序》中说：“希望一切有关嫫祖是否为盐亭人的争论，最好抄当代高新技术的研究，如用分子考古学、遥感考古、地面勘查考古法、埋葬学等国际先进科学成就来争

论”；至于文献传说、神话、民俗等仍是收集整理、再创作丰富的问题。

### 3) 与西平嫫祖之争

雷锋(1940--1962年),共产主义战士,出生长沙。1962年8月15日在部队服务中不幸英年早逝,年仅22岁。1963年3月5日毛主席等题词、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后,做好人好事,影响了几代人。在广泛持久开展学习雷锋活动中,全国、全军各部队和全国各条战线上涌现出大批雷锋式的英雄模范人物。

因为年代比较近和不是神话及人文始祖人物,“雷锋”和“雷锋式人物”容易搞清楚。作一点相似联系,把“嫫祖”和“嫫祖式人物”作类比解答“李进难题”,也许用年表、王表的历史进展顺序,把中华“天下人--天下道”因各种灾变、事故造成的“认祖归宗”统一。

例如,据“百度百科”整理,关于西陵氏部族的地望和嫫祖故里的认定,存在十余种观点:河南有三地:开封、荥阳、西平;湖北有四地:宜昌、远安、黄冈、浠水;四川有三地:盐亭、茂县、乐山;还有山西的夏县、山东的费县和浙江的杭州。

由于古代文献上或多或少地有过这些地方为“西陵”或者与嫫祖传说相关的记载,所以认定这些地方为“西陵”并非空穴来风,也就无法完全排除这些地方为嫫祖故里的可信性。尤其是在四川盐亭、湖北宜昌先后举行嫫祖文化研讨会以后,嫫祖故里盐亭说与宜昌说在学术界曾产生较大影响。“百度百科”的具体操盘手的整理,不是用“抄当代高新科技的研究”,便也类似曾经的古文献注释,或多或少有倾向性---如倾向“西汉以前,西平一带称为西陵有较为充分的文字记载”。至于西陵在河南什么地方,《水经注》记载:西平县,“故柏国也,《春秋左传》所谓江、黄、道、柏方睦于齐也。汉曰西平。其西吕墟,即西陵亭也。西陵平夷,故曰西平”。尽管如今对“西陵平夷,故曰西平”有着不同的理解,但也说明了西汉时期的“西平”和“西陵”大致为同一个地方。西汉的西平县属于汝南郡,1981年甘肃武威磨咀子发现汉简将近40枚,其中的“王杖诏令”简上有“汝南西陵县”等文字,西汉以后,这里又设置过西陵乡、西陵亭等与“西陵”相关的地名,进一步说明西汉将西陵改为西平是有史可证的,即:西汉前期和西汉以前,西平一带称为西陵,西陵之名可能源于远古时期的西陵氏部族。

又因与新郑(黄帝故里)地缘相近,增强了西平为嫫祖故里的可能性。原始社会交通极为不便,到处是未曾开发的山林沼泽,决定了远古部族之间相互交往存在一定的地域局限性,地缘临近应该是远古部族之间进行通婚的重要条件,同时,通婚也是增强部落之间政治、军事联盟的重要手段之一,

这就要求西陵氏部族应该与黄帝部族具有较为接近的地缘关系。《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娶嫫祖之时,居于“轩辕之丘”,说明西陵氏部族应该距轩辕丘不会太远。明代的《广輿记》、《明一统志》、《天下名胜志》以及清代的《大统一统志》等文献均称轩辕丘在河南新郑,所以学术界普遍认同黄帝故里在新郑。以现今的里程计算,西平与新郑相距120公里,活动在新郑的有熊部族与生活在西平的西陵氏部族地缘相近,具备交往通婚的便利条件。相对而言,四川盐亭与新郑相距数千里,湖北宜昌一带与新郑虽然较四川为近,但也有千里之遥。新郑与这两地之间路途遥远、山水阻隔,地理等自然因素决定了黄帝部族与当时活动在巴山蜀水间的各部族的相互交往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如果西陵氏部族生活在盐亭或宜昌等地,会使黄帝娶嫫祖为元妃存在诸多不可能的因素。而且民俗、传说和考古材料,提高了嫫祖故里在西平的可信性。

这就是当代我国“学术界普遍认同黄帝故里在新郑”,嫫祖故里在西平的学术水平?任正非总裁说:“我们形容自己是一架‘千疮百孔’的飞机,具体很多,每个洞都要补”---说到点子上---不说盐亭县粮食局的老干部、92岁高龄的石云龙先生用了20多年时间著书立说,发表多篇评论1981年甘肃武威磨咀子发现汉简将近40枚,其中的“王杖诏令”简上有“汝南西陵县”等文字,联系河南西平有误。就是一位1954年出生盐亭县富驿镇雄关太平村、只读过三年半书的小学文化的农民杨绍森先生,2003年他在河南新郑市打工,在该地新华书店偶然买到一本关于黄帝与嫫祖传说的书,书中写到嫫祖诞生地古西陵在今河南省西平县,他感到有些困惑。后来回到家乡写出长篇章回小说《千古丰碑》,2008年由国际炎黄文化出版后,有评论《认识“远古联合国”盼和谐一统的赞歌》,给予与西平之争的解读。

原来杨绍森先生家乡四川盐亭近一百年来有一批学人一直在研究嫫祖,阐述中国早期文明真正的辉煌。与河南西平、开封、荥阳说,湖北远安、黄冈、浠水说,山西夏县说,山东费县说,浙江杭州说、四川叠溪说等声称嫫祖诞生地不同的是,60万盐亭人妇孺皆知一个几千年来世代相传的《金二伯射黄帝》的远古传说。但黄帝是中华民族人所共知的人文始祖,能射吗?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远古政治传说,使近代一百多年来盐亭的学人难以理解。

但它却揭示了中国早期文明为什么是辉煌的,它的光辉在于什么地方?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一是中国早期文明的长度,起点于约公元前6390--6210年的法天法地时期;二是中国早期文明的广度,地处四川5000多年前的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遗址,说明它孕育了后来的东西文明;

三是中国早期文明的高度，地处四川5000多年前的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遗址，说明它曾诞生过一个海洋文明在先，农耕文明在后的类似和谐一统的“远古联合国”。

把杨绍森和西南石油大学常健民教授作比较，从这两种不同环境的人出发可以看出他们是各展其能：常健民的盆塞湖和海啸遗迹地质考察，是注重历史的真实；杨绍森的长篇章回小说，是抓展历史的精神——《千古丰碑》是认识“远古联合国”盼和谐一统的赞歌。

2000年四川省出版的《文史杂志》第2期发表的《“绵阳第一碑”与盘古王表石》一文，列出了盘古至禹的该年表。历史学家王立教授说：在没有更好的证据出来之前，《盘古王表》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其次，“盘古王表”中的金二伯、盘古、嫫祖等三位人物传说曾活动过的三座名山：衣落山、五面山、长平山。其中衣落山地区传说的《金二伯射黄帝》，更有传闻汉代天文学家落下闳是盐亭地区西陵氏金二伯的后代，还传说金二伯就叫金落下，不但会冶金，而且会观天象。金二伯反对嫫祖与黄帝轩辕完婚，反对嫫祖扩大“远古联合国”，把政权交给轩辕氏、把“远古联合国”总部迁移到中原，企图射杀黄帝。因实践证明金落下是错误的，所以传说后来金二伯自觉找到嫫祖和黄帝，跪在他们面前“负荆请罪”。

令人震惊的是，1995年3月18日，盐亭县金鸡镇农民岳大登、杨华茂、岳树伦等人，在金鸡镇烟台山顺天寨挖出一尊十分古朴的高约60厘米的青铜跪俑，初定为“金二伯铜像”。原绵阳市团委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颜晓亚摄影师，认为很有价值。后四川省博物馆雕塑院名誉院长叶毓山教授，已鉴定是比三星堆更远古的青铜像。

2008年3月28至30日西南石油大学的常健民教授，到盐亭踏勘了解盆塞湖和海啸遗迹的地点、地貌、地物、传说、早期工作、地方关注等情况，想以地质学和他的地球翻转观念去解读远古遗留的地质剖面现象。由于这次踏勘性了解偏于地质学，笔者作为常教授的向导，请求盐亭方面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赵均中先生协助。赵均中于是叫来杨绍森先生和我们一同考察。杨绍森把他著的《千古丰碑》一书，分别送给了常健民教授和给他开车来的邓师傅以及笔者。

常健民教授1944年11月生于南充市，1962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地质测量及找矿系专业学习。先后在内蒙、川北和西昌等地从事野外地质技术工作。1980年调入西南石油学院地质系任教，到2004年退休。2004年初常健民教授完成了自然科学新发现的《地球翻转》书稿和“地球翻转的首次鉴别及其科学效应”的论文。常健民教授在盐亭踏勘了盘古

圣地的天垣盘垭村袖头山、五面山以及嫫祖故里的云毓山、烟鼎山、嫫村山，回龙山、公子山等山寨城邦文明遗址和观看了多处收藏的文物后认为，从玉龙镇、高灯镇、金鸡镇等地区密集的古山寨遗址景观看，盐亭存在远古文明事实的可能性很大，特别是烟鼎山脚下申家沟台地上露出的民间俗称为“石条球”的约七米高竖立的“石柱”，有可能是这个远古文明留下的建筑物遗存，值得发掘。

杨绍森先生失学于“十年动乱”，他父亲因有“历史问题”而冲击到他们，但他没有怨天尤人。他在农村勤俭持家、勤劳致富、团结乡里，受到党组织的重视，把吸收为中共党员。和其他农民不同的难能可贵之处是，他离开学校后，书从未离过手，使他逐渐积累了知识，为后来创作《千古丰碑》打下了基础。他在河南新郑市打工，嫫祖诞生西平县的困惑触发他想到古史的“千疮百孔”：自约公元前911年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开创纪传体史书范例的《史记》问世以来，历朝历代都没有搞清楚黄帝是一个人还是不同代的几个人？任凭谈四千年前有黄帝，五千年前有黄帝，六千年前有黄帝，乃至近年还有学人说三千年前有黄帝，七千年前有黄帝——中国史学家做学问不怕“脸红”，已成为中国“特色”。

例如，新浪网“老派的博客”2009年发表据铜川民革成员、陕西文学院签约作家、炎黄文化研究专家李延军写的《黄帝生平年表初编》，说“公元前6019年阴历二月初二，黄帝轩辕氏出生于寿丘（今陕西省黄陵县黄帝陵桥山东南桥沟塔之长寿山）”。即黄帝轩辕氏出生在至今8000多年前。杨绍森不服这口气，他在河南灵宝、新郑等地暗暗搜集资料后，又毅然回到家乡，在劳动之余深入到高灯、金鸡等地考察蚕丝山、水丝山、轩辕坡、丝织坪、锦机台、三锅桩、先猫洞等嫫祖传说留下的遗迹，还主动向一些嫫祖文化爱好者请教，多次征求意见，三易其稿，终于让14万字的《千古丰碑》面世。

在送走了常健民教授之后，笔者用了约一周时间读完了杨绍森先生的《千古丰碑》。杨绍森积极为弘扬优秀民族文化添砖加瓦，奉献的这本《千古丰碑》，与十多年来以盐亭嫫祖传说为题材创作的近十部长篇小说和戏剧、影视作品不同的是，突出了“盘古王表”中远古文明从“城邦之美时期”到“跃起中原时期”过渡的内部斗争。杨绍森不是专业作家，在今天，民间搞纯文学创作或纯科学研究都是自费的，不能养家糊口；杨绍森的主要任务还是搞生产劳动，而且他的作品主要面对的还是劳动群众，所以《千古丰碑》写得很质朴，很多用语也同今天的历史小说、戏剧、影视作品相似，而且是人间、天庭人神相应，很有可读性和感人之处。

四川盆地地处祖国西部或西南，是中国黄河、长江两条大河上游的交汇处，也是东、西人类文明的交汇处，还是远古云南元谋人、陕西兰田人、广西柳州人、重庆巫山人等的交汇处。如果一万至五千年前四川盆地因地球局部地质大灾变，曾经形成过盆塞湖到盆塞海，古梁州有过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而区别于同时期其他地区的人类文明，是它具有先进的原始生产力、先进的原始文化、先进的原始方向的话，那么以盘古文明为代表的四川盆塞海或盆塞湖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的人类社会，是如何称呼现代人理解的部落、联邦、联盟、国家、氏族等社会组织的？又是如何称呼现代人理解的国王、皇帝、酋长、头人等领袖人物的？这也许是今天的历史学家也难弄准确的，所以杨绍森《千古丰碑》书中，把类似的社会组织称“部族”，头人称“族领”，黄帝自称“朕”等，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

有书云：“将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用现代人理解的称呼去衍绎远古的人和事，也是为让现代人更好更准确地理解远古的人和事。笔者和常健民教授也讨论过“远古联合国”的用语——说盘古文明类似“远古联合国”，而不类似现代人理解的部落或氏族联盟、联邦、国家，是因为它们更像部落或氏族联盟、联邦、国家类型的混合体，这恰与今天的“联合国”相似。

今天“联合国”内部的国家之间也有战争，但它的大趋势是以“和谈”解决问题为主，是以“化干戈为玉帛”解决问题为主，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千古丰碑》虽然使用的是部落或氏族联盟的用语，但较好地理解了“远古联合国”式的盘古文明。这突现在《千古丰碑》坚持表现部落或氏族要追求和谐一统的联盟构思上，坚持表现部落或氏族追求“化干戈为玉帛”的波澜起伏的情节构思上。其中更不回避金二伯与联盟的矛盾，黄帝与炎帝间坚持大统与自强的矛盾，黄帝与蚩尤间不同文明的矛盾。其实今天“联合国”内部的国家之间也有争论，“联合国”的实践，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旅游文化”的实践，都对争端解决提供了启迪。

北京学者苏三称中华文明起源于中东，“三星堆”属于古犹太文明；中东是人类“文明的子宫”，中华文明则是它的“宫外孕”的文章。说实话，笔者不赞成苏三的观点。因为笔者多年研究发现，中国除四川盆地外，其他地区难于建立八千至五千年前中华多代“远古联合国”历史实地研究的平台，原因是没有如目前四川省绵阳市盐亭县的那种远古文明遗迹。虽然那里的远古原有的生态景观和古建筑群早已被破坏，但那里的海啸地质地貌和山寨城邦遗迹结合的景观随处可见，如在绵阳涪江和梓江

下游区域，距今8000年左右的古山寨群落遗址犹存，它们规模宏伟，气势壮观；围绕古山寨的处于半山腰的大围坪，延伸数百里，境内文物古迹众多。这些与古书记载的蛮荒历史无一相似；俗称“洋港子土”的丹霞地貌的浅土崖层剖面，“低岸为陵，高山为谷”的地质突变造成的高山鹅卵石延伸带的古河床遗迹、古冰川冰臼遗迹等也有数十处。

这使人想起了20世纪初留学日本归乡的学人何拔儒，通过长期考察和研究从盐亭辐射嘉陵江流域两岸的大围坪和古山寨地质地貌，得出从1.2万年至8千年前的大冰川末期起，四川曾发生和存在过多次盆塞湖和盆塞海现象，从而为5000年前中国的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提供了地质地理条件，而被人称为中国上古海洋文明和城邦文明古环境研究的第四部书。如果海内外的考古学家，即使英、美、法、德、意、加、日、澳、俄等多国考古队齐聚绵阳市盐亭等县区，也有平台能安置。因此把苏三的观点反过来，把1.2万年至5千年前的四川盆塞海的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现象，看作是人类文明的“孵抱期”，而中东文明则仅是它的“应用期”，不是也行吗？

#### 4) 与周光华教授文明起源地之争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小平同志的这一智慧是从哪里来的？应该说，从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中国开创多元一体的国家模式起，到今天总部设在美国的联合国，都联系着这一永恒的主题。华夏自古就有的“世界大同”、“天下莫非王土”、“大同王土”之说，揭示了远古华夏族开创全球多元一体国家模式实践的理想，也揭示了远古科技、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进步改变了战争的形式，其结果也改变了政权及政权人物现象的特征。2004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淄博市社科联研究员周光华教授的《远古的华夏族》一书，谨慎而探索性地翻开了这一进程的第一页。

《远古的华夏族》凸显《山海经》的多面意义——古今中外研究《山海经》的人很多，把周光华教授《远古的华夏族》里的《山海经》研究，和胡太玉教授在2002年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的《破译〈山海经〉》比较，客观地说，《破译〈山海经〉》的学术规范性不如《远古的华夏族》的学术规范性强——理论追寻年表和王表，成为记述人类社会远古史的一种要求，周光华是努力在做着。相比之下，《破译〈山海经〉》缺环太大。这是一件难事。不说四川省盐亭县何拔儒老先生破译的天垣《盘古王表》和他的中华文明是盆塞海文明在先、农耕文明在后的观点，就拿周光华教授说的“稷作文化”与“稻作文化”，即所谓远古长江文化是源生文化，并且是后来接受远古黄河文明的渐浸文化，在目前也难于取得共识。



无容讳言,《远古的华夏族》是以整体剖析《山海经》为基础,尊重《夏商周探源工程》的合理衔接,尊重《史记三家注》提供的历史年代线索,结合古籍和学界、考古界的研究成果,但还需实地考察全面综合研究华夏族。即周光华教授对学界争论的敏感问题、应该提出商榷的问题,没有做大的争辩,是尽量避免“稷作文化”与“稻作文化”之争。从全书来看,由于作者是工作、生活在山东,更多了山东的情况,所以也过多地描绘了远古黄河文明的渐浸和源生。

胡太玉教授的《破译〈山海经〉》与《远古的华夏族》有很多相同之处,但胡太玉不是立足于周光华的山东,也不是立足于周光华的远古大黄河文明渐浸长江文化。相反,胡太玉是立足于成都平原,立足于长江文明的源生文化,不但对国内黄河文明作了渐浸,而且对美洲、西亚、非洲和欧洲,早在6000年前已作了开拓,证明了天府之国可能就是人类史前文明的“母国”,成都与东方伊甸园有着密切的联系。但胡太玉教授为了说明《山海经》是一部上古世界联合国史志,写得更像报告文学。我们不知道胡教授是不是在四川工作,当然我们不是说在四川工作的人,就一定偏重四川或“稻作文化”。

因为还可举两个反例。一是祖籍在山西,在成都出生,在广元市任职的白剑先生,2002年出版的《文明的母地》一书,就偏向于周光华教授工作的山东,说三星堆发掘的远古青铜器,原本是山东泰山大庙夏朝祭祖、祭天的铜器。由于掌管泰山大庙的夏朝功臣有缙氏部落,不满夏桀的暴政,西迁逃到四川的三星堆,这才是三星堆著名青铜器的来历。白剑先生的理性是,他反对人类起源于非洲撒哈拉说,而类比提出戈壁滩人类起源说,于是远古的华夏族是从戈壁滩走出,由西向东经过甘肃、陕西、河南到山东的发展,再向长江开拓的。

而在北京出生、工作的王红旗教授,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从信息传输角度研究《山海经》,用了差不多20年时间,才完成了对《五藏山经》地理方位的全面系统考证,2003年他出版了《经典图读山海经》,是立足于北京而偏爱四川。他认为神农、炎帝族源生于北京桑干河谷,而不是陕西;他认为帝尧时,东海已淹没到了太行山。2002年他在《文史杂志》第1期发表文章说,蚕丛发明了望远镜。

理由是三星堆遗址的两个与商代同时期的“祭祀坑”里,出土有54件青铜纵目人像及面具,它们或两眼角向上翘,如同竖眼一般,或眼球向外突出。其中一件青铜人面像,阔眉大眼,双眼斜长,眼球极度夸张,直径13.5cm,凸出眼眶16.5cm。前端略呈菱形,中部还有一圈镯似的箍,宽2.8cm,眼球中空。据此眼球突出的纵目青铜人像,他认为其文

化和族属渊源蜀人的先祖蚕丛氏,可解释为这是远古蜀人关于望远镜的使用和崇拜。

白剑先生是一个年青的学者,他了解广元市周围羌族地区的情况。这一带靠近岷山和秦岭,在《文明的母地》一书中,他可以尽情地发挥“蜀人来源于氏羌人”的观点。其次,他也容易到附近绵阳市,考察盐亭县的嫫祖文明遗存。当他在短时间内的旅游中,看到的古文明遗存因已被解放时破坏,而不尽人想象的标准后,就开始在《文明的母地》一书中尽情地发挥对盐亭县学人研究的批驳。但他不知盐亭数十座古山寨遗存被拆得荡然无存,数千册古籍资料已被烧毁,这一幕却发生在1950年的土改运动,及以后多年中的一些革命和生产、生活的需要。这是当地当代老人们不愿说的事情,但当地农村七、八十岁以上还活着的人,都亲眼目睹过---白剑先生和当地这些人比起来,不但不了解,而且从年龄上也没有经历过那场“暴风骤雨”。

旁证还有,1958年大跃进,绵阳市有数万人涌入广元市大山中挖矿大炼钢铁,建大小高炉、鸡窝炉数千座,造大小风箱数千台,那是千真万确的。这事已过不到60年,却已荡然无存。当然现在活着的六十岁以上的人士,大多亲身经历目睹过,人还在可以作证。如果白剑先生作为广元市宣传部长、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因找不到那些炼钢遗迹或风箱类似的遗物,能说这是谎言吗?况且在盐亭,大围坪、寨子山等地地貌铁证如山---俗称“印把子山”的地貌在嫫祖故里随处可见,只要懂得历史计量学的有责任的地质学家,定能鉴别真假。

正反信息博弈法,凸显华夏远古盆塞海文明。以后类似华夏远古黄河大文明是中国远古的主干文明一样,地中海周边远古大文明是世界远古的主干文明,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等于说这两处文明,就是人类社会文明的孵抱期。相反,华夏远古黄河大文明和地中海周边远古大文明正反信息博弈,却凸显了以中国西部远古盆塞海文明为特征的远古国家共同体或古世界联合国,类似现代欧盟或联合国模式的存在。因此,如果说人类最早的顶尖优势文明起源于8000多年前的巴蜀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那么就能说明中国后来的北方、南方以及海外的远古文明渊源问题。因为在这些顶尖优势文明产生之前,嫫祖、夸父、盘古、女娲、伏羲、蚕丛等先王,已经在巴蜀盆塞内陆海及四周城邦之间,演习操练远古市场经济和物品交换经济---即龙凤经济或龙凤文化存在多时了。

著名历史学家蒙文通教授早就说过,《山海经》是远古巴、蜀、楚人最初完成的著作。但蒙先生论证何为“山海”,何用“山海”?没有说清楚。何拔儒先生说“山海”就是“盆塞海”,《山海经》就是以“盆塞海”文明为中心的古联合国史地志书。

真是画龙点睛。但蒙文通和何拔儒都是四川省盐亭县人，有“稻作文化”人之嫌。《远古的华夏族》虽给“稻作文化”留有余地，但主要维护的还是黄河大文明和“稷作文化”，所以也不讲何为“山海”，何用“山海”，但在该书第四章“华夏补说”中，周光华教授却在无意中揭开了中国西部远古盆塞海存在的秘密——如果中国西部远古盆塞海是以巴蜀盆地或巴蜀为中心，这个盆塞海能淹没或能沟通淹没的省份，当然只能是巴蜀盆地及临近巴蜀周边的其它省、市、县了。

它们是四川、重庆、陕西、青海、河南、湖南、湖北、贵州、云南、西藏、甘肃等省、市。如果把把这个盆塞海内的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史地志称《海内经》，这个盆塞海周边东、南、西、北的城邦文明史地志称《海内东、南、西、北经》，临近这个盆塞海周边东、南、西、北城邦文明外边的东、南、西、北的陆地文明史地志称《海外东、南、西、北经》，再远离这个盆塞海周边的陆地文明的东、南、西、北的农牧文明史地志称《大荒东、南、西、北经》，那么不管周光华教授对《山海经》里诸多“国”的推说或考证是否正确，他在该书 266 页至 267 页提供的《海内经》、《海内东、南、西、北经》、《海外东、南、西、北经》、《大荒东、南、西、北经》等各处邦国地域位置涉及的具体省份，都可作参考。如果这个介说能够接受，那么他说的《海内经》的邦族地域位置，涉及到青海、四川、重庆、陕西、河南、湖南、江苏等 7 个省、市。其中只有江苏一个省是远离四川省的，不符合“海内经”的设定。

至于贵州、云南、西藏、甘肃等省没有涉及到，这不奇怪的。因为对于远古的发达文明，这个设定的省份只能是少，不可是多的。其次，我们还可以反求之，看四川省是不是混在周光华推说或考证的其他各类山经中？结果四川省只在他的《海内南经》推说或考证中一处出现。把四川和重庆放在《海内南经》的地域位置，也是正确的。因为盆塞海内发达的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主体是在四川省北面绵阳地区。以此作参照，四川省南部及重庆、贵州、云南、西藏等省、市，当然是在《海内南经》的地域位置了。其中还没有涉及到的甘肃一省，是在《海内西经》和《海内北经》两处提及的。可见周光华的推说和考证，是很合符《山海经》的原著，且准确概率也很高。

其他的问题，还可能存在着《山海经》在成为纸版书之前，因为古人是写在竹筒线编的书上的，后来出土或发现时，竹筒因线编已经腐烂而散乱，是后人根据竹筒散乱的具体情况和文句的联接，重新整理出来的。所以即便是周光华推说和考证现存的《山海经》上的邦族地域位置正确，也难免《海

内东、南、西、北经》、《海外东、南、西、北经》和《大荒东、南、西、北经》中，各邦国地域位置涉及的省份有混淆之处。但四川省又是不能太混淆的，因为中国远古盆塞海的主体是四川盆地，盆塞海内发达的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就只能是四川省一个，这个概率是很小的。

反之，散乱和联接生错的概率也很小。周光华教授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以他的造诣和认真负责的精神，从历史文献的角度第一次科学地证明了华夏远古盆塞海文明在中国的存在。从“先进治国”论的意识形态，就能揭示中国远古盆塞海文明与山寨城邦文明，较同期其他地方，有更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表现，这才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之源。这里，中华民族的开山先王，在开创人类文明的搏斗中，已感悟和树立起“传播发明，天下大同，幸福共享”的原始意识形态。即使后来一些部落和王朝的“落后侵略了先进”而取代了前王朝，这种“天下大同”的中华民族开创性的意识，仍然保存了下来。

这说明真正产生过具有先进意义的意识形态文明，是不会消亡的，是能够传播的。这才是“中国主义”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真正内涵，并且以此“传播发明，天下大同，幸福共享”的“中国主义”，推进世界大同。周光华的《远古的华夏族》，是他自觉地运用新的“先进治国”论的思想，来研究远古华夏族的政权现象及政权人物现象，揭开了人类社会邦族或邦国内部政权交接的社会现象。

例如，《远古的华夏族》中 166 页至 190 页，作者用了近两万字的篇幅，全方位地描述了炎帝蚩尤氏族的发展和先进性。作者由衷地写道：“研究认为，炎帝蚩尤氏在中国地域的东部，奠定华夏文明的物质地域基础。随着使用青铜兵器能力的提高，炎帝蚩尤氏的经济生活能力和军事治政能力同时得到增强壮大，古‘中冀’黄河北岸乃至今天的山东广大地域，成为当时炎帝蚩尤为代表的，华夏族发达经济文化治政中心地域，成为华夏民族兴旺发达的地域根基地，代表着当时华夏文化进步发展的时代主流”。这样从蚩尤、黄帝、炎帝之间的战争，是内部争夺领袖权的战争来看，就觉得这是人类社会邦族或邦国内部政权交接的一种程序编码。

作者用蚩尤氏代表着当时华夏文化进步发展的时代主流，回答了蚩尤为什么要同黄帝大战的这个社会进程的程序或编码问题——战争与改朝换代必然且自然地遵循的法律程序，周光华教授暗示，国家内部社会大的改朝换代，存在着必然且自然的规律程序或法律编码。毛主席就讲得很直白：“枪杆子里出政权”。说明从远古到如今，国家内部社会大的改朝换代至少存在两形式。第一种是“发明创造出政权”，第二种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

“枪杆子”是一种科技武器，不同于远古黄帝以前的先王，用自然物简单加工制作出的原始工具，进行的这类“战争”，因为它的残酷性、死人的数量是有限的。从青铜器、铁器到“枪杆子”，这是人类社会用自己发明的科技原理，创造生产出的“高科技”工具武器。所以，国家内部社会大的改朝换代进行的这类战争，是更残酷的“内战”，是人类的“自残”。

这类更残酷的“内战”，是从蚩尤战黄帝划分时代的，它是人类社会“科技”出现发生的不可避免的必然“程序战争”或“战争编码”，它深刻地说明了政权现象与科技现象的关系。但民主与独裁并非是不对立的，例如那些缺乏强大的原始创新科技力量的国家，它们即便有了民主的政权，也是不强大的。所以科学和民主不能一手软、一手硬，两手都要硬才行！这就是21世纪里强调和谐社会，强调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联系，以及它的先进意义和正确性。

今天的中国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2005年我国人大制定并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提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周光华教授认为，这就是对近代我国社会不可避免发生的必然的“程序战争”或“战争编码”的一种“法律界定”。周光华教授在他主办的《知识论坛》网上发表《从中国国民党江丙坤率团访大陆看中国的统一前程》的文章中说：“由此，中国境内最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同时认为台湾是中国的内政，这就把任何外国势力图谋插手中国内政，分裂中国的企图，拒之门外；这就把台独分裂势力，把台湾的‘民进党’、‘台联党’这些分裂中国，这些搞台湾独立活动的叛国祸国党团，推向接受法律和人民制裁，国家行使权力给予惩处法办的地步，由此维护中国统一的尊严。”这就是《远古的华夏族》出版后，周光华教授登上的又一新高度。

战争与科技武装后的政权及政权人物，代表着当时华夏文化进步发展的时代主流的蚩尤，为什么会被黄帝打败？其实内战是很复杂的。对此，周光华教授作了一类“声东击西”的提示。《远古的华夏族》158页上说：“夏商周秦汉，虽然在西方立国，其源头却在东南，而处于上古时期的神农氏也正兴起于南方”。周光华是以古籍预言“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为依据，作的发挥。这个古籍预言，其实也适合当今联合国或欧盟这类现代国家模式，虽落脚或成熟于西方，但却源于东方远古的中华盆塞海文明。

其原因是，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中，由于原始部落强调集体思维，就把破坏部落整体效应的个别爱“发明创造”的人物，看成是“叛逆者”。东、南、西、北、中的原始群落内的大量“叛逆者”、

犯人，被放逐到四川盆地的盆塞海边，他们倒集成了一种“新人类”。这是一批重视“发明创造”，重视“新创见”实践的人。所以盘古王国不是从原始部落政权及其政权人物现象展开的，而具有原始超前的民主性、科学性。真所谓是“浑沌”初开，开天辟地，人类文明大爆炸。

“盘古王表”记述，这渊源于约公元前6390年开始的法天法地时期，四川盆地的盆塞海内初现的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迫使盘古王把类似动物世界的蜂王、蚁王到猴王、狮王模式的四方或五方邦族、邦国、部落政权及政权人物现象，集合成一种远古国家共同体模式的政权及政权人物现象。其政权现象的核心动力，是远古的市场交换、物品流通，长途交易、商品生产。

其“古联合国”或“古共同体”政权人物现象的选举办法，是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发明创造”竞争国王。当然，这不是到1789年才出现的类似华盛顿“普选多票当总统”的模式，而是在原始群落内个体偏好的适当限制下，以多数规则应用于一个广泛的群体决策的和谐社会方法。翻译成现代科学语言，就是所谓的“汉族”，或“群体决策的不可能性的多数规则”。在远古的华夏语言中，“汉族”有“汗毛”——形容多的意思，载以“多数规则”的信息——因为“汗”有“汗牛充栋”、“汗流满面”、“汗马功劳”，含有广大、多数、劳苦、下层之意。这也解释了后远古联合国文化的三星堆文明，有一部分来源于中原，但中原文明也来源于远古联合国文化的难题。

所以，“汉族”是起源于约公元前6390年开始的法天法地时期，支持国家共同体模式的政权及政权人物的多数邦族、邦国、部落。但主干的“多数”与支干的“少数”，仍然是在一个多元一体的国家内部。这个远古模式可称为“世界原始共产社会联合国”，或简称“古联合国”。它不同于今天的“联合国”，但是更具有统一国家的权威性。这个远古国家共同体模式的政权，就是所谓的“盘古开天地”。八千多年来经过无数次内部社会大的改朝换代，这种“多数规则”至今都没变。“汉族”和古氏羌族、古彝族、古苗族等从“盘古开天地”起，就是中华民族。那些所谓古氏羌族、古彝族、古苗族等等少数民族，是远古华夏国家共同体政权之外民族的说法，都是不实之辞——也许我国今天的各个少数民族，还是远古联合国掌管各山寨城邦和远途去作贸易人物的后裔——类似今天说的“官二代”、“富二代”。

动物社会知道要有蜂王、蚁王、猴王、狮王，如果进化到高等动物的人类，不知道要有人王，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所谓“母系、父系”进化规则，以代替智力或体魄竞争称王的“多数规则”，其结

果是如苏三出书，说中国人是以色列人，远古的文明仅是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其实，要说言必称“母系社会、父系社会”的学者，才类似“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至今还是“母系社会”。但以色列也不是仅选女性当“人王”。其次，人类社会一旦建立起了国家共同体的政权模式，就具有很大的传承性。而接近这种国家群体的任何人或任何一方，不会因不是“国王”，就不具有传承性。相反，只要最终争夺到了这个“王位”的任何人或任何一方，都是先接近这种国家共同体的，而后也就代表着这种国家共同体政权的传承性。

由此来看，远古的政权及政权人物现象就是一只“不死鸟”。那么黄帝的“共同体”政权，是从哪里来的？大家也能猜到是从“西陵氏”来的。“盘古王表”记述，“西陵氏”共有5代“国王”：文昌、夸父、歧伯、金二伯、嫫祖，他们分别是在远古教育、地理、医药、天象、蚕丝方面的大创造或大发现家，争夺到了“王位”的。这是约公元前4170--3150年城邦之美最后一个时期，由于他们掌握了这时发达的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的“政权”，其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方法，也许如今天的跨国公司，敢于到外面去建厂。这也类似今天一些发达的国家，把工厂建在国外，而把研究所、实验室、大学、金融等清洁而高智力的场所，建在国内一样。

相对中国后来的北方、南方以及海外的远古顶尖优势文明，这些都是它的“后院”了。正是在“古联合国”内部科技、经济、文化的交流，使得处在有利地缘的北部黄帝邦族、东北部蚩尤邦族、东南部神农邦族，比西部、西北部、西南部的邦族进步更快、更大。《嫫祖研究》一书认为，掌权“古联合国”的嫫祖西陵部落，与炎黄部落以及蚩尤部落的接触，改变着当时战争的模式，并十分频繁地在这些落后地区激化着战争。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嫫祖发明养蚕治丝，类似高新科技，也联系类似黄金、货币经济、文化，而更加发达，强烈冲击着临近的部落。其主要是他们在与周围部落的交往中，将丝绸、舟船、养殖、编制、刀具等技术传入，改变了当地人的整个生活方式。

由于蚩尤部落与西陵部落接触，而发展出的铜制工具比炎黄部落的石斧功效高出数倍，又十分珍视与“古联合国”主干的物品交换，于是激发炎黄部落一次又一次地把他们的村庄搬迁到新地方，力图取得与西陵贸易团体进行接触的好机会。因为在这样的地区，势力大的一伙人能得到比较充足的物品，所以那些控制着与西陵部落接触机会的人，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声望和地位均得到提高。因此，先前的炎黄部落，虽然也曾偷袭过西陵部落的定居点或其它村落，藉此获得所需物品和人才。但是比这

更好的办法，还是移居到西陵部落贸易团体的前哨地点附近才好。北部的黄帝邦族捷足先登，因此不但控制着物品的交换交易，而且还得到通常是装备精良的西陵部落人的支持。

特别是嫫祖故里盐亭县传说，黄帝因为发明战车，原本是“古联合国”选的王储，并与嫫祖有婚约，是北部邦族抢劫了年少的王储和退位的歧伯后，金二伯和嫫祖都力图解决这一争端。后来“古联合国”的政权没有通过“竞选”，由嫫祖让给了黄帝。在这种情况下，远离西陵但也很先进的蚩尤部落，用战争的武力阻止“古联合国”政权的竞争对手或潜在的政权人物，压制自己的“竞选”，或粉碎对手妄想控制自己区域的企图，不失为一种法律程序或法律公正。然而据盐亭县传说，这本身却是嫫祖王的千古设计——因中华巴蜀盆塞海终将要干涸，远古的民主终将要被专制所代替，战争选在中原打有好处。

事实证明，直到清代，政权人物还在坚持“天下莫非王土”的“古联合国”观念。是近代科技粉碎了“古联合国”之梦，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才部分恢复和重建了“联合国”。关于意识形态与远古政权及政权人物，《远古的华夏族》145页上说：“后世思想家，特别是地主经济时期的思想家，为完成……帝王治世理论，对上古传说，加以撷采，而形成治政理论根据”。周光华教授没有明说无产经济时期的思想家，也是对上古传说加以撷采而形成治政理论根据的，但暗示是不言而喻的。这涉及从古至今的意识形态规律和讲政治。

法国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阿尔都塞说，意识形态是永恒的，它不随着国家权力的变异、阶级的消亡而消亡，它存在于阶级社会，同样也存在于无阶级社会。例如，任继愈先生说的知识分子爱国主义“典型”的冯友兰先生，1931年、1934年完成上、下册的《中国哲学史》，解放后放弃其新理学体系，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又著第一、二册《中国哲学史新编》，与前者比较，增加的多在讲先秦时期思想家的阶级局限性，以及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服务性，突出了人民性及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

又如杭州市政协第一届副主席钟毓龙先生，1936年出版的《中国上古史神话演义》巨著，从378部古籍中发掘公布有“尧年王表”，但因开头的政治错误，直到1985年删除开头几页才再出版。其实，改革开放后，我国“夏商周断代工程”公布的王表年表，除年表更细更准确外，王表与历史文献记载还是相同的。从孙中山时代起，政权人物内部学者间，为争夺远古华夏王表年表的决定权，对上古传说是各有撷采的。比夏商周断代更远的我国古文明王表年表的文献材料不乏其有，解放后对夹杂严重

封建迷信或政治错误的材料，也弃置不用或被烧毁。现代有些国家，曾把自己的开国领袖，讲成是“钢铁灵将”。而被打倒的，就漫画丑化——这是在讲政治。

因此，远古的神话，曾经类似就是远古社会讲的“政治”，如《山海经》可以说是一本“古联合国”强调讲“政治”的史地志书。同样道理，司马迁的《史记》也讲“政治”。例如他说，商的第一个王，是他的母亲踩到一只大鸟的脚印而受孕；《史记三家注》说黄帝的第四孙颛顼在位 78 年，死后他的叔伯兄弟帝喾接班当王 70 年，活了 105 岁。难道这样的记载，能视为符合人真实的生命生长规律？

周光华教授为研究的稳妥说：他只考察了伏羲、太昊、女娲、神农、炎帝、蚩尤、黄帝、颛顼、帝喾、帝挚、尧、舜等远古华夏族氏及政权人物，以此打造远古王表年表：神农炎帝开始于公元前的 3000 年，历时 530 年，黄帝族系时代合计为 396 年。其中黄帝历时 100 年，颛顼历时 78 年，帝喾历时 70 年，帝挚历时 9 年，尧历时 98 年，舜历时 41 年，止于公元前的 2075 年。舜的治丧期 3 年，所以禹夏起于公元前的 2071 年，同《夏商周断代工程》测定的年代相合。但这样的比夏商周断代更远的王表年表，有让人不踏实的疑惑顾虑。

因为全世界没有这样多个国王长寿治政交替的真实记录。所以说目前我国历史学界，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对照现代政权及政权人物现象，类似“联合国”的秘书长，可以从成员大国中选，也可从成员小国中选；可以是白种人、黄种人，也可以是黑种人；但是都必须任过职。比夏商周断代更远的王表年表中，有多个国王长寿治政交替的真实情况，也许是把他们作“古联合国”政权人物的时间，与其作王储或邦国的国王或邦族、部落首领的时间，混在一起或加在一起了。

A、解答远古政权现象及政权人物现象部分难题——源生、衍徙、渐浸、接纳说等难题之一的人类社会的起源，如果不是从一盘散沙开始的，而是有早先优胜动物社会群体的传承性，那么中华文明不在于人种来自哪里，而在于文明爆发的时间。作为从非洲大陆迁徙出来走得最远的一批人群，必定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群之一。他们定会选择条件最好的地方辟土开疆，从而在一万年前中华大地东、南、西、北、中五方分布起原始的部落。

B、公元 9 世纪出生在巴格达的阿拉伯史学家和旅行家马苏第，写的世界名著《黄金草原》，似乎把非洲大迁徙开始时的中国人的祖先首领，都要一一记录在案。但这可是他们用的阿拉伯人的名字。

C、1989 年我国著名冰川学家韩同林提出，距今约 2 至 3 百万年前开始的第四纪冰期，全球四分之三的陆地被冰雪覆盖，中国全境也不例外。由于

只有非洲大陆赤道附近有绿洲，这就是中国和其他地区有先进的原始人群落，都在 20 万年前向那里迁徙，从而第一次杂交、融合产生了全球的现代人种。

D、约 20 万年前至约 8000 年前，是大迁徙期，原始人群落分陆路和海路两大类从非洲走出，陆路向东、向东的，可抵达太平洋沿海。

E、1927 年蒙文通先生在《古地甄微》书中提出，中国上古民族可分“江汉、海岱、河洛”的三系学说。这实与人类大迁徙有关。

F、陆路向东第一次在伊朗分支，一路往印度，一路往戈壁滩方向。到戈壁滩的又有第二次分支，一路往河洛方向，成为河洛系；一路往内蒙、河北、东北，山东方向，成为海岱系的先声。海路向东的快一些，第一次在印度分支，一路往缅甸和我国云南、广西方向。到云南、广西又有第二次分支，一路往四川、贵州方向，成为河洛系的先声。一路往广东、湖南、福建、江浙方向，成为江汉系的先声。

以上可解答人类起源于中国全境，包括白剑的戈壁滩说。

源生、衍徙、渐浸、接纳说等难题之二，是在约 8000 年前的巴蜀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的原始社会开始后，源生民群落，在我国东、南、西、北、中都有分布，再谈动物类似的大迁徙，不现实。因为除草原上有大量马匹的游牧民族，其他族民不可能有经常性的大规模整体移民。能移民的或衍徙的，只能是接近政权及政权人物的主体或潜在政权及政权人物的主体。《远古的华夏族》中就提到西羌人的始祖爰剑，本是秦人的奴隶，逃跑进深山野林，碰上受割鼻刑的羌人女子结为夫妇，后向羌人传授农耕技术，改变羌人的游牧生活，而发展农耕经济，成为西羌人的政权人物。

袁珂先生也说，商人的祖先王亥、王恒兄弟，是做长途马牛羊贩卖的政权人物，王亥在外遇害而引发商人起兵。钟毓龙先生更认为，上古政权为了更好地发展生产，政权人物和首都的移动很频繁，连移动后的首都，很多地名都依照先前的称呼。可见远古的政权人物及潜在政权人物们的知识、智慧，组织作用等，在他们自觉与不自觉的交流、搬迁、贸易、派遣或逃遁、刑罚中，发生的民族源生、衍徙、渐浸、接纳等文明影响现象，才是多处同人名或地名等难以自圆其说的根源。钟毓龙先生认为帝尧时，因地质灾害，黄河不能再从剑门流入四川盆塞海，三门峡又暂堵，还解答了王红旗“东海淹没了太行山”，以及四川盆塞海逐渐干涸的难题。

笔者与周光华教授之争，发生在 2015 年 12 月 12 日他亲手给笔者送第二本书《远古华夏族群的融合——〈禹贡〉新解》的时候。这笔者在北京参加第二届全国自然国学研讨会期间。这是第一次送书 10 年后首次相见，都很高兴和亲热。10 年前的 2005

年初，笔者收到淄博市社科联寄来参加当年9月份淄博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办的“齐文化《管子》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邀请函，同时还寄有周光华研究员的新书《远古的华夏族》。笔者猜想自己的信息也许是办北京“天地生人学术讲座”的宋正海教授告诉周光华研究员的，因为“天地生人学术讲座”也曾邀请笔者去作“讲座”；因自己还没有退休，“讲座”与办报无关，怕报社不同意没去。而2005年4月笔者要退休，所以看完《远古的华夏族》一书很快写出《从齐文化看远古华夏族的政权及政权人物——评周光华先生的新著》一文，给周光华研究员邮寄过去。

但2015年相见的好气氛，很快被双方交谈打破——针对笔者猜想说的“世界人类起源和文明第二个孵抱期，与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世界第三极有关”，周光华教授立马反对说：“山东泰山地区才是人类起源和文明起源之地”。他列举了山东和泰山历史上记载古文化及古文明中的一些亮点，说明它们的全国性和世界性。而笔者心里明白：泰山古文明起源即使成立，与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也是“流”和“源”原的关系：约20万年前冰川期开始结束，从非洲走出的现代人向东，一直走到中国东面大海边才停住前进，也许在泰山留下来过少部分的人——但他们的大部队寻找的真正归宿点是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东面的巴蜀盆地及其堰塞湖—盆塞海。这是他们曾经的一部分祖先，带着保留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的耐寒基因，在约200万年前因第四纪冰川的严寒，迁徙到非洲前的栖息地。

其次，2005年笔者写评论《远古的华夏族》期间，周光华教授曾打过电话告诉：他父母出生上海，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陈毅元帅在苏北领导的新四军，后又跟陈毅元帅到山东参加解放战争。刚解放又参加志愿军到朝鲜。抗美援朝结束回到山东淄博工作。他读高中遇“文革”，后参军到兰州部队，在那里作为工农兵学员他上了大学。后来因父母在淄博，就从部队调回作了一所学校的校长。他的特长是喜欢文史，又转到淄博市社科联工作。2015年在北京见面后，所以笔者一开口向周光华教授父母问好，他才说他的背景的不说，他是1964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参加的工作。笔者这才明白：书刊、口说的“真实”，与“实在的真实”，对远距离没有亲身交往的人来说，这种差距是搞不清楚的——类推探讨争论人类的古史也许存在类似的现象。笔者对周光华教授的学术成就是很敬佩的，而且他关于“人类文明起源于泰山”的话，笔者还没有看见他在公开的书刊和网络论坛上说过，也就没有过多地解释争论。

为了印证“实在的真实”，笔者将10年前——2005年4月10日就收到的周光华教授的电子邮

件，全文抄录如下：“您好！很高兴您真诚支持帮助，写出《远古的华夏族》专著的研究评述，这对我是很好的鞭策和启发，使我看到研究需要深入，探索需要继续，问题需要展开剖析，方可见到清晰的前途。希望您的评述见著省级以上报刊和学术中心期刊。谨此”。周光华教授还说：他很愿到笔者那里及四川考察调查研究，届时会给添麻烦，请帮助；对不厌弃孤陋相助真诚致谢。他大致的安排是：五月份他到河南大学、南阳师范学院讲座“东夷齐文化与华夏文化的早期文明”。如果没有变化，大致考虑借这次机会到笔者那里及四川考察调研。因为六月份他要插手准备中宣部批办，淄博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办的“齐文化《管子》国际学术研讨会”，9月份开会。所以再往后就得在9月以后才能找机会时间来四川的。

周光华教授又说：“话说到这里，您可以试探性地帮我宣传宣传，可否寻找您那里及四川感兴趣的大专院校或学术单位，聘请我并安排‘东夷齐文化与华夏文化的早期文明’或类似讲题的讲座课，这样对我到四川调研考察会更方便的，也有利于我们在远古文化历史文明研究领域可能的合作提供好的方便。恭候您佳音回传。您的评述文说‘一部探索远古政权及政权人物现象的巨著’，我冒昧动粗删改，主要把我的背景删掉，把一些政治色彩的言说调整掉，保持学术研究的面貌，个别字句做些调整和删改，希望您能满意，希望您的文章原意突出。谨此，把我修改后的一部探索远古政权及政权人物现象的巨著‘一部探索远古政权及政权人物现象的巨著’评述文，发回给您，请雅正。恭候回信——周光华 2005.4.10”。

但2005年5月周光华教授没有到四川调研考察，而周光华教授修改后的评述文，笔者和工学院金鑫教授再作修改后，2007年发表在绵阳市科学城工学院学报《教学与科技》第2期上。

### 5) 青藏高原第三极原理考古旁证举例

#### A、高等植物、动物、人同源

《光明日报》2019年6月27日报道，吉林大学教授崔银秋研究团队与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宫磊研究团队合作，成功测定并分析了距今约3800年的小麦全基因组序列；该研究提出了普通小麦从青藏高原边缘到长江流域的扩散路线，为理解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农业传播提供了跨时间维度上的直接证据——六倍体普通小麦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普通小麦驯化始于大约1万年前近东的新月沃地，然后向西扩散到欧洲，向东扩散到东亚，但小麦进入中国的传播途径仍不清楚。为探寻传播路径，经过约10年时间的研究，两支团队克服了古植物中DNA含量极低、降解损伤严重，古植物DNA研究对实验环境要求高等困难，从距今3800年的单粒小

麦种子中成功提取到其基因组 DNA, 并利用新一代测序技术, 对中国新疆小河和古墓沟墓地出土的 7 粒古代小麦种子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和序列组装。

基因组数据分析和形态学观察都证明出土的小麦为六倍体普通小麦, 古代小麦与中国西南地区现存的普通小麦地方品种的密切关系---青藏高原现代地方品种与古代小麦高度相似的等位基因频率, 为小麦向高原传播的西南途径提供了更加直接有力的分子依据。这项研究也提出了普通小麦从青藏高原边缘到长江流域的扩散路线, 为现存小麦地方品种的栽培起源、扩散和遗传改良提供了重要信息。

从植物到动物联想 2007 年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邓涛等专家, 在喜马拉雅山西部海拔 4200 多米的扎达盆地中, 发现的一具远古完整的披毛犀头骨和下颌骨后, 推证全世界的人类起源的“动物”类, 来自青藏高原雪岭地带的“雪人”类。因为这表明西藏披毛犀, 有带着对寒冷的适应能力基因, 走出西藏, 扩展到包括北极圈在内的欧亚大陆北部的干冷草原地带, 最后演化为最成功的冰期动物之一。这虽只与生命起源来源于共同的动物祖先有关, 而与后来人类文明起源的孵抱地的单一没有关系。但人类社会的起源, 不是从一盘散沙开始, 而与有早先优胜动物社会群体的传承性有关。从动物到古人, 兰州大学张东菊教授介绍青藏高原最老的考古遗址---白石崖溶洞, 位于甘加盆地北侧的白石崖山脚处, 洞口高约 5 米宽 8 米。洞口处有相对较平坦的通道。在洞穴入口约 30-50 米处, 此前进行发掘的两个探方, 共四平方米, 分为十个地层, 共采集了 1400 多件石制品, 500 多件动物骨骼。采集的石制品以石片、石核、工具、断块为主。动物骨骼以较破碎的四肢骨为主, 鉴定出的动物种属有犀牛、野牛、野马/ 驴、鬣狗和野羊/ 羚羊, 与更新世晚期广布欧亚大陆北方草原环境的“猛犸象—披毛犀动物群”高度相似。

这还可鉴定的犀牛和鬣狗骨骼上, 均有较多敲击和切割痕迹, 确定为人为活动结果, 进一步证明人类活动是洞穴内动物骨骼堆积的主要因素。丰富的动物遗存为理解青藏高原旧石器人群的业生模式 (古人类生产, 获取食物的模式) 和对高原环境的适应提供重要信息。初步检测结果显示, 该遗址上部文化层 (人类活动造成的文化堆积) 至少形成于距今四万年前, 应该为青藏高原目前已知最老的考古遗址。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陈发虎院士认为, 青藏高原史前人类活动的环境效应具有借鉴意义。不同学者对史前人类向青藏高原扩张的历史有不同的认识。青藏高原人类活动历史是世界范围备受关注的重大科学问题, 争议和突破机遇共存。

2007 年 6 月 14 至 16 日夏河人研究成果推介会在甘肃省夏河县召开, 发布了中科院陈发虎院士团队关于夏河人研究的最新进展---EPAS1 基因来源研究的最后一块拼图---夏河人旧石器时代青藏高原原住地的发现, 补上了现代藏族人群携带的高原适应基因。夏河丹尼索瓦人 (简称夏河人) 化石出土的白石崖溶洞, 是备受关注的神秘古人类丹尼索瓦人的原住地之一。这里海拔 3200 米, 背靠达里加山, 面对甘加草原, 在江拉沟河谷上方约 50 米处。EPAS1 基因可能源自夏河人---2010 年《科学》杂志发表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金鑫教授关于青藏高原世居藏族人群高原适应的关键基因 EPAS1---高原环境对人体关键的影响因素是低压性低氧, 大气压力随海拔增高而降低, 氧分压也随之下降。当生活在低海拔地区的人来到高原环境时, 由于氧分压的降低, 会使人产生缺氧, 因而引起“高原反应”。EPAS1 基因是低氧诱导调节通路中的重要基因, 在人体面对低氧环境的调节通路中起到核心作用。

藏族人群特有的“EPAS1”基因阻止了血红蛋白浓度的过度升高, 降低了各种高原性疾病发生的可能性。EPAS1 基因来自于哪里? 2014 年《自然》杂志发表了藏族人的 EPAS1 基因可能来源于丹尼索瓦人的研究成果---虽然在丹尼索瓦人化石中找到了 EPAS1 基因, 但丹尼索瓦人发现于海拔仅有 700 米的西伯利亚的丹尼索瓦洞。在 700 米海拔的地方生活, 并不需要适应高原缺氧环境的 EPAS1 基因。直到科学家发现夏河人, 并确定它出土于海拔 3200 米的夏河白石崖岩洞, 补上了 EPAS1 基因来源研究的最后一块拼图。研究推测, EPAS1 基因很可能最早产生于长时间生活在高海拔地区的夏河人, 后又传给现在的藏族人群。EPAS1 基因很可能最早产生于在青藏高原生活的包括夏河人在内的古人类, 后又传给现在的藏族人群。对夏河丹尼索瓦人的进一步研究, 可能会改写人类演化迁徙的版图。例如,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高星研究员认为, 根据对夏河人下颌骨的综合分析, 它不属于任何一支已知古人群或现代人群。推测夏河可能是更早的丹尼索瓦人发源地, 而阿尔泰山地区的丹尼索瓦人可能是其后代。

另外 2008 年“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 张岳桥研究团队在岷江、青衣江、大渡河、白龙江等长江上游水系作野外考察。他们选取岷江上游、青衣江上游、大渡河上游 3 个古堰塞湖进行沉积、构造及年代学研究, 结果发现岷江上游, 在史前 7-1 万年 (主湖期可能是 3~4 -1 万年) 期间, 存在一些长约 30Km, 河道堵塞近 10 公里大型的堰塞湖。更为有趣的是, 这些堰塞湖在大约 1 万年左右全部溃坝了, 其水量足以淹没整个四川盆地。这是 2010 年在《第四纪研究》杂志第 4 期上, 中国地质科学院李海龙

博士和张岳桥、李建华等科学家发表的论文：《青藏高原东缘南北向河流系统及其伴生古堰塞湖研究》的研究。

李海龙等人提出青藏高原东缘南北向河流系统的概念，定位该系统包括岷江、青衣江、大渡河、鲜水河、雅砻江等总体呈现南北走向的河段。这些南北向河流系统的形成演化，具有构造和气候双重意义。因为晚更新世以来，南北向河流系统发生多次堵江事件，形成数套堰塞湖沉积。从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是如何形成的？有环境地理学家认为，远古长江和黄河上游四川、云贵、青藏、陕甘等地区高山冰川，在 20000-8000 年前的第四纪大冰川末期的迅速融化，不仅会改变当地的地质情况，也会引发从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及其溃坝等灾难性后果。20000-8000 年前的第四纪大冰川末期气候变暖，使得全世界的冰川绝大多数都出现融化现象，其面积和厚度都在缩小，这不仅改变了当地高原地区的地貌，而且加上 8 级以上的一些不同时期的大地震，极有可能诱发长江和黄河上游西北、西南高山及丘陵地区的洪水和滑坡，形成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的间断变化的景观。

李海龙博士曾给笔者发电子邮件说，他 2009 年做完川西的工作之后，对四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时他从互联网上搜索到笔者关于远古巴蜀堰塞湖到盆塞海及其溃坝等研究报道，更觉神往，感到绵阳市盐亭大围坪地貌、嫫祖历史，或许是一把金钥匙。但后来李海龙博士又给笔者发电子邮件说，2010 年当他开车专门到盐亭考察海啸遗迹地貌后，认为所谓的海啸遗迹竟是子虚乌有之事。问题出在哪里？根据李海龙博士的说法，他根本没有到已指明的如榉溪河畔延伸数十数百公里大围坪景观去亲自查看，而只是在盐亭县城里游转一下，和只到盐亭县城的公路沿线看过，拍摄了几张照片，就说对当地的地貌特点已进行了总体性的考察，得出盐亭处于内陆，远离海沟和俯冲带，根本不具有发生海啸的地质条件。原因还有，他只是个读博士的研究生，不是单位领导，手里没有权，不能立此专项任务，没经费、没时间；到盐亭也没向导和交通工具等问题；这些都是他难于说出口的。

如果在盐亭盘古故里天垣盘垭村袖头山、五面山以及嫫祖故里的云毓山、烟鼎山、嫫村山等地去实地考察，那么对从榉溪河畔到梓江、涪江流域的数百座密集寨子山的古生态景观与寨子山下半坡的大围坪台地，在山头与山头之间即使有河流、山沟相隔，水平线延伸数十数百公里如此一致，会有实际了解。至于远古盆塞海遗迹在四川不但有地貌证据，也有沉积证据。李德文教授曾说：“不能指望每个人都去亲自查看”，这话不错，但不等于像成都理工大学刘兴诗教授参加 1993 年绵阳市科学小说研

讨会期间，有人提出盐亭存在近万年前海啸遗迹地貌的问题请教他，得到的回答：“我是教地质的，不用看也是错的”。在中国懂地质学的不只刘兴诗教授一个人。“不用看就知道是错的”，请这样的教授鉴定嫫祖文明、嫫祖遗址当然没门。

且不说在盐亭，大围坪地貌铁证如山，俗称“印把子山”的地貌在嫫祖故里随处可见，只要懂得历史计量学的有责任的地质学家定能鉴别真假。四川师范大学张昌余教授 2001 年在绵阳市科普创作交流会上，讲从黄帝上溯女娲及盘古是中国古史的神话阶段，从黄帝以下才是人文阶段之说。会后他们这批学者被请到了盐亭，看了冰川冰臼遗迹，看了大围坪地貌和古山寨群城邦遗址；听了讲解：由于远古四川存在过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从而造就了先进的龙文化经济，即古海洋远航贸易交换经济，以及凤文化经济，即山寨城邦区的产品制造加工经济，出现了一大批智慧超群，目光远大的古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的执掌人，类似现代人称呼的寨主、邦头、国王、贵族、大臣、祭司、市长、老板、经理、董事、首席执行官等等。这段远古文明消失后，由于意识形态的需要，这些“超人”都被用神仙、道人、鬼怪一类的称呼和神话故事包装起来，成为没有群众基础和经济基础的摆设。张昌余教授听了、见了，认为从国外的《荷马史诗》到国内的《山海经》等远古神话，都能把谜解开了。张昌余教授等人离开盐亭时，终于说出了真心话：“四川存在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是真实的”。

事情并没有完结。笔者在 2011 年 8 月“科学网”的“个人学术展示”专栏发表了一篇短文《嫫祖与内蕴海啸地貌学》，其中说：“海啸问题，我们是把海啸学当作一种地貌来讨论的。原有的海啸地貌学关于嫫祖存不存在？是不是盐亭人？地质学家也不关心。这无所谓。但嫫祖存在和出生在盐亭，却引起求学国内外的学子们的关心。他们把地貌的很多特定参数，和能构成海啸的所有可能的地方的特定参数结合，用来讨论巴蜀远古盆塞海及其后来干涸后，四川盆地大围坪的盆塞海海啸遗迹地貌，创建了内蕴海啸地貌学。同原有的海啸地貌学内蕴地貌求证方法一样，地貌类似记录、档案，内蕴海啸地貌学是用干涸了的盆塞海自身可确定的特定参数量定义的，并且没有必要把海洋海啸地貌原有的海水、力源，看作是位于某种远古特定条件形成内陆盆塞海，干涸后还要照旧有的必需因素”。

## B、嫫祖历史与还原盆塞海科考

说到嫫祖历史涉及的盆塞海猜想，远古地震--堰塞湖--盆塞海--大围坪--海啸有关联吗？先看看海啸的定义，我国的旧地貌学教程说海啸是一种巨大的海浪，主要是由海底地震、火山喷发、海岸崩塌、滑坡等海底地形大规模突变所引发的具有超长波长



和周期的一种重力长波，但遗漏还有神秘的古陨石引发古代海啸之说。例如，中国年青的地质学家李德文博士，是中国地震灾害防御中心的研究员。1986-1990年就读华东地质学院地质系本科；1990-1994年在核工业208大队从事地质调查工作；1994-2000年攻读北京大学地貌与第四纪专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2000-2004年为南京大学博士后/教师；2004-2007年调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2007年至今为中国地震灾害防御中心副研究员。2008年任中国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地貌与第四纪地质学基础理论及其在活动构造探测方面的应用研究。

李德文教授在互联网论坛上先说：“A、从来就没有过海啸地貌学，更不会有内蕴海啸地貌学。B、四川盆地如果有过海啸留下的证据，那也只能是沉积证据而不太可能是地貌证据。C、讨论问题最重要的是证据以及证据和结论之间的逻辑关系。作为新观点的支撑，对论据的科学表达是很重要的。不能指望每个人都去亲自查看吧？D、海啸是专指由津波-tsunami引发的自然过程，是一种与潮汐完全不同的地貌营造力。也就是说，海啸证据这种说法本身就包含了它的成因意义，用潮汐理论来解释海啸证据是自相矛盾的”。但后来李德文教授却改口了。他说，海啸的成因有多种，常见的是地震断层引起的，另外还有海底滑坡，海底火山塌陷和外星撞击洋面等类型。

笔者认为，李德文教授说“海啸与潮汐是完全不同的地貌营造力”，这点说到了关键，但既然说海啸与潮汐各有地貌营造力，又说海啸成因表面没有地貌营造力，这不也“自相矛盾”吗？如果四川在洪荒的历史时期存在盆塞海，那么从榉溪河畔到涪江、涪江流域的数百里，有没有形成类似海沟和俯冲带的地质条件呢？引起笔者对此的思考，是1970年代笔者参与大打“矿山之仗”，在綦江铁矿看到，从重庆市綦江铁矿矿部到土台乡政府要上一座大山，土台乡政府就在大山顶上的“小平原”上。笔者每年探亲回家，沿嘉陵江、涪江和榉江流域，从重庆经遂宁坐长途客车，綦江铁矿土台山到四川盐亭玉龙镇西仔山相距千里，以两地的山顶“平原”作标杆，从长途客车外似乎可以望见沿嘉陵江、涪江和榉江流域两岸，有连成一线的大围坪台地时隐时现，类似澳大利亚海啸地貌时隐时现，这可“读懂”何拔儒先生关于盆塞海的推证。因为在榉溪河畔玉龙镇政府旁的西仔山，山顶上也类似有一个“小平原”。据原玉龙区粮站站长石云老先生介绍，西仔山后面的红石坝，他找到过大量的古桑化石。还有家在西仔山的网友介绍，西仔山烧砖和修公路，发现有大量的干涸沉积层。

如果要还原盆塞海，就像钱塘江潮汐从长江口

上溯到越来越窄的钱塘江面一样，沿嘉陵江、涪江和榉江流域到榉溪河畔，几千年中多次发生的海啸，形成类似近海沟和俯冲带的一种巨大的海浪，当其接近榉溪河畔丘陵山地的浅水区时，波速变小，振幅陡涨，骤然形成“水墙”，瞬时入侵沿岸山地；那一次次冲刷掉山腰表面的岩石和泥土，才刻蚀出现在还可考的台地大围坪海啸地貌。现在的问题是，盆塞海早已经不存在。但内蕴几何学的科学智慧的火花启示了海啸地貌学。如在内蕴几何学建立之前，平面一直被作为三维欧几里德空间中的图形来研究。但高斯和黎曼等数学家受平面几何能通过专注于平面本身得以研究，建立具有点、线、面的一些定理和用参数来表示的表达式的引导，为曲线、曲面一类更为宽泛的空间发展了一种内蕴几何学；这一几何学是内蕴于平面的，并且与周围的空间没有关系。例如把三维欧几里德空间发展到n维空间并当作一个流形来讨论，可用流形自身可确定的量来定义。类此，海啸地貌学中的地貌，不就类似记录、档案吗？反之这些记录、档案内蕴于地貌，盆塞海不存在了，但仍可以用它的“流形”自身可确定的量来定义。

后来李德文教授在得知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地理系布赖特教授等科学家的资料提示下，也改口了。他说：这丰富了他爱的地貌学教程和最新的地貌学百科全书的定义——布赖特教授是研究海啸的，并在剑桥和伦敦地质学会出版过这方面的经典文献，但布赖特主要的工作，是致力于外星撞击地球引起的海啸。李德文教授谈到为何人们保守时说：发现还有神秘的古陨石引发古代海啸的异常的地学现象是好事儿，但是如何合理解释这些现象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应根据在用海啸解释所发现的现象时，最好能够明确一下属于哪种成因类型。这里涉及形成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的间断变化的景观，是类似外星陨石撞击地球引起的海啸和地震断层引起的海啸以及海底滑坡、塌陷等因素的概率组合都有。李德文教授也许会说，民间学者关于此研究如果在构造地震成因与地外成因之间游离，将无助于问题的深化和解决；而且他借布赖特已这样暗示了，所以李德文教授感到困惑，要求国内民间学者提供有关布赖特建立海啸地貌学的支持性文献。

其实李德文教授可以自己亲自到澳洲去一趟，不是更可信。至于李德文教授说：“地貌学研究无外乎两个主要的方面：历史地貌学和过程地貌学。海啸地貌学无疑是面向过程的，应属于过程地貌学。在讨论学之前，应该优先解决史的问题。在史料悬而未决的情况下讨论建立史学，很容易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问题。但李德文教授可以亲自与布赖特教授讨论，就不至于在国内难找齐国际上无论是最新的地貌学教程还是最新的地貌学百科全书

等可信之东西，因为李德文教授似乎不爱找国内民间学者在国家出版社出版的有关对四川盆地地貌演化历史著述的东西的。也许正像《计量历史学》一书的翻译者 1985 年说的那样，在国外，计量历史学已有一、二十年的实践，而在我国出现的速度却异常缓慢。

而且海啸地貌学在我国没有，不等于在澳大利亚没有。海啸地貌学是由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地理系的布赖特教授等科学家建立。他们经计算发现海啸袭击海岸的大滑坡，可导致对邻近岛屿产生高出海面达约 375 米的巨浪。于是他们在澳大利亚南部海岸寻找海啸的遗迹，发现有力的证据来自岩石台地：这些台地通常盖有年龄达约 10 万年以上的沙土层，然而高度不到 40 米的山岩都已经变得光秃，处于未经风化的原始状态，有一处地方显示曾有许多布满棱角且重量约 20 吨的岩块从岩石表面被冲刷掉。这种清晰刻蚀的形状，只有在岩石被至少每秒 10 米的急流冲刷才会产生，并让岩石改变面貌。以新南威尔士洲为例，那里许多海岬的北面是悬崖，没有零散岩石块，而南面则缓慢倾斜入海。在过去，有人把沙丘的消失归因于暴风雨或者河水的冲刷。但布赖特等科学家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即使是带有 7 米高巨浪的大风暴，也无法强制把岩石台地磨光。

地貌类似记录、档案。澳大利亚海啸地貌学给予的启示是，海啸学也能当作一种地貌来讨论，即可以把地貌的很多特定参数和能构成海啸的所有可能的地方的特定参数，以及干涸了的盆塞海自身可确定的特定参数等结合，运用布赖特海啸地貌学方程，计算位于某种远古特定条件形成的内陆盆塞海原有的海水、力源，推证四川远古盆塞海及其后来干涸了的四川盆地大围坪盆塞海海啸遗迹的内蕴海啸地貌。笔者之所以受启发，是因笔者出生在四川盆地盐亭县天垣盘垭村袖头山大围坪，那里从梓溪河畔到梓江、涪江流域，存在数百座密集寨子山的古生态景观与寨子山下半坡的大围坪台地。

大围坪是地处半山腰，在山头与山头之间，即使有河流、山沟相隔，台地相对一致，水平线可延伸数十数百公里。当然，海啸与潮汐靠星球引力营造地貌的力是完全不同的——正如潮汐在全世界到处都有，为什么只有钱塘江潮汐现象有此规模之大和奇特——潮汐从长江口的宽阔海面上溯到越来越窄的钱塘江面的一些特定的条件形成；如果还原盆塞海就像钱塘江潮汐，由一些特定的条件形成的一样，是否沿嘉陵江、涪江和梓江流域到梓溪河畔，几千年中多次发生的海啸，形成类似近海沟和俯冲带的一种巨大的海浪，当其接近梓溪河畔丘陵山地的浅水区时，波速变小，振幅陡涨，瞬时入侵沿岸山地，骤然形成的“水墙”一次次冲刷掉山腰表面的

岩石和泥土，就能刻蚀出现在还可考的台地大围坪海啸地貌呢？这也可以根据梓溪河畔现在自身可确定的特定参数，用类似布赖特海啸地貌学方程大致能计算出的。

即需要求出从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的水要多大？震级要多大？形成在多少年？海沟和俯冲带多在什么方向？地史知识讲，上扬子海时期的海盆，是大约距今 5.7 亿年前到 4.4 亿年前，到志留纪晚期才变成巴蜀湖。巴蜀湖干涸以后，就成了四川盆地。第四纪的地壳运动造成了三峡的对外通道，同时也极大疏通了巴蜀湖的残余水，这个时间大约距今 200 万年前。但这仅是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能产生的基础，距今 7 万年前到 5000 年前的第四纪最后一次冰期的后期，多次大地震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崩塌，才是形成我们说的盆塞海本身。因此，这已经不属于巴蜀湖的残余，这是要分清楚的。盆塞海面积估计有多大？因为海啸是一种波长相当大的流体（水）表面波，如果盆塞海不具备这样的尺寸的话，那么大型海啸波将来不及发育出来。有人指出海啸波里往往伴随着所谓孤立子波的产生，孤立子波的特点是，它以相对较小的衰减穿越其他表面波而却保留形态。

这样，在到达陆地形貌阻遏时将产生较大的破坏力。其实用布赖特海啸地貌学方程和流体力学非线性孤波方程，道理是一样，先经计算，再寻找印证。假设盆地面积是三角形、方形、矩形、菱形、梯形、六边形、圆形等 7 类形状，地震震源分别在边和角上，由此有多种组合；再根据现存的山崖断面的高度参数、台地面积参数代进方程，反推出盆塞海所需的面积和水量。由此四川盆地及周边省份的面积是足够的。其次是计算长江出川是山体滑坡和崩塌造成的堵，黄河入川是山体滑坡和崩塌造成的开，再加 20000-8000 年前长江和黄河及其支流上游在四川、云贵、青藏、陕甘等地区的高山冰川，在第四纪大冰川末期的迅速融化形成的一些高山湖，如此的泛滥和溃坝等组合概率，由此水量的来源也是足够的。台地大围坪形成时间计算，是假设造山运动形成的最初山形，类似金字塔的等腰三角形，台地是在等腰的两边对称分别切去了一个小直角三角形。把这两个小直角三角形转换成土石方量，除去海啸袭击冲刷搬掉的土石方量，剩下的归因于每年暴风雨或者河水冲刷等水土流失量，人类改田造地等人为搬迁量的叠加，那么这个每年的叠加量除以小直角三角形剩下的整个土石方量，可估算出大围坪地貌形成的时间。

那么从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是如何形成的呢？有环境地理学家能从现在的地貌内蕴来引导，如目前中亚吉尔吉斯斯坦天山地区的伊塞克冰川，是世界上最长的高原冰川，有 80 公里长。这个

巨大冰川，也存在融化问题。这里会定期出现一个高山湖，而且这个湖几乎每年都会造成洪水泛滥。将今论古，20000-8000年前长江和黄河上游四川、云贵、青藏、陕甘等地区的高山冰川，对在第四纪大冰川末期的迅速融化来说，一方面，冰川的融化会形成一些高山湖，这些高山湖如果泛滥，就有可能形成巨大山洪，大量洪水将会冲毁途经的一切。另一方面，冰川后退也会造成当地地质情况不稳定，诱发山体滑坡甚至地震。这不仅会改变当地的地质情况，也会引发从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及其溃坝等灾难性后果。而且加上8级以上一些不同时期的大地震，极有可能诱发长江和黄河上游西北、西南高山及丘陵地区的洪水和滑坡，形成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的间断变化的景观。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岩石台地海啸遗迹，作为海啸地貌学的研究平台，不会是伍伦贡大学等科学家的臆造。然而在我国海啸地貌学却引起争论。原因也许我国虽是一个地震灾害大国，但却不是一个海啸灾害大国，无澳大利亚类似活的海啸地貌学研究平台。然而在远古我国西南的盆塞海，既是一个地震灾害多，海啸灾害也多的地方。但后来这个盆塞海干涸了，中华文明转移了中原地区。李德文教授说中国没有海啸地貌学，但不等于国外没有。况且远古盆塞海，四川不但有地貌证据，也有沉积证据。

笔者能理解让远古盆塞海文明失落的证据，是四川盆地几经盆塞海、几经干涸，由此人类早期起源地的青藏高原，四周河流，江水入川，围绕古四川盆塞海形成过山寨城邦海洋文明，是先于农耕文明的。此期的迁徙实为围绕青藏高原与盆塞海的起落，周期流转，与后来盆塞海彻底干涸后的迁徙也有区别。这个“远古联合国时期”存在的事实，解决了“多地区起源”和“非洲起源”的争论，也解决了现代人种与中国类人猿不分的错误----20000-8000年前的第四纪大冰川末期气候变暖，使得全世界的冰川绝大多数都出现融化现象，其面积和厚度都在缩小，这不仅改变了当地高原地区的地貌，而且加上8级以上的一些不同时期的大地震，极有可能诱发长江和黄河上游西北、西南高山及丘陵地区的洪水和滑坡，形成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的间断变化的景观。仅仅从大冰川末期的迅速融化来说，一方面，冰川的融化会形成一些高山湖，这些高山湖如果泛滥，就有可能形成巨大山洪，大量洪水将会冲毁途经的一切。

另一方面，冰川后退也会造成当地地质情况不稳定，诱发山体滑坡甚至地震。这些地质灾害都将直接威胁到当时当地的上古人类居民的生命安全，以至影响到国家的起源。但是目前的地质学家和历史学家还远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即远古国家的起

源也许首先从远古联合国起源开始的。远古大自然的危險严重程度，抗灾自救的联合、维和需要，远远大于部落之间及个体之间的竞争、争夺以至战争。远古联合国不是联邦、邦联，也不是联盟，而类似今天的联合国，是类似维和、维稳机构。至于从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的机制，类似霍伊斯勒介绍的模型：中亚吉尔吉斯斯坦天山地区的伊塞克冰川，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高原冰川，有80公里长。这个巨大冰川，也存在融化问题。这里会定期出现一个高山湖，而且这个湖几乎每年都会造成洪水泛滥。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塞维斯，把人类社会组织形态发展序列分为：游团、部落、酋邦和国家等四个阶段。

我们则化简为三大阶段：远古联合国时期、游团部落酋邦时期和王国国家时期。这是因为在第四纪大冰期前后两端，形成有过人类共同基因、语言和文化起源的两个孵抱期。特别在第二个孵抱期，这是个“多难兴邦”的特殊时期，大自然灾害逼迫原始社会的人们，团结救灾、团结抗灾，才自然成就形成了巴蜀盆塞海及四周内陆山寨城邦中的远古联合国。但团结救灾、抗灾需要发展生产力做后盾，而科技创新，就成为人们对生产力的第一源泉的认识。约公元前8000-3150年在川、甘、陕为一个大地震多发地区，长江三峡和剑门关山峡因大地震的山崩地裂有合有开，在川西北地区造成过无数的堰塞湖。

如果其中有的大地震的山崩地裂，造成长江三峡山崩堵塞而剑门关山峡地裂分开的组合，引起长江断流，黄河通过渭河与嘉陵江连接的剑门关山峡分开的峡谷流入四川，古蜀盆地就有可能从堰塞湖演变为盆塞海。而在约公元前4170-2070年，如果相反的组合---其中有的大地震的山崩地裂，造成长江三峡地裂溃坝而剑门关山峡山崩堵塞的组合---即引起盆塞海下面的长江三峡溃坝，盆塞海上面的渭河与嘉陵江连接的通道剑门关山峡的重新堵塞，黄河重新向东流入大海，那么四川盆地的盆塞海就会干涸，发达的盆塞海文明大部分就会向中原转移。以此类推第一次长江三峡上面的盆塞海地裂大溃坝，发生在良渚河姆渡文化产生之前；第二次同样的长江三峡大溃坝发生在江汉湘楚文化产生之前。组织救灾、抗灾巡行天下，如果嫫祖类似远古联合国的“秘书长”，历史上称她是“行神”、“道神”，这也正是她的一种责任和任务习惯常态。

### C、珠峰映射原理区块链科考系列

总之，综上所述，教授、博导、四川省社科院党委李后强书记认为：人类可能起源于喜马拉雅，最早进入四川盆地活动。原始宗教可能最早起源于喜马拉雅山脉、青藏高原。随着人类迁徙传播到世界各地，埃及金字塔建造可能受到青藏高原金字塔山形的启示。第一，亚洲是全球陆地最高点，全世

界所有 8000 米以上的山峰都在亚洲。青藏高原位于中国西南部,地理界线为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等,海拔 4000 米以上,面积约 250 万平方公里,雪山连绵,冰川广布,是地理第一阶梯。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被称为地球第三极,呈巨大金字塔形态,最高的珠峰达 8844 米。据地质考证,早在 20 亿年前,喜马拉雅山脉的广大地区是一片汪洋大海,称古地中海,与太平洋、大西洋贯通。由于印度板块北移与欧亚大陆板块相撞,受挤压抬升,成为当今的最高山脉。过去研究表明,喜马拉雅山脉形成于 6500 万年前。但最新研究显示:喜马拉雅山的形成最少有 4.5 亿年。这推翻了早期的理论即 6500 万年。

根据科学家测算,宇宙的年龄大约是 150 亿年,人类所赖以生存的地球,在宇宙中已旋转了 46 亿年。生物的历史至少也有 33 亿年,而人类的历史大概为 300 万年。约 33 亿年前—25 亿年前的太古代,是生命的开端。约 6 亿年前—2.25 亿年前的古生代,是生物大爆炸的时代。奥陶纪(约 5 亿年前),出现脊椎动物。志留纪(约 4.4 亿年前),出现鱼类,植物开始登陆。约 7000 万年前至今的新生代,是哺乳动物和人类的时代。在渐新世(约 4000 万年前),灵长类中产生了猴类和古猿类。到上新世(约 1200 万年前)时,古猿逐渐向人转化。新生代的第四纪(约 300 万年前至今)是人类的时代。人类在成为完全形成的人之后,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一是早期猿人,也称能人,出现在 300 万年至 200 万年前之间。

二是晚期猿人,也称直立人,其生存年代约从 180 万年至 20 万年前。三是早期智人,也称称古人,生活在 20 万年至 4 万年前。四是晚期智人,也称新人,出现在 4 万年前至今,晚期智人就是现代人类。科学家研究表明,人类是从一种 3 亿多年前漫游在海洋中的史前鲨鱼进化而来的。这种名为棘鱼属的原始鱼类是地球上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有颌类脊椎动物的共同祖先。2013 年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倪喜军研究员等人证明:类人猿起源于约 5500 万年前。总之,喜马拉雅山脉早于人类诞生。

2015 年科学家在《隐秘的喜马拉雅:亚洲的奇境》报告中指出,喜马拉雅存在一种“会走路”的鳔鱼,它通体呈蓝色,个头很小,能够在陆地上存活达四天。大量事实表明,人类可能起源于喜马拉雅山脉。因为喜马拉雅是地球上最早的一块陆地,其他地方当时还是海洋。直到今天,地球大部分还是海洋,海洋占地球表面积 71%,陆地占 29%。人类来自海洋,但只能生活在陆地,并且需要淡水。珠穆朗玛峰是世界最高最大的淡水塔。所以,珠峰两边有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和印度。喜马拉雅山脉现在海拔很高,平均每年升高 1 厘米,但过

去没有这么高,也不太缺氧,适合人类生存。喜马拉雅山上有许多海洋生物化石,说明过去的确在海洋之中。《圣经》故事中的诺亚方舟可能就是喜马拉雅。从卫星看地球,四川盆地就像是一艘停靠在青藏高原东岸的“诺亚方舟”,因此四川被称为青藏高原东大门。

西藏阿里地区 18000 年前的象雄文化也是证据。原始宗教可能最早起源于青藏高原,随着人类迁徙传播到世界各地。西藏到处是金字塔形的巨大山脉,埃及人造金字塔是否受到青藏高原山形的启示和影响,值得探讨。阿里的冈仁波齐山至今还被认为是世界多种宗教的中心。生物学家研究发现,世界上所有生物,在喜马拉雅山脉都可以找到原型,即野生的原始标本,只是与现在人工驯化的或者自然进化的生物有较大差异。在喜马拉雅还有夏尔巴人和藏族,甚至发现了雪人的足迹。喜马拉雅、青藏高原与昆仑山脉相贯通。昆仑山又称昆仑虚、中国第一神山。该山脉西起帕米尔高原东部,横贯新疆、西藏间,伸延至青海境内,全长约 2500 公里,平均海拔 5500-6000 米,宽 130-200 公里,西窄东宽,总面积达 50 多万平方公里。

昆仑山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上具有“万山之祖”的显赫地位,古人称昆仑山为中华“龙脉之祖”。古人类经过漫长进化,一部分人逐渐迁徙到昆仑山一带。所以,关于昆仑山的传说很多,比如古代神话认为昆仑山中居住着一位“西王母”,人头豹身,由两只青鸟侍奉。远古时代的人类还是游牧民族,没有固定居所,四处行走,很多地方都留下了足迹,这是造成今天许多地方争抢同一个远古名人的根本原因。后来,人类祖先的一部分顺着黄河、长江向东迁徙,到了中原和四川盆地,走向亚洲和世界。因此,有北京周口店人,有四川资阳人、重庆巫山人、云南元谋人。另外一部分到了古印度和两河地区,再走向非洲、欧洲,直至全球。1910 年人们最早于巴基斯坦和印度交界的西瓦立克山区发现了腊玛古猿化石,后又在肯尼亚、希腊、土耳其、匈牙利、巴基斯坦和我国云南省发现了腊玛古猿化石。经鉴定,腊玛古猿大约生存在 1400 万年前至 800 万年前。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人类即元谋人,距离现在大约 170 万年。

四川盆地位于中国地理第二阶梯,约 20 万平方公里,海拔 300 至 700 米,地理界线为云贵高原、巫山、大巴山,内部为低山、丘陵、平原。四川盆地号称千河之盆,流域面积 100 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 1400 多条,不同规模的河流有 5000 多条,又是紫色(红色)盆地,属于世界唯一,具有内陆海洋性气候,物产丰富,最适合人类生存。四川盆地在远古时代也是海洋,巴蜀图语的著名符号“S”(或者“鱼”),就是指海洋和水波。人类从喜马拉雅迁

徙到昆仑山再到四川盆地，在盆地创造了许多辉煌，如“资阳人”，还有三星堆文化、金沙遗址。

“资阳人”是中国发现的第三个古人类头骨化石，也是新中国发现的首枚古人类头骨化石。伴随“资阳人”出土的，还有大批石器、骨器，特别是骨针、穿孔石珠、鹿鹿角等文物。“资阳人”被鉴定为约4万年前的古人类，和现代的人类有直接关系，是古蜀人祖先。“资阳人”的发掘说明在此之前，古人早在四川盆地活动，顺着安宁河谷慢慢向南方扩散，直至东南亚、南亚。今天在安宁河谷发现的巨大石墓就是证据。《山海经》是先秦古籍怪书，记载了550座山，300多条河流，由战国中后期到汉代中期的楚人或巴蜀人所作，这说明作者很熟悉四川情况。古代丝帛只有四川产，蜀是丝帛原产地。

2013年9月国外《科学公共图书馆—综合》报导，英国赫尔大学水文学者利用撒哈拉沙漠地区的详细地形数据，了解水流如何从山地向北方流动形成湖泊和内陆三角洲，并在一些情况下到达地中海而创建的计算机模型的最新研究表明，大约在距今13万年至10万年前的间冰期，与现在相比，非洲季风能够到达更北部1000公里之外的地方，季风所带来的暴雨可以滋润撒哈拉沙漠南部的山脉。该地区在最大季节性暴雨时节，每一条主要的河流都能够带走大概相当于尼罗河四分之一的水量。这些河流可以在沙漠中创造植被繁茂的“绿色走廊”和大片水域。这样一来，季风暴雨滋润了穿过撒哈拉沙漠的河流，撒哈拉沙漠曾经处于向北流动的三大水系的纵横交错之中，这为人类向欧洲和亚洲的第一次迁徙创造了可能，即早期现代人类就可以经此迁移到北部地区和其他大陆。而鉴定大围坪盆塞海海嘯遗迹地貌，要采用计量历史学或计量地质学的技术创新。如其中，中科院遥感所及挂靠该所的“遥感考古室”，可给予帮助。

其次云南大学的天文高能物理学家喻传赞教授，用高能实验测定湖泊沉积等材料，得出的我国近一万年气候变化曲线的峰值图，也可给予帮助。近代地质学在中国传播，还不到一百年的历史。中国地质学者研究或传播关于因近万年大地震地裂等地质局部灾变，造成盆塞湖一类的特殊地貌结构等知识，是有空白的。刘东生先生补足黄土高原的认识，也说明这一点。四川海嘯遗迹从哪里来？从平武到黄龙寺、九寨沟路上看到延绵数十里不见一只飞鸟、不见一棵草木的怪石嶙峋的大山，像刚发生过大地震的景象，就是一本书。云南大学高能天体物理学家喻传赞教授1992年在平武第四届全国数学、物理、力学及高新技术研讨会上，就拍案而起讲这本书，他说这不是近万年产生盆塞海灾变的证据是什么？他在会上放弃了原准备好的发言稿，

专讲“喻传赞曲线”，即证明中国远古史中存在女娲突变纪和大禹突变纪的科学认识方法：他在完成国家交给的“近万年的气候变化曲线”的高能实验测定项目中，发现该曲线在6000多年前和4000多年前有两处出现特高的奇峰，大大超过曲线全段其他地方的峰值。

喻教授虽不是研究历史的，但在惊异之余，终于在远古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的传说中找到了答案，即中华远古文明传说中有真实成分。“喻传赞曲线”是女娲王朝、大禹王朝存在的第一批科学根据。

## 7、摇钱树之谜

“一带一路”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不是从零开始，它远不止继承古丝绸之路的开放传统——李后强教授的“天府学”，立足于珠峰映射原理——青藏高原是人类共同的舞台，世界淡水塔，是人类最早活动之地；青藏高原的分开东西两面，形成今天国际占主流的欧洲水平，和相比要落后的东亚态势。

钱学森院士曾谆谆告诫：“有几分科学证据，说几分话。妄自菲薄和妄自尊大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无助于深入研究问题”。李进副省长讲话提到：“嫫祖诞生地除绵阳市盐亭县外，国内其它省市也还有争议”，笔者用维京人与“天下人”世界比拼科学解读。但北京著名学者何新教授的博客一直在讲，维京人的后裔在近代出版的欧洲古史中的“辉煌”历史，有不确实的遗憾，给人耳目一新。

问题来自，用文字、用纸张记录的古史，有的时间已过去两千年。类似的情况在我国，司马迁的《史记》，也不是用严格的年表、王表顺序记载上古史。改革开放以来，绵阳市盐亭县境内发现与丝绸源头有关的数十处古山寨城邦遗址和遗存，成为可以开发旅游，也可以开发中华万年古史的试点工程，引得海内外数批专家到此考察，以揭开丝绸之母、外贸之母、金融之母、开放之母和人类文明大爆炸的联系，那么它以什么硬证据文物，打开笔者“科商”的呢？

### 1) 从嫫祖说古今科商传奇

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先生2019年5月21日至22日，在回国述职期间应邀赴深圳考察，会见了华为创始人兼总裁任正非，考察了华为研发中心和手机生产线，并在华为大学发表题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与挑战》的主旨演讲。他说：“美国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发难，明面上打‘贸易战’，暗地里在打‘科技战’，想把中国科技大发展的势头遏制下去”。这话醍醐灌顶——改革开放以来，成千上亿的各地人民思考嫫祖，成百上千的各路学者研究嫫祖。笔者不是说这有什么不好——恰恰是智商高、情商高的体现：兴趣在诗词歌舞小说绘画等艺术表达，和文献考究的人多。但为啥至今仍各自为

阵，存在“李进难题”？这能与国际的科学多交流吗？而只沿着智商高、情商高的这条道路走下去，还不能够让世界认识嫫祖---从“科商”认识嫫祖缺少，嫫祖研究不可避免会被分割成智商高阵营、情商高阵营特征，和智商高+情商高结合特征等三块阵营。但这种各自登高的情况，也不是都能一定走好到底。

正如贸易战有记者说会分成一个是美国为主导，一个是中国为主导，一个是“坐山观虎斗”的大国为主导。华为的任正非总裁与此的看法不同，他认为世界一定要走向互联互通；他说：“如果美国人到中国来，需要换一个手机才能打电话，中国到美国换一个手机才能打电话，这是人类社会的倒退，不是前进。而且信息社会将来互相依存度会越来越高，特别是软件定义云社会以后，如果不能成为一个统一的社会，这是很复杂的，所以与科技脱钩是政治家不太明智的一个幻想。比如，美国零部件不卖给别的国家以后，美国零部件厂家就会变小，生产成本会变高，人们在消费时就要付出高一点的成本才能进行消费。全球化的目的就是要优质配置资源，我们今天享受社会的服务和成本是比较低的，将来分裂成两个板块，其实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我估计华尔街也不会赞成”。嫫祖研究的道路，最终也会一样。

### A、黄帝时代青铜像之谜

1998年1月22日《绵阳日报》第三版“天下大观”专栏，发表《盐亭发现黄帝时代的青铜器》引发领导之间、专家之间争论风波---因为就在22日发表的当天早上上班时间，正遇上市委开常委扩大会议，《绵阳日报》同时送发到每位领导手里。但会议正式开始后大家惊奇地发现，主持会议的市委第一书记冯崇泰书记开口说话，不是讲原定的议题，而是拍了拍《绵阳日报》说：“黄帝时代怎么会有青铜器？我是文革前上清华学工科的，工程上没听说四千多年前能铸造铜器；考古上也没有看到发现四千多年前有铜器文物的出土”---他言外之意是《绵阳日报》的报道，对绵阳市影响不好。大家以为冯书记只是批评几句就算了，哪知他一议论就是十多二十分钟，到会的领导都不好开腔。列席会议的《绵阳日报》社长兼总编严泽铄同志头都不敢抬。这时市委宣传部部长赵欣同志，觉得《绵阳日报》是归他分管的部门，只得出来说话：“这是作者的一家之言”，才放了过去。

会议一结束，严泽铄总编立马赶回报社找到笔者，详细说了冯崇泰书记开会说的事情和他的委屈。《盐亭发现黄帝时代的青铜器》是笔者编发的，从办公桌上笔者拿出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胡刚等编的《世界简史》，翻开第一章就是古埃及“公元前四千年中期，埃及人已学会了冶炼金属的技术，用

铜制造工具和武器”。接着又拿出一本科学杂志说：“严总你看，这是报道乌克兰的草原考古，在六千多年前的马的坟墓头骨遗骸嘴部发现铜嚼子”。马嚼子，就是连着缰绳上套在马嘴巴上的金属部分，借以控制马匹的活动。现在一般是用铁嚼子做马嚼子，铜嚼子说明人类在铁嚼子之前就开始使用了马嚼子。原来家马最先可能出现在今天乌克兰一带的草原上，其标志是在第聂伯河西岸的德累夫卡遗址发现了距今6000年的具有明确佩戴过马嚼子痕迹的家马骨骼。马嚼子考古现象是“前苏联学者在乌克兰草原的斯里第尼·斯托克文化发现的一些马骨，特别是在第聂伯河西岸离基辅250公里的德累夫卡遗址中，还发现了两条狗、陶缸及近似马面颊片的鹿角合葬的一匹牡马。该马有7~8岁，生活在公元前4000年”。此马经美国学者安东尼和布朗的研究，发现有使用马嚼子的痕迹，从而“认为很可能早在公元前4000年前的斯里第尼·斯托克铜器时代文化中，马即被人类驯服，变成人们的坐骑了”。

严泽铄总编仔细看完所指的文章，没说话带着杂志走了。以后也没有再过问此事；笔者不是说冯崇泰书记的认真有错。其实青铜器的考证有严格的报道---从考古发现的铜器，提取类似铜的同位素类型和含量，在对标查找巴蜀和全国、全世界发现铜矿地点的铜的同位素类型和含量。对上号的，说明青铜器出自哪里？以及制造的时段。但这对我国很多专家来说，都是难题。其实笔者编发《盐亭发现黄帝时代的青铜器》是很认真的。事情缘起1995年3月18日，盐亭县金鸡镇农民岳大登、杨华茂、岳树伦等人，在金鸡镇烟台山顺天寨挖出一尊十分古朴的高约60厘米的青铜跪俑。正遇上绵阳市团委青少年活动中心颜晓亚主任在金鸡镇采风搞摄影，岳大登等农民听说颜晓亚主任是知名摄影师，又是市团委宣传干部，就拉着不准走，要他去拍照和向上级汇报。颜晓亚主任考察后认为是真实的，回绵阳后带着拍照的铜像、古桑化石、石刀片、石斧、陶蚕等照片，到报社反映看到的情况，要求给予报道。此时笔者才第一次听到盐亭发掘出古青铜像。

由于不是正式鉴定，报社决定叫第三版的“天下大观”专栏考虑---“天下大观”是带故事性的新闻。笔者是编辑之一，于是在书刊中开始收集远古梁州铜矿和冶铜的材料。看到有记载黄帝时代已“采首山铜，铸鼎荆山下”.....在盐亭不远的中江、北川、彭县等地都有铜矿。到1997年底盐亭城郊五指山建“嫫祖公园”举办开工仪式，邀请报社。笔者随同王天柱副总编、办公室任启乔主任参加。在盐亭举办的“嫫祖文物展览室”，笔者第一次看到玻璃柜里展出的岳大登等挖出青铜跪俑。事前笔者已在绵阳城里“工美大王”李照明先生的商店，看过一个古“青铜跪俑”的仿制品，对比岳大登等挖出

的青铜跪俑锈蚀严重，到处都有锈蚀孔；从锈孔看出铜像铸胚很薄，但铜像造型精致。相反李照明商店的古“青铜跪俑”，人物造型粗糙，铜像铸胚很厚，且无锈蚀孔。“嫫祖文物展览室”的负责同志告诉：盐亭的学者据嫫祖时代的历史和当地传说，初步把岳大登等挖出的青铜跪俑定名“金二伯铜像”——原因是盐亭数千年来流传着“金二伯射黄帝”的妇孺皆知的故事，金二伯铜像下跪形象有后来对认错的表示。

当时盐亭县嫫祖文化研究会会长赵均中主任也实话实说：专家之间也有争论，如川大林向教授等到金鸡看后，说是赝品。理由是有人到台湾也发现有类似青铜像，目前一些文物市场也有，疑是有人买来预先埋在那里的。但四川省博物馆雕塑院名誉院长叶毓山教授，却鉴定是比三星堆更远古的青铜像。金鸡镇政府派干部去调查，岳大登要杀鸡滴血指天发誓：“自己如作假遭断子绝孙”。事情到了这步，翻年的1998年初，报社同意在“天下大观”专栏报道看有什么反映？

绵阳市委书记之间其实意见也不一致。1998年2月冯崇泰书记调成都作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杨海清书记作绵阳市第一书记，市委对嫫祖文化加大了支持。其实，杨海清书记1985年5月调任绵阳市委副书记后，到盐亭县检查工作到县科协，当时笔者汇报建农村各乡镇科普协会受欢迎。杨海清书记说，他1963.-1967年在西南农学院读书，毕业后1973-1977年在平武县枕流公社作过党委书记，知道农民需要科普。笔者和杨海清书记的这次汇报后没有再接触，但1993年《嫫祖研究》一书出版后，盐亭县把书分送给市上领导。一天晚上，杨海清书记一人在红星街散步遇到笔者，他居然还能认出来。他对笔者说：“你们的《嫫祖研究》一书写得不错”。多年来笔者一直在想：为啥市委书记之间有样的不同？

冯崇泰书记1942年生，安徽五河人，1961—1967年在清华大学冶金系金属学及金属材料专业学习。毕业后曾在兵器工业部5023厂当过工人、车间主任、厂长，1986年当上四川兵器工业局副局长，1987年调任中共四川省绵阳市委副书记，他抓工业是很能干的。但改革开放后，面对不熟悉的巴蜀古文化研究热的前卫，他作为外省人，听惯的对五千年的中华文化一直宣传，是中原和华东地区占主流。因此面对不熟悉的兴起的巴蜀古文化研究热的前卫，有质疑，也很自然。而杨海清书记1944年，绵阳本地人，因学农，对抓农业很熟悉。他希望结合嫫祖文化，促进绵阳农业生产，也能理解。

## B、巴蜀有无上古文明与李白之谜

巴蜀有无上古文明？其实历史上四川本土内部早就有争论，而且巴蜀上古文明，在四川内部

还占上风。例如，汉代生活在成都的扬雄，也同司马迁一样言先进其文不雅驯，他称上古之纪，蜀地尚处不晓文字，未有礼乐的蒙昧时期。然而在他家乡，如今就发掘出著名的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以及宝墩等五座古城遗址。更奇怪的是，在他北上京都，途经绵阳，逗留住宿之地的永兴普明，如今也发掘出大型豪华的汉墓。但杨雄也像懂新闻报道有强烈的意识形态选择规则一样，他只认京都、府地的繁华，其他偏远之地或过时的先进东西，推荐报道都难言之。这种“落后治国”论的意识形态延续到近代，中华五千年前的早王朝文明，几乎被“以苏解马”的旧石器或新石器时代、母系氏社会或父系氏社会、仰韶文化或龙山文化等史观否定掉。

再是江油唐代大诗人李白，19岁时写出长诗《蜀道难》，和他的老师——盐亭唐代杰出纵横家赵蕤发生争论。赵蕤在唐开元年间为金鸡镇嫫祖山嫫轩宫重建，写《嫫祖圣地》四方碑志。文中明确提出：“黄帝元妃嫫祖，生于本邑嫫祖山”。盐亭县作家协会名誉会长赵良田局长据《嫫祖圣地》碑志，归纳“嫫祖精神”有四点：一是嫫祖首创蚕桑，法制衣裳，开中华文明起源之“美”；二是始兴嫁娶，崇尚礼仪，开中华文明礼仪之“德”；三是协和百族，帛化干戈，开中华文明和谐之“和”；四是辅弼黄帝，奠定国基，开中华文明发展之“本”。以文明、国家和青铜器的出现为标志，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盐亭人已从山顶迁移到了山脚。随着远古山寨城邦的衰败和人工制品的流失，盐亭已大部分失去和遗忘自己的古文明遗产。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蜀道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更具颠覆性的巴蜀无上古文明宣传。赵蕤当然不同意。

奇怪的是平武县史志办研究员曾维益主任，出版的约70万字的《李白〈蜀道难〉新探》一书，对历代学者都把《蜀道难》的创作时间视为千古之谜的问题给出答案，李白创作成名作《蜀道难》的时间是在其20岁之前，李白16岁时即有了《蜀道难》草稿。但有部分学者认为，此观点与当地发展旅游的借题炒作有关，有点牵强附会。

曾维益主任曾送笔者《李白〈蜀道难〉新探》一书，研读后认为曾维益主任的观点，与笔者采访盐亭天垣乡赵家沟赵成芝老先生，他讲的赵氏远祖及赵蕤等传说能联系——据传赵蕤的祖先在盘古年代曾发明过“皮鞋”的大臣，这是用晾干鞣制的牛皮或其它动物的毛皮包裹脚。到唐代赵氏庄园在盐亭全境近40处，赵蕤虽出生盐亭两河区，但作为赵氏大庄主的私塾先生，赵蕤兄弟三人在盐亭的三河、天垣、金鸡等处还有别业。天垣赵家沟即为赵蕤前辈老三买的庄子，并把买的的天垣乡胥家沟的庄子赠送给帮过大忙的胥氏人家。但事后因赵家和胥家闹

矛盾，一部分胥氏人家迁移到了江油，如李白的母亲胥月莲及小姨胥仲莲有类似“花木兰替父从军”的传说，也曾感动过赵氏人家。又传李白的祖先与葛洪《神仙传》记载的汉朝人李意期有关；李意期和绵阳游仙区“游仙”之名也有关，与此李家与胥家先人有过世交。

2001年10月22日《绵阳日报》第8版，发表绵阳学者刘文传、蒋志教授等的《“游仙”之来由》一文。其中说：三国刘备到涪城与刘璋聚会期间，就拜访过的李意期，实为11代的李家班主李意。涪城游仙李意期实为绵阳地区一支从墨家向道家转型的工匠班主家族。据传第一代李意期约生于公元前158年，正是西汉文帝执政。文帝在巴蜀设立工官，大力扶持私人工商作坊发展，其产品还与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贸易。李意期是绵阳一家专行与西域贸易、产销结合的大工场班主。同时李意期对工场的技术传授、培训、生产、营销，学习戏家班管理，实行严格的班主制，招入工场的徒弟、匠人必须从一而终。

李意期工匠班主家族产销的西域贸易与招收工场徒弟从一而终的两者结合，正是李白父亲李客家与母亲胥月莲家先世两家结缘的由来——据传李白(701—762)父亲李客家先世，是李意期工匠班主家族商贸一房移居留在长安—陇西一支的子孙。而母亲胥月莲家先世，则是李意期工匠班主家族工场徒弟中得技术真传一支的子孙。唐朝时疆域新疆以西常遭突厥族侵犯，防守碎叶城等边疆需要大量修建营房、工程的匠人，以及商贸、物资，李白的外公胥家工匠班主家族是国家常年征召的民工队伍和领队人，并代管商贸。李白的母亲只两姊妹，无兄无弟，李白的外公年老不能从军领队，李白的母亲胥月莲就常代父出征。正是在碎叶城，胥月莲认识从军商贸的年青的李客，两人相爱结婚。胥月莲怀上李白后不能指挥工程，被妹妹胥仲莲和丈夫李客送回蜀地江油老家生育，李客又返回碎叶城经商。公元701年李白出生，但不幸的是李白的母亲产后得病不到半年而亡，接着公元702年李白的外公也得病去世。他们死前，都希望李白能送给李客赡养。

于是妹妹胥仲莲遵命将一岁多的李白送到边疆碎叶城李客手中。直到李白长到8岁时，胥仲莲和姐夫李客又才把李白送回蜀地江油老家。但李客居住了一段时间又离开了江油。平武县史志办曾维益主任的《李白〈蜀道难〉新探》书中说，李白创作《蜀道难》，是在其20岁之前，16岁时即有《蜀道难》的草稿。也许正是李白8岁时随父李客从碎叶城回家于绵，经历平武等大山路程的艰辛，留下记忆的写照。而他早早离川，和19岁那年与老师赵蕤的争论也有关。

嫫祖研究，其实如履薄冰。据20世纪以来绵

阳学人前仆后继的研究，在7000多年前的女媧突变纪到4000多年前的禹禹突变纪，四川盆地一度曾处于盆塞海、盆塞湖、堰塞湖与溃坝干涸间断交替时期，目前嫫祖故里盐亭的山川地貌鲜明地展示了当时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留下的遗迹。据传说嫫祖山顶的十里长坪山就是嫫祖时代近万人口的大城镇。相传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老师纵横家赵蕤，曾购置过这里的部分遗存，人称“赵蕤别业”；也称这里山顶为“长坪山”；李白拜访赵蕤为师，求学论道就在这山顶上，并且构思《蜀道难》这首千古名诗也是在这山顶上完成的。而赵蕤也是在此期间为嫫祖山嫫祖宫写的《嫫祖圣地》碑志，与曾维益说的时间相合。赵蕤明确指出丝绸源头就在盐亭——至今嫫祖山山顶还有观天象台遗迹；今天所称三台城郊赵蕤著书居住过的“长坪山”，实为对名人赵蕤的纪念。

## 2) “科商”与丝绸

学生李白对上古文明的失语症，与老师赵蕤对产生过丝绸的山寨城邦文明和盆塞海洋文明的情有独钟，形成鲜明对照，反映了绵阳市南北两地人的环境地理亲身感受所积淀的差异，也反映了中华远古文明数千来的“失语症”之争论的内因。解开这个谜，不但有古罗马等其他文明古国对丝绸情有独钟的历史昭示，也有“维京人”与“天下人”世界比拼在近代以来昭示的“科商”问题。

直到公元8--11世纪以前，北欧英格兰、法兰西和俄罗斯等维京人的海盗身影，都还在“海上冒险”征战袭击、掠夺、杀戮、打劫来自西南欧洲罗马、希腊等方向的商贸船只。那么被抢劫的物资、财富从哪里生产、创造而来？为啥“维京人历史”记载要把古罗马、希腊从早期人分开？又为啥这些“维京人”后来建立的国家，在近现代成为世界的强国、富国？其实谜底很简单——“科商”是人类不朽的基因。

### A、古罗马与巴蜀丝绸之谜

谜底的背景是，由于距今7000--5000年前古巴蜀盆地的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才造成有早期科学与民主的气氛，也才有嫫祖、女媧、伏羲、黄帝等人的丝绸发明、改良、推广与交易。也正因为有古罗马、古希腊的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才造成该地域的兴盛、强大，也才造成有对中国远古盆塞海洋文明丝绸高科技的强烈需求。

李学勤教授曾来北川考察大禹遗存——2001年12月31日他在《绵阳日报》的“科技城导刊”版，发表的《古史、盘古与炎黄》一文中说：“绵阳发现盘古、炎黄二帝等传说及王表谱系，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中华文明的起源要比很多论著设想的要早，甚至要早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第二，中华文明的相当早的时候，包括它刚在萌生的过程



中，便有了颇为广泛的分布。这意味着从北方到南方很广大的范围里，多种文化都有共同点。这种情况，也可譬喻为形成了一个文化‘场’，其范围之大在古代世界是罕与伦比的”。

李学勤教授说得好，嫫祖古丝绸也是一种“场”。丝绸是古代中国非常重要的出口商品。远在2000多年前的奥古斯都时代，罗马人就称中国为“赛里斯”，意为“产丝之地”。公元前3世纪秦统一中国，罗马人改用“cin”(“秦”)来直接称呼这个丝绸大国。丝绸之路的两端就是当时的两个世界大国——中国与罗马。这条大路不仅为罗马和整个西方带来了珍贵的丝绸，还带来了冶炼等高超技术以及大黄、桂皮等药材和香料，当然还有遥远东方古国的文明信息。对中国来说，丝绸之路也成为一条面向世界和了解世界的信道。所以我国的《后汉书》，称罗马为“大秦”或“骊阡”；将罗马的“水精”即玻璃，写得特别详尽。当时罗马出现专门出售中国丝绸的市场，甚至因贵族们大量购买而出现了国库资金困难。西汉时期汉武帝极力扩大疆域，开拓市场，于是派遣张骞于公元前139年出使西域，在安息(伊朗)被扣留，出使失败。公元前119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仍未达最终目的地。

张骞打通丝绸之路后，丝绸作为昂贵的国礼和重要贸易商品源源进入安息王朝(前247-224)统治下的波斯帝国。中国丝绸的西传大约是在西汉通西域之后，使中国丝绸在欧洲得到越来越多的推广和青睐。不过，只有王后才能穿得上绣着简单花纹的丝绸，而其他贵族只能穿上普通素色的丝绸。那时候中国丝绸的价格简直可以和黄金并肩。罗马人要想购买丝绸也并不容易。因为运输是个百转千回的过程，要经过罗布泊、塔克拉玛干沙漠、帕米尔高原，再经过中亚的撒马尔罕，到达波斯才能转运到达罗马。波斯因为征收过境关税，使得一些商人望而却步，而罗马人要得到丝绸就只能从波斯买高价了。罗马人想与中国直接交易，却因为波斯从中作梗始终未能如愿。

中国丝绸的威力有多大？轻软的丝绸，铁血的战争——二者之间从丝绸之路开通算起，数百年间，丝绸正是操纵着世界经济和国家利益争端的那只手——如同今日的石油。据说古罗马人曾因此输掉了一场战争——公元前53年，罗马“三巨头”之一的克拉苏与另外两位巨头恺撒和庞培争夺个人荣誉，克拉苏率领四万人率军出征进攻东方的安息帝国(波斯地区)，结果克拉苏军队惨败，两万万余名罗马将士阵亡(其中包括克拉苏的儿子)，另有一万余人被俘。克拉苏本人为免受当俘虏之辱自杀身亡，其首级被呈献给安息国王奥罗德斯二世(前57年至前38年在位)。强悍的罗马军队为什么在这场著名的卡尔莱战役中遭遇惨败呢？据载可悲的是，他们不是被打败

的，而是被吓败的——那些忽然间出现的鲜艳刺目的军旗，后来据西方史学家考证，那些鲜艳刺目的旗子就是丝绸做的！此后，丝绸很快进入了罗马社会，成为罗马社会的高档奢侈品。罗马人爱上了中国丝绸，以能穿上中国丝绸为荣，尤其是上层社会，丝绸简直是他们贵族身份的象征。它光滑、轻盈、精致、华贵，跟古罗马人之前穿的毛麻相比，不知舒适多少倍，高贵多少倍。所以，人们争相购买。

这一期间的交往佐证，还是公元前53年古罗马克拉苏，率数万人征战古帕提亚王国(安息)，在卡莱(现土耳其的哈兰)战败，长子普布利乌斯所率6000余人神秘失踪，成为古罗马悬案。但《汉书·陈汤传》提供的线索记载，公元前36年，西汉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带4万人讨伐郅支单于战于郅支(现在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市)，“生虏百四十五，降虏千余人”。战败的军队，“土城外有重木城”拱卫。而这“重木城”的防卫只有古罗马军队采用。历史学家们认为，这支军队可能就是在卡莱战役中战败的古罗马军队。

陈汤将其带至甘肃永昌，在祁连山麓始置“骊阡县”。《后汉书》写道：“汉初设骊阡县，取国名为县”。这个县的名称来自古罗马之名，即“骊阡”的音译。骊阡人就可能是普布利乌斯的残部。现在永昌县一个叫者来寨的小村庄，已发掘出一座古城遗址。这个小村庄生活着270多名外貌特征特殊的人：高鼻梁，深眼窝，蓝眼睛，毛发金黄，头发自然卷曲，身材魁伟粗壮，具有地中海人的外貌特征。基本确定是古罗马人的后代。到了东汉时，班超曾大败西域诸国，在西域活动达30多年，被封西域都护。他于公元97年派手下大将甘英出使“大秦”。这时的罗马正是蒂托和图拉真皇帝统治时期，罗马市的人口达150多万。甘英一直走到条支的南海，即现在的波斯湾。

甘英这次出使得到很多有关中亚各国的直接材料和有关罗马的间接材料。一般认为，从大秦(古罗马)方面来到中国的第一批人，是公元100年前后从地中海东岸推罗城前来洛阳的罗马商团。古罗马学者托勒密的《地理学》中，提到曾有一位名叫梅斯·蒂蒂安努斯的马奇顿商人，同中国保持着经常的贸易关系。梅斯曾委托代理人组成赴华商团，于公元100年11月抵达洛阳，受到汉和帝的召见，并赐予“金印紫绶”。公元161年古罗马皇帝安东尼诺·马尔科·奥雷利奥(公元121~180年)又派出使团，带着象牙、犀角前往中国交好。这时，中国已经改朝换代，已是东汉桓帝时期。罗马帝国后期，罗马商人秦论即曾来到中国。据我国《梁书》记载，秦论经海道从日南(即现在的越南)进入我国，当时正值三国时期，曾于孙权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在南京谒见孙权。中国政府还派刘咸护送他回国，

可惜刘咸在旅途中病故。但罗马的古籍未再提到秦论归来后的行踪和谈话。

另在文化交流方面，最突出的事是希腊罗马的古典风格也借丝绸之路传到我国。从新疆的克孜尔、库木吐喇直到敦煌、大同的云冈、洛阳的龙门等石窟艺术宝库以及菩萨、飞天的形象和藻井、佛龕的形状等，都可看到西方古典传统的影响。现在山西发现过公元 14 年~275 年间的罗马钱币，这是两个文明古国交往的实物明证。

### B、古丝绸之路丝绸技术间谍战

替代安息人的统治而建立起来的萨珊王朝(224-651)，是一个比安息王朝更加强盛的朝代，史称萨珊波斯帝国，强盛富足的社会意味着对丝绸更加旺盛的需求。然而，此时东方强大的汉王朝覆灭，接下来的魏晋南北朝都是一些短命王朝，忙于你争我夺，根本无力控制广袤的西域地区，丝绸贸易因此受阻。为满足国内的丝绸需求和对西方的丝绸贸易，强大的萨珊王朝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南方进口丝绸原料。然而，随着进口成本的增加，波斯变本加厉地抬高对西方的成品丝绸出口价。330 年罗马帝国一分为二，建都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不满波斯从中盘剥，于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自己进口丝绸原料，并在现今的叙利亚地区建立起了自己的丝绸加工业。

此举惹恼了萨珊国王沙普尔二世(309 年至 379 年在位)。当时沙普尔二世又眼见东罗马帝国抢走了自己的丝绸贸易垄断权，不禁怒从心起。360 年沙普尔二世不再与东罗马帝国小打小闹，而是亲率大军出征叙利亚，取得完胜，不仅解决了领土争端，将叙利亚地区并入萨珊波斯帝国版图，而且还将叙利亚的丝绸织染工和有关设备尽数掳到波斯本土，铲平了当地的丝绸经济，再次将丝绸贸易垄断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后来东罗马帝国又绕道东地中海、红海，从海上丝绸之路不断弄来一些丝绸原料。为了免除再次被波斯铲断的后顾之忧，他们将丝绸织染加工设置在了君士坦丁堡的皇家作坊内，严禁外面进行丝绸织染加工。但也严重阻碍了丝绸织染业的发展，因此东罗马帝国境内成品丝绸的生产始终有限，不能满足社会的大量需求，还得依赖从波斯进口。作为丝绸产地的中国也深知丝绸贸易的重要地位，因此严禁丝绸生产技术外泄。

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功地严防死守住了这项技术，但 420 年史书上记载，一名汉家公主下嫁于阗王，在其夫婿的恳求下，这位公主将蚕卵藏匿于头饰，桑种混入随身携带的草药中，又将几位女缫丝工化装成自己的侍女，成功地将蚕桑养殖和丝绸生产技术带入了阗。当时掌握着中亚和西域地区控制权的是萨珊波斯帝国，因此，波斯也很快就获得了这项技术。已经掌握了丝绸生产技术的

波斯，尽管仍然从中国进口丝绸原料，但总体来说国内丝绸总量大幅度提高，丝绸出口贸易价格不降反升，丝绸价格的暴涨让东罗马帝国忍无可忍，只好兵戎相见，但屡战屡败，只好忍辱接受波斯人的重利盘剥。483 年东罗马帝国查士丁尼大帝登基(483 年至 565 年在位)，他见国内丝绸价格暴涨，民众怨声载道，542 年迫于巨大的丝绸经济压力，查士丁尼大帝不得已与波斯开战，结局是 545 年签署停战协议，东罗马帝国的堂堂一代雄主，不仅赔款黄金 500 磅，还将自己医术高超的御医，借给波斯国王霍斯陆(531 年至 579 年在位)使用一年。

查士丁尼深知要解决国内的丝绸需求，最根本的办法是获得丝绸生产技术。于是一场丝绸间谍战展开：550 年或 551 年查士丁尼召见了几位修士，许诺他们若带回蚕桑卵种，必以重金奖赏。这几位修士为避开波斯边关口岸的盘查，不惜绕道北高加索，一路餐风宿露，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又费尽心机，将蚕桑卵种藏匿在空心的手杖竹节中，终于在 553 年或 554 年将蚕桑卵种成功偷偷带回了君士坦丁堡，完成了 600 多年没有完成的“使命”：偷窃了植桑养蚕技术，养蚕业传到欧洲。地中海宜人的气候十分适合桑树生长，桑蚕养殖业在东罗马帝国境内迅速建立起来，随后丝绸生产技术进入西方其他地区。从公元 5 世纪起，中国与拜占庭（即东罗马帝国）大规模地开展贸易，安提阿克是中国和拜占庭贸易的中心，也是中国商人到达的最西站，丝绸之路的西端通过安提阿克伸向拜占庭。

公元 6 世纪中叶，东罗马帝国与波斯王朝因为争夺两河流域展开了战争，这场战争后来延续了有 400 年之久。当时波斯国王甚至下令封锁了所有的商路，让拜占庭人离开丝绸变成乞丐。罗马人当然不甘心，他们想摆脱波斯王朝，更想自己生产丝绸。13 世纪成吉思汗西征后，一度中断了的东西方交流重又兴盛起来。那时从欧洲到东方，均需通过地中海中部。意大利由于地理上的便利，成为东西方贸易中的重要角色。在很长时期内，威尼斯在与东方贸易中起着重要作用，这里最先成功地在欧洲仿制了染色软质的中国瓷器。

1585 年佛罗伦萨也设厂制造蓝花软质瓷。1627 年比萨瓷工制成了软质青花瓷碗，先是阿拉伯蓝色，后来又模仿中国青花，并由那里传到了到荷兰和法国。控制着亚欧大陆丝绸贸易的波斯这个中间商，从中国大量进口生丝和素锦，进行织染加工，然后转手高价卖给罗马。丝绸经济支撑着当时波斯社会的繁荣昌盛，正如现今石油支撑着伊朗的经济大厦。但在 15 世纪后波斯虽然仍是亚欧丝绸贸易的最大中间商，却也不再享有对丝绸贸易的垄断权了。然而一千多年之后，他们另一种重要经济物资-石油---如现今的伊朗，虽然再也不能用丝绸勒住西方的

咽喉，但却能时不时地用石油掐一下西方的喉咙，以应对来自西方大国的动武的威胁。

### C、“科商”来源桑林生臂手

丝绸间谍战，中国严禁丝绸生产技术外泄，西域于阗王用的是“情商”；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用的“智商”，完成的“使命”，把桑蚕养殖和丝绸生产技术窃取到手，而传到波斯和欧洲地区。桑蚕养殖和丝绸生产技术属于科技专利，窃取专利属于非法。但古代没有“专利”的国际国内法规。非法与合法交织一直进行到现在都存在——严厉的“专利”法规，制约着落后地区的生产生活，一是有“革命”之说，类似“土地回老家，合理又合法”。二是有前途的新技术，大多数发明者都走申请专利的道路，但少数发明者为了及时造福全人类，也有主动放弃的，例如发明提炼放射性镭元素的居里夫人，就是个典型。

嫫祖发明养蚕缫丝，说明她有“科商”；而且嫫祖也类似居里夫人，为了及时造福人类，她是不辞辛劳到大江南北普及养蚕缫丝，所以今天才出现“李进难题”——“嫫祖诞生地除绵阳市盐亭县外，国内其它省市也还有争议”。其次，刘晓明大使在华为说的“美国在贸易上对中国明打‘贸易战’，暗在打‘科技战’”——也说明今天提出“科商”讨论，是时代必然。

按理说，“科商”表露的是一种“知识”，和“智商”、“情商”有很大的交叉，特别是可以归类到“智商”里面去。但今天为啥要把它单独分立出来？说来这是十分复杂而敏感的问题——例如，文革中的中学自然科学教材，提出过去经典有名的数理化天地生原理定律，都是工农大众创造的，他们养活了那些“臭知识分子”，却“窃取”了他们的成果，所以要把课本命名为《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改革开放后，小平同志提出我国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要“科技兴国”；农村搞“养鸡专业户”、“养猪专业户”；城市里搞“经开区”、“科创园”等，都含有追求“科商”的意味。

从理论定义，智商通俗地可以理解为智力，表示人的聪明程度：是指数字、空间、逻辑、词汇、创造、记忆等能力，即智力商数，是衡量个人智力高低的标准；但智商是和遗传有很大的关系的。而情商是与智力和智商相对应的概念。是一种对自身行为活动所产生的利益关系的认识能力，是体现情感性的智力水平。即指一个人社会交际能力，包括一个人的动作语言和思想；又称情绪智力。情商是可以后天培养的，努力培养有利无弊。智商与情商既相互区别、相互独立，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智商主要用于解决逻辑关系、推理演算、创新创意等一系列相对比较程序化的问题，而情商主要用于

解决情绪调节、关系认知、待人接物、角色互换等方面的问题。

智商和情商在很多方面有相通之处，要进行创意和创作，要进行逻辑的推演，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情绪调节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很多时候也做不到。而与人沟通交流，如果有了强大的分析能力和逻辑判断能力，很多时候能更好的认清现实，进行关系的解读和处理。在现代，智商与情商看似简单的词语，虽与每个人的成功密切相关，但单纯的高智商、单纯的高情商以及高情商和高智商的结合，包括单纯的意商、经商、政商、军商、德商、灵商、文商、心商、志商、责商、律商、健商、体商、性商、逆商、胆商、财商等高，一个国家是否就一定成功呢？例如，天大变，地大灾，才体现可比较“科商”呢？

“人生无进退，天地宽窄间”，这一进一退、一宽一窄尽显对科商的生活态度。什么是“科商”？科商指在有正当的生计条件下，对前沿科技的争论或难题的参与，不计较个人功利追寻前沿科技原理的思考、探索、学习、资料收集、研究不懈的兴趣、恒定或组织应用和收获的实在——科商主要是后天获得的一种特殊的区别智商与情商概念的能力。“科商”凝结的科技原理有的从古到今是不变的，变的只是随着时代变化的语言阐释。例如，量子起伏、虚实传输与“有生于无”，阴阳虚实表象拓扑形态的不同伦——联系数学的“0”与正负对称的四则运算，和负数的开平方及求对数等数论有关。“科商”更多的是跟随国际国内科学界主流前进，它的大小更多是在国家层面表现，且是可变的。所以不强求别人、名家、上层、国际机构等对自己工作的承认、奖励为目标。科商创意有的是高难度数学公式化，需要尽量普及让更多熟悉经典数理基础的人能弄明白；有的实验、观察内容，态度要等待让国内国际更多有条件的机构、专家再实验、观察去重复证明，而不以语言、工具、法律、意识形态划线等暴力相威胁。

据古文献《淮南子·说林篇》记载，约公元前5070-4170年立足山海的女媧氏时期，就已懂得“桑林生臂手，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的道理。这里桑林表明，是代指市场交易使用帛币。用现代的话讲：就是货币助长了经济的无形之手；这些功能的发挥，所以女媧王对万事都能理顺。传到约公元前4170-3150年嫫祖的城邦之美时期，更是达到了鼎盛。所以求真考古人类起源序列、历史文化秩序的意义重大。因为古籍《淮南子》一书记载女媧氏成就的“桑林生臂手”的变化，说的就是货币类似无形之手，对社会有拉动作用的影响。为什么女媧氏的“桑林”意指“货币”，是因当时的养蚕抽丝织出的绸布，类似今天金融界的“黄金”作用。而伏

羲氏成就的“太极、阴阳”等科商思维，以及古代自然国学的“无中生有”，也类似“0”量子力学的量子起伏的“正负虚实数对称”退相干映射，以及陈省身院士讲纤维丛对称破缺的平凡圈和不平凡圈。

证明“盘古--嫫祖文明”有文字、城市、政府和贫富不均的社会现象发生，就是199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著名汉文字学专家何九盈等主编的《中国汉字文化大观》一书，首次披露绵阳市盐亭县曾发现的一个完整的上古界碑，上面刻有50多行类似文字的符号，与约6000年前的半坡彩陶刻划符号相类似。我国最早收集甲骨的学者、天津的王襄老先生也曾公布过一块从四川盐亭县得来的石碑，他说：碑是清末四川盐亭出土的，当地称为“蛮碑”，其文字不易辨识，而刊出供鉴古家与研究少数民族文字者作为参考。其次，我们不能不如实报道，1949年新中国的解放，由于革命和政治斗争的需要，四川省仅在盐亭县就有近百在特定环境中与革命发展中不合拍的旧人物被镇压；大批收缴中的有关古书籍、古文献资料被焚烧，数十座远古山寨城邦遗存被拆毁；其中在文革结束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也有销毁证据的事情。而今天，70岁以上活着的人中，嫫祖故里四川省盐亭县还能找到成十上百的这些见证人到场作证。

什么是“科商”？科商的重要---前沿科技原理思考的重要从何时起，突出地体现出来的？这可以肯定地说从一进入20世纪就开始了---“黑体问题”关系给德国的照明工业争取到一个竞争优势，1871年刚刚打造成形的德国，想跟英美竞争照明工业优势，几十年间德国一批顶尖物理学家百般努力，都不能解决黑体问题。直到1900年偶然中出现的普朗克，才得以完成。这个高昂的代价，即使后来德国政治几经曲折，换来的是整个民族智慧站到了“量子”高地时代。在真实世界这个难以捉摸的量子概念，发展出的量子力学，如量子遂道扫描显微镜，是一种比电子显微镜放大倍数更大的显微镜，对研究基因组学十分有用。还有激光、核磁共振、核元素分析等常见的应用，对人类学考古也十分有用，已成人类上古史大统一考古用的主流方法。

中科大教授袁岚峰博士说：以前我们最习惯的思路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还有就是，发挥组织能力的优势。或者层次更高一些，发挥信仰的力量。这些都很好，但都不是用科技来解决问题。一个国家如果成为了以科技为基础的工业国，那么它再怎么都不会太差。一个国家如果成为了以科技为基础的工业国，例如意大利，即使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仍然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家。意大利的汽车、机械和化工产业都是十分强大的。如法拉利、玛莎拉蒂、阿尔法·罗密欧等豪华汽车，都是意大利

品牌。同样的道理，还有德国。德国的汽车、电子、机械、化工、光学等等许多产业都非常发达。同样的道理，还有荷兰。即使英国崛起，荷兰退出大国争霸的舞台，二战又被德国推倒占领，荷兰仍然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家。这是因为，荷兰的食品、化工、炼油和电机等等产业十分强大。与芯片相关的，荷兰有世界上最大的光刻机巨头。最近中国芯片业一个重要的进展，就是中芯国际订到了荷兰一台极紫外光刻机，价格1亿多美元。总体而言19世纪时的工业国，现在仍然过得不错，因为它们仍然是科技先进的工业国。工业国跟农业国有质的区别，因为科技能带来无限的增长可能，而农业的增长空间十分有限。反过来，如果一个国家的发展不是建立在科技的基础上，那么即使现在是富裕的，也并不可靠。如一些西亚国家，靠卖资源就富了，但自己几乎毫无技术能力，如果没有外国工程师，连自己的石油都开采不出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1999年10月7日《绵阳日报》第3版，发表笔者的《绵阳丝绸话沧桑》一文，话没有说完的，就是嫫祖发明养蚕缫丝，与普及到中国近百年来不懈奋斗的一个重大成果，就是把“科商”提升到了高科技竞争的层次。“科商”应该树立这样的价值观：科学本身就是好的。就基本的动机而言，科学只是为了满足好奇心，当发现了新的原理之后，科学的用处却会远远超过单纯追求高智商、高情商以及高情商和高智商的结合，包括单纯的意商、经商、政商、军商等高的实用的做法。“科商”是人类最伟大的“无用之用”。到了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商”思路是，开发一个新的软件，制造一个新的机器，或者提出一个新的原理。习惯于用科学技术来解决问题，这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是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今天这个“科商”时代，是中国第一次拥抱科学。中国的科学以后会在世界上占据更高的地位。这需要所有人都付出努力，都为科学事业做出贡献。

### 3) 从嫫祖、女娲说科商

其实，我国已创立有自己的年代学理论，这是从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侵略与遏止史观，引出的“落后侵略先进”史观：以目前传流的盘古王表追寻中华古王国的起源，透过原始的龙凤经济文化，所谓的古代国家，就是强势集团依据某一地域对内对外实行的生存保障或侵略。从这一定义出发，不管掌权者的时期的长与短，邪与正，强与弱，在没有新替代者较量取胜之前，都可以近似代表此时的顶尖优势。所以中华古王朝时期的国家模式，不是困惑西方的如夏王朝那种实际占领控制的版图模式；这种版图很小，也就很难相信夏朝在中华民族国别史上是一个王朝。中华各民族的起源虽都有各自特定的历史，但可以说汉民族起源的历史，就是远古盆

塞海洋文明和城邦文明的起源史。因为这一文明的顶尖优势的确立，也就确立了汉民族和中华各民族凝聚的核心，以及传承、争夺和溶合的基础。

因此不能把中国东南西北中五方区系内的地域古称号，当成是古民族的称号，如把蜀人、楚人、越人等与当时的古汉族完全相区别。盐亭有一则关于嫫祖设计越千古，产生中华多民族的传说。内容是嫫祖的丈夫轩辕，类似古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儿子亚历山大。马其顿与古希腊各城邦相比，虽既专制又落后，但亚历山大希腊联军遭到惨败，又先后征服波斯帝国，占领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等地，进攻波斯腹地巴比伦、巴特里亚，远征中亚，进入印度，建立起一个人类历史上空前庞大的世界帝国，其领土东起印度河流域，西至巴尔干半岛，北起中亚，南至埃及，几乎包括了地中海东部所有先进的古文明地区，实为盘古王的写照。但嫫祖没有让轩辕用战争像亚历山大那样来征服西陵，摧毁巴蜀的古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建立的成果。

在这里，中华的古蓝色文明首先举起了原始的自由与科学的旗帜，创造出像丝绸这样巨大的原始物质财富。即使这些财富主要集中在被后来包装为神仙、道人、鬼怪的盟王、城主、寨老板的手里，但人民的生活仍然比其他大多数地区舒适得多。因此这里的古联合国的国王从盘古到夸父，一代又一代都打出“传播发明，天下大同，幸福共享”的旗号，一次又一次带领本土的能工巧匠，到海内外去撒播福音，但都不理想：走得近的都跑回了故土，走得太远的又杳无音信。

传说到嫫祖称王时，她审时度势，决心设计出一种能超越数千年的制度，让人民经历一段长时期的痛苦的磨练，才能醒悟先王们留下的“传播发明，天下大同，幸福共享”的人生意义。古书记载，轩辕出生在海外，即四川盆塞海东南边的广西，他是东北方炎帝的同母异父之弟。因为炎帝族和黄帝族之间内斗，又与东南方的蚩尤争夺和西陵氏的货物交换权，连年战争不断。在一次混战中，炎帝的母亲随逃难的人群流落到东南方，磨难求生中，与蚩尤族的一位老工匠结合，生下了轩辕。少年的轩辕聪明过人，有不少的奇思异想和发明。西陵氏的国王歧伯卸任后，按神喻到南方外邦物色寻找王储，年少的轩辕在艰苦中虽然腿带有残疾，但仍被歧伯选中带回西陵，这就是嫫祖和轩辕有早期的婚缘的原因。到西陵氏，轩辕后来并没有当上国王，而是被北方白马族绑架到了中原，并奇迹般地又当上黄帝族的首领。

#### 4) 从马云“科商”支付宝说摇钱树桑林生臂手

《淮南子·说林篇》记载“桑林生臂手，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道理是桑林表明代指市场交易使用帛币。这是从女媧--嫫祖时代到今天马云的支

付宝表现的“科商”。据日本传来的消息报道，继全面进入中国城市公交系统后，支付宝正联手欧力士，一举打入日本城市公交系统。欧力士是日本最大综合金融服务集团，双方决定从今开始，首先在日本旅游胜地冲绳试验手机，“滴”一声完成所有购票流程，快速进站乘车。这将是中国的移动支付首次进入日本交通系统，日本人出门搭公交地铁，也将被支付宝承包。“马云要来了”，日本媒体甚至不惜动用头版头条报道。欢呼终于可以像中国人一样刷机坐车了；冲绳的一家单轨铁路公司宣布，全面接入中国的支付宝。

将把原本只能读取纸质车票的自动检票机全面大改，实现可一秒读取支付宝的二维码。马云在女媧--嫫祖“科商”时代的基础上再创新科商“全球付”---支付宝已覆盖全球超200个国家和地区，服务着这个地球上超8亿的人口。从女媧--嫫祖发明蚕桑、丝绸到黄金、货币，再到马云的支付宝，这种“科商”最明显的改变是，去一个国家，不用再兑换这个国家的货币；而是拿着支付宝，用人民币结算---让全世界的货币都可以在支付宝上高效的流通，无国界、无种族、无宗教---支付宝每天十亿、百亿的货币流通，背后的本质是千千万万陌生人正因此建立信任---货币流通驱动信用流通，这样的中华文明科商模式一旦从中国复制到全世界，支付宝将成为全球人民的“移动世界银行”，放大格局，是少搞点争权夺利情商和智商结合的窝里斗。

但中科院原电子所研究员宋文淼教授，最近的博文似乎说马云的支付宝成功不算“科商”。但按“科商”定义条款中的“科商指在有正当的生计条件下，对前沿科技的争论或难题的参与，不计较个人功利追寻前沿科技原理的思考、探索、学习、资料收集、研究不懈的兴趣、恒定或组织和收获的实在---科商主要是后天获得的一种特殊的区别智商与情商概念的能力”，这其中的追寻前沿科技原理的“组织应用和收获的实在”，就包括马云类似的“科商”。

而宋文淼教授说的理由是：“马云只是一个能够用大数字计算来赚钱的人，就像我们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很多富可敌国的大商人的记载。中国历史上一直有延绵不断的‘晋商’、‘徽商’的记载。直到今天中国登上世界的《财富》杂志上留名的豪富也不少。但是所有那些‘豪富’和‘资本家’是不同的，和西方的资本家，特别是美国的19、20世界的资本家集团，从政治、经济和科学的概念上，完全不是同一种‘概念’。看起来我国的大陆地区，作为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环节中的‘资产阶级’，还没有真正的独立地站立起来过！其实‘资产阶级’是无法独立站起来的，资产阶级必须通过他的知识

分子才能独立的站立起来！就像地主阶级必须通过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才能站立起来一样”。

看来宋文淼教授没有认真研究过什么是“科商”——“科商”定义条款中还有“且是可变的”。例如，宋文淼教授在读清华大学和研究生以及在中科院原电子所工作期间，和他的清华大学同班同学比较起来，他的“科商”算是高的，不然考上研究生就不止他一个人。从他2006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实物与暗物的数理逻辑》一书来看，他对经典电磁学理论的理解“科商”是正确的，也很高的。这表明他当时的学习是“跟随国际国内科学界主流前进”，这跟他工作环境能从实验重复证明和能收集到相关资料也有关。但《实物与暗物的数理逻辑》书中，从他对以霍金为代表的现代量子宇宙学等前沿科技原理的批评，看出从政治、经济和科学的概念上，他完全不是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理解“虚数”是同一种“概念”，也不是再“跟随国际国内科学界主流前进”。这与他年纪大，也缺乏对国际科学界主流类似“超弦理论”数理深入学习的师资条件，不如经典电磁学理论有关。

### 5) “科商”改写“修昔底德陷阱”

古巴蜀盆塞海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先于古希腊、古罗马，如果把当时游团、部落、酋邦组织的大联盟，比作抗战时建立的联合国，那么今天联合国的这种多元一体，因是战争对抗的结果，其功能松散，就比不过那时。那时的“科商”就有是团结救灾、抗灾的结果。这是约公元前8000-3150年在川、甘、陕为一个大地震多发地区，长江三峡和剑门关山峡因大地震的山崩地裂有合有开，在川西北地区造成过无数的堰塞湖。如果其中有的大地震的山崩地裂，造成长江三峡山崩堵塞而剑门关山峡地裂分开的组合，引起长江断流，黄河通过渭河与嘉陵江连接的剑门关山峡分开的峡谷流入四川，古蜀盆地就有可能从堰塞湖演变为盆塞海。

而在约公元前4170-2070年相反的组合，如有大地震的山崩地裂，造成长江三峡地裂溃坝而剑门关山峡山崩堵塞的组合，引起盆塞海下面的长江三峡溃坝，而盆塞海上面的渭河与嘉陵江连接的通道剑门关山峡的重新堵塞，黄河重新向东流入大海，那么巴蜀盆地的盆塞海就会干涸，发达的盆塞海文明大部分就会向中原转移。以此类推第一次长江三峡上面的盆塞海地裂大溃坝，发生在良渚河姆渡文化产生之前；第二次同样的长江三峡大溃坝，发生在江汉湘楚文化产生之前。

而今天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此说法源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他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

的危险多数以战争告终——正如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19世纪末德国人面临的情况一样——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成就急剧崛起震惊了陆地霸主斯巴达，双方之间的威胁和反威胁引发竞争，长达30年的战争最终毁了这两个城邦。

而自1500年以来，一个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案例一共有15例，其中发生战争的就有11例。最显著的就是德国。德国统一之后，取代了英国成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在1914年和1939年，德国的侵略行为和英国的反应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在亚洲日本崛起之后，就想挑战欧洲维京人在亚洲建立起来的或者正在建立的秩序，确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秩序，最终爆发了日本以反对西方列强为名而侵略亚洲其它国家的战争。但科商说明是本无“修昔底德陷阱”的。

2015年习主席访美时，在欢迎晚宴上强调：“修昔底德陷阱”思维，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中国崛起应避免陷修昔底德陷阱。在《世界邮报》创刊号的专访中，习主席醍醐灌顶针对中国迅速崛起后，必将与美国、日本等旧霸权国家发生冲突的担忧，反驳说：“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指出西方大国应抛弃二元对立观，避免在世界制造冲突、隔阂与对抗，导致两败俱伤，而走和平共荣的道路——西方大国应反思历史、接纳中国，适当做出调整和让步，若针锋相对则难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曾出现过华夏（中华）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巴伦（罗马）文明、古印度文明等四大古文明。其实是统一的，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等早已在民族、城邦王国间的征战和残杀中灰飞烟灭，仅有中国的华夏文明，能绵延数千年，得以很好传承至今，就是证明。古巴比伦文明衰亡最早，现在所说古巴比伦文明，主要指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古巴比伦的兴衰是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1595年，古巴比伦现在在伊拉克一带，在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交汇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又叫两河文明。

公元前3000年，巴蜀人的一支族群迁移生活来到这里，被称作苏美尔人。在这富饶肥美的平原上，类似古巴蜀山寨城邦文明，分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独立的城邦国家。到公元前1895年阿摩利人灭掉苏美尔乌尔第三王朝后，建立起强大的巴比伦王国，开创古巴比伦文明。经历了300年被赫梯人灭亡，古巴比伦文明消失了。赫梯王国兴衰是公元前1595年--公元前626年；在公元前1595年，北方维京人入侵者赫梯人，灭掉古巴伦王国，建立起赫梯王国。由于常年征战，特别与埃及近百年的战争国力下降，在公元前13世纪赫梯王国解体，成若干个城市小国历经900年，后被日益强大的亚述帝

国毁灭。

亚述帝国兴衰是公元前 626 年--公元前 558 年；到公元前 626 年迦勒底人那波帕拉沙尔，建立起新巴比伦王国，历 70 年，在联合米底人攻陷亚述帝国首都尼尼微后，亚述帝国也彻底灭亡。波斯帝国的兴衰是公元前 558 年--公元前 400 年；公元前 558 年伊朗地区强大的游牧民族建立波斯帝国，经过近 20 年战争，征服了吕底亚、大夏和新巴比伦王国，成两河流域的新统治者。波斯是个落后但十分强悍的少数民族，它居然征服了比它先进的古巴比伦、埃及、印度三大文明中心，并统治近 200 年，这段历史也就是后人所说的“古希腊文明”。

马其顿王国的兴衰是公元前 400 年--到公元前 146 年；公元前 4 世纪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领导马其顿军队入侵波斯帝国，经过 10 年征战将波斯帝国灭亡，并带兵攻占埃及。在统一中亚地区后，东征占领了印度西北部，印度河流域。在波斯原有的土地上，建立起了地跨亚州、非州、欧州三大洲的庞大的亚历山大帝国。然而亚历山大大帝死后，马其顿帝国分裂成几个独立国家，各自沿着自己方向发展，到公元前 146 年马其顿被在意大利崛起的古罗马国打败而结束。罗马帝国的兴衰是公元前 146 年--476 年；罗马继承了马其顿时期的古希腊文化遗产，建立起庞大和更先进的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的古罗马帝国以地中海为中心，西至西班牙、高卢（法国）与不列颠；东到中亚幼发拉底河上游；北至莱茵河、多瑙河一带；南到非州北部古埃及，面积达 500 多万平方公里，是世古代史上最大的君主国之一。

古罗马与中国汉王朝关系密切，张骞出使西域就在这一时期。罗马后来由共和国改封建帝国，最高统治者自称皇帝，也许是学习的中国。古罗马中后期，帝国处在皇室宫廷阴谋和相互残杀，及持续对外扩张和各部族的混战中，经历 600 多年被斯巴达克斯不断反抗暴君的斗争中灭亡。这期间处于奴隶制社会的罗马民主制度得到高度发展，公元前 450 年世界第一部成文法“十二铜表法”在雅典问世，开创民主政治的先河。到公元 395 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罗马帝国，于公元 476 年西罗马帝国，被自己的日耳曼雇佣军叛变所灭。

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的兴衰是公元 476 年--1453 年中世纪时期；公元 286 年罗马皇帝戴克里把帝国一分为二，到公元 395 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乌斯，将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交给他的两个儿子。西罗马帝国首都在意大利米兰，由霍诺乌斯管理，并于公元 475 年灭亡。东罗马帝国首都定在君士坦丁堡，即现在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由阿卡迪乌斯管理，东罗马帝国后来又被称为拜占庭帝国。一直延续到 1453 年，后被土耳其奥斯曼帝国

灭亡。

古埃及文明起源於非州尼罗河两岸。在公元前 5000 年，在尼罗河沿岸的埃及人，是游牧民族。尼罗河上游叫上埃及，下游叫下埃及，以孟菲斯为界。到公元前 3100 年，上埃及国王美尼斯，统一了上、下埃及，建立起奴隶制国家。前后共经历 31 个王朝。最大特点是，多次被外来的入侵者占领和统治。古埃及文明宣告终结，是公元前 333 年马其顿亚历山大，继波斯人之后统治埃及，完全希腊化长达 300 年。公元 642 年阿拉伯帝国占领并统治埃及，直至 1258 年阿拉伯帝国被蒙古军队灭亡，所以埃及至今一直信奉伊斯兰教。从公元前 333 年马其顿占领并统治埃及后，分别被罗马，阿拉伯帝国占领，占领者早已把古埃及文明摧残得荡然无存。如今在埃及的土地上，除了法老们的陵墓金字塔，尼罗河畔的狮身人面兽，古埃及文明早已灰飞湮灭。

古印度文明起源於印度河流域，实际上在《盘古王表》记载的“叩向自身时期”---约公元前 6 2 1 0 -- 5 7 7 0 年，在远古巴蜀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的巨灵氏，句疆氏，谯明氏，涿光氏，钩陈氏，黄神氏，巨神氏，犁灵氏，大隗氏，鬼隗氏，掩兹氏，泰逢氏，冉相氏，盖盈氏，大敦氏，云阳氏，巫常氏，泰壹氏，空桑氏，神民氏，倚帝氏，次民氏等 22 支族群中，分布在青藏高原西南面地段的，就有少部分族群人在苦行僧式练功的头人的带领下，翻过喜马拉雅山脉向现在的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和印度的西北部迁移---这就是公元前 2300 年生活在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人的来源。是远古联合国中南迁的原始部落游牧民族，所以学习到文字及青铜雕像等较高水平影响的技术，进入农耕的哈拉巴文明。但在公元前 2000 年遭雅利安维京人的入侵，到公元前 1750 年时，哈拉巴文明已经消亡。现在所讲古印度文明，应是发源于恒河流域的印度文明。

但类似吠陀时代的公元前 1800 年印度南部的恒河流域，已进入“吠陀”的前期，称为的“犁俱吠陀”（从公元前 1800 年--公元前 1000 年），和吠陀后期（从公元前 1000 年--公元前 600 年），也仍然保留有远古联合国“叩向自身时期”西南面部分族群中苦行僧式练功人的影子。而且社会进化出现阶级分化，分为四个互纳尔等级的社会阶层。

就是印度持续到如今的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个种姓的原因。种姓制度形成后，不得任意改变自己的种姓，还不能跨种姓通婚。

到公元 1526 年--1858 年的莫卧儿王朝时，蒙古人巴布尔于 1526 年打败德里苏丹最后一位国王后，建立印度最大封建王朝---莫卧儿帝国。再到公元 1858 年后，印度后被英国占领沦为殖民地国家，直到 1947 年在圣雄甘地领导下，印度才获得独立。

## 6) 从袁隆平院士的杂交水稻说嫫祖科商

用“科商”研究嫫祖解答“李进难题”，把盐亭说是“嫫祖诞生地”，这与国内其它省市争“嫫祖诞生地”的各地还有一点不同，是同时分清“嫫祖教民育蚕”的民间传说，与远古历史真实“科商”进程的区别。这就是把“嫫祖教民栽桑养蚕缫丝织绸”，类比袁隆平院士引领着我国杂交水稻技术发展的“科商”在研讨。这是为啥？

在我国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古城遗址，包括公元前 3300 年至公元前 2300 年的城址、功能复杂的外围水利工程和同时期分等级墓地、祭坛，一系列以象征其信仰体系的玉器为代表的出土文物也为其内涵及价值提供了有力佐证，以及此地的农业经济在稻作之余，良渚的先民们还学会了使用多余的稻米酿酒。除了农作物之外，良渚文化的遗址中出土了不少竹编器和丝麻织品。如在六七千年前的河姆渡古文化遗址中，已经有丝织工具的图像。2019 年 7 月 6 日良渚古城遗址已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但面对另一个话题是，延续了一千余年的良渚文明虽然灿烂辉煌，为啥在公元前 2300 年前后忽然消亡？

其次，在远古连尼加拉瓜和拉伊尔的历史都流传在这些地区，虽然未使用通常意义上的货币，但已采用纺织品作临时货币。因为他们的先民有的懂得用石头打制树皮等植物纤维，纺线织网做衣服；有的懂得用棕榈叶纤维，织成精致的贡布。古埃及 6000 多年前已出现了麻布。古印度 5000 多年前已出现了棉布。另外，笔者在家乡盐亭收集嫫祖民间传说，遇到很多人对嫫祖“教民育蚕”的“科商”从哪里来？回答不出来，于是他们也如同各地争嫫祖诞生地都是大同小异：像盐亭嫫祖育蚕的故事---只从打“智商”牌、“情商”牌的真实，才被一批人认可，才能说明中国古代有科学一样---相传远古时嫫村山有一家人生下一女，取名嫫凤。当时人间还没有衣服，以岩洞栖身，吃树果野菜。嫫村山长有许多桑树，嫫凤每天摘果孝敬父母吃。

一次嫫凤没采着果子，又渴又饿又累，又不敢空手回去，就在大桑树下哭起来。哭声直冲天庭，玉帝拨开云雾看见凡间一孝女在树下伤心哭泣，就发了善心，命七彩仙将罪仙“马头娘”带下凡间，变成天虫吃桑叶吐丝，为民造福。又饿又渴的嫫凤，发现果子掉下来，拣起来放到口里一尝，又香又甜。从那以后，嫫凤每天都要出去摘桑果。时间长了，嫫凤发现有虫在吃桑叶，后来竟吐出一根丝，还做成了网子。她觉得很奇怪，就顺着网头，把丝拉出来。这样越拉丝越多。她把丝拿回去，给二老做睡垫，暖和得很。嫫凤想，要是把这些细丝编织起来，那该多好。她就再将拉出的线，以十字形编成很多方块，由小方块连成大方块，然后将大方块丝披在

父母身上。这就是人间第一件用丝织成的衣服。后来，嫫凤将摘下的网茧拿回去，不久发现蛹变成蛾。蛾子交配后，生下很多虫蛋。嫫凤把虫蛋保存起来，观察它的变化。第二年，她将虫蛋拿出来，放在父亲用竹编的浅筐内，不久变成了小虫子。她把这些虫放在家里，每天给这些虫弄桑叶喂养，等养大了后让它做网子，再抽丝。这件事一传出，邻近的百姓也来学养天虫.....笔者不是说这类民间传说、神话不真实，而是说人们都共同只看重生活的“小环境”，没有考虑“大环境”。

即使像西平从嫫祖与黄帝的婚姻考虑，认为嫫祖只有出生在河南，离黄帝近，婚姻才有可能，其他嫫祖诞生地都离黄帝远，争嫫祖诞生地就不真实。但在盐亭有关嫫祖的民间传说、神话外，笔者还收集到“天垣盘古王表”、歧伯是嫫祖的舅父、夸父精卫是嫫祖的父母等传说，而且和笔者亲身经历印象难忘---解放初笔者还在童年，陪伴母亲在村里水沟边洗衣服，常看见一群群灰黑花色的类似黄豆雀的小鸟雀，沿水渠飞翔出没，笔者问什么鸟？母亲说是叫“精卫”。母亲没有文化，是地道的农村妇女。其次，那时村里还有临时用煮饭的铁锅，和简易木架+踏板+转轮自家缫丝木机的人家，看到大人一手用长竹筷子挑动热水锅里的蚕茧，一手理丝；一只足踩踏板，不但缫丝的轮子转动，而且木架上竖立的长杆端做的木鸟也在转动，并发出“拐乖阳”的响声，如同家乡农村春天里早晨的布谷鸟的叫声。

笔者家乡农村，把布谷鸟也称“拐乖阳”。笔者好奇问大人们：“为啥装个‘拐乖阳’？”他们也说是“精卫”鸟。这种缫丝也许家乡 80 岁左右的老年人都见过。现在明白，那是纪念嫫祖的父母夸父和精卫---夸父追日一去不复返，精卫在寻找丈夫。奇特的家乡天垣远古得到的印证是，1961 年笔者初中毕业回家务农，父亲当时还是村上生产大队的副主任，他带社员在如今天垣盐埕“盘古庙”旁边的石坡修建“氨水池”。一天中午回家吃饭，父亲告诉说：“今天挖氨水池，挖出板块残缺的石碑，上面的文字真奇怪，像传说的古文字鸟爪子和蝌蚪图形”。当时农村没有文物保护意识，再加上搞阶级斗争，深怕出事，也就不了了之。2019 年年初，笔者接到成都有位女士打电话来问，她在寻找何拔儒先生曾用过的“盘古王表”龟碑的临摹拓片，还能找到吗？笔者只能告诉她：“不知道。唯一的办法是找 1995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何九盈等主编的《中国汉字文化大观》一书，披露盐亭县曾发现一个完整的上古界碑，上面刻有 50 多行类似文字的符号，与 6000 年左右的半坡彩陶刻划符号相类似。说是来自甲骨学者的天津王襄老先生公布的一块从盐亭县得来的石碑，说碑是清末四川盐亭出土的，当地称为‘蛮碑’，其文字不易辨识，而刊出供鉴



古家与研究少数民族文字者作为参考。也许与此有关”。

到底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或者说：“真有科学”，只是没有被部分现代人“发现”、“认定”和“视而不见”——如中医传统的“阴阳”、“五行”概念，如果分别引进“量子起伏”的卡西米尔平板对效应和“量子交流”的“柯召-魏时珍猜想”理论——“空心圆球内外表面不撕破，能将内表面翻转到外表面”，请证明——联系智能手机和二维码支付——手机类似一个“膜面”，照扫的商家的二维码平面类似平行另一个“膜面”——“量子信息交流”移动支付的“新型卡西米尔效应”的兴起，使用手机刷卡坐车、买东西等都很便利——也使中医理论得到长足理解。对历史不懂，对中医不懂，对世界医学和基础科学前沿现状不懂，偶尔“崇洋媚外”、“仇洋排外”——汪品先院士说是有可能治理的。

联系华夏文明“嫫祖教民育蚕”，即使《淮南子·说林篇》记载“桑林生臂手，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以及南宋《路史》称：“伏羲化蚕，西陵氏嫫祖为帝妃，始教民养蚕制丝，以供衣裳”，即约公元前 5070-4170 年立足山海的女媧氏时期，已发明桑蚕缂丝，并使用帛币，也还不是很普遍。正如中国水稻栽培已有七八千年的历史，然而袁隆平院士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发现一株野生的雄性稗育稻开始，引领着我国杂交水稻技术的发展，22 年间为我国突破增产 3300 多亿公斤粮食，仍不失为一位水稻发明家，而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5000 多年前的嫫祖在女媧之后普及发明桑蚕缂丝，正类似今天的袁隆平院士。按“科商”定义，追寻前沿科技原理思考，要么是有理论创新研究的提出，要么是有组织应用收获的实在。从后者说，袁隆平院士和嫫祖元妃都有“科商”。

从欧洲“维京人”与中华“天下人”的“科商”划段区分来说，西方资本主义“以工促农”生产方式的“科商”诞生和对外扩张，才打破嫫祖“以农带工”生产方式的“科商”——嫫祖开拓桑、蚕、茧、丝、绸、销，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实现农业与工业的现结合——这种“以农带工”生产方式的“科商”，从嫫祖延伸到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既然不能指望传统的“以农带工”或“以工促农”生产方式的“科商”，搞出石破天惊的技术和消灭战争，“维京人”与“天下人”的统一，只能是如 2019 年 7 月 8 日第八届世界和平论坛在清华举行，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出席开幕式并致辞讲的：新中国成立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全面小康的历史巨变，迎来了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主张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毫不动摇地推进经济全球化，构建合理、有效的共商、共担、共治、共享国际秩序。现

在网上有篇公号文章《请暂时遗忘袁隆平，我们应该认识一下这些给我们米饭吃的人们》，奇文共赏想说的的问题是：袁隆平“杂交水稻之父”名不副实；“给我们米饭吃”的人，除了袁隆平还大有人在；袁隆平的成就被“过度放大”，应该被“暂时遗忘”，把“舞台”留给其他科学家。

杂交水稻属于基因学说原理的应用，袁隆平虽然不是基因学说原理的提出者，但他在这方面的“组织应用和收获的实在”，即使不说是“科商”，那么他在对“基因学说原理”的理解、敏锐的洞察、超强组织和坚定执行上，有没有过人的“科商”，让业界对袁隆平佩服的？四川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所长李平教授说：受历史环境因素影响，我国当时与国际科技界基本为“零交流”。袁隆平院士的原创性发现，在于开创了杂交水稻学科和杂交水稻产业。扬州大学潘学彪教授说：“1971 年找到雄性不育系，1974 年找到三系配套模式，此后成立‘全国杂交水稻研究协作组’，1976 年我国就实现了三系配套大规模制种。不到六年时间，在国际上都尤为惊人”。安徽农科院研究员朱启升教授说：“袁先生是杂交稻研究领域的‘旗手’和战略家。在他思想指引下，科研工作者才知道怎么去寻找和创造不育、保持、恢复系等材料，进而培育杂交稻组合”。

以上专家虽然肯定了袁隆平在杂交水稻学科和杂交水稻产业上的功绩，但并没有说明袁隆平在“基因学说原理”的“科商”高过他们——其实“科商”定义已经挑明存在“意识形态划线等暴力相威胁”。“以苏解马”以“东西方对立”为“科商”，并没有获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存在“虚数”物质超前认识的“科商”，而是拱手把一些自己同胞的前沿科技原理的发现，送给西方，这是前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例如，米丘林学说部分的“组织应用和收获的实在”——短期环境改造能改变物种的“李森科发挥”，能否打倒代替西方的“基因学说”，并没有通过“东西方交流”的“进攻性马”类似华为的实践，就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强行推开，后来以失败告终；在我国至今在存在反相反量反中医的极端“科商”者，而不重视类似“柯召-魏时珍猜想”的引力量子学创新等，也是“以苏解马”遗留下的惯性。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是百多年西南大学最杰出的校友，为中国和世界的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的、实实在在的贡献。他的“科商”过人在哪里？实际就在对基因学说的理解上，袁隆平懂英文，他在大学的外文书刊中自学知道摩尔根的理论，遗传基因在染色体上的位置很稳定，但麦克林托 1947 年提出的基因可移动的“转座因子”理论，是 1932 年发现类似我国农村说的“花包谷”——某些玉米的颜色会跳跃一样改变位置，而麦克林托已潜心

观察了 15 年。西南农学院一位姓蒋的教授，1930 年代留学日本掌握家蚕基因育种，回国后在西南农学院讲授遗传基因困难重重，直到 1957 年被错化“右派”放去“劳教”。1980 年代蒋教授获“平反”已经残废。1950 年代初蚕茧有两种颜色：黄色和白色。而野外蝴蝶的颜色更是多彩。这对大学时代袁隆平的“科商”是一次激发。2016 年袁隆平院士谈过“转基因”，有人说他想搞“转基因食品”。其实，“转基因”分为“人工基因剪接”和生物间自身选择。上世纪七十年代袁隆平开创发现一株野生的雄性不育稻，是属于“后者”；至于人工基因剪接的“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问题？不是袁隆平的科商主攻的对象。

都世民教授对笔者说：“科商概念在百度网没有这个关键词，一个科学家能否被社会承认？是天时地利人和所决定，不是贡献所决定。事后讨论科学家的科商概念，很难说清楚”。都世民教授说对了一部分——百度网不是科学编写的垄断，况且百度网本身就有一种封闭性之嫌。其次科商的定义本身就强调后天的学习，事后讨论科学家的科商，更具有天时地利人和复杂分化的说服力，而不是“学霸”论天下。例如西南大学公布的袁隆平的学籍卡和大学成绩单，袁隆平 1950 年入读西南农学院（后并入西南大学）农学系农学专业，1953 年毕业。他在大学 4 年 8 个学期的平均成绩（百分制）是：76.5、70.8、74.9、71.3、72.1、76.4、73.8、75.5。重要的专业课成绩是：植物学（一上）65，（一下）75；农场实习（一上）67，（一下）75；作物栽培学（二下）75；新遗传学（二上）63（二下）63；遗传育种学（三上）72。为啥袁隆平不是“学霸”？“科商”有眼。

1953 年大学毕业时，袁隆平被分到了湖南安江农校。在当年大学生资源稀缺的大背景下，这算不上一个好单位。如果他是“学霸”，那么也许会与他同届毕业的学霸们一样，很可能留在大学担任老师。袁隆平没成“学霸”却“科商”有眼。西南大学教授、国际著名蚕学专家向仲怀教授说：“成绩并不代表实际能力”。但卢晓东博士不赞同向仲怀教授的解释，他说：“我们不能说学霸们的实际能力不高。这个简单的评论并没有抓住科商要害”——“米丘林学说”是遗传学中的“范式陷阱”——卢晓东博士对“以苏解马”一针见血。

卢晓东博士说：“1949 年后，米丘林学说很快成为中国国家公认、唯一正确的遗传学理论，立即进入了农学、植物学、生物学等高校教学中，成为相关学科的主要范式”——米丘林学说构建的“范式陷阱”危害是：“学生在既有的旧知识范式之中学习，他们学习越好、掌握知识更精确、考试成绩越高，不断在旧范式中取得成功的同时，很可能在认

知基础上陷入旧范式越深，越难以跳出旧范式而有所创造”。但对袁隆平来说，这个范式陷阱渗透在“新遗传学”等农学专业的核心课程中，很多考试成绩优秀的学生，在认知方面深陷其中而难以自拔。非常幸运的是，袁隆平没有陷进去。“米丘林学说”的范式陷阱，让中国和苏联的农学、生物学等相关专业，20 几届的学生都受到影响。那些基础扎实、考试成绩优秀的学生，更容易陷入其中而难以自拔。他们可能精力充沛、能力高强，但却因为少了对教材、教学和理论的怀疑，而在基本方向上形成了错误认知，因而难以在后期研究、实践中，轻易地改变方向。这就是范式陷阱，对创造性的制约——但“学霸”不会认账；袁隆平一旦引路，他们跟上后就争功劳。

再看争嫫祖诞生地，很多人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但若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从“嫫祖教民栽桑养蚕缫丝织绸”是说不过去的；若说中国古代没有产生符合现代人“口味”的“现代”科学，是说得过去的：没有“盘古王表”，就没有“中国化”——这与从古到今人类开创科商凝结的科技原理起的变不变有关。“盘古王表”联系女娲造人和伏羲造八卦等传说，可以认定人类开创科商凝结科技原理的起源时间，最早是在“立足山海时期的约公元前 5070-4070 年年”的巴蜀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的远古联合国时代，代表人物就是女娲氏和伏羲氏。从远古联合国的“全球移民”、“世界贸易”来说女娲、伏羲等传说英雄人物，他们类似既是远古联合国的“秘书长”、国王，又是盆塞海世界贸易中商船商队的船长；山寨城邦的首席执行官、帮主、寨主；还是市场经济的商人、老板、厂主。天时地利人和强迫他们善于长期的仰观俯察，对发现发明科技原理是小事一桩。

例如，玻璃透镜的发现发明可从观察露水珠的放大现象，到类似四川平武等大山中有天然的水晶石矿，联系河流中有冲击出的鹅卵石，同理，鹅卵石状的天然的水晶石球，女娲、伏羲等船长、商人、老板、厂主也就能捡到。做望远镜和放大镜是商品制造，以及盆塞海洋中商船商队的需要，需要对发现发明出望远镜和放大镜是非常可能的。再具体地说，“女娲造人”类似“物质造人”、“基因造人”、“大量子论”，这也许是看到蚕蛾对尾交配、产卵、孵化小蚕、吃桑叶变大蚕、老化作茧子等变化循环，使女娲明白的“桑林生臂手”，而不是“神创论”。生活在约公元前 5070--公元前 4171 年四川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远古联合国的鼎盛时期的伏羲，在教人结网捕鱼，遇到湖塘水面上的旋涡，以及教人制土陶生火做饭，看到锅中沸水的翻滚时，就已领悟和觉察到了圈态的线旋。为了表达和传授这一数学概念，他动了不少脑筋，例如他把摆卜爻

文字用的草节茎棍带来的薯茅草叶，圈起来扭转比划，终于发现了一个我们不妨称之为伏氏几何的智慧现象。用基础研究的话来说，就是“代数几何”---湖塘水面上的旋涡、锅中沸水翻滚的圈态线旋，演变对应易经的太极图徽所积淀的东西，现在反过来倒推再看太极图，这种“太极体”实际是今天基础研究的“量子”和弦论圈体。而摆八卦卜爻阴阳用的三条、六条横放的平行线，取两条平行线对应今天基础研究的“卡西米尔效应”平板和虚量子起伏波动看，实际才能真正解释清楚《易·系辞》中说的一些互联互通的符号动力学效应。

再解释六七千年前的河姆渡遗址中已有丝织工具的图像；延续了一千余年的良渚文明，为啥在公元前 2300 年前后忽然消亡？道理是约公元前 5070--公元前 4171 年的科商产生科技原理的中心，在远古联合国的巴蜀盆地。河姆渡和良渚文明说到底还是盆塞海溃坝，古长江水流向东入海的河姆渡和良渚地区，灾难造成远古联合国派大量的能工巧匠和劳力、物资，到东海沿岸地区救灾，团结起那一带的古人修建城墙、排水渠等大工程，以及生活、生产物资的丰富、鼎盛，留下内部的阶层分化和社会矛盾等痕迹。等到公元前 2300 年前后在盆塞海彻底干涸，迁徙转移到的中原文明，女娲、伏羲等的“科技原理”变为老子、孔子等的《易经》、《道德经》和《黄帝内经》等阐述的“0”变 1、2、3 等万物的“无中生有”、阴阳五行、气血经络等隐、显性传输，以及巴蜀的“宽窄学”。再到新中国解放产生“柯召--魏时珍猜想”的类似庞加莱猜想外定理、量子“三旋理论”等。没有科商产生科技原理的中心的河姆渡和良渚地区文明，消亡也很正常。

这也正像古希腊文明的出现科商产生科技原理的中心，也与在约公元前 5070--公元前 4171 年，就有巴蜀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远古联合国时代的一部分产生科技原理的科商领军人物，迁徙转移到古中东、埃及和古希腊、罗马等沿海、沿江地带一样，即超越了我国中原文明而产生更符合现代人“口味”的“现代”科学解读一样。

### 7) 从任正非总裁的华为说嫫祖科商

科商和智商、情商不同，科商类似生物基因作用从古到今是不变性。变的类似只是生物的层次、水平、发挥和组织应用收获的实在性。

科商是自然进化阶段的产物，受控自然全息的约束---具体起源于约公元前 5070--公元前 4171 年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远古联合国的女娲、伏羲鼎盛时期，所以科商这以后组织应用收获实在型居多。例如，量子起伏的“藏象论”和“0”变 1、2、3 等万物的“无中生有”、阴阳对称破缺的“藏数论”等，是不分维京人和“天下人”，国家、民族、人种，即使语言、文字不同，表达的方

式方法不同，但凡是被时间、历史、众多检验证实的人类自己发现发明的基本科技原理、公理，类似自然国学分为的“藏数论”和“藏象论”，本质都是统一的。从任正非总裁的华为说嫫祖的科商，是因为如果说女娲时代已经出现桑蚕发明，嫫祖是在这基础上有类似袁隆平院士搞杂交水稻等发明的提高推广，解决了广大人群吃饭难的“科商”；同时也类似华为任正非总裁在 2G、3G、4G 手机的基础上，组织攻关推出 5G 智能手机和刀片式基站，铺平了东西方高科技信息交流差距的“科商”一样，但嫫祖科商似乎与“化干戈为玉帛”更直接一些。

赵蕤为盐亭嫫祖山嫫轩宫写的《嫫祖圣地》称：嫫祖“生前首创种桑养蚕之法，抽丝编绢之术，谏诤黄帝，旨定农桑，法制衣裳”。这里嫫祖的“科商”即使超群，但当时嫫祖面对发明野蚕家养，还有《嫫祖研究》一书中《嫫祖年谱》称：“公元前 3140 年，嫫祖轩辕寻找马头娘、菀窳。嫫祖参与发明养柞蚕”。以及元朝王祯的《农书》讲：“汉祭菀窳妇人、寓氏公主，蜀有蚕女马头娘，又有谓三姑为蚕母者”等，说明当时和以后与嫫祖竞争“教民养蚕制丝”就有“菀窳妇人、寓氏公主、马头娘”等很多杰出妇女，也说明李进难题“嫫祖诞生地除绵阳市盐亭县外，国内其它省市也还有争诞生地的”，事出有因---类似学雷锋。而且嫫祖与“菀窳妇人、寓氏公主、马头娘”等教民养蚕制丝的很多杰出妇女的科商还有一点不同的是，《嫫祖年谱》称：“公元前 3126 年，嫫祖谏诤黄帝，化干戈为玉帛，重新确立发展经济的道路.....公元前 3124 年，为发展蚕桑，嫫祖轩辕北上巡视东北三省。公元前 3123 年，为发展蚕桑，嫫祖轩辕南巡视江西、湖南.....”---化干戈为玉帛，永远的嫫祖，产生了永远的“科商”。

这一点，今天在“天下人”任正非体现得更明显---永远的任正非，永远的“科商”，这可以从 2018 年中美贸易战以来，华为总裁任正非接待中外媒体记者发表的一系列谈话来体会。例如他说：

A、欧洲在科技基因上还是非常强大的。人工智能的根本是数学，世界上数学最发达的是两个国家：第一是法国，第二是俄罗斯。纪尧姆·格哈雷问：虽然法国有这么多名研究者，问题是过去 40 年间没有一家公司成为巨头，而华为、谷歌、阿里都是在过去 40 年间崛起的，您怎么看？任正非说：基因还在，但是基因不能自动转变成组合体，这就需要企业家和政府合理地推动。我们的生产系统是使用法国达索的软件，怎么说欧洲不伟大呢？是很伟大的。你们去看一看我们的生产线，回去采访达索，怎么华为买你们的产品用得那么好？法国是一个具有良好投资环境的国家，法国以数学为中心，是世界上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地区，这与拿破仑在几

百年前确定“数学立国”有很大关系。人工智能的本质就是数学，我们在人工智能上要加大发展，在法国的投资发展还会继续加强，继续深入。现在我们刚刚初步体会到人工智能对我们的影响，我们手机的照相技术目前是世界上最好的，其实就是法国的数学家设计的，用数学的方式合成图像。未来人工智能将会在更广泛的领域发展，还要吸纳更多优秀的数学家加入到我们公司。“一切新产品和新工艺都不是突如其来、自我发育和自我生长起来的。它们皆源自新的科学原理和科学概念。新科学原理和科学概念则必须来自最纯粹科学领域持续不懈的艰难探索。如果一个国家最基础的前沿科学知识依赖他人，其产业进步必然异常缓慢，其产业和世界贸易竞争力必然极其孱弱”。

B、任正非的“科商”再一次昭示：一个最基本的规律就是划时代的科技和产业创新，必定源自划时代的思想创新。唯有创新的思想才能激发创新的技术、产品和服务。思想创新的重要性高于一切。正如伟大的法国科幻作家儒勒凡尔纳（1828-1905）所说：凡是人能想到者，必有人能实现之。任正非总裁说：幸亏世界上还有爱立信、诺基亚能担负起人类 5G 时代，我们是高兴的。排斥我们的国家也不会没有 5G 使用，所以就像我赞赏苹果一样，我也要赞赏爱立信、诺基亚。严格来说，爱立信、诺基亚是我们的老师，交换机是一百多年前爱立信发明的，诺基亚原来是做橡胶木材的公司，上世纪是全世界手机做的最好的公司，都是我们的老师，我们要尊敬老师。5G 标准来自土耳其教授在 2007 年发表的一篇数学论文，我们投入了几千名科学家和专家来分解这篇论文，全世界其他公司也投入了几万名科学家和专家，努力去做出 5G 的标准来了。土耳其教授写了一篇论文，但他不知道论文有什么用，然后全世界的科学家和专家一起把它做出 5G 来，这位土耳其教授本人也感到震惊。

C、任正非总裁还说：5G 将来对于人工智能来说就是一个工具。三位人工智能之父都在加拿大，他们已经是人工智能理论的领袖了，为什么加拿大不能成为人工智能技术的领袖国家呢？如果加拿大在人工智能的应用上形成能力，假设人工智能辅助人类提升十倍的生产力，那么加拿大就相当于变成 3 亿人口的工业大国。2017 年我去加拿大，三位人工智能之父，我见到了其中两位，另一位当时不在加拿大。现在美国、中国都在人工智能领域猛追，加拿大有先发优势，一定要抓住这个战略机会。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改变在加拿大大规模投资的策略。记者问：在华为渥太华研究所，有三位比较资深的人士，他们三人以前都在北电工作，包括他们的下属也有一些是在北电工作的。华为是不是把北电的技术偷过来了，并把他们剩余的人招过来了，

然后在加拿大设立自己的研发机构，并逐步发展壮大？任正非总裁说：是北电破产以后，我们招聘了北电的一些人员。那时北电并没有现在的技术，只是有人才，人才失业之后要再就业，这永远都是必须的。北电破产的时候，实际上世界连 3G 都才刚刚开始，经过 3G、4G 到 5G，这些人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了，作为人才，他们头脑里的思维方式是有贡献的，但没有知识产权问题。北电当年最伟大的贡献，就是把光传输容量提高到了 10G，但由于 IT 泡沫的破灭，把北电拖垮了。我们现在的光传输能力，已经做到了 800G。当然，我们肯定是踏着前人的脚步往前走，但这没有知识产权问题，是新的创造。我们曾经想收购北电，最后因为商业考虑也没有做。

## 8) 从郭光灿院士的量子通信说嫫祖科商

从嫫祖公元前 3083 年随轩辕南巡死在路上以来，“天下人”的科商坐了 5000 多年的冷板凳。发展进化到今天的“科商”是与“量子霸权”相连。一个尖锐的问题是，马克思和列宁开辟了 20 世纪人类革命的新纪元，但马克思和列宁承认数学中虚数存在的“科商”，并没有得到“以苏解马”的重视，以致造成类似反相反量反中医的极端表现的“反科商”，被当成硬“科商”，作为对抗所谓“伪科学”的口实，在老中青一代一代人前仆后继出现。这种发展演变中的转折，在维京人和“天下人”早期内部出现的微妙分歧不大。

例如，东西方古代的“炼丹术”实验，以及“天下人”太极、阴阳和维京人的“以太”等概念，虽说也藏象藏数类似与科商的基本科技原理、公理有联系，但与 16 世纪开始成熟起来的科商，根本的不同是后者把基本科技原理、公理和实验方法广泛交给人民群众去学习、重复，且成效被精炼的基本科技原理、公理和实验方法，已经是通过学校专科、专业机构、专门书刊，在一代代没有间断地传授、仿效发展，并有国家、国际的权威机构的监督或评判。即使远古嫫祖发展女媧的养蚕制丝的科商，也不同于女媧。嫫祖是广泛交给民众去实践收获，所以嫫祖比女媧被认可为“先蚕”，也才能化干戈为玉帛。

当然上海交通大学李侠教授的《大学是一段用来修补世界观拼图的安静时光》文章另有分析，他说：世界观的结构由真理之维，伦理之维、审美之维这三个要素的圆面积交集的外延，构成了一个人的认知视界（或格局）。因为事实大体分为实证事实与哲学/概念事实；实证事实大多是源于生活经验，数量少质量不高；相反来自哲学/概念事实则依赖于认知格局的大小。如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与托勒密认为：完美圆周运动事实和匀速运动事实，这些都是哲学/概念事实。正是这一套世界观体系支撑了

古希腊的科学认知，相反中国传统文化则缺少这些哲学/概念事实，这一切源于我们文化所塑造的世界观拼图的差异。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16世纪开始），西方人的世界观拼图面积远超我们的世界观拼图面积。

李侠教授说：世界观拼图构成的圆面积越大越好。如以亚里士多德理论为基础形成的世界观拼图的面积  $S_1$  小于以牛顿理论为基础形成的世界观拼图的面积  $S_2$ ，而  $S_2$  小于以爱因斯坦相对论等成果为基础所形成的世界观拼图的面积  $S_3$ 。还可推论：宏观层面拥有世界观拼图面积越大的时代、国家，社会文明程度、科技发展与人类创造力的发展都呈现出明显的优势，反之亦然——拿中国的教育来说，长期鼓励与重视数理化等学科（真理之维的内容），导致中国学生在这个维度上的表现不输给世界上任何国家，但在伦理之维与审美之维的教育方面薄弱，导致中国学生的世界观拼图结构扭曲并出现认知格局严重狭窄化倾向（即圆的面积较小）。李侠教授说反了，要害是回避了“科商”与政治的联系和区分。政治曾宣传有权的幸福，无权的痛苦。

从郭光灿院士的量子通信说螺祖的科商，是他2019年7月1日在上海“观察者”网发表的《坐了20年冷板凳，我们离“量子霸权”还有多远？》一文——这是他在《中国经济大讲堂》的演讲，他把“科商”发展演变中的转折，联系“量子霸权”说到了量子信息计算、传输的要害。但说螺祖的科商从螺祖上溯到伏羲、女娲，他们都并不知道现代生物学的“基因”概念——这类似今天量子纠缠信息隐形传输中，存在里奇张量引力量子虚数超光速一样不可思议。但科商是一种奇妙的人类社会相互依存的进化集群现象——不是“穷则思变”闹革命了或致富了，就一定有科商。作为一种基本的科技原理、公理，看似简单，但即使国家有几亿人、时间有数千年，也难“冒”几个。

其次，政权和掌权者有换位，“科商”发展也会出“反科商”，但这不是暴力和法院、检察院能解决的，而是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是解决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教导，给机会实践见分晓。这也正是中科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郭光灿教授与潘建伟教授等团队之间，存在认识分歧解决的归宿，也是遵循从螺祖上溯到伏羲、女娲的“科商”与后代“反科商”之间存在认识分歧昭示解决的归宿。因为郭光灿院士说：什么叫量子，凡是运动规律遵从量子力学的那些客体，统统叫量子。一个遵从牛顿力学、电动力学这经典物理的，叫做经典世界，这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个确定的世界，而量子世界是一个不确定的概率性的世界。只有通用量子计算机得到实际应用，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宣称量子时代到了。这是郭光灿院士才认可的“确定的世界”。

但郭光灿院士似乎并不认可潘建伟院长说的事实——2016年8月16日，经过中国科大、上海技物所、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光电所、国家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等十多个团队历时5年的合作，“墨子号”成功发射，提前一年完成星地量子纠缠分发、星地量子密钥分发、地星量子隐形传态三大既定科学目标；近期潘建伟院士与范桁教授两团队合作，研制出24个比特的高性能超导量子处理器，超过20比特的相干调控，为研制量子计算机迈出重要一步。

但问题类似郭光灿院士不认识量子“奇点”的不确定性——类似王春教授的《星旋态宇宙模型》一书，开篇就说“奇点”并不完备：“自然力的二重性足以抹平‘大爆炸宇宙’的奇点”——2011年6月18日王春送书给笔者，应该感谢。王春教授是江汉大学余其云教授曾教中学时的学生；余其云教授1963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物理系，现在已经退休。余其云教授说：王春利用十年的业余时间写出这本书，“十年磨一剑”的执着精神难能可贵——王春早在青年时代起，就自学《周易》、《黄帝内经》、《道德经》、《论语》等古代典籍，同时关注现代物理学前沿的进展，为写好这本书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王春教授自己也说：“智慧并不产生于学历，而是来自对于知识的终身不懈的追求。作者在写作过程中碰到的最大困难之一，就是在没有完全掌握现代科学知识的情况下，又必须涉足一些前沿的科学问题。倘若学历高一些的话，可能不会感到如此艰难。如果说‘智慧的第一涵义是创造力’，那么作者的创作灵感，正是来自对于知识的不懈追求，对人类科学事业的热忱关注”。王春教授是亿万中国奋斗者的缩影；他的话也解答了“科商”难题：重视有机自然观和宇宙观的中国，为何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反之机械自然观和宇宙观的西方，为何能够产生近代科学？因为“在没有完全掌握现代科学知识的情况下，又必须涉足一些前沿的科学问题”，不能成为“量子霸权”旗手。

潘建伟院长就说自己在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后，到奥地利科学院量子隐态传输世界权威蔡林格教授指导下学习过。他还说：照此，他也是将优秀的学生有针对性地送到国际顶尖团队学习和开展合作，再将掌握的关键技术带回国内。如陈宇翱去德国马普所、赵博去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研究超冷原子量子调控，张强去斯坦福大学研究参量上转换探测器，陆朝阳去剑桥大学研究量子点光源，张军去瑞士日内瓦研究单光子探测器……潘建伟回忆说：“当时国内实验室很缺人，不把人送出去学习的话，将来这把火肯定烧不旺。所以尽管国内对人才极度渴求，还是把人送走了……如今随着这批年轻人的集体归国，这把量子通信的火真正烧起来了，他们也

个个成为独当一面的研究室负责人。而研究超导量子计算的朱晓波，也是从兄弟单位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加入创新研究院的。朱晓波团队已成功实现 12 个量子比特的多体真纠缠态“簇态”的制备，刷新了超导量子比特纠缠的世界纪录”。

朱晓波自己也说：超导是目前最受关注的量子计算方案之一，也是谷歌、IBM 等商业公司投入最大的方案。在创新研究院，朱晓波除了自己的学术团队，还有一支近 30 人的团队为他们提供支撑服务。“创新研究院的作用就像土壤”。潘建伟说，“在单个研究小组中，很多种子只能长成花盆中的盆景，但在创新研究院多学科交叉融合，和协同创新的模式下，我们希望每颗种子都能长成参天大树。”

读《星旋态宇宙模型》一书，深感王春教授是亿万中国奋斗者的缩影。笔者近 10 年之所以读完《星旋态宇宙模型》书后，并没有给王春教授回信，是怕伤害他---“奇点”不是“在没有完全掌握现代科学知识的情况下”能抹平的。笔者同他中学时代的班主任余其云教授一样，“文革”在武汉读大学。在当时大学的课本里是读不到前沿科学最新介绍。而且武汉市 31 中李育德老师还在重庆大学的《新物理探讨》杂志上发文说：霍金的黑洞辐射理论只对西方各国的能源危机有吸引力。笔者懂得“奇点”要分清环面与球面不同伦，是自学《漫谈拓扑学》、《微分几何》、《20 世纪场论的概念发展》等书后。

王春教授说：“星旋态是反对称的宇宙模型，体现了无限可分和无法可分的全息原理”。但“奇点”正好体现了无限可分和无法可分的全息原理。例如，曹天予教授“文革”前在北京大学读书也是反前沿科学的，“文革”后到英国和美国等大学学习、工作了 20 多年，他写的《20 世纪场论的概念发展》一书，除开拓拓扑学和微分几何定义球面存在奇点，环面不存在奇点的讨论外，提到类似环面中心的空白空间的不可分，也是一类“奇点”---除去黑洞视界的“裸黑洞”，其中心的“无”是无限的不可分也属于是奇点。由此“星旋态”和“星旋体”的自旋是三种自旋：体旋、面旋、线旋。线旋与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庞加莱猜想外定理即“柯召-魏时珍猜想”的空心圆球内外表面可不撕裂翻转有相同之处；且与毛主席倡导的“物质无限可分”讨论希望的“科商”相符，但为啥千百万元的学者还是反其道跟之？

看王春教授说：“在西方，玻尔的‘互补性’、爱因斯坦的‘波粒二象性’、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哥德尔的‘不完备性’都是令人费解的、一时难以接受的新观念，其影响力是革命性的：导致了确定性的终结，动摇了近代科学‘主客二分’的基石。在东方，这种革命性的观念之所以被充分理解、欣

然接受，其原因是它与《周易》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世界观不谋而合。于是，一些思想家、科学家起头从东方科学文化传统中寻找智慧。21 世纪，最古老的东方科学与最前沿的现代科学将形成跨时空的完美链结”---但王春教授的“星旋态”和“星旋体”才只是一种球面拓扑自旋态---实际是玻尔、爱因斯坦、海森堡、哥德尔的科学革命的“反其道跟之”。但这能说吗？

我国的科技评奖有几十个项目，都是实在的，都有贡献，都应该获奖。而且基础科技原理获奖还是排在前面的，然而却少得类似可以忽不计。这不是这种科技评奖不对。很多人业余喜欢打麻将，不打麻将的喜欢写诗，这无可非议。而且这正是中国很多人，在伦理之维与审美之维的教育方面，并不是李侠教授说的薄弱的和安分守己的体现。

在《坐了 20 年冷板凳，我们离“量子霸权”还有多远？》一文中，郭光灿院士说的第一个例子：“量子纠缠可以实现超光速的通信”，正是科商在目前我国难说的“纠缠”。但郭光灿院士说：量子纠缠的例子是 A 和 B，A 自旋要么向上，要么向下，只有两种可能，那它自旋到底是向上、向下？不一定，不确定。所以它就有 50%的概率向上，50%的概率向下。量子世界就是不确定的，但不管 A 和 B 的自旋在哪儿，它们两个自旋总是相反，A 已经说是向下了，B 肯定向上对不对？如果 A 不测量，那么 B 有一半概率向上，有一半概率向下。先测量 A，B 发生变化，说好像应该有个什么东西过去才会变，那我们现在不做这样的实验，我同时测量 A 和 B，同时测量没有先后了，没有因果了，我不需要什么传过去了，我不需要任何信息传过去。同时不传什么，发现的结果一样，A 只要向下，B 一定向上，A 要向上，B 一定向下，它们总是相反，纠缠就是这个性质。是一种量子关联。所以纠缠幽灵它的本质。有人说我们到纽约去，以后不用买飞机票。他根据的是一个实验叫做量子隐形传态。但郭光灿院士的此说不全。

然而郭光灿院士说：有个物理科学家说把经典跟量子一块儿来用就可以做到量子信息隐形传输。但这个里面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纠缠、一个是经典通信。有经典通信就不会超光速，所以隐形传态，你把一个态传到那儿去，绝对不可能超光速。这是郭光灿院士反对“虚数超光速”，不提彭罗斯的量子引力信息里奇张量效应，存在“虚数超光速”量子信息隐形传输。彭罗斯的量子引力信息韦尔张量效应，是不能实数超光速的量子信息隐形传输。郭光灿院士把经典跟量子一块的量子信息隐形传输，与量子水、量子按摩、量子鞋垫、量子医学等假的市场量子产品广告相提并论。但郭光灿院士称的迎接的“第二次量子革命”，到来的量子信息技术却

类似实数超光速的伪技术。

例如，在郭光灿院士的《爱因斯坦的幽灵---量子纠缠之谜》一书中，在“超光速狂想曲”这章中的“探寻绝对”这一节，他提出“波函数坍缩过程的规律很可能违背相对性原理，从导致绝对参照系的存在”问题，可成为今天中国最新的既批爱因斯坦又批玻尔---用非连续性批爱因斯坦，用“最小本体论”批玻尔---这也是该书最精华也是最矛盾之处。蒋春暄高工评论说：郭光灿院士这本书是讲“量子通信、量子计算机等广泛应用，是和超距、超光速联在一起的”。

郭光灿院士念念不忘的“时间分割”和“实数超光速”问题，涉及量子信息隐形传输的所谓 EPR 源现象---从 EPR 源被分成纠缠对的两个量子态，分别到发送者和接收者手里后的时间，接收者是在发送者之前。所以，发送者能把未知量子态与自己一方的 EPR 源缠结量子的合并操作，只能在接收者接收到自己一方的 EPR 源缠结量子的时间之后---这两者静止同时性的非纠缠性时间差，正是郭光灿院士论“时间分割”和“实数超光速”问题的基础---但是对于沿着接收者到发送者方向高速行进的观察者来说，彭罗斯认为，则应是发送者测量未知量子态与自己一方的 EPR 源缠结量子合并的时间，是发生在接收者接收到自己一方的 EPR 源缠结量子的时间之先。

其原因是，彭罗斯首创了量子发散态 (U) 过程和收缩态 (R) 过程的自主知识产权理论---U 过程对应韦尔张量，R 过程对应里奇张量。于是彭罗斯用韦尔张量和里奇张量清楚地简化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引力方程，也能清楚地说明量子退相干和量子宇宙学的一些难题。当然彭罗斯也没有用虚数超光速直接解释纠缠性量子幽灵，他是把虚数超光速隐藏在量子发散态 (U) 过程和收缩态 (R) 过程的纠缠性解释中的---这代表了 1935 年爱因斯坦的原始 EPR 效应图像。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国际前沿转向量子信息学应用型学科的研究，实际是用虚数超光速直接解释的纠缠性量子幽灵的。因此彭罗斯才把发送者的测量发散 U 操作点，和使得位于接收者的 R 态收缩同时点的这两点的连线，是用过去时联系的非因果量子纠缠态的点画线标注的---这实际就是一种虚数超光速解释。这条过去时联系的非因果量子纠缠态连线，实际在哪里？我们说，就在“点内空间”，它变成了“点内空间”类似毛毯一样折叠的连续的多层膜路，或者一种额外维。这里的“点内空间”，也类似人们常说的“赛博空间”。

彭罗斯教授与郭光灿教授分别代表的是 20 世纪 90 年代后量子信息学应用型的两类对立研究，但因超光速是解释纠缠性量子幽灵避不开的话题，郭

光灿教授却没有掌握类似量子发散态 U 和收缩态 R 的自主知识产权理论，也没有用虚数超光速解释的“点内空间”、赛博空间一类像毛毯一样折叠的膜理论、额外维理论，造成我国“量子力学二次革命”论坛长期部分学者之间不断地死斗---“以苏解马”哲学自主知识产权的实数超光速传留解释，是我国基础科学落后的原因。

### 9) 从毛主席说嫖娼科商与“李进难题”解

本文已经写得够长，应该收尾了。笔者还想说的是，之所以把“科商”联系李进副省长提出的“嫖娼诞生地除绵阳市盐亭县外，国内其它省市也还有争诞生地的”难题，能回答最后的确证原理，是笔者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毛主席生前长时间发动和开辟的“物质无限可分”的极有意义的讨论---它使笔者在学校读书和在参加工作后，没有逼迫地在课外和业余，主动去自学前沿科学的许多专业基础知识和最新的研究文章。毛主席生前十分强调重视科学实验；他也特别念念不忘“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要虚实相继，以虚带实”，这不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彻底的唯物主义”等“以苏解马”哲学观念，而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承认数学中虚数存在的看法相一致。

自然世界的发生是一元化的，虽然也呈现多元格局，但嫖娼能化干戈为玉帛，她教民养蚕制丝的“科商”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不同于维京人的“持剑经商”---据宋文淼教授介绍：英国是第一个开启工业革命的。在这之前有一个长期的助跑阶段，是乡镇企业在英国繁荣了一、二百年，满山遍野的乡村企业到处都是。英国政府大量地鼓励英国乡镇企业和比利时、荷兰、爱尔兰、法国等国家的乡镇企业竞争，制定一系列贸易保护法令帮助他们创造欧洲和全球市场。而且这个乡镇企业的繁荣，是由一大批富裕的依靠全球殖民和奴隶贸易发财商人集团（阶级）帮助融资、组织生产和销售的，因为单门独户的农民不可能自己依靠劳动分工去组织企业、创造大市场，他们缺乏资金、原材料，也不知道销售渠道在哪里？知道了也无力控制和维持安全、惩罚欺诈。是这些商人把原材料拿给农民，提供信用担保，负责销售，同时还依靠强大皇家海军的武力保护。因此原始工业化阶段的出现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和中介，这个中介就是一大批在政府的支持下，通过全球贸易致富的商人，由他们形成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

维京人与“天下人”世界比拼的不同，宋文淼教授说：中国一直重视的是“语文第一”的教育，其实不是“语文第一”，而是“语文唯一”。在戊戌变法之前，国家教育实际上只有“语文教育”，根本没有“数学”的教育。中国没有“数学”，只有“算术”，而且“算术”也放在三教九流中的一个很低的位置。

今天在中国科学院或在一些大学里，都有一个地方供奉着我国伟大的数学家祖冲之。其实这个祖冲之也是戊戌变法以后才渐渐的扬名的。因为把圆周率算到了最高的精度，也只是属于“算术”的范畴。在西方现代数学史上，“算术”不属于“数学”，数学和算术是不同的：算术是一种生理本能的计算数字的能力；解放前，一些一字不识的农民，和农村的小商贩，在最简单的买卖中，都要用到十六进制到十进制之间变换的计算。那个计算实在也是很复杂的，但一字不识的他们大多会算——都是心算，连一支笔一张纸都不要，还算得很快，也很精确，比早期的电子计算器还要快。这就是中国人的特殊的本能；现在的一些“博士”也不一定会算。以后的人大概更不会算了，只要一按计算机，那些算术的问题都解决了。

宋文淼教授说：“数学”所要研究的不仅是数字的“计算”，而是数字演绎的“逻辑”。真正的“数学”实际上产生于古希腊。它有一个非常深奥的逻辑关系：这种“数学”，主要不是用来作数字间的计算的，而是发展人“科商”思维能力的重要的学问。但是这一点又并不能完全否定毛主席一生的伟业：他的坚定不移的反对外来侵略，他彻底的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儒家思维中的僵化的等级观念和封建的宗法统治。把变为工人阶级一部分和追求先进科学观念的知识分子，进行压制造成的障碍，是一股极端地放大那段时期的错误，而对于毛主席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的反省如若罔闻。嫫祖有没有科商？有科商。如果说嫫祖教民养蚕制丝，在远古联合国类似英国开启工业革命之前开启满山遍野的乡村企业，也到处开启养蚕制丝等原始社会手工作坊，还放大了嫫祖的“科商”。那么毛主席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承认数学中虚数存在的看法相一致，有没有科商？毛主席的科商从哪里来？

众所周知，毛主席作为湖南韶山冲的一名农家子弟，他冲入的是中国政治舞台，但他对物质无限可分联系科商中国梦的兴趣，最早起源何时何地？其实1918年8月19日25岁的毛泽东，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第一次来到北京。1918年9月底，毛泽东经北大杨昌济教授的介绍，到李大钊任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负责报纸阅览室15种中外文报纸的管理。在这里能查阅到中国更多的古籍，为青年毛泽东提供了一个造福人类，接触从自然科学统一方面放飞新思想的广阔天地。例如，在北大的短暂6个月，毛泽东每天通过管理和阅读报刊，听来来去去的北大师生们议论各种热点新闻，他第一次听到脑洞大开的爱因斯坦的名字。爱因斯坦对世界有何冲击力？早在这的1907年至1915年间，爱因斯坦建立的广义相对论，到1916年3月完成总结性的论文《广义相对论的基础》，

给物理学带来了新的创造性的思想观念，例如爱因斯坦预言质量会影响时空的流动。1917年3月25日爱因斯坦在普鲁士科学院作“引力的场方程”的学术报告，11月发表“用广义相对论解释水星近日点运动”。同年爱因斯坦发表的爱因斯坦-布里渊-克勒方法（EBK方法），能够构造一个经典系统的量子力学版本，著名的氢原子的玻尔模型就是一个简单的例子。1918年爱因斯坦又建立了一套描述原子辐射和吸收电磁波过程，促成现代量子电动力学发展的普适理论。

特别是毛泽东在第二次到北京时，听到1919年5月29日在南美洲和非洲发生日全食，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和剑桥大学天文台分别派出日食远征队到巴西和西非观测，1919年9月英国天文学家观察日食的结果，证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经得起考验的科学理论，11月6日消息公布后全世界为之轰动。但毛泽东看到这类科学信息，对此时的中国还不过是身外之物。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没有条件学科学。毛泽东从湖南农村走出，他在北大图书馆能不时注意到，西方自然科学的新奇发展，与中国古代文献中的物质可分科学有不同寻常的同工异曲之妙。由此，毛泽东在当时和后来能想到中国古代文献中的物质可分科学，实际也曾是他想尝试开辟物理前沿科学的统一之梦。毛主席的初心是中国要中国化。但离开《盘古王表》，中国化只能是空话。何新教授类似说，维京人的学者爱伪造西方古希腊、罗马英雄历史。但不能不说“天下人”的学者，其实也在不自觉配合维京人爱真想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远古联合国历史——只因远古巴蜀盆塞海干涸，文明遗存被以后历代的开发和争夺消灭的荡然无存。

那么《盘古王表》求真有没有收获？仅举3例。A、韩国丝绸学会会长朴在明，编辑出版了《世界蚕丝绢年表》——他以1927年我国山西夏县发现的蚕茧科学测定的时间，即约公元前3000年为开始作纪年。那么中国模糊上古历史的惯例，要杜绝类似两岁的嫫祖和80岁的黄帝结婚生子的笑话，很简单又科学的办法，就是以常识统计的一个人能活的寿命的年龄段、能生育的年龄段、能干国家大事的年龄段，来限定比较校对我国惯例的模糊上古历史更精确的误差。于是在十多年间，笔者利用何拔儒破译流传的盐亭天垣《盘古王表》，搜集了全世界亚、欧、非、美、澳洲近百个重要国家的通史，以其中有大约纪年的远古人类活动事件、考古发现和科技发明作比较、鉴别、选择、调整完善。例如我国的考古发现，约公元前3000年前的商代才有青铜器的使用，但乌克兰的考古发现，约公元前6000年前就有青铜器的使用。如果作“远古联合国”看待，青铜器的使用就不应该在约公元前3000年前，而应在



约公元前 6000 年前也有可能。所以《嫫祖年谱初探》在《四川丝绸》发表后，引起吉林省蚕业研究所所长李景洛教授的重视，被介绍韩国和朝鲜，才引起韩国和朝鲜的重视。

B、笔者的《嫫祖年谱初探》最初公开，是在《四川丝绸》1993年第3期上发表的。因年谱中提到：约“公元前3092年，为开辟丝路，嫫祖轩辕巡视东北，并到了朝鲜”。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主席重视朝鲜上古史研究，据《参考消息》报道，1994年金日成主席生前为此视察了檀君陵。因为朝鲜自古就有“檀君神话”，传说天帝之子桓雄天王率领3000人马自天而降，来到太白山顶的一棵神奇的檀树下，造就了古朝鲜开国鼻祖檀君王俭，在平壤市郊江东郡的檀君陵现还存在。尽管日本曾盗掘过该陵墓。在金日成主席的指示下，后朝鲜社会科学院还是在陵墓中发现86块人的遗骨和一些遗物，经现代科学手段的多次检查，证明遗物的年代是约公元前3016年的。这可以说《嫫祖年谱初探》经受了一次严峻的国际考验。

C、在盐亭和绵阳，反对嫫祖的人不说，就是赞成嫫祖的人，也有90%反对《嫫祖年谱初探》。理由是远古历史研究只能“宜粗不宜细”，这是惯例。有的人还讽刺说：“有人连他的妈、他的婆的历史都不清楚，还能知道嫫祖妈、嫫祖婆？”甚至有的说：“四川地区落后，中原先进，嫫祖配已经是皇帝的黄帝，就像今天年纪小的打工妹，嫁给发达地区年纪大的大老板，只能做二奶一样”；而赞成嫫祖的人也说：“连司马迁都没搞清楚嫫祖的很多事情，今天谁还能搞清楚？”《嫫祖研究》一书出版后，绵阳日报社送给了绵阳《剑南文学》杂志的主编谢宗年主编几本。1993年开盐亭县嫫祖研究会成立大会，邀请谢宗年主编作特邀嘉宾参加，他写出《上古文明史的新发现---浅析<嫫祖研究>的学术价值》的论文，并打印出了五、六十份，准备带到会上去宣读。后来他回来告诉笔者，他根本不敢宣读论文，只能改作泛泛的发言，并把他打印出了论文带回来送给笔者。他说，他论文中涉及高度评介《嫫祖年谱初探》的内容，到会一听，才知连主宰大会的大部分人也反对“嫫祖年谱初探”。所以他后来在绵阳市社科联的《绵阳论坛》杂志正式发表时，就把这一部分内容删去了。

谢宗年主编当然清楚，绵阳有作家在他主编的《剑南文学》上发表文章，写传说三千年前黄帝到过三台县的三元丝厂那个地方。因此如果说《嫫祖年谱初探》“假”，没有比惯例的模糊上古历史“假”的了。所以直到国家公布要搞夏、商、周断代工程

后，这种众口一词的局面才被打破。嫫祖教民养蚕制丝，在远古联合国类似英国开启工业革命之前开启满山遍野的乡村企业，也到处开启养蚕制丝等原始社会手工作坊的“乡村企业”，而放飞的嫫祖“科商”。但为何以后消失？是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在盆塞海干涸后，转移到中原的黄土农耕文明，不适应养蚕制丝“乡村企业”规模发展。

科技生产力的持续依赖于全球产供销产业链系统的制约，是在形成世界的统一性中产生。“远古联合国”的解体，各国家或民族、群体，通过类似法律手段的克服战争或大的自然灾害等形式，只能艰难曲折。如果中华民族的上古史，存在盘古文明式的“远古联合国”现象，那么可说直到鸦片战争时的这种“天下莫非王土”的远古联合国的追思，才被后来维京人“持剑经商”的全球产供销产业链系统破灭。

因为天下莫非王土的“王”字，不是指“国王”，而是应作全球化“统一”解读。如果宇宙的起源，发生于150亿年前宇宙大爆炸，科学家们连宇宙大爆炸时的万分之一秒一秒的事情，都能搞得很清楚，那么中华民族起源不过一万年，就喊“宜粗不宜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融进全球产供销产业链科技系统的表现。对属于“科商”的一些基本科技原理和实验方法，没有近10万到100万粉丝事先形成的兴趣；有实验，甚至论文公开发表，也不能像近100多年来诺贝尔科技奖评审、验证，产生的“以下推尖”的集群效应和集聚效应。

## References

1. Baidu. <http://www.baidu.com>. 2020.
2. Google. <http://www.google.com>. 2020.
3. Journal of American Science. <http://www.jofamericanscience.org>. 2020.
4. Life Science Journal. <http://www.lifesciencesite.com>. 2020.
5. Marsland Press. <http://www.sciencepub.net>. 2020.
6. Marsland Press. <http://www.sciencepub.org>. 2020.
7. National Center for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 U.S.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 2020.
8. Nature and Science. <http://www.sciencepub.net/nature>. 2020.
9.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http://en.wikipedia.org>. 2020.